

中华口述历史丛书

左玉河

主编

黑暗下的 星火

——伪满洲国文学
青年及日本当事人
口述

齐红深 编著

大象出版社

揭秘日伪血腥内幕

幸存者的记忆，惨绝人寰的经历

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ISBN 978-7-5347-6836-1



9 787534 768361 >

定价：45.00 元

中华口述历史丛书 / 左玉河 主编

黑暗下的星火

——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

齐红深 编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下的星火/齐红深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347-6836-1

I. ①黑… II. ①齐…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1684 号

中华口述历史丛书 黑暗下的星火

出版人 王刘纯
策划编辑 杨吉哲
责任编辑 杨天敬
责任校对 李婧慧 毛 路
书籍设计 王翠云
监 制 杨吉哲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18号 邮政编码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郑州华中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83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新郑市郑新路

邮政编码 451100

电话 0371-62690808

鸣 谢

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大连枫叶教育集团

中国近代口述历史学会(美国纽约)

编 著 齐红深

访谈整理 (以姓氏笔画为序)

门熙鼎	车富川	齐红深	许铁舰	李立冰
张 博	严玉波	邱俊贤	金素兰	赵 贇
姜 涛	蒋 翠	詹洪阁	蔺淑艳	魏正书

图片提供 刘晓丽 詹洪阁 徐 彻 齐红深

“中华口述历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 虞和平 周新国 庄建平

主 编 左玉河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伟志	丁守和	马 勇	王 炎	王桢林
车 前	左玉河	朱汉国	庄建平	刘志琴
祁龙威	杨天石	李亚娜	步 平	张宪文
周新国	荣维木	耿云志	耿相新	梁景和
程中原	虞和平	谭继和		

序

刘晓丽

“抗战文学”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谈论解放区和国统区文学时对此都有涉及，但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对此却少有细致的描述，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伪满洲国文学一直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忽略，这期间的抗战文学也一并被忽略掉了。二是研究资料的缺乏。我在采访中得知，当时东北就有秘密的抗战刊物《东北民众报》《满洲红旗》等，萧红为《东北民众报》画过插图，赵一曼、杨靖宇等抗日将领都在《满洲红旗》上面发表过诗作，但这些刊物都没有被保存下来。三是在伪满洲国的确没有出现如法国维希政府时期出版的有代表性的、影响巨大的“地下文学”。

我在考察东北伪满洲国时期文学时，限于资料只提到了“东北左翼作家群”这样一个抗战作家群。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迁至哈尔滨，并以哈尔滨为中心开展了左翼文艺运动。这个作家群以金剑啸、舒群、罗烽、姜椿芳等共产党作家为核心，萧军、萧红、白朗、林郎、塞克、小古、金人、关沫南、山丁等文学青年积极参与其间。这个作家群的文学活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后来在关内文坛著称的“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为主，他们的作品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具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和抗日意识。代表这个时期较高文学成就的是萧军、萧红二人的作品集《跋涉》。随着伪满洲国文化控制的加强，东北左翼作家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迫于压力，一部分作家远走他乡。留下来的作家继续进行文学活动，东北左翼作家群的文学活动进入了第二阶段。“哈尔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开始活动，据当时的主要成员关沫南回忆：“当时虽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学习、阅读上却是不受约束的。既读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也读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既读俄国十月革命文学《铁流》《毁灭》《夏伯阳》，也读安那其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传》，巴古宁、高德曼的《狱中记》；拿日本文学来说，既读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叶山嘉树、洼川稻子等左翼作品，也

读新感觉主义的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和早期的片冈铁兵。”^①这个阶段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方式有所变化,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倾向。作品的内容有阶级矛盾、民族压迫,也有个性解放和人性的压抑和困惑。1941年的“一二·三〇”事件和“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1942年的“七二七”事件,这些文学事件彻底破坏了东北的左翼作家的文学活动,绝大多数的左翼作家被捕或被杀。“左翼文学作家”的称号在一些东北老作家眼中是最高荣誉,当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复称萧红为“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时,包括萧军、舒群在内的东北老作家非常兴奋,这个本应属于他们的称号终于给予了他们。

齐红深教授的新作《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为伪满洲国时期文学研究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维面。我读过花喜露(田贡)和驼子的诗,看过矜人、铁励、赤婴、力菲等人的小说和散文等作品,也曾到过辽宁盖县寻找过《星火》的刊物,我把这个文学团体与当时在南满地区兴起的其他文学小社团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他们是一群有志于文学事业、有爱国情怀的青年自发的文学组织,为东北地区的文学复苏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齐红深教授编著的这部著作让这个文学团体呈现出更丰富的内容,他以史学家的观察视角切入“星火”文学社团的各种活动,在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和“协和文学”的社会背景下,凸显他们的抗日情怀,并把这些内容还原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始于具体,终于具体。

亚里士多德说过“历史旨在具体”,历史处理的是实际已经发生的事情。诗人讲述一个似真的故事,而历史学家则就往事力图做出可靠的陈述。历史学家约束自己,在探究所确定的事实的基础上讲故事。历史学家赢得读者信任不是靠他的故事似真,而是通过向读者透露信息的源头,指明证据的可靠性基础。齐红深教授严守历史学家的职责,搜集整理近百名中国和日本亲历者的口述史料,把一个真实的抗战文学团体呈现给读者,他努力确证证据,对于不能确证的证言交付读者自己鉴定。齐教授和他的课题组深入到亲历者的记忆深处,拨动他们已经惯于掩饰的感情神经,努力复原被岁月磨平了的情节,修补破碎了的生活细节,挖掘事件本身的内在联系和动因,尽可能地向读者呈现历史本身的丰富多彩。书前对伪满洲国文学进行综述,书末又有同龄作家的自述,勾画出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立体图景,点面结合,为观察“星火”同人提供了客观参照,增加了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这样的历史书可读性强,容易让读者对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学团体有比较生动的印象。可以说,《黑暗

^① 关沫南:《花秋月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把口述历史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全书有故事性、有线索、有人物形象、有细节、有情感、有见解，能发人思考，可以与被誉为“四大抗战小说”之一的《滚滚辽河》（《葬故人——鲜血上飘来一群人》）和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相媲美。

齐红深教授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后来专治日本侵华教育史，承担过多项国家重点课题。多种专业素质使他在本课题研究上发挥出独特的优势。我与他相识于2003年。那年暑假，我到沈阳查阅伪满洲国时期的报刊杂志，采访林郎先生、田兵先生、李正中先生、朱媿女士、崔束先生、杨絮女士、刘丹华先生、张鸿恩先生、里扬女士、韩彤先生等曾经在伪满洲国从事写作的老作家，经友人介绍有幸结识齐红深教授，我们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我被齐红深教授的工作热情和毅力深深感动，他已经自筹经费在“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领域辛苦工作20多年。他与他的课题组克服重重困难，与时间赛跑，从死神手中抢救、搜集到1300多人近1亿字的口述历史；与日本人争夺，从民间搜集到数千件我国官方没有保存的殖民地教科书等实物原件。齐红深教授的工作精神也感染了我，激励我完成自己的工作——“口述伪满洲国时期文学史”。与齐红深教授有同感，与那些曾经在伪满洲国生活的人们在一起，和他们面对面地注视、交谈，询问他们所经历过的具体事件，仿佛穿越了历史时空的隔阂，曾经的往事再度被还原，他们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事实上的澄清，更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不能让那段历史无声无息地消逝。齐红深教授缺乏科研经费，更无力支付出版费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工作热情和毅力。一次通信中，他写道：“口述历史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愈加显现。我不相信，诸大的中国会没有出版机构愿意出版这些东西。”的确，中国的出版界没有忽略这些历史的记忆与辛苦的劳作，近年来看到齐红深教授所编著的口述历史著作陆续问世，如《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满洲”オーラルヒストリ——“奴隶化教育”に抗して》（竹中宪一译，日本皓星社，2004年）、《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辽海出版社，2005年）、《日本对华教育侵略》（昆仑出版社，2005年）、《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大象出版社，2008年）。现在又有《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即将出版，令人欣喜。

我注意到齐红深教授在本书“导言”中引用65年前田贲应《盛京时报》之约，写给“畸形中发展的满洲文坛”的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之后说：“我们有责任进行一场抢救，把前代没有能够具现的生活‘从纸上具现出来’。是的，我们应当承担起这个责

任。”

保存历史,既有赖于学人的努力,也有赖于出版界的支持。让我们共同努力。

2008年12月于上海中江路公寓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

导言

齐红深

本书是关于“星火”文学团体的口述历史。

“星火”是伪满洲国最年轻的一个文学团体。镇压“星火”的“桃园事件”是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制造的最后一个大惨案。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星火”同人在法庭上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星火”同人因爱书、爱文学而走到一起；因爱国而被日本侵略者拘押、杀害；也因后来参加不同党派使回忆罩上不同的色彩。

专家审阅本书时把它与美籍华人纪刚的《滚滚辽河》^①并提。我们对此褒扬不敢承领，但本书以下几个特点，应当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如果影视工作者将它搬上银幕，兴许有较高的收视率。

一、伪满时期青少年自发爱国团体的动人故事

1934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年。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大规模武力“围剿”，使东北抗日武装力量损失殆尽，殖民统治日益严密。溥仪在日本关东军操纵下，“登基”称“帝”。

^① 纪刚，本名赵岳山。1920年生，辽宁省辽阳县人。东北沦陷时，参加“东北抗战机构”，辽宁医学院医科毕业，曾任台南第四总医院小儿科主任，在台南开设儿童专科医院，后定居于美国洛杉矶。著有散文集《诸神退位》《做一个完整的人》，历史纪实性长篇小说《滚滚辽河》等。《滚滚辽河》以其在东北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经历糅合爱情故事，表现“生命写史血写诗，革命误我我误卿”的主题。1969年8月起在台湾《中央日报》副刊连载。1970年《滚滚辽河》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由吉林延边人民出版社以《葬故人——鲜血上漂来一群人》为题印行简体中文版，后来又被翻译成日语。该书在国内外再版近百次，发行量达千万册，被誉为四大抗战小说之一。

辽南文化名城盖平县(今盖州市),美丽富饶,交通便利,地处南满铁路沿线,濒临营口港和大连港。本书中的爱国文学青年与日伪满的斗争就发生在辽南这块被中国文化滋养的土地上。

一个名叫花喜露(田贲)的满族青年,从奉天省立第三师范(校址在海城)毕业回到原籍,到盖平县归州村两级小学校当老师。那年,他22岁。在“星火”同人中是年龄最大的了。故事从他辅导小学生办墙报开始。

另一位主要人物名叫于家麟,是个驼背,自称驼子,小花喜露1岁。他的父亲是奉系军队的一个团长。日本占领家乡后,他从盖平中学弃学回家,经常在伪满公开发行的《大同报》《泰东日报》《明明》《凤凰》《新满洲》《华文大阪每日》等报刊上发表新诗和短文。

他们二人和王克范、李光海等交上朋友,相互之间传阅书籍,交流读书心得、写作经验。

1936年,他们联络当地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成立了“L·S(鲁迅)文学研究社”,自编油印刊物《行行》《星火》,分发传阅。

1939年,他们结识了《营口新报》文艺副刊编辑王觉。王觉帮助他们把《星火》搬上《营口新报》公开发表。后来,由于王觉要把《星火》与另一个文学副刊合并,花喜露与他产生意见分歧,《星火》被迫停刊。

王觉与花喜露同岁。他的真实身份是营口地区国民党地下党部书记长。

“星火”的大多数成员是盖平县一高、二高和女子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他们爱交友,好读书,喜欢写作,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1941年,花喜露在本村留日青年学生救国会成员田琛(后为伪满国务院官需局属官、中共地下党长春地区负责人)影响下,参加抗日救国会,到奉天(沈阳)以大东区凌云街公所职员身份为掩护,搜集军工厂生产、思想动态方面的情报工作。同时继续关注伪满文坛,通过学生的关系,指导盖平县、本溪中小学生的读书活动,后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些青年在他的影响下偷偷入关奔赴抗战前线。于家麟经王觉、李光海介绍,秘密加入国民党,一起到“新京”(长春)组建“新时代”出版社。不久,日伪统治者进行“一二·三〇”大逮捕,王觉英勇牺牲,于家麟、李光海逃回盖平,与门文东、王锡成、张克恩等创办了“秋灯书店”,引导中学生开展“读书会”活动。中学生又创办了《大地》《辰星》油印刊物。同时,他们也经常去奉天为国民党搜集情报。

1944年4月至5月,日本特务在奉天、本溪、营口一带进行大搜捕,制造了代号为“桃园事件”的大惨案。

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花喜露在奉天、地下国民党员于家麟和无党派人士王克范在盖平首先被捕。

盖平一高、二高、女高 24 名学生也先后被捕。

随后,新京(长春)、吉林、奉天、本溪、海城、熊岳、瓦房店、盖平等地数十人与“星火”有关的社会人士、大学生被捕,共约 100 多人。家属、朋友和帮助过他们的人也未能幸免。

被捕者无不遭受严刑拷打。狱中或出狱不久重伤致死者有 10 人:花喜露、王克范、李勤甫、许默语、许庆春、杨伯甫、门恩义、王盛伦及家属 2 人。

1945 年 5 月 4 日,伪奉天省高等法院以“治安法违反”罪,对盖平女高的姜静芳、穆玉琪、侯赓芝、赵俊芬,盖平一高的杨士绵、李吉恒、高玉元、赵廷奎、张文廷、洪声钜、关振国、张登玉、赵怀藩、李如东、赵宝丰、李连泰、赵俊久,盖平二高的周建涛、王德祥、于恩惠以及社会上的孔庆举、汪士硕、李季生、李明轩、阎家珍等 25 人判处 3 年“犹豫执行”,放回家由当地警方监视。

8 月 9 日,监狱预通知以“治安法违反”罪判决于家麟死刑,门文东无期徒刑,张继宽 20 年徒刑,花喜露、王锡成、张克恩 15 年徒刑,郁庆令(铁汉)、鲁启智、迟金镇、李昌毓、臧永昌 5 年徒刑。

8 月 15 日,于家麟、门文东等人被押到伪奉天高等法院,正待宣判,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8 月 19 日,被判刑的 11 人出狱。

“星火”同人在敌人的监狱中英勇不屈,顽强斗争,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花喜露在狱中写的英雄主义诗篇《我是王》流传出来,成为鼓舞东北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的响亮号角。

花喜露因在狱中受酷刑致重病,于 1946 年 6 月 13 日去世。1982 年,他和王克范一起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于家麟出狱后受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书记长委派回盖平县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并任书记长。不久被长春派来的国民党驱逐回家。1951 年镇压反革命时,于家麟被判处 15 年徒刑。

1956 年 6 月 9 日至 7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公开审判外国侵略者。“星火”同人于家麟、王锡成等人出庭控诉,用大量确凿的证据,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起了旁听群众的极大义愤。

一群才华横溢的青年，
 一群天真浪漫的学生，
 正是嗜书如命爱好写诗的花季，
 在日本铁蹄蹂躏的年代，
 读与写怎样点燃文学的星火？
 星火怎样燃起曲折的故事？

我是王，
 把生命发出万道光。
 监狱里没有阳光，
 我怀揣十万个太阳。
 烈火中化作凤凰，
 折断翅膀也要飞翔。

我们历经周折，寻找当年的“星火”同人和“桃园事件”亲历者。他们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和感受，口述“星火”的形成、发展、遭受镇压、狱中抗争的曲折经历，构成鲜活、多元、生动的历史故事，层层揭开迷雾和灰尘，还历史一个真实和公道，使爱国主义的铁凤凰放射出光照日月的万丈光芒。

二、披露日伪时期第一手文学史料和感人肺腑的抗战诗篇^①

“星火”文学是抗战文学。可是，目前的几十种《中国文学史》版本中都没有关于“星火”文学团体的介绍和评价。

历史震撼人心。“星火”文学团体的作品同样令人震撼。本书不仅是伪满时期文

^① 本节参考了刘晓丽《发现的“满洲”——对1932—1945年中国满洲地区文学的一种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申殿和、黄万华《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纪刚《抗战时期东北的文学活动》（美国《世界日报》1995年9月）；吕钦文《东北沦陷时期文学》（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学》（靳丛林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特此致谢。

学青年由自发到自觉的抗战故事,也是一部揭秘文坛往事的伪满洲国文学史。

日本统治下的东北地区,文艺界的形势错综复杂。主要情况是:

1. 日本殖民统治者竭力推行妄图灭我种族、灭我文化的奴化教育和“协和文学”

九一八事变之后,早就活跃于“关东州”(大连)的日本文化团体急忙向全东北扩张,灌输日本殖民文化。早就与关东军相呼应的橘朴、小山贞知等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人开始以伪满“建国精神”为基调进行创作,提倡“适应新国土的满洲文化”。1937年6月,他们在大连组织了“满洲文话会”,企图主导东北文学全面向日本殖民化方向发展。1937年9月,伪满民生部社会司和“满日文化协会”共同召开了文艺和睦会,促进各地文艺团体和文艺界人士加强“协和”“善睦”。1938年,日伪统治者主导的伪满文艺界活跃起来,《同人》杂志、《作家》文集陆续刊行,伪满民生部大臣奖、盛京时报文艺奖、文化会奖、满蒙文化奖、王氏文化奖等名目繁多的评奖活动陆续出台。

1941年3月,为了与军事侵略、经济掠夺需要相适应,日本殖民统治者制定了《艺文指导要纲》,规定伪满文艺要“以(伪满)建国精神为基础,是为八纮一宇(扩大侵略至全世界)精神之美的显现”,为“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的圣意”而存在。日本侵略者用刺刀指挥笔杆,强令以“日本艺文为经,原住民族固有之艺文为纬”,发展“康德文学”“国策文学”。文艺团体、文艺创作活动一律由日本占领者及汉奸政权“直接指导”。成立了伪“满洲艺文家协会”等由日本侵略者严密监视、一手控制的御用组织。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又大肆鼓吹“决战文学”,多次召开“文学者报国会”“大东亚决战文学者大会”,将日本及其殖民地文人纠集在一起,鼓吹“大东亚共荣圈文化”,驱赶文人到前线、工厂、农村“视察”,编造掩盖失败、粉饰现实、欺骗人民的“宣报文学”。他们不断强化文学书刊发行、出版法令,疯狂迫害进步文化人士。“反匪排共”“东亚明朗”“圣战完遂”成为这一时期作品基本的主题。同时,大批日本法西斯文学作品被源源不断地翻译、介绍到东北沦陷区。报刊上经常刊登“时局作品”“东亚必胜小说”“决战吟”等专刊、特辑,直接发出战争叫嚣。

2. 传承五四新文学运动和中华文化命脉的作家和作品普遍存在

刘晓丽认为,既顺应殖民统治又能传承五四新文学运动和中华文化命脉的作品是当时东北地区文学的主流,“没有他们的文学活动就没有当时的满洲新文学”。“这些新进作家,大致形成以下几个作家群落:早期南部文学小社团作家群,《明明》《艺

文志》同人作家群,《文选》《文丛》同人作家群,《作风》同人作家群。这些身处凄厉变幻时空的敏感的心灵不会沉默,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来感知周遭。他们没有家园,没有明确的文化身份,在夹缝中求生存、求文学。他们有的听命于某种召唤,以文学为工具进行各种层面上的抗争;有的在探索文学自身的各种可能,以此确定生命的意义;有的用文字来安慰、麻醉自己;有的为破碎的虚幻的理想而写作;还有人为生存而写作,为权势而写作……这些写作者用文字来感受粗砺的异态的生存时空,把一种特殊的生活体验、精神感受和审美追求带入文学,出现了区别于其他时段、地域的独特的文学图景。^①

《明明》《艺文志》同人作家群中的大部分人供职于伪满政府和文化机关,几乎都参加了官制的“满洲文话会”和“满洲文艺家协会”,并在其中担任一定职务,也发表过和他们当时身份相符的言论,他们的文学活动也受到了日本的资助和奖励。当时执文坛牛耳的古丁,曾以长篇小说《平沙》获伪“民生部大臣奖”,担任“满洲文艺家协会”审查部副部长,代表“满洲国”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但日本统治者始终认为他是个“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敌人。古丁以写杂文著称,其笔法类似鲁迅,“太苛里有真理”“太冷里有创见”。他的文艺类杂文思想力较强而且具有一定的深刻性与启示性。古丁主张要在继承传统、向民间文学和外域文学学习的基础上发展。他强调“满洲”(东北)文学要有“屈原、杜甫、鲁迅,在传承着的一贯诗魂”。主张用“自己的母语”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用“写印主义”使汉文作品占领满洲文坛。

3. 消遣性的闲情文学风靡文坛

有和江南“鸳鸯蝴蝶派”相似的市井言情小说,有传统的武侠小说,有幽默小说、侦探小说,还有一些诗词、小品。这些作品主要刊登在当时著名的“满洲五大杂志”《兴亚》《青年文化》《新满洲》《新潮》《电影画报》上面,或以单行本刊出。这些诗词、小品强调性灵的流露,注重趣味性,大部分是吟风弄月、浅吟低唱、闲愁闲情之作。他们的文字虽然无补于国仇家恨,但也疏遣了自己的情感,安抚了孤寂的民众心灵。

这些在敌伪严密统治下,透过种种限制,坚持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及其作品,在日本摧残消灭中国文化政策的背景下,有意无意地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守护者和中国新文学的播种耕耘者,使身处殖民地的东北青年仍能接受纯正的中国语言文化熏陶。他们的作品虽不时使用些日语的名词和句法,但不同于“协和语”,反倒丰富了中

^① 刘晓丽:《发现的“满洲”——对1932—1945年中国满洲地区文学的一种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国文学写作上的词藻和语汇。

4. 进步文学、抗战文学虽顽强生存,但随时随地可能遭到残酷镇压

1932年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迁至哈尔滨,革命文学活动曲折地发展起来。共产党派人进入《哈尔滨新报》,创办《新潮》副刊,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揭露日本统治者的反动和黑暗。为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共同战斗,扩大党的宣传舆论阵地,1933年,罗烽、姜椿芳、金剑啸等人受党的指派,与进步作家萧军、萧红等一起在《大同报》创办《夜哨》文艺周刊。《夜哨》共出刊21期,以鲜明的色彩、犀利的锋芒和清新活泼的面貌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李文光的短剧《黎明》、金剑啸的短篇小说《星期天》、罗烽的《口供》,无情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奸淫烧杀,实行白色恐怖的罪行,痛斥了“民族协和”之类的欺骗宣传。罗烽的独幕剧《两个阵营的对峙》借精神病患者之口,发出“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的革命呼喊,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觉醒反抗的心声。萧红的短篇小说《夜风》、李文光的中篇小说《路》则通过形象的画面,热情赞颂穷苦人民奋起革命,反抗日本侵略者和地主阶级的武装斗争,给受压迫人民指出了摆脱苦难、走向新生的正确道路。

1933年10月,萧军、萧红的小说、散文合集《跋涉》出版,这是东北沦陷后第一部文学创作专集。这些作品摒弃虚伪与粉饰,以一幅幅生动的图画,描绘出东北沦陷时期“下层的被毁辱与损害的人们”浸透着血泪的悲惨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走向反抗、斗争的思想进程,显示了清醒、执著的现实主义特色。

《夜哨》被迫停办之后,1934年春,由白朗在《国际协报》上主编《文艺》周刊。罗烽、金剑啸、萧军、萧红、山丁等人又转移到这一新的阵地,继续从事进步文学活动。在白色恐怖下,《文艺》周刊共出刊42期。在此期间,萧红还在《国际协报》上发表了小说《麦场》、《麦场之二》,这便是后来得到鲁迅关怀和支持、在上海出版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的前两章。

敌人统治日益严酷,进步作家频遭迫害。1934年,罗烽被捕,舒群、萧军、萧红先后出亡青岛、上海,沦陷区进步文学受到沉重打击。东北各地报纸上的文学副刊,或被查禁,或为敌所用,或内容空虚,名存实亡。但金剑啸和林珏、金人、塞克等人仍坚持战斗。1935年金剑啸写下了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热烈赞颂抗日联军前赴后继、同敌人浴血奋战的英雄业绩和与人民不可分割的骨肉情谊。1936年夏,共产党人金剑啸惨遭敌人杀害。

除了受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左翼作家,还有国民党地下抗战力量和无数自发的爱国人士,坚持进步文学活动。姚彭龄在奉天设博智书局掩护印制秘密刊物。王觉、

于家麟在长春创立新时代出版社,出版忠义丛书及画刊。张辅三、王天穆等渗入长春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参与《青少年指导者》的编务。李季风在金剑啸开拓的《夜哨》停刊后,争得《长春大同报》副刊的笔政。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战斗性的作品,鼓动抗敌意识。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伪当局为安定后方,加强了对东北反日力量的镇压,制造“一二·三〇事件”^①和“贞星”事件^②等大惨案。革命文艺工作者多遭不幸,有关刊社,均告封闭。范紫等人出逃入关。杨野、李季风、光遯、关沫南、陈隄等人相继被捕。王觉、王天穆、张辅三等人刑死狱中。一般文化人也都如惊弓之鸟,噤若寒蝉。

花喜露、于家麟和他们组织的“L·S(鲁迅)文学研究社”的文学活动仍然在艰难地继续发展着。《星火》在《营口新报》上停刊后,在一般文化人也噤若寒蝉的极度恶劣形势下,又办起了《辰星》《大地》等新的秘密刊物,刊登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品。盖平的“读书会”成员进一步扩大,办起了一个半公开的书店。花喜露通过昔日学生的带动,把“读书会”发展到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并且办起了秘密刊物,宣传抗日爱国思想。1944年,日本侵略者以“通过读书研究文艺,发表作品,巧妙地向一般知识青年宣传抗日思想”为罪名,将他们残酷镇压。以花喜露的《我是王》为代表的狱中和出狱后的一批文学作品,达到了革命性、战斗性和文学性、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应当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抗战文学作品。

本书在伪满洲国教育、文化的背景下展开“星火”的曲折故事,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且通过大名鼎鼎的文人李季疯来访以及伪满作家的回忆和评述等,密切了“星火”与伪满文坛的关系,使得“星火”的活动成为伪满文学史中的一个灿烂的乐章。

① 1941年12月30日,伪满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警佐、原抗联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叛徒宋一夫化装成“中共中央特派员”,在哈尔滨召开会议,诱捕了东北左翼青年自发的反满抗日地下组织的代表。此后,在整个东北地区开展大搜捕,大约逮捕、判刑、杀害500多人。此为历史上所称的“12·30事件”。

② 1942年1月,日本侵略者先后破坏了石墨堂(石坚)领导的“东北调查室”、王文宣(王育人)领导的“东北铁路党员筹备处”和魏忠诚(罗大愚)领导的“东北抗战机构”三个国民党组织,逮捕240多人,入狱判刑约180人。由于是齐齐哈尔市日本宪兵队队长星宽敏负责侦破此案的,日本侵略者使用他的姓将此案称作“贞星事件”。

三、中、日两国多种身份的亲历者共同口述,形成一部多元、多彩的历史画卷

口述历史是以访谈的方式搜集亲历、亲见、亲闻及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记录不同人群的鲜活记忆与感受,并借此开创出更生动与多面向的历史回溯。而这些记忆与故事若是没有透过口述历史可能被永久隐埋和尘封。

“星火”之所以被众多的中国文学史所遗忘,正在于文本记录的缺失。

我们不由得想起67年前花喜露(田贲)应《盛京时报》之约,写给“畸形中发展的满洲文坛”的话:“我有时这样设想:若把今日的实生活真实地写下来,不麻木,不虚伪,不畏惧。(麻木使你失感觉,虚伪使你失真,畏惧使你失力。)把自己的生活,从纸上具现出来,自己看看,也会促使你更清醒些,更严肃些。把本身的生活,写成今代的野史,并不是浪费。也许在若干年代之后,会有人类的子孙,很愿一详这身际的童话的。世纪的也许嗜读此等野史的读众,并不必俟诸若干年代之后才会有的。”^①

当年,他们未能如愿地把“星火”的“实生活真实地写下来”,才造成今日史料的缺失。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应当秉承先辈的教诲,广泛访谈当年亲历者,把昔日的“实生活真实地”写出来,人们也许是很愿一详这并不算遥远的童话的……

我们有责任进行一场抢救,把前代没有能够具现的生活“从纸上具现出来”。

20世纪80年代,花喜露的事迹在盖县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得以初步整理。而于家麟等人的事迹却被人为地割舍,造成了“星火”文学团体的断裂和整体失色。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口述历史这种多元化的历史呈现方式逐渐兴起。

让历史见证人不再做被沉默的他者。本书的口述人既有后来加入共产党和革命队伍的“星火”同人、文学爱好者,也有后来加入国民党、解放后一度处境困难的“星火”同人及其家属,还有有关的东北沦陷时期作家,而且有制造“桃园事件”大惨案的日本战犯和当事人。

口述者具有丰富的层面。“星火”文学团体的事迹是完整的和立体化的。一直延续到几十年后的影响和感受。——这是本书的最大亮点。

需要说明的是,口述历史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口述历史难免留下记忆“褪色”和

^① 山川草草:《期待于今年者》,载《盛京时报》文学版1943年1月4日。

经受时代“风化”的痕迹与残缺,因而我把口述历史称作“历史的化石”。^①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人虽不会如“瞎子摸象”那样各执一词,也会形成不同的记忆。假如我们在日本投降之后就访谈那些从监狱里刚刚出来的当事人,假如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审判日本战犯时访谈他们,假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访谈他们,听到的内容肯定会与目前的记录有着某些微妙的差异。这是因为口述者在历史事件中所处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他们的身份和政治色彩不同,加上岁月流逝过程中在外界的影响下修正自己的记忆和看法等诸多复杂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因素,因而,口述历史带有叙述者的主观意识和特有的用语。与档案资料相比,这是口述历史的独特魅力,也因此而更具社会文化学上的认识价值。我们透过分析,可以解读和推测历史事件背后与当时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意义、该事件对人与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与人对该事件记忆所造成的影响。

据“星火”当事人门文东说: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都追查各种历史问题,特别是与国民党有牵连的问题,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前几年在回忆辽南青年文学活动时,都尽量不提国民党,回避不了时就尽量寻找与国民党的分歧。在这种背景下,有人夸大田贲与国民党的矛盾就可以理解了。虽然没有说与于家麟有矛盾,但是给人的感觉,既然于家麟加入了国民党,田贲和于家麟也就保持距离了。这种状况在本书中的部分口述历史中有或多或少的存在。

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遗症,导致具有共产党背景的口述者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口述中尽量不提于家麟。到了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他们就不再刻意与之划清界限。国民党背景的当事人也改变了原来沉默的态度和对某些人的怨气。我们如实地记录整理口述内容,尽量保存各种意识形态的编码,保存历史细节和不同看法,在大是大非中尽显点点滴滴。避免用个人的观点取舍亲历者的口述内容而影响读者对历史本来面目进行探索和判断。使历史保留本该具有的生动性、多元性和丰富性,读起来更加鲜活和亲切。

历史具有复杂性。导致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构成事件的元素往往不是单一的。比如,关于著名作家李季疯的三次逃跑和投奔于家麟,关于“星火”团体被破坏的经过,我们在访谈中听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有的没有提供什么根据,只是当事人的耳闻或推测。亲历者会随着时光远离我们而去,我们有责任如实记录亲历者的口述

^① 参见齐红深《“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研究”课题报告》,载齐红深主编:《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内容,尽可能给后人留下思考和研判的丰富的素材。我们不是判案,也没有做认定结论的责任,所以没有进行核实和取舍。当事人为什么会这样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怀疑?这可能与他们的处境和获得的某些信息有关。我深信:读者比我们聪明,后来的人比我们更聪明。我们不想用自己的思考来剥夺读者探索、认识历史的权利。

四、“星火”能够在严密的殖民统治下生存、发展,其原因发人深思

本书由不同阶层的亲历者口述“星火”的历史,让直接和间接经历过事件的历史主体发声,成为一个多元的价值中心。读者和后代的人透过这一事件的故事述说定会获得启发。我作为主要访谈者,有幸直接听取亲历者的述说,内心里曾经一次次激起波澜和思索。在此,我愿意与读者分享。

我们思考最多的是,在日本殖民统治如铁桶般严密的伪满洲国,几个年轻人自发组成的文学团体,为什么会发展壮大成令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害怕的反日力量?

“星火”同人,这些当年二十几岁甚至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不曾被日本侵略者血腥的屠杀所吓倒,向往祖国、向往进步的热情也不曾被敌人的严密统治所禁锢。日本殖民统治者大肆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王道乐土”来麻痹人民的思想;千方百计抹杀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查禁爱国书刊,不许出现“中国”“中华”等字样,不许说自己是“中国人”,极力培养学生和民众对“满洲国”的认同感;严密控制学校,强化“建国(满洲国)精神”教育,搞“东方遥拜”,举行孝忠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的各种仪式,加强军事训练、“勤劳奉仕”等活动,目的是把小学生培养成“满洲国”的“忠良国民”,把中学生培养成“中坚国民”。以至于在日本投降时,有些年轻人听到“我们是中国人”这句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话,却感到疑惑不解:“我们不是‘满洲国’人吗?怎么变成中国人了!”

这样的悲剧没有在“星火”同人中出现。他们不仅没有变成伪满洲国的什么“忠良国民”“中坚国民”,相反,却成了今日伪恐惧的敌人。

“星火”同人为什么能够在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下,成长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1. 最直接的原因是进步书籍的影响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名言。“星火”同人个个是爱读书的人。书,真正成了他们青少年时期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攀升的阶梯。

花喜露的家属说:花喜露虽然在沈阳只念了一年书,但对他这个在农村长大的

孩子来说,确实是见到了大世界。当时正是“东北易帜”之后,打倒列强、抵制日货的反帝浪潮高涨。他们经常唱“日本小鬼真真完,夺我旅顺大连湾……”等反帝歌曲,在他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种子。沈阳的大书店里,什么书都有,他简直是进入了知识的世界。他从沈阳回来时,带回满满一大箱子和一柳条包书。

王克范的亲属说:王克范从盖县西关中学毕业后,考入奉天省立第一高中,从闭塞的乡村来到省城奉天。他和同学们唱着打倒列强的歌曲加入了反日爱国运动。当时,省城的书店里,书的种类繁多,有许多左翼作家的进步书刊。诗词中,他最喜欢岳飞的《满江红》;书籍中,他最崇尚鲁迅的作品,简直是爱不释手。

他们不仅自己阅读,还与朋友互相传阅、赠送、切磋。

门文东回忆说:“家境富裕的于家麟买的新书很多,经常把书借给别人看。我看过巴金的《灭亡》后受到巨大的鼓舞,我曾从头到尾把全书用水笔小楷抄录下来。”我们采访他时,门文东已经80多岁了,还能流利地背诵出卷头语:“大凡那最先起来反抗的人,灭亡必然会顾全到他的一身,我也本知道这样的事情……我却愿意去做。”

五四新文学给了他们丰富的营养。许多人在晚年时对读过的书还如数家珍:巴金的《灭亡》《家》《春》,三郎的《跋涉》,茅盾的《子夜》《激流三部曲》,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鲁迅杂文选》,郭沫若的《女神》,冰心的《寄小读者》,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穆时英的《南北极》,老舍的《赵子曰》,丁玲的《夜会》《田家冲》,叶圣陶的《倪焕之》,诸夏怀霜社出版的《海上述林》等。

外国进步书籍有: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罗亭》《烟》《屠场》,杰克·伦敦的《深渊下的人们》,勃克夫人的《大地》《死魂灵》《铁流》等。

马克思主义著作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主义ABC》,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等。还有人阅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陶炎回忆说:“花喜露老师向我们提供了许多中外文学作品,从巴金的《家》到茅盾的《子夜》,从外国文学中的《死魂灵》到《铁流》等。这些优秀著作我们都能从他手中借到。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拿一本《鲁迅杂文选》向我介绍说,你要读鲁迅的著作,鲁迅的骨头最硬,他的反抗精神最彻底,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这些话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我曾如饥似渴地读过一些文学作品,似懂非懂,从中确实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促使民族意识的觉醒。”

他们有的达到嗜书如命的程度。读书,是一生的精神依托,是灵魂栖居的永远的“家园”。孙萌晚年时深受疾病折磨,总是把花喜露送给她的《妇人与社会》放在枕边,

才能入睡。

2002年,由受过花喜露影响的老同志发起,辽宁教育学院离退休老干部自费购买了一批书籍,希望捐献给花喜露工作过的学校。多次与该校及其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联系,始终无人接收这批图书。他们对书的轻忽令那些年轻时酷爱读书的耄耋老人颇感讶然和失望。

据统计,我国每人每年平均阅读图书仅为4.5本,而全世界平均每人每年读书最多的民族是犹太民族,为64本;平均每人每年读书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为55本;美国也开展了平均每人每年读书50本的计划。

“第四次(2006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广义的国民图书阅读率为42.2%,狭义的识字者阅读率为48.7%。6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下降。国民阅读率调查数据:1999年60.4%;2001年54.2%;2003年51.7%;2005年48.7%。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2.7%。

据搜狐读书网站调查显示:我国知道“世界读书日”的人仅占6%,27%的人虽听说过但不知详情,67%的人从未听说过这个日子。

伴随“快餐文化”的盛行,网络泛娱乐化风气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感官刺激”,读书流于肤浅和功利,甚至被人淡忘与抛弃。中小學生以考试需要为中心选择知识,过浓的速读实用主义致使大学生在选择图书的时候流于功利,而忽略传递智慧、开启思想、承接传统、发扬经典等方面的阅读。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人文知识积累匮乏,直接导致发散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耐挫力的缺失。

对于个体生命来说,阅读有利于培养人的抽象思维、理性思维,有利于培养人的文化人格、道德性灵、精神追求,有利于培养人的生命和灵魂的健康品质,有利于培养人的文化尊严和文化自觉。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阅读,是一个民族灵魂的核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支撑,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最强大、持久、热情、富有创造性的力量……

2. 良师益友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向导与同志

参加“星火”社团的都是朋友。他们相互启发,相互学习,一步步走向抗日道路。在敌人的监狱里,在酷刑拷打下,互相鼓励,英勇不屈。

花喜露更是他们的良师益友。在伪满后期和日本投降初期就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同志,无不由衷地感激花老师。

他们回忆道:花老师先后在盖平县归州、康宁堡、熊岳城等小学任教。他从来不

打骂学生，还给家庭贫困的学生买书买本，关怀备至，常亲切地称我们为孩子。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学生非常爱学。晚上他还给住宿的同学们辅导。他从来不讲“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圈”。他带领学生办墙报《春潮》、校刊《飞浪》，办图书阅览室、读书会。他经常给学生讲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讲“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他形象地把租借给日本的辽东半岛比作母亲的乳头，说：“母亲的乳头被割掉了，她该多痛啊！”

孙萌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任伪满盖平县商会会长的父亲娶小老婆之后，对她和母亲置之不理。她心情苦闷。是花老师把她引上革命道路。她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向我们述说与花老师认识的经过：我没有跟花老师念过书。我认识他是因为同班好友穆玉琪小学时是他的学生。从玉琪那里我知道他是个革命诗人，写过不少有爱国思想的诗文。1942年寒假，我和玉琪到沈阳找他。他问我读过什么书，还问我的家庭情况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对我说：“你要勇于做剥削阶级的叛逆者。”他让我再读一读屠格涅夫的《门槛》和《前夜》，还借给我一本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后来他送给了我一本德国社会主义者倍倍尔写的《妇人与社会》。从这本书里，我懂得了妇女和无产阶级同是被压迫者。我明白妇女解放必须参加阶级斗争的道理。后来我从家跑出来参加革命，什么衣物都没带，只把花老师给我的这本书带了出来。

有位亲历者说：我总忘不了花老师对我思想有深刻影响的一次谈话。我说我喜欢《灭亡》里杜大心的勇于牺牲精神，花老师立刻说：“那种勇敢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主张变革社会制度，不主张盲目冒险和谋杀。”他还问我：“你说杀死一个李总督，再来一个王总督怎么办？”这次谈话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革命和冒险不同，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剥削制度，才是真正的革命。

花喜露到沈阳之后，仍有许多过去的学生去找他。花喜露与他们亲切谈心，有时通宵达旦。他善于有针对性地进行说服教育。李吉恒、李昌毓回忆说：1943年年底，我们从盖县第一国高到沈阳毕业旅行，参观“建国成就”。花老师知道后，领我们去逛贫民区。那里臭水熏人，卖破烂的到处都是，烟头也卖。乞讨的老人、小孩，穿着破更生布的衣服，还有披麻袋片的。尤其是“半掩门”的妓女更多。我们问花老师：“你咋把我们领到这个破地方来呢？”他说：“你们不知道，这才是真实的社会，不看看这些哪行？高楼大厦谁能住上？看一看有好处呀！”他用这个悲惨世界的现实来启发我们的思想觉悟，唤起我们对劳动者的同情、对统治者的仇恨。他的教育更增强了我们反满抗日的决心。

3. 中华文化像空气、阳光和水一样,无处不在

日本关东军及其御用学者费尽心机,从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论述建立“满洲国”的“正当性”。以为在东北这片满族发祥地,请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招牌,利用“王道主义”“五族协和”来欺骗,建立“满洲国”就“名正言顺”了。

他们无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和中华文化在东北的巨大力量。不仅唐、明等中原政权在治理东北时兴学重教、大力传播中华文化,原居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前燕、北燕、高句丽、渤海、辽、金政权,也主动学习汉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清朝满族统治者以中华文化的当然传人为己任,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教育文化政策。清末解除“封禁政策”之后,东北教育文化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特别是1928年“东北易帜”之后,五四新文化和反帝爱国运动在东北风起云涌。中华文化在东北地区成为抵御日本殖民统治的强大力量。

所以,日本殖民统治虽如铁桶一样严密,但一接触中国人民群众,就像落入汪洋大海里的马蜂窝,处处是漏洞。敌人的残酷杀戮又激发了更大的不满和反抗。

顺应日本侵略者,满族作家穆儒丐以清太祖、太宗的丰功伟绩,写成《昭福创业记》,获《盛京时报》文学奖。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襄辅“故主回故土”重振祖业,撰拟《满洲国建国宣言》和《新满洲》国歌。这些汉奸文学也没能欺骗广大人民。

盖平这座文化古城,地处铁道沿线,北达沈阳,南抵大连,紧连营口、大连两大开放港口。九一八事变之后,各种抗日武装活动频繁,群众爱国情绪持久高涨。

读者会发现,虽然是日本统治严密的伪满洲国,但中华文化犹如空气、阳光和水一样,无处不在。

从口述者对当时形势、背景的叙述中便可知道,中华文化是孕育“星火”爱国团体的肥土沃壤。不仅花喜露、于家麟等在九一八事变前上学的青年深得中华文化精髓,伪满的中小學生也从家庭、社会和进步教师、学生等渠道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强大的中华文化能够冲破日本侵略者军事、政治、思想等方面的严密统治,发散出民族再生的强大力量,孕育出中华民族新的生机。

龚自珍说过,“亡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败人之教化,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二》)在民族危亡之时,只要文化不亡,国家就不会真亡。正如“星火”同人秘密阅读过的进步书籍中所说:“我们如果不愿意‘中国人变为日本化’,那末必须努力保持发

扬我大中华民族的优点,抗拒外来的文化侵略。”^①在和平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文化是软实力。振兴中华,必须加强中国文化建设。

爱国主义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为国捐躯,在中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即使在日本殖民统治高压下,仍然像地火一样燃烧着、奔突着,即使以隐晦的形式与语言出现,仍然产生不可抗拒的力量。

今天,中华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主流,弘扬爱国主义,抵制外来劣质文化、泛文化、俗文化等多方面的侵蚀,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星火”这群年轻人在恶劣环境下的学习成长历程,为我们今天的学校工作、青少年工作,特别是国家文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空间。如果读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启迪,那是我们所期望的。

① 蒋坚忍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汉口奋斗报社印赠,民国十九年八月出版,第375页。

目 录

- 1 序 刘晓丽
1 导言 齐红深

上编 长夜,燃烧的“星火”

- 3 一、故事发生在文化名城
15 二、成立“鲁迅文学研究社”
40 三、从《行行》到《星火》
61 四、“五步斋”的故事
78 五、《辰星》《大地》与秋灯书店
106 六、读书活动
140 七、李季疯越狱来访

下编 “桃园”,绽放的血花

- 155 一、大逮捕在进行
192 二、黑狱中的太阳
216 三、长夜过后盼天亮
239 四、田贲的文学观
249 五、田贲、驼子诗歌赏析

附录

- 280 1. “星火”同人、读书会成员与“桃园工作”案件关系人简介
291 2. 主要参考文献与伪满洲国文学研究成果

上编

长夜,燃烧的“星火”



长夜,燃烧的“星火”

一群才华横溢的青年
 一群天真浪漫的学生
 正是嗜书如命爱好写诗的花季
 在日本铁蹄蹂躏的年代
 读与写怎样点燃文学的星火
 星火怎样燃起曲折的故事



伪满洲国“星火”文学社团主要活动区域图

一、故事发生在文化名城

盖平史话

郭世魁

郭世魁 笔名光慈,1914年生,花喜露在盖平中学(初中)、奉天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和在归州两级小学教书时的同事。离休前系盖县盖州高中教师。

盖平(今名盖州市)位于辽东半岛西北部。东与岫岩县、庄河市相邻,南与大连市接壤,北临营口市和大石桥,西濒辽东湾。独具一市连三港(大连港、营口港、鲅鱼圈港)之利。铁路、公路纵贯全境。盖平地貌属辽南丘陵地带,地势东高西低,东部和东南部为高山和丘陵,西部和北部为平原。雪帽山山峻林密,古朴原始,风光秀丽。山上土质肥沃,植被丰富,生长着几十个种类、近千亩的阔叶林,以及上百种中草药和山野菜。一年四季花开不断。这里还生活着几十种野生动物,山间时见松鼠、山鸡跳跃,林中常有野鹿、狍子、獾、狐狸穿行。整个雪帽山如同一个天然的野生动植物园。

盖平,在历史上建制很早。早在战国时期,燕国就开拓辽河流域,盖平属辽东郡。秦统一六国后仍属辽东郡。西汉、魏晋时期,于盖平境内北部设文县(今大石桥市的汤池),南部设平郭县(今熊岳城),统归辽东郡管辖。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燕、前秦、后燕,属平州的平郭县。407年北燕建立后,盖平一度被高句丽割据,并筑建安城(今青石岭的高丽城),置建安县。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于建安城设置建安州都督府。辽代于建安城置辰州,故盖平有古辰州之称。金代改辰州为盖州。元代置盖州路,治所仍设在建安城。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把熊岳、汤池二县并入建安县。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将建安县并入盖州。明洪武四年(1371年)废州改卫,将军事、行政统于一体,盖州遂为盖州卫。翌年改筑新城,位即在今盖县县城。清康熙三年(1664年)改明代盖州卫而设置盖平县,隶属奉天府。“盖平”之名,是取“盖州”、“平郭”两个历史地名的首字而得。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继称盖平县,属奉天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期间,盖平县仍属奉天省。1965年经国务院决定,改名为

盖县。1992年撤销盖县，设立盖州市。

盖平是我国东北地区有名的文化古城，人杰地灵，文风昌盛。明朝年间，辽东属山东巡抚管辖。山东巡抚马文升有一首《过盖州诗》，前四句写的是盖平县的风光：

烟雾初消海国边，
荒原寒水与云连。
山光杳霭飞兔外，
秋色参差落雁前。

盖平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据齐红深《满族教育史》《东北地方教育史》记载：早在辽、金时期，辰州一带渤海遗裔望族的家学代代相传，培养出一大批武将文才。辰州熊岳人王政，本名南撒里，其世祖相传32代，先后仕高句丽、渤海、辽、金，皆有显贵者。因其家学世代相传，其子王遵古，好学守道，文行兼备，潜心伊洛之学，登正隆五年（1160年）进士第，仕为翰林直学士，“天下目为辽东夫子”，是金代辽东著名的教育家。他重视学校教育，认为“教化之源唯在于学”，发展学校教育可以使“教化流行，风俗移易，人识廉愚，国兴仁让”。所以，他为官，每到一处，“所居必兴学”。王遵古娶“通经史，尤长于诗”的辽阳渤海人张浩之女为妻，生庭玉、庭坚、庭筠、庭揆。对其四子，口授言传，进行家教。四子皆有才名。其中的王庭筠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史称：庭筠“生末期，视书识十七字，七岁学诗”。后登大定十六年（1176年）进士，号称“渤海第一文人”。“为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工险韵，有《藜辨》十卷，《文选》四十卷。书法学米元章，尤善山水墨竹。”王庭筠之子王曼庆，“亦能诗并书，仕至行省左司郎中”，庭筠的侄子明伯“亦能诗善书”，皆能继承其家学渊源。王庭筠的外甥高宪，自幼在王家就学，故诗文字画，颇得舅家之风，年近30，作诗已数千首。

清朝时，盖平有一个知县，名叫骆云。那一年，盖平久旱无雨，时已六月末，仍无法耕耘下种。这位骆知县只好率领县衙诸同知和乡绅，在城隍庙拜天求雨。他撰写的《祈雨再告城隍文》情真词切，呼天抢地，纵然众神无知，天帝耳聩，听之亦当泣而成雨，泽润大地。他还写过题为《过云岛望海》的七律，写出战乱之后百姓贫瘠，收租无着，他忧民忧时，却无知音的苦闷心情。表现出一个封建社会清官的可贵情怀。

山势西从碣石来，

云山沙碛重徘徊。
龙门两洗刀兵后，
鳌背风翻星斗回。
民瘠未收珍府利，
官忧空作委输裁。
子期何在留岑寂，
疑有琴声响石台。

有清一代,东北地区先后共建有 29 个书院,其中的辰州书院就在盖平县。辰州书院建于 1822 年,是东北地区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一所书院。对于传播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起到突出的作用。鸦片战争之后,关内地区教育改革的呼声渐高,视封建科举教育为束缚思想、限制改革的羁绊。而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东北地区,这一时期的儒学、书院,仍热衷于读经讲学,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这有利于建立大一统的中华观念、巩固中国统一思想,其积极进步的作用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客观上也为以后抵御日本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侵略,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县内自然风景区和名胜古迹很多。位于盖平县中心的钟鼓楼,建于明洪武年间。中部为观音阁,阁后为大慈殿,大慈殿左右各有配殿。盖平钟鼓楼平面呈长方形,长 37 米,宽 14 米,由楼座与座上殿宇组成。钟鼓楼上,东西为钟鼓亭,中间为观音阁,阁后为大雄宝殿,左右各有一配殿。楼座正中为券顶门洞,是城内南北方向上的交通要道。正殿前,钟亭、鼓亭分立两侧,并有清同治年间重修碑记两块。整个建筑古朴典雅,巍峨壮观。钟鼓楼周围是盖平古城的繁华区域。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玄帝庙,位于盖平中心偏南,居于盖平古城的南北中轴线上。以融汇元、明两代的建筑风格和民间特点,建筑雄伟壮观而著称,全木架结构,形制奇特,工艺精湛,彩绘传神。始建于清朝的慈航寺位于盖平东北 4 公里处。慈航寺坐北朝南,建于山腰,背依秀美的盖平城北第一高峰老青山,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临水。山峰叠翠,水波潋滟。

盖平陆路交通发达,公路直通营口。据清雍正四年(1726 年)天后宫《重建碑文》记载:“没沟营(当时营口称为没沟营)通郡渡津,舳舻云集,日以千计。”这说明当时在清雍正四年间营口早已是各种船只停泊在码头、远近闻名的水陆商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咸丰八年(1858 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开辟牛庄等通商口岸。后英国人感到牛庄水浅轮船难以驶入,不宜做通商口岸。清咸丰十一年(1861 年)英国人密迪乐到营口勘察,提出开辟营口港以取代牛庄。英国人把



伪满洲国时期的盖平县城

通商口岸移到营口后在辽河南岸修建码头，停泊船只，以经营水运贸易。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三日营口开港。此后，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等还有本地的商贾相继在营口沿河修建码头。轮船通往国内

各水路港口和世界各地。京奉铁路、日本占领的南满铁路支线均从附近通过。外国殖民国家纷纷建立领事馆，外国人云集。西方文化和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先进文化较早地在盖平传播，教育也发达起来。民国时期，奉天省以重视师范教育而闻名，1922年，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受陶行知、张伯苓邀请来华参观访问，他向张作霖指陈奉天教育利弊得失时，曾经称赞奉天师范教育先进。而奉天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就设在与盖平相连的海城县。这所学校就是我和花喜露就读的学校。而他此前就读的奉天第一高级中学，也是近代东北地区成立最早的一所西式学堂。

到九一八事变前，营口的码头东自三家子西至辽河入海口已建成大小40多处。其中，既有中国自己的，也有日本的、英国的、德国的、美国的。这些码头最初设施非常简单。每当船只靠岸只须搭桥板，便可装卸货物。后来水面系一只船或浮标箱（趸船），多数码头以木桩，少数码头以混凝土、钢筋修筑。



营口各码头不同，吞吐货物也不同，有装卸建材的，有专运豆饼的，有专运食盐的，有专运煤炭的，有专运煤油的，有专卸水产品的，有专运卸粮食的，也有专运卸杂货、山货的，还有专运输旅客的。当时

营口港码头

进出口的货物多数是通过水上运输的,而营口码头便是主要的转运站。

停泊在码头的船只各异,有铁甲轮船、帆船、槽船、舢板等。铁甲轮船外国人多用,也有租给本地商户使用的。而中国人多使用木制船。这些船只装载重者达上千吨,轻者几吨。外轮多载中国东北出产原材料产品,如煤、盐、木材、豆类、粮食、药材等重要物资出口。而进口的货物则是外国商品,如日用品、化妆品、西药、煤油等;还有毒品,如海洛因、鸦片、吗啡等,可以说凡是当时人们习惯上称呼带“洋”字的东西均为“舶来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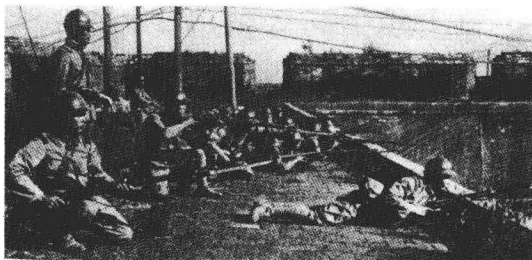
盖平有西河口码头,繁荣了盖平的商业。

据史料介绍:仅1901年至1910年10年中,从营口码头运出大豆、豆油、药材、煤炭等资源每年不少于100万吨。记得我小时候,看到穿梭于辽河水面和停靠在码头的船只确是帆樯林立,群舟蚁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他们扩大大连港吞吐量,采取各种手段排挤民族航运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退出竞争,致使辽河航道逐年淤积,码头失修,营口港口吞吐能量日益减少,直至营口解放前夕营口码头停运。

其实,从码头上进入营口的,不仅仅是货物,还有开化、进步的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民主、科学、改革、进步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思潮、图书、报刊大量进入东北,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毕业后分配到小学当老师了。伪满洲国当局一再强调,“国家的兴衰,实际上是由如何健全地培养第二代国民来左右”,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职员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百年命运”。所以自伪满建立之日起,一直把使教师具备“对于满洲建国之必然性的信念”“对于日满不可分离之关系的信念”作为推进奴化教育的重要而紧迫问题,下大气力来抓。

1932年7月,伪满成立不久,就召开第一次教育厅长会议,对师资问题进行讨论。表明日伪当局对奴化教育



九一八事变日军从沈阳小西边门攻入城内



日军在沈阳城内射击

师资紧迫性、重要性认识十分明确。他们认为，伪满教育是将过去的三民主义、排外教育等，用“王道教育”“日满一体”“五族协和”来代替。广大教师深受三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缺乏伪满的“国家观念”和“建国精神”，依靠他们培养日本侵占者所期望的“小国民”“非常危险”，于是伪满加紧对教师的培养与培训。可以说，花喜露和我虽然是伪满洲国建立后毕业的第一批师范生，但是，我们的思想里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所以，不可能老老实实地为日本侵略者培养“满洲国的小国民”。这一点，日本统治者的心里明明白白。

九一八后的盖平

门文东

门文东 笔名铁键，1915年生，伪满时盖平县馥馨香铺会计，国民党地下党员，因积极参与“星火”同人反满抗日活动，在1944年5月初被日伪特务逮捕，判无期徒刑。1945年8月19日出狱回盖平县，在于家麟组织的盖平县国民党县党部任总务科长，被长春派来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文斗撵出后，去沈阳经商。退休前系沈阳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干部，1999年去世。

盖平是一个古老、美丽、富饶的地方。远在几千年前，盖平人的祖先就繁衍劳作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时至20世纪30年代，盖平已成为一个在全国也很有名气的城镇了。民国修《盖平县志》记载当时的情况说：“天下无不知有盖州，名振八闽声达三江。”祖祖辈辈的盖县人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了美好的家乡，所以对自己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着浓厚的感情。

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家乡，在一天之内竟落入了侵略者的魔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也就是1931年9月19日，一小队日本兵，在一个手拿指挥刀的军官带领下，穿过盖平县西关中学西北的山坡，直扑学校大门外的土岗子，包围并冲进了驻扎在土岗上的县警察局迫击炮队。在中国士兵毫无提防的情况下，日本兵用刺刀挑死了排长和一些士兵，有两个中国士兵头破血流地逃出了兵营。接着这一小队日本兵把机枪架在西关城墙上和县政府的大门口。从此，古老、美丽、富饶

的盖县,就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盖县人民沦为亡国奴,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之后,日本侵略者对盖县人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恐怖统治。抓劳工,增奇税,加苛捐。动不动就给人扣上思想犯、国事犯、经济犯的罪名抓进监狱。



伪满时期小学生学习日语



伪满洲国教育会编印的刊物

日本侵略者为了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小学生从一年级起就得学日本话,说不好就用板子打。每天早晨学生一进教室,就得向挂在黑板上边的日本“膏药旗”和伪满洲“国旗”行90度鞠躬礼。每天朝会还强迫学生向东方给日本天皇遥拜,向北方给满洲皇帝遥拜,接着还得向“忠灵塔”默祷,风雨无阻。哪个学生如果站得不直,或稍露不满情绪就要挨打受罚,用暴力强制中国人做他们的亡国奴。随着日本对盖县的占领,一些日本浪人、投机商人也接踵而至,他们在日本侵略军的怂恿下,有恃无恐地在盖县大肆贩毒。开设大烟馆,出卖鸦片、吗啡,每天引诱成百人上钩堕落。在侵略者的毒害下,一些人因吸毒成瘾闹得家破人亡。那时候,在东关下坎和“东一面街”下边的大坑里,每天都有因冻饿而死的“路倒”死在那里。在西顺城街有个叫李长科的人,娶妻王氏,生二子。长子李殿侯,次子李殿伯,一家四口都吸毒成瘾,不能自拔,最后全家一个不剩都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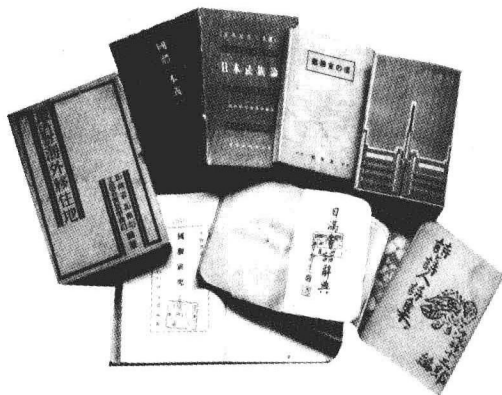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初期,各地中小学教材都集中在伪文教部,可是还仍然使用中国编的教科书,只对富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部分的教材加以删除,或对个别地方用墨笔抹除。地理和历史教材是其重点涂抹对象。到后来干脆禁止使用旧教材了。教材完全由伪文教部编审,交由伪满图书会社再进行统一印发、出版。为此,在伪文教部教育司成立“编审官室”专门编纂中小学校使用的教材。其编纂的原则以“日满亲善”“王道乐土”、与日本“一德一心”、忠于“皇帝陛下”的“建国精神”为思想基础。从小学到中学的教材内容,充满了民族自卑和崇拜日本的奴化色

彩。教材内容以假乱真，篡改历史，替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服务的御用学者所谓日本历史学家峰内教授和东洋史权威高岩博士，信口雌黄，歪曲历史事实，伪造一些荒谬论调，强迫人们相信。就拿日本的“天照大神”来说吧，在日本古代史上只是一个模糊的神话。在日本近代史上明治天皇统治时期，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势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于是在“尊王攘夷”运动中，人为地臆造出“天照大神”这个偶像，借以维护和强化中央皇权的统治基础。到19世纪末，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飞扬跋扈的军人、政客积极向外侵略扩张，便大张旗鼓地抬出了这个偶像作为诈骗的招牌，并且说什么日本皇室完全是由“天照大神”作鼻祖而“万世一系”传下来的，当代的昭和天皇即是“现人神”了。在日本国内企图用这种论调实行“愚民政策”防止人民反抗。为把这种论调强加于中国东北，于是进一步加以引申，硬说“天照大神”在有人类历史以前就已存在，它不但是日本的祖先神，而且是全人类的祖先。不言而喻，当然也是所谓满洲国人的祖先。这就是利用神话来作为解释“同文同种”的侵略学说的依据，证明日本人来中国东北统治不是侵略，而是以同一子孙的身份来分占土地，是理所当然的。用木谷的话说：“满洲国人里就包括日本人，日、满是一个祖先，经营祖先的土地，开发祖先遗留下来的资源，人人有份。”在伪满首都“新京”伪帝宫营造地上面，建造一个“建国神庙”供奉“天照大神”偶像，在长春南岭占据最优越的地势，把它放在伪帝宫之上，这就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了。木谷曾说过，“再过十年二十年，‘天照大神’的威力，在满洲青年一代里要起更大作用”，可见其用心之毒了。对近代史中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竟颠倒黑白，进行歪曲。说什么甲午战争是由于中国人不守信义而引起的；日俄战争则是日本的仗义行为，是为了挽救满洲人的痛苦才打仗的。更为荒唐的弥天大谎，竟把“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东北，说成是东北人民痛恨张氏父子（张作霖、张学良）的残暴，群起反抗，由东北人民恳切地邀请，日本皇军才仗义兴师，帮助东北人民驱逐张学良军队，以使东北独立自主，人民安居乐业。起初日本帝国皇军不肯管别人的闲事。但是，鉴于同文同种的血肉关系，不肯坐视东北人民遭受痛苦，才出“仁义之师”，把东北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帮助满洲建国，使人民享受“王道乐土”的幸福生活。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信口开河地编造历史，并且明目张胆地把台湾、旅大和东北地区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地图上所谓的“支那本部”，只是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日本统治朝鲜和台湾，所采取的最毒辣的手段之一，就是用日本文字来替代当地人民的固有语言文字。当时的台湾人，不使用中国文字了，朝鲜的文字也被日本文字所代替。日本统治东北也是采取这种手段。首先到处推广日本话，反映在教材上是小学从一年级开始就学

习日文,并把汉语改称为“满语”,把日语和“满语”统称为“国语”,而把重点放在日语上了。对日语的文法、语法等,尽量推敲研究,开会调查,积极商讨怎样才能使满洲的青少年在学习日语上,容易掌握和消化。更严重的是满语里掺杂一些日本语,就是使用一些日本人惯用的汉字,制造所谓“协和语”。如把某某街写成某某“町”,把十字路口写成“过町”,并且把“你的挺好”“我的如何”等似通非通的语言也搬到课本里来。如把“电影”二字变成了“映画”,把理化专用名词也完全用日语来表示,所以学生在学习上就是不会中国文字,而只要懂得日文,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因此,只要精通日文,就万事大吉了。“国高”(中学)课本深浅程度只相当于日本小学的后后期程度。国高毕业以后,就可以直接升入伪满的“大学”。当然这样的大学赶不上日本国内的高等学校的教育程度。



日伪当局收缴烧毁的书刊



日本图书大量流入东北

印刷出版教材书刊,利润最大。为排挤中国人经营的出版业,伪满洲国成立后,“满洲图书株式会社”成立了。它对教材、刊物的出版进行垄断。教材的配售办法,均由编审部负责分配。“日语最重要”,中小學生如果学不好日语对将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有影响,这是个基本的问题。对印刷日语教材用纸不需要考虑,必须满足需要。“满语”教材,可以少印一点,两三个学生有一本就可以了。满语学不学都会。在满足日语教材用纸之后,剩下纸张再印满语课本就行了。编审官加藤说:“你们会日本语,懂得日本事情很好。满洲人必须和台湾、朝鲜一样,渐渐用日文代替汉语。只有使用同一文字(日文),放弃对满语的学习兴趣。”他又说:“台湾用了将近30年的工夫,完成了文字的统一,朝鲜也费20多年的力量,才达到今天的程度。‘满洲人’有了台湾、朝鲜做榜样,可能要快一些,不一定再用15年,就可以完成完全用日文的使命,我也算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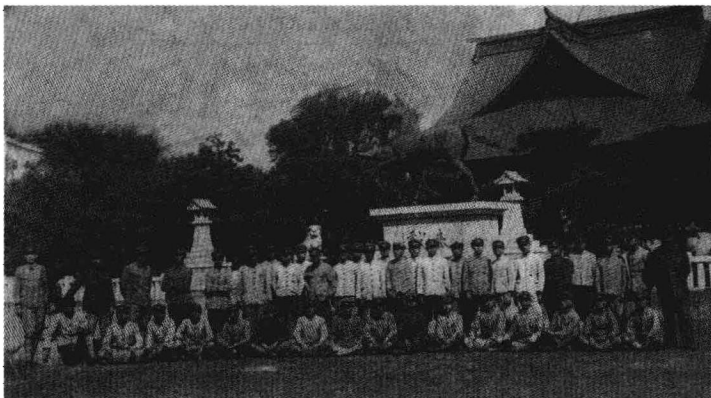
对日满‘一德一心’尽到了力量……”当时朝鲜学校完全使用日本文字了。满洲图书会社除印刷教材外,还出版《新满洲》《麒麟》等刊物。主要编辑人是文化汉奸荣孟枚。刊物中的封建毒素最深,搬弄孔孟经典,介绍日本的文明,鼓吹“王道乐土”,宣扬日满“一德一心”的“建国”精神,这些东西尽管订户不多,可是出版数量并不少,因此说它是在文化上奴化中国人的恶毒工具。

1934年,溥仪在新京(长春)登基当上了傀儡皇帝,那时在学校里张贴出“御极东方”的彩色画报,到处宣扬傀儡皇帝的神威。硬把中国人变满洲国人。唱国歌,学说日本话。每天早晨见人要说“ずばよう”(早安);中午要说“こにては”(午安);晚间说“こんばんは”(晚安)。学生见老师必行举手礼。

进入国高后,受更深层次的奴化教育。因为是农科国高,课表上农业劳动是主课。每周六下午半天全是劳动,刨镐、下粪、拉犁杖;自然科学课极少,可是日语每周七八节,天天上日语;将国文改称“满语”,每周仅上四节。更恶毒的是不开中国历史,开设满洲史、日本史。

1940年7月,溥仪第二次去日本请来“天照大神”的三种神器供奉起来。颁发《国本奠定诏书》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到处修建“建国神庙”,宣传“大东亚圣战”,从1935年《回銮训民诏书》中的称日本为“友邦”升为“亲邦”。宣扬太平洋战争是“圣战”、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鬼话,伸张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

学生进校门,先向御影室“皇帝陛下”行90度鞠躬礼,老师和其他行人也不例外,有违纪者按校规处罚。每日间操师生集会,全用日语喊口令,先向帝宫(长春伪皇



宫)遥拜90度鞠躬礼;再面向东京日本皇宫遥拜。当时学生们背地悄声说:“这是对着太上皇牛犊子拜四方!”真是天天把人折腾得没完没了。

奉天国民高等学校参拜日本神社

日本占领盖平县

刘凤卓

刘凤卓 1921年生,辽宁盖平县什字街于家屯村人。1937年入盖平西关中学,1940年入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参加过反满抗日秘密组织“仙洲同盟”“真勇社”“北辰同学会”,曾任“北辰同学会”主席。毕业后任伪满陆军军官学校教官、连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时率部砸开日本监狱,救出“政治犯”。1947年任国民党军驻营口第58师团副时,参加共产党东北局社会部辽宁情报站工作,成功策反国民党军第58师。离休前系本溪北台钢铁厂副厂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我的家乡盖平县城。

记得那是1931年9月21日的晚上,忙碌了一天的爷爷,刚端起饭碗,又放下了,老人家十分痛苦地说:“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奉天城,东北军一枪未放就跑了。今天日本鬼子又占领了咱盖平县城,张家父子(张作霖、张学良)把咱们东北老百姓坑苦了,我们要成为亡国奴了。”爷爷眼含泪花,放下了筷子,一家人都没有吃下去……

那时我还小,刚刚10岁,许多事情还似懂非懂。后来逐渐长大了,对儿时的记忆才有了理性的认识。记得有一天,我们一群小伙伴正在后山上玩,突然东边高家屯、碧流河两岸硝烟弥漫、尘土飞扬。飞机的轰炸声、枪炮声震耳欲聋。一阵激战过后,才知道是邓铁梅带领“东北抗日义勇军”向正在过碧流河的日本鬼子发动了袭击,毙伤鬼子军数十名。日本鬼子拉走了三四汽车尸体和伤号,丢下被击毁的两辆铁甲车,狼狈地逃跑了。战斗结束后,邓铁梅的义勇军在我的家乡一带名声大振,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和慰问。许多年轻人踊跃地报名参加了他的队伍。

1932年端午节过后的一天,又一支民众自发的抗日救国军由高小楼团长带着来到了我们村。高小楼团长住在我家里。我们一群孩子围着他跑来跑去。他和蔼可亲地对我们说:“你们快点长大吧,长大了好打鬼子!”接着他又给我们讲了一些打鬼子的故事。我们被他的英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第二天半夜,日本鬼子在汉奸的引导下,将我们村偷偷地包围了起来。拂晓时,向抗日救国军发动了突然袭击,高小楼团长不幸被俘。鬼子军押着他游街示众。满身

伤痕、血迹斑斑的高团长昂首挺胸，毫无惧色。我难过得偷偷地掉下了眼泪。后来，鬼子将他押到大石桥日本守备队。传说，高团长被押到大石桥后，日本鬼子对他说：“你若能够将狼狗圈中的三条狼狗打折服，就放了你。”高小楼团长明知有诈，但也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很快，武艺高强的高团长就将三只狼狗打得死的死、伤的伤。这时，凶相毕露的日本鬼子，放进了十多条狼狗，这些狼狗扑向高团长，高团长拼死搏斗，因人单势孤、体力不支终被一群狼狗活活咬死吃掉。噩耗传来，我们村的许多人都悲痛得哭了起来。从那时起，我开始从心底里痛恨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为了对村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实施残酷的并村政策。强迫各家扒掉小院墙，修起围绕全村的大围墙，逼迫散住户烧掉原住房，迁到大围墙里来。大围墙内，分东、南、西、北四个大门交叉相对，修起了笔直的十字马路，凡占在十字路上的房屋一律拆掉。我们家的院墙被强行扒掉，还要扒掉我家本不应该扒掉的房屋，爷爷拼老命抢上房子，要与房子共存亡，为此爷爷挨了鬼子的一顿毒打。从此，在日本鬼子建立的保甲制监督下，村民们的一举一动都失去了自由。还不十分懂事的我也尝到了当亡国奴的苦滋味，心底里更加痛恨日本鬼子了。

1934年，我上兴隆屯高小读书时，李修甫校长、张杰三和马振戈老师经常给我们讲反满抗日的故事，教育我们要热爱祖国，不忘国耻，永远记住自己是中国人，满洲国是日本鬼子强加在我们头上的。1937年入盖平县西关中学，孙庆文、王大安、姚修齐、林德厚等老师常常悄悄对我们讲，要牢记我们都是轩辕黄帝的子孙。要雪耻报国，为自由解放而献身，绝对不做亡国奴。1940年，在没有其他道路选择的情况下，我考进了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我人在曹营心在汉，利用一切机会将心中的仇恨，化为反满抗日的实际行动。

二、成立“鲁迅文学研究社”

与花喜露相处的日子

郭世魁

我和花喜露两次同学,第一次是1928-1930年在盖平县初中,分在同学年的两个班;第二次是1933-1934年在海城省立第三师范,他比我高一届。他在师范学校时,爱文艺、管图书、办校刊。我也常投稿,因此很熟。毕业后,我们先后分配到盖平县归州村两级小学任教。

海城奎星楼



花喜露是1934年到盖县归州村两级小学任教的。我比他晚一年。这时,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教员进行思想奴化,企图改变他们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之成为宣扬“民族协和”等日本侵略正当化谬论的工具。在师范学校,就向我们灌输“建国精神”“王道主义”“满洲

国教育之本旨”等。目的就是让我们充当向学生灌输奴化思想的工具。伪满对教师进行“建国精神”考试,制定了考查教员的“人物考查表”,对教师进行考核。考核的内容,首要的一条就是是否认同“建国精神”。通过这些措施,把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的教师从学校清除出去。

伪满洲国民生部大臣在一次会议上发表训词说:“欲达成国民思想善良统一的目的,赖教育之力量居多,教育者不只为一国文化兴隆之源泉,而且为国家发展之根本。”日本侵略者清楚地知道:要想使其在我国东北实行的殖民统治长期存在下去,只靠武力镇压是不行的,还必须依靠殖民主义教育“培养忠良之国民”。而能否培养出殖民统治需要的“忠良之国民”,与直接担当指导教化学生的教师的素质有直接关

系。因此，日伪统治者在实施殖民主义教育过程中，始终对师范教育特别关注，严加控制。

田贲知道在日伪统治时期，当一名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启发他们热爱祖国，不当亡国奴，做一个振兴中华的中国人。但在当时，尤其是在已沦陷为殖民地的东北，这些思想又不能直接给学生说。花喜露利用历史课和业余时间给学生讲文天祥、林则徐等民族英雄的爱国故事，来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要学生立志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归州位于辽东半岛，面临渤海。据说是辽代的一个州。我们在归州小学教书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大的土堡，老人们都习惯地称它归州城。归州两级小学的校舍是利用归州村后的一个平顶小山南坡的庙院扩建而成。有东西两个校门，门上都有对联，白底黑字，都是花喜露编写和用隶书镌刻的。东门长年关闭，对联内容已经忘记，西门天天走，故记忆犹新：

高本自卑，知勤求方能进步，
级防懈等，唯循习乃可图功。

很明显，这副对联是采用鹤顶（“高、级”）的手法编写，勉励同学们学习要勤奋，要有毅力，要持之以恒。

我俩曾共同编写在每天朝会时唱的《朝会歌》和《校歌》。他作词，我作曲，至今朝会歌曲我还记得，词已大半忘记，幸经焦德濂同学帮助补记上了，全文如下：

川原形势雄，
龙蟠虎踞无穷。
请看我山河，
山河真光宠，
请问我责任，
责任真恭重。
用我好身手，
趁此晨光熊，
砥砺磨砢，
使我精力充。

他日破浪乘长风，
宇宙任驰骋，
好友好友莫等闲，
一刻千金同。

当时,在日本统治下的学校实行奴化教育。千方百计让你相信日本是“亲善”的,与“满洲”是“一德一心”的。各级学校均设国民道德课,对学生宣讲“友邦”日本进军“满洲”是因“这块土地盗匪蜂起,民不聊生,军阀割据,横行暴敛,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友邦日本仗义兴师,为拯救满洲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事等解悬,功同援溺。日本满洲,如兄如弟,共同携起手来,一德一心,建设美好的、自由的大满洲帝国”。还编造说,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日本是最优秀的民族,负有领导世界实现“八纮一字”的历史使命,臣民必须崇敬天皇陛下。

每天早晨上课前举行“早会”,在操场上全体师生集合列队,由值周老师率领向“日本天皇”和伪满“康德皇帝”敬礼,遥拜,鞠躬90度,用日语喊“立正”“稍息”,升“满洲国旗”和“日本旗”,然后唱“满洲国歌”,歌词是“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全国臣民无苦无忧……”唱日本国歌,要呼“皇帝陛下万岁”“日本天皇陛下万岁”!

溥仪访日归来颁布了《回銮训民诏书》。这是溥仪要国民必须与日本“一心



国民学校学生手持木枪进行“国防训练”



国民学校学生在朝会上背诵《国民训》(1943年)



国民优级学校“建国精神”课

3月1日是“建国节”,5月2日是“访日回銮宣诏训民节”,还有什么溥仪的生日叫“万寿节”,昭和天皇的生日叫“天长节”,以及其他一些节日。这些节日都要庆祝。庆祝时要求师生衣帽整齐,手执日、满“两国国旗”。日本国旗是太阳旗,“满洲国”旗是红蓝白黑满地黄旗。那时,学校、机关、厂矿门口悬旗,都是日、满“两国国旗”。凡庆祝就要呼“万岁”,每呼必是“大日本帝国万岁!”“大满洲帝国万岁!”一呼就是两个,不能单呼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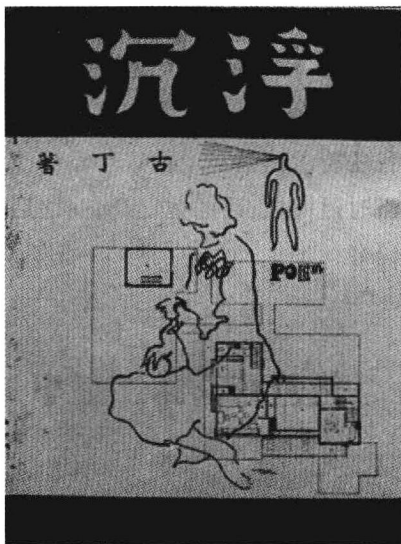
盖平有一位造诣颇深的京剧演员,他经常编写唤起民众觉醒的剧目和唱词,给人民群众演唱,后被日本人察觉,将其逮捕,并扔到大石桥的狼狗圈里,唆使众多狼狗咬他。开始由于他会武术,还和狼狗搏斗一阵,渐渐体力不支,无力抵抗,最后活活被狼狗咬死。其情景令人惨不忍睹,闻者无不潸然泪下。

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下,我们编写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将来乘风破浪、光我山河的《朝会歌》是很需要勇气的。

在花喜露的倡议并主持下,我们还在教室过道墙上创办文艺校刊,用全裁图画纸选抄学生优秀作文,也有老师作品。他主编,我画刊头、插图。上学期的叫《春风》,下学期的叫《秋潮》,各出一期。自第二年起,每年出一本32开本的校刊叫《飞浪》,也是他主编,我画封面,共出两期。这些刊物,在引导学生写作和爱好文艺上,起了一定作用。

在这一年,学校还曾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会。花喜露负责选拔学生作文和毛笔大楷、钢笔小楷,我负责指导学生画图画(铅笔、钢笔、墨笔及水彩)、做手工,有纸、泥、秫秸等制品,我们夜以

继日地忙。夜间,他每逢批阅到学生好的诗文时,就往往情不自禁地低吟或索性朗读起来。有时,还把学生找来,当面指点。有时,也看我们画画、做手工,他还曾画两幅四开纸的水彩画:一幅是《风雨满江城》——画面是在斜风细雨中,江边一城,房屋栉比,绿柳低垂,远处白帆点点,冒着风雨前行。另一幅是《长城春晓》——画面是一条人行长堤,沿堤是一排白杨,由近及远;堤内春水盈盈,堤外芳草萋萋,蔚蓝天空,一抹朝霞,生趣盎然。这两幅画,展览过后,我爱不释手,妥为珍存。虽经时事更迭,辗转迁徙未尝弃舍。可叹“文革”十年浩劫,连同其他作品,都已荡然无存。



古丁的诗集

花喜露除了善写诗文,新、旧体诗俱佳,也写得一手好隶书,还会画梅花,可谓多才多艺。

他作风朴素,不修边幅,阔鼻大眼,炯炯有神,热爱学生,平易近人,藐视权贵,刚直不阿。性豪放,重感情,追求真理,向往光明。

那时,高小有几个爱好文艺的,也是他得意的学生如石岱宗(卞和之)、刘永良、穆玉琪、孔庆举、张吉宽、臧光华、马汝常等。这些学生有的在住校,有的家在学校附近。晚间经常听他谈诗论文,共同研究写作或阅读进步文艺书籍。他曾对学生们专题介绍鲁迅。

1938年春,我们曾借“建国节”(3月1日)之机,揭穿伪满成立的实质,宣传热爱祖国思想。其后,花喜露通过国文课,对学生作了大量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那时,校外和他接触的有于家麟、葛雷、王锡成等人,这些人都是文艺爱好者。

在和花喜露相处的日子里,课余,我们经常登临校后平台,或漫步渤海之滨,栉风凌波,濯足拾贝,海阔天空,闲谈漫论,低吟长啸,忘乎形骸,可谓人生乐事。

1939年,我转到芦屯两级小学,我俩就此分别。后来,他转到康宁堡两级小学,我还曾求他给芦屯两级小学作个校歌,我谱了曲。当时曾写在学校门洞的西壁上,可惜时过境迁,词曲也已忘却。之后,他又转到熊岳城内两级小学。

爸爸花喜露二三事

花友藩

花友藩 花喜露的长子,1938年生。退休前系辽宁盖州熊岳高中教师。花喜露1929年承祖父之命与年长4岁的王氏结婚,生长女桂芳、次女丽芳、长子友藩、三女存芳、次子铁汉。

我爸爸花喜露上初小时用的一个小本子,上面记了好多东西,有《诗》《遂意》《趣》《常识》等部分。在《诗》中有几首诗,如:“东方叠云似泰山,青紫红蓝尽缓缓。一朵晓云捧晓日,万重山上万重山。”“谁云一日不三秋,放假来归总埋头。睡起日长无别事,荷花遥寄一心幽。”在《趣》中有几个小故事。在《常识》中有怎样种菜、嫁接树、种葫芦、搭棚等知识。

爸爸虽然在沈阳只念过一年书,但对他这个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孩子来说,确实

是见到了大世界。当时正是张学良时代,打倒列强、抵制日货的反帝浪潮日渐高涨。他们经常唱着“日本小鬼真真完,夺我旅顺大连湾……”和“打倒列强”等反帝歌曲,在他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种子。在沈阳的大书店里,什么书都有,他简直是进入了知识的世界。他爱书如命,从沈阳回来时,除了路费之外,所有的钱都用在买书上了,装得满满一大箱子和一柳条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三师一度被迫停课。爸爸回到家中,教村里的孩子念书。他白天教《三字经》《百家姓》之类,晚上就看书、写文章。在他写给小时候的朋友赵振立的信中有五绝一首,可看出他无限忧国忧民的情怀:“教童三字曲,徒念一文谣。家贫不需虑,国恨何日消?”

1934年毕业后,他先后在盖县归州、康宁堡、熊岳城等地任教。他从来不打骂学生,还给家庭贫困的学生买书买本,关怀备至,常高兴地称他们为孩子。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学生非常爱学。在归州两级小学有不少学生在校住宿,爸爸晚上就给他们辅导,家在附近的同学,晚上也经常来。他从来不讲课本上有关“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课文。而讲他自己编选、自己刻印的补充教材,如《伐檀》《硕鼠》《黍离》等。他办墙报《春潮》、校刊《飞浪》,办图书阅览室、读书会。他经常给学生讲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讲“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等。他形象地把租借给日本的辽东半岛比作母亲的乳头:“母亲的乳头被割掉了她该多痛啊!”有个学生在赛诗会上激昂地朗诵他的诗:“南国春光北国秋,春草淡吐懒牧牛。暖风吹得全民醉,直把中华作满洲。”会后爸爸对这个学生说:“诗词如剑应入鞘,文学似刀刃还薄。”意思一是说政治锋芒太明显,要担风险;二是说有的诗句还欠妥,要加强磨炼。爸爸还自编教材给学生讲,如“冬天的尾巴还在颤抖,春天就要来了。春天,可爱的春天,你来,你快来呀,我正在等候着你。你有红的花开,你有绿的草长,鸟语花香,你会迷住这整个世界。”在康宁堡小学,有一次正课讲完之后,他在黑板上工整地写了两行大字“在人身上榨取生活的是蠹贼,在土地上榨取生活的是英雄”,一言不语,微笑着环视课堂。他把《大路歌》作校歌,把《摇船歌》作班歌,以激励学生奋进。爸爸深厚的文学知识、丰富的历史知识、强烈的爱国热忱、生活俭朴平易近人的和蔼作风,给学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的学生戚汉翼不去经商,认为那是“在人身上榨取生活”而愿意在家种地。刘永良十四五岁就能作诗,写小说。他在熊岳城小学教过很短时间的学生王孝先,甚至仅仅给代过几堂课的学生赵庆忱,一提起爸爸无不感慨万分,印象之深终生难忘。在爸爸的影响下,有的学生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有的学生加入了革命行列。

爸爸参加革命时,我的年岁还小,那时爸爸给我、弟弟、妹妹分别起了个带“铁”字的名字:铁骏、铁汉、铁虹。爷爷由于家族观念,让我叫“友藩”。今天我领悟了“铁”字的真谛,“铁”字包含了爸爸对我们全部的爱和全部的要求与期望。

初识花喜露

石岱宗



田贵

石岱宗 后名卞和之,笔名力飞,1923年生。花喜露在盖平县归州国民优级学校时的学生,在本溪国民高等学校读书时组织读书会。1943年入山海关参加革命。离休前系沈阳戏剧学校办公室副主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之后,就很快地成立了一个傀儡政府——“满洲国”。还把被推翻了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找回来,在长春——当时定为国都新京,当了儿皇帝,一切都得听日本人的指挥。在小学课本里,增添了日语、日本历史、日本地理等课程,欺骗中国人民,大力宣扬和美化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是“天照大神”留下的优秀子孙。言外之意是中国人不如他们聪明,应该受他们的领导和统治。就这样从精神上麻醉我们,用武力镇压和杀害我们,让中国人当顺民,给他们当奴隶。

日本人在一般县级地区都修建元神殿供“天照大神”,在一定时期让中国人去参拜,特别是让学生排队去参拜,毕恭毕敬地祈祷“天照大神”保佑。在课本中大讲“日满协和”“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等谎话,大肆宣扬大日本帝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和“满洲国”是邻邦,“同文同种”。因为在日文中多采用中国字——汉字所以叫做“同文”,又都是黄种人所以叫“同种”。两国应该“协和”“亲善”,称日本国为“友邦”,意思是日本帝国主义是友好的国家,是“满洲国”的好朋友,要“一德一心”把“满洲国”变成“王道乐土”。真是天大的谎言。我小时候去煤矿上玩,看到很多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中国人被圈在铁刺网里,由日本兵持枪监视着。他们肯定是“反满抗日分子”“思想犯”。他们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任人宰割。解放后挖掘出大量的死难者尸体,手是被铁线捆着的,可以肯定他们生前都是不屈服日寇的爱国者。

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乡村进入了城市,知识面开阔了。经常听说某人是“反满抗日分子”被杀害了,某人是“思想犯”入狱了,某人失踪了……在营口日本守备队,经常在那里审讯毒打中国人,无数的无辜同胞被杀害了。更有甚者肆意将我们善良的中国人推进狼狗圈,活活地被狼狗咬死。所以人们夜里都不敢从守备队门前经过。我们中国人中有一部分败类充当汉奸,走狗,仗势欺压中国人。通过这一系列事实,我明白了日本是侵略者,是杀人魔鬼,什么“友邦”“协和”“亲善”“王道乐土”,统统是骗人的鬼话,我在心里暗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讨还这笔血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日本侵略者在镇压东北人民的同时,加紧向关内进攻。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占领我大片国土,大肆杀害中国人民。每攻克一座城市之后都举行庆贺活动,让小学生们列队游行,手持红灯,喊着口号,宣传日寇的战果。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同盟要称霸世界。日寇便喊出了“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圣战”的口号;妄图网罗“满洲国”等殖民地国家给日本侵略者充当炮灰,首先在满洲建立伪满军,而且在中学里也增加了军事训练,在二年级时就派来了军事教官,学校成立大队,班级成立中队和小队。让我们去山城镇部队体验部队生活,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在一星期的时间里,深刻地体验到部队就是人间地狱,日本人讲阶级服从,老兵可以打新兵,气氛非常紧张,不知什么时候打骂临头,一点乐趣也没有。一周时间的兵营生活结束了,有个带上士军衔的40多岁的老班长,看样子,他在旧中国时就当过兵,在我们即将离去的前夕,特地为我们召开一个娱乐晚会。老班长神气十足地叫了一声某某人出来!同时对我们这些学生说“他是大警察呀!”用命令的口气说:“唱一个!”这个当过警察的新兵,本来不愿意唱,也得拉开嗓子,唱一个“何日君再来”,接着又喊某某人出来唱一个“天涯歌女”,“他是一个大教员哪”!……当时的伪满军就是这样不讲情理,随便污辱人格,一点儿自由都没有,他们能不想家吗?只有夜里躺在床上偷偷哭泣。

在座谈会上,同学们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由一位少尉排长来回答。当时我向这位排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听说中国有个中央军,他们的战斗力如何?……他回答说:现在不像从前了,也很有战斗力……他们是敌对国家不能多谈……我们这些中学生们都关心中国的命运。虽然日本人控制、封闭消息,但是当时小道消息还是广为流传。爱国青年殷切期望早日驱除日寇、光复祖国大好河山,为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不惜牺牲一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越伸越长,占领东北,进攻关内,把兵力扩展到南洋……战线越拉越长,兵员补充物质供应都越来越困难,因而对东北加强压榨、控制;讲“配给制”,粮食、布匹严加限制。不许中国人吃大米,吃大米是“国事犯”。穿更生布,连使用火柴都不随便。记得在中学时,集体伙食,吃高粱米饭,后来变成稀

粥，高粱米买不到就吃苞米面、窝窝头，苞米面供应不上了，就吃土豆子。以上种种就可以说明“王道乐土”是什么货色了。更让人作呕的是日寇竟喊出了“亲邦”大日本帝国的口号，让中国人认贼做父，真是恬不知耻。

1934年，我在盖平县（今盖县）归州村两级小学校五年级读书。暑假过去，新学期开始，学校里的人有了一些调动，教语文的迟老师调走了，代替他的是一位年轻老师。这个人中等身材，两眼炯炯有神。课堂上喜欢岔开两腿，把双手按住教桌的两个桌角，向上一蹶一蹶地对我们讲课。写黑板字由于用力过大，经常把木制的黑板震得咚咚响，并总得弯腰去拾起一些被用断了的落在地上的粉笔头。他走起路来，总是阔步前进。上课铃一响，他会突然地出现在课堂上；下课后，不屑几步，也就跨进了预备室。这个人就是花喜露。当时他还没有正式使用田贲这个笔名。

起初，我与花老师还不太接近。有一堂图画课，教画的郭世魁老师有事没有来，让学生每人画一幅水彩画交上去。我画完一幅送到老师的教桌上之后，看到一个同学从家里带来的一本供临摹用的旧画册，见那上面并没画伪满国旗，而是画着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眼看着身旁无人，我拿起笔在剩余的图画纸上画了起来。不曾想竟被来收作业的郭老师发现了。他没有吱声，就悄悄地把我们班主任花老师找来，两个人就在我的课桌旁站住了。

“画这个干什么？”郭老师猛然说。那时候再想把画收起来，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说：“玩。”然后把那未画完的国旗卷了起来。

“画什么玩？”郭老师马上把那张国旗要了去。

“图画呗……”我说。又觉得这一回答不太礼貌，一眼看到画本的底边上印着“国旗”两个字，就又指着那两个字说：“这上面写的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花老师那炯炯逼人的目光中有些微妙的东西。

“没什么，许画本上印，就许画。”我不得不辩解了。

“哈哈，你还有个道理……”花老师说，“画完了吧？”

“跟我们走吧。”郭老师和花老师交换了一下眼色说。

“上哪儿去？”走出教室，我回过头问。

花老师马上跟上来攥住我的一只手，凑到我的耳边，小声地说：“把你送给日本人……”

我怀着无比恐惧的心理，跟着他俩来到既是预备室又是教员宿舍的屋子里。“哈哈，日本人怎么没有在家呢？”花老师打趣地笑着说：“坐吧。”

原来他们所说的“日本人”指的竟是那个刚刚派来不久的家住在关东州的教日

语的中国教师。两位老师其实是和我开玩笑。

“坐呀!”花老师说着使劲儿地把我按到椅子上。郭老师便立即当着我的面,把我画的那张图画烧掉了。然后,转向花老师说:“把他交给你啦!”说完他就走了。

接着,花老师就问起了我的家世、志趣和爱好……包括对日本人怎样看法等都提到了。我就把自己读过一年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的教科书,乃至一次跟着大人到城里去,亲眼看着一群日本幼稚园的孩子怎样欺侮一群中国儿童的情形说了出来。

花老师全神贯注地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又问我说:“那你说像这样的事,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等我长大了揍他们。”

“揍那几个孩子么?根本问题不在他们身上。”

“那,那,谁叫他们那样干,我就揍谁。”

“要当英雄吗?”花老师笑了。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笑,却想起另外一件事,就对他说:“老师,你在课堂上讲的《论说指南》上的那篇《论时势造英雄》我理解了。不过,后头你又讲了不少英雄也能造时势的话,我还是不大明白的。”

花老师沉默了片刻,然后独自咕哝着:“揍,当然也是一种造时势。不过,可不是那么简单哩!”他不再说什么,就从抽屉里找出一本鲁迅的《呐喊》,领着我跟他一起读那篇序言。然后向我解释说:“鲁迅放弃了学医,要当文学家,想用文学这个武器来唤醒那些只会当看客的人,就是要造时势。也就是以笔作枪来造时势……”尽管当时我还不能完整地领会这番话的全部含义,却朦胧地意识到他已用双手为我打开了文学这个神圣殿堂的门。

这一次,我们谈了许多,记得那是在郭老师默许下,整整占用了他所担当的一堂课的时间。临了,花老师又嘱咐我说:“若想揍侵略者,自己又不被揍的活,这样的画以后不要在班上画了。”但他认为不能公开的文章却可以写,只是要秘密地交给他,待他看完了再作处理。

随后,他就利用业余时间教我读冰心的《春水》《寄小读者》和老舍、张天翼等人的小说。特别是在夜晚,旁人都睡熟了之后,又单独地留宿给我讲读三郎(萧军)、悄吟的《跋涉》,丁玲的《法网》,巴金的《电椅》和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等。

这一年的冬天,举行完毕业典礼之后,我到他屋子里向他告别,他要我经常给他写信。然后沉默了好一阵子,指着墙上他亲笔写的一个条幅说:“要记住泰戈尔老人

这句话：当路灯消灭时，就燃着自己的肋骨，继续你的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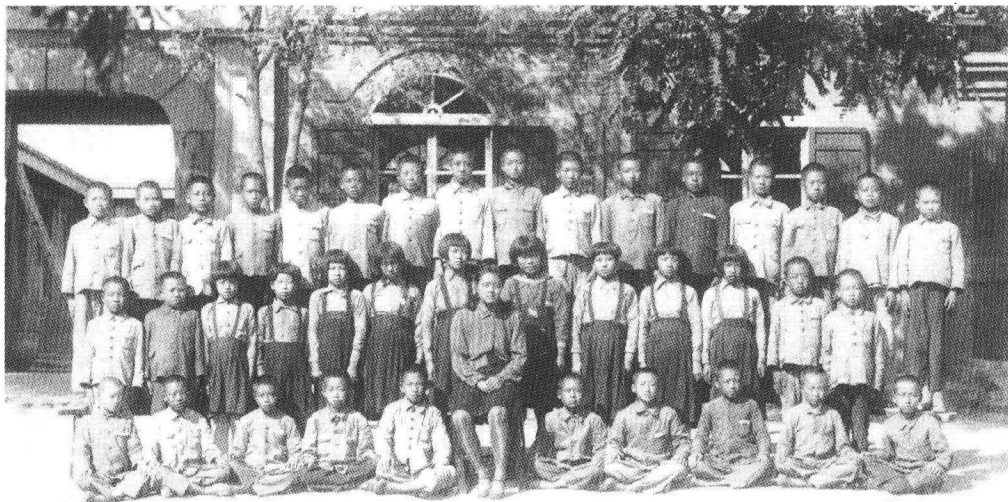
1936年我到本溪国民高等学校读书时，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已与朋友们组成一个“L·S文学研究社”，希望我也参加。“L·S者，鲁迅也”。他说，“但，对外则要说那是我那‘灵莎’二字的缩写。”“灵莎”是花老师的字。这时，我知道他已开始用田贲这个笔名，在社会上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

“鲁迅文学研究社”成立

王丹群

王丹群 原名王风云，曾用名田丹，女，1922年生。吉林省九台县城关女子小学、盖平县归州村两级小学、盖平县立女子中学、奉天省立第三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学生，盖平县归州国民优级学校教员。1943年到奉天装作家庭妇女掩护花喜露做地下情报工作，与其结婚。女儿铁虹出生14天时花喜露被捕，受狱外监视。离休前系辽宁中医学院人事处副处级干部。

1936年春，我从吉林省九台县城关女子小学转到盖平县归州村两级小学读书。



王丹群在盖平归州小学读书时

我的班主任老师就是花喜露。

泰东日报

归州村两级小学,坐落在村北

的小土丘上,空气清新,风景秀丽。每当星期日,花老师就带领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到海滨去,在这海阔天高的大课堂里,他给学生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人民受的压迫和污辱,使同学们义愤填膺,人人谈理想抱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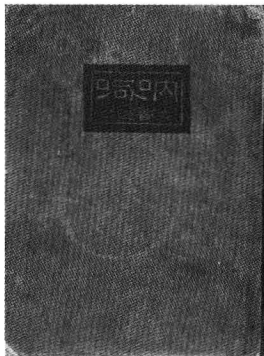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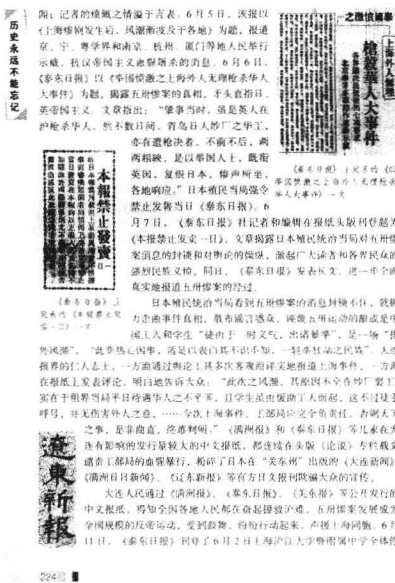
来到这所学校后,我觉得一切都很活跃,有生气。每周六下午有学生演讲会,学校有墙报《春风》,班级有壁报,学校还有成绩室,展放学生的图画和手工艺品等。花老师教我们唱《校歌》和《朝会歌》,讲文天祥、林则徐等民族英雄的爱国故事,启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要我们立志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花喜露老师对学生情同手足,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有一次他给学生出作文题《论志》,文章批改完,在全班会上他对写得好的、立论正确的文章给予鼓励,并对出错的指出方向。有一个同学在文章中说他立志学好,将来好享受荣华富贵。花喜露老师在文后批“富贵之志不足取”,之后他找这个同学谈心,鼓励他志向要远大,念书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使这个同学深受教育,以后他参加了花喜露老师组织的“鲁迅文学研究社”,成为一名爱国青年,“九三”胜利后参加了革命。

1936年花喜露老师在归州组成“鲁迅文学研究社”,和爱好文艺的学生

早期版本鲁迅《呐喊》

共同研习左翼文学。指导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并秘密油印地下普罗文学刊物《行行》。我记得封面是花喜露老师画的,几个人撑着一把雨伞,在泥泞的路上行走,寓意是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需要艰苦的跋涉。他说,我们要走出一条路,“行行复行行”。他给我起了笔名“田丹”,丹是红色,他最喜欢的就是红色,还给他喜爱的学生也起了表示红色的笔名,如赤婴、殷拳等。



我与驼子

王锡成

王锡成 笔名夕澄,1915年生。伪满营口义和利药店学徒、忠信昌药店店员,《营口新报》星火副刊汇稿人,积极参与“星火同人”反满抗日活动,1944年5月被捕,被判处15年徒刑,1945年8月19日出狱回盖平县,在于家麟组织的国民党县党部任宣传科长,被长春派来的国民党县党部部长刘文斗等撵出后,参加革命,离休前系辽宁省新华书店副经理。1954年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时,出庭控诉日本战犯罪行。

驼子与我同村,他比我大两岁,我经常以大哥称他。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他在盖县西关中学读二年级,我在城里一个私塾学习。一天下午,我们俩进城,亲眼看到车站上的日本宪兵队,二十几个人全副武装,抬着一挺机关枪,从西门进城,兵不血刃一直走进县公署,把盖县占领了。

在这以后,我和驼子经常在一起议论近百年来不平等的条约等国耻大辱,抒发忧国忧民、仇恨日寇、恨煞汉奸的情怀,深深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驼子的学识赢得了我们的钦佩,他对琴棋书画样样上手,写得一手好魏碑字,在议论时局中,他不但健谈而且知道得也多。虽然他是官僚地主家的少爷,却很少有富家子弟习气。他与村中的穷人相处得很好,同情穷人,经常接济一些困难的村民。他是我村杜家小铺的常客。在那里往往能听到一些反满抗日人物的故事,像高筱楼(一个演戏的武生)下乡组织队伍举旗抗日、抗日义勇军邓铁梅部队的活动和战绩等。也能听到日寇汉奸草菅人命的消息,像汉奸王殿忠队伍又进山“剿匪”去了等。我们很关心时事,驼子、门文东和我多次下决心,誓死要反满抗日,赶走日本鬼子。

1934年,我到营口市义和利汉药店学徒,虽然和驼子分开了,但差不多每星期都有书信往来。这时我刚踏入社会,待人接物的知识增长了。药店订有好多报纸,这给我创造了学习条件。

从1934年开始,驼子就经常写些新诗投到报纸副刊上去发表,开始笔名是“迢迢”和“条条”。《大同报》《泰东日报》《明明》《凤凰》《新满洲》《华文大阪每日》等报刊,

常登他的作品。按那时的说法,就是通过文艺形式,以隐讳的手法,抒发内心的愤懑。当时我也在《营口新报》上发表些小作品,于是又结识了几位要好的朋友,如万庆文(笔名葛雷,师范毕业生)、许庆春(笔名雷力普,在药店学徒,后来考上兴业银行)、马灿洲(我的师弟),皆因信里有反满抗日言论被捕关押一年多。就在这段时间里,驼子给我来信说他结识了“诗友”花喜露。他向我说花喜露笔名田贲、花蒂儿、灵莎等,是盖县归州小学教师,海城三师毕业生,爱国思想很强。驼子在给我的信中,还谈了花喜露的同学王克范、李光海也是爱好文艺的爱国青年,并说有机会就把这些人介绍给我和门文东。

回忆驼子

门文东

驼子原名于家麟。祖籍盖县东关天台街。其父于沛源,字问渠,原为东北军张作霖部团长,于直奉战争后,退伍家居,靠祖业生活,1929年病故。驼子为独生子,没有兄弟,只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异母妹妹。驼子貌不惊人,体不压重,瘦小枯干,鸡胸驼背,习以“罗锅”呼之。他工书法,善刻印,还善画国画。随手拿来一张硬纸壳,不用打稿,就可以用剪子剪出一匹栩栩如生的奔马,常自画自刻驴皮影人的身首,让孩子们作戏,令人赞叹不已。他更善写诗属文,真是多才多艺。

我于1929年到天台街馥馨香铺学徒,1933年学徒期满,因为受大掌柜青睐,提拔为内柜,就是会计。其时驼子在盖县西关中学念书,因对日本侵略者实行奴化教育不满,愤然退学,家居自

学并搞文艺创作。其后,伪盖平县当局多次请他出来做事或当官,都被他拒绝。他家是香铺股东,又离香铺很近,所以经常到香铺看报,又加上我家租用他的门房住,我们是前后院的邻居,所以就相识了。他看到我很爱读古旧小说,就主动借给我新小



门文东和家人

说看,并时常给我讲些文学创作的宗旨和如何写作等知识,因此我就开始喜爱新文学并练习写作了。

他买的新书很多,先后借给我看的有巴金的《灭亡》,三郎的《跋涉》,茅盾的《子夜》,鲁迅的《呐喊》《彷徨》,穆时英的《南北极》,老舍的《赵子曰》,丁玲的《夜会》、《田家冲》等。后来又借给我一些翻译的书,如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罗亭》《烟》,杰克·伦敦的《深渊下的人们》,勃克夫人的《大地》等。他不但借给我书看,还鼓励我练习写作。我看过巴金的《灭亡》后受到巨大的鼓舞,我曾从头到尾把全书用水笔小楷抄录下来,以便随时阅读。书的卷头语,至今我还能背下来:大凡那最先起来反抗的人,灭亡必然会顾全到他的一身,我也本知道这样的事情……我却愿意去做。我非常喜爱书中的主人公杜大心。驼子看到我的爱好和理想,就更愿意和我接近,帮助我练习写作。他给我讲过苏联的革命和普罗文学,也讲过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学。这些都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新知识,我如饥似渴地接受了。在他的帮助下,我开始试写小诗,有几首被他拿去寄给《大同报》,真的发表了。

大约是1935年秋天,他已退学家居两年了,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诗文。一天又返回西关中学看望同学,当时即席作了一首七律诗,回来给我看,至今我还能背下来:

一辞二载又登楼,
白云黄叶不尽愁。
落日盈眸光惨淡,
寒蜚扰耳泣啾啾,
为涉世路书难度,
欲历尘途剑却留。
堪羨古来苏季子,
贫归发愤志还酬。

此诗既表现了他在日伪统治下的苦闷心情,也抒发了他反满抗日的决心。他曾对我说:“我们的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了,我们成了亡国奴,要想自由,就得斗争。”并说:“接受什么教育,就发展什么思想;有什么思想,就表现什么行动。所以要读有用的书,再写出自己的思想,这就是行动。”他就是这样鼓励我和其他青年走上了反满抗日的爱国道路。

1935年以后,他以文会友,和花喜露、王克范、李光海等人交上了朋友。这些人经常到他家吃、住、讨论。我就是在他家里认识这些人的,并和这些人交上了朋友。1936年夏天,以他们四人为主,创办了《行行》油印刊物。后来又创办了《星火》油印刊物,还成立了“鲁迅文学研究社”。凡是在《行行》《星火》上投稿的或参加“鲁迅文学研究社”的人,都称“行行”或“星火”同人。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了很多反满抗日的诗文。以后经过他们的努力,在1940年把《星火》移到《营口新报》副刊上公开发表,在1941年又把《行行》移到在哈尔滨出版的《大北新报》副刊公开发表,起到一定的反满抗日的宣传作用,后来都被日伪特务禁止了。驼子在这些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同人们称他们四个人为“星火四友”。此四人经常在驼子家或香铺开会、讨论,有时就唱革命歌曲。我也跟他们学会唱那些歌曲了,其中有《大路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打铁歌》《摇船歌》等,到现在我还能唱。当时我看《桃花扇》里有一首插曲,其中被删掉两句,我找驼子问他:“这两句空白是什么内容?”他看了看歌词,拿笔就给补上两句“为民族的生存要努力向前,为大众的幸福要奋勇当先。”这两句填得恰到好处。我非常羡慕他的才学和爱国热情。

从1933年退学到1944年被捕,驼子经常外出联系同人,办理出版刊物的事。他去过复县、营口、奉天、新京、哈尔滨、双城等地方,联系了很多同人。这些年里,他创作了很多诗歌、散文和小说,发表在各家报刊上和我们自己的《行行》《星火》上。



伪满小学生饭前祈祷“皇军的恩赐”



伪满小学生观看捐献的飞机

驼子与田贲

李昌毓

李昌毓 李实，笔名舒啸、狂奔，1924年生，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参与“星火”活动，领导一高进步学生参加秋灯书店读书会，主编《大地》油印刊物。1944年5月被捕，判刑5年，1945年8月19日出狱后参加革命。离休前系山西省农牧厅机关党委副书记，2002年去世。

驼子，原名于家麟，因其背驼故在发表作品时常以此为笔名而蜚声伪满诗坛。当时在伪满大约有三种作家：一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而舞文弄墨、歌功颂德的汉奸作家；一是不问世事、吟风弄月、沉醉于自我欣赏的作家；一是以文艺为武器，鞭挞丑恶与黑暗，讴歌自由与正义，积极进行反满抗日的作家。驼子就属最后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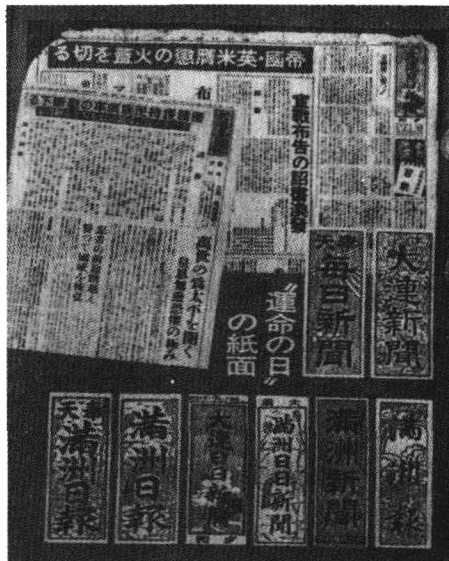
我结识驼子是由铁汉介绍的。他同意与我结交是有目的的。在《大北新报》的《行行》和《营口新报》的《星火》被迫停刊后，他要另辟反满抗日阵地，即想以国高学生和社会青年为对象，推进盖县的爱国文艺活动。事实上，后来出现的“读书会”，《辰星》和《大地》以及“秋灯书店”，莫不与他有直接关系。铁汉为他物色几个有志青年，其中也有我，使他能实现在学生中开展活动的愿望。而当时我也希望能得到一位有修养的作家指导。当我一接触他，他便像磁铁一般吸引着我，因为他的思想品德和写作才能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在我们之间很快建立起亲密的友谊。他成了引导我以文艺为武器进行反满抗日活动的备受崇敬的导师。

驼子家道殷实，但与邻里相处极好。为了开展爱国文艺活动，在他周围交结了门文东、王锡成、王克范、张吉宽、张克恩和郁其文等一些进步青年，并结交了在归州教学的田贲。而且田贲在他们之中是位思想激进又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物。在反满抗日的活动中，他与驼子都起着主导的作用。

驼子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家庭幸福美满，为了反对敌伪统治，不为五斗米折腰，多次拒绝参加伪政府的工作，表现了一个中国人最可贵的民族气节。他能文善诗，其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又极富遐想和寓意，极少雕琢和标语口号之弊。其诗想象丰富，含而不露，常使思想性寓于艺术性之中，很有艺术魅力。他

伪满发行的日文报纸

伪满文艺杂志



反对诗歌脱离实际,无病呻吟。一贯主张“诗言志”,把它视为革命的号角、反抗的战鼓,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因此,他的诗意境深远,感情充沛,构思巧妙,战斗性强,具有诗的生气和魄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前进的脉搏。他的诗富有活力和生命力,因为他植根于人民的艺术土壤之中。他对待写诗极庄重严肃,而且造诣较深,与其说他是位作家,不如说是位诗人。在伪满诗坛上他与田贲、噩匹、雷力普、杨野等诗人齐名,是极受欢迎的爱国诗人之一。

驼子虽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但始终同情劳动人民,反对剥削与压迫,这常在他的言谈和作品中反映出来。这和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在中国诗坛上,他极推崇臧克家、何其芳和艾青等著名诗人,常向我们推荐他们的诗作。同时,他也极力向我们介绍鲁迅、茅盾、郭沫若和巴金的作品。因此,我们都很爱读他们的作品。

在他家的墙壁上,很少挂着装饰品,除了他父亲一幅半身照片外,最显眼的要算两幅字画了。一幅长联为田贲所书,抄录鲁迅《自嘲》全诗,是赠给驼子的。可见他们对“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名句的推崇了,这当是他们的座右铭吧。字是隶书,笔力雄健,潇洒自如,极为庄重美观。另一短幅为驼子手书,引自法国著名作家A·纪德的名句“我诅咒,我战斗。在这齷齪地方,驱逐这齷齪的时代”。一看便知诗人的反抗性格了。他引用这位作家的名言,意在为了打鬼,不得不借助钟馗吧!字是魏碑体,深厚刚劲,功底极深。他们的书法各有千秋,正如他们的诗各具风格一样。

可见这两位诗人,不仅友谊深厚,品德高尚,而且诗才出众,书法也不同凡响。

驼子旧诗功底深厚,是他新诗写得好的坚实基础。他那首《寂寞的城》刊登在日本华文《大阪每日》杂志上。此诗描绘的是被敌人侵占的城市像死了一样没有生气,令人怀念起另一个美丽的故土。暗示反对敌人的统治。如果没有相当的艺术水平,是不会被这个著名刊物采用的。

驼子和蔼可亲,平等待人,谈话时大多用商量口吻,决不自以为是,更不好为人师。我们常把作品拿给他看,请他修改。他极谦逊,提出的意见既中肯又有说服力。他常指教我们要多读、多写、多观察、多思索,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我们颇受教益。他虽谦和,却很有主见,在重大问题上,决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在浅易中常有独到见解。他言谈举止稳重,常于委婉中露真情。这也许是人如其诗,故多隐喻含蓄之意吧!

我们不该问的决不多问。一次我去他家,他把我领到前院一处土平房,给我介绍一位客人,说他姓吴。后来才知道那人便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著名作家李季疯,躲藏在他家。可见他为了朋友安全而不顾个人安危,实在难得。

驼子一生不断追求进步,决不故步自封。他虽参加地下国民党组织,但他一直坚持“左”倾的文艺观点。光复后看到国民党黑暗腐败非常不满,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寄予很大同情与期望。他勇于探索,能坚持真理,修正陈腐观点,开拓新的道路。我们先后参加革命是与受到他的影响分不开的。

我在与驼子交往的同时,也结识了门文东、王锡成和王克范等进步人士。在反满抗日的旗帜下,他们对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出版《大地》和《辰星》、开设“秋灯书店”等活动,都给予积极的支持,而且亲自参与活动,对我们有良好的影响和帮助,对发展盖县爱国文艺活动起着重要作用。

田贲,在我没有同他认识以前就已知其大名了。他的学生,有些是我一高的同学,从他们那里知道他许多美妙新奇的故事,包括他对学生的启蒙、极深的写作修养和家庭恋爱等问题。我读过他的诗,特别对《孙二祖宗上西天》《塔·城·一切建筑》等诗尤为喜欢,读之朗朗上口,意味深长。他的诗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气贯长虹,多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这和他思想激进,立场坚定,笃信共产主义,热爱共产党,对祖国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渝的品质是分不开的。他反对旧思想旧传统,积极宣传新思想新风尚。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疾恶如仇、不共戴天,是一位敢于斗争,不折不挠,并具有宁死不屈、硬骨头精神的爱国诗人。

田贲的反抗精神,也表现在被捕后在敌人酷刑的拷打下那种视死如归的品格。即使在监禁中也不忘战斗,用血和生命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悲壮诗歌。由于他被

敌人残酷地折磨和摧残,在出狱后,虽经医治也未好转,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我的爸爸王克范

王剑华

王剑华,王克范的女儿。1941年生,退休前系营口市永安乡中学教师。

我的爸爸王克范惨死在日本侵略者暴行之下时,我只有三岁,已记不得爸爸的音容笑貌了。但从妈妈的讲述中知道了爸爸是因反满抗日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爸爸有刚直不阿的品格、爱憎分明的立场、坚贞不屈的气节。一个为民族解放而捐躯的爸爸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930年,爸爸从盖县西关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奉天省立第一高中,从闭塞的乡村来到省城奉天。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卖国求荣的官场,帝国主义的奴役,使苍茫的神州大地陷水愈深,蹈火愈热。这时,打倒列强、抵制日货的反帝爱国浪潮日渐高涨,也波及到校园。学生们唱着打倒列强的歌曲加入了这场爱国运动中,激起爸爸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爸爸求知若渴,当时,省城的书店里,不仅书的种类繁多,还出售进步书刊。左翼作家编辑的《大众文学》《拓荒者》等刊物已传播到奉天,还有大量的左翼文学作品。这里如同知识的海洋一般任他遨游。在这里他饱览了古今中外各类书刊。诗词中,爸爸最喜欢岳飞的《满江红》,它气壮山河,是一首千古传颂的爱国主义绝唱。书刊中,爸爸最崇尚的是鲁迅的作品,简直是爱不释手。这些文学作品对他的影响很深,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飞跃。可好景不长,他只读了一年就被迫辍学了。这时我们家已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了。主持家庭的是曾祖父,他勤劳、俭朴,但有点守旧。在儿孙们中,最喜欢爸



《盛京时报》(1934年6月5日)刊登邓铁梅被害消息

爸。出于偏爱，他唯恐这个有着新思想又带有叛逆性的孙子，在省城的常常闹事的“洋学堂”里读书会闹出什么“乱子”。因此不同意爸爸继续求学，逼着爸爸找个事做。爸爸虽然抗争过，但还是离开了奉天。这时由父母包办，爸爸结婚了。妈妈读过小学。她善良、热情、开明，看到爸爸辍学的苦闷很是同情。为帮爸爸实现继续求学的夙愿，她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私房钱，资助爸爸进了省立第三师范读书。

1931年，爸爸入省立师范之际，正值九一八事变之时。民族危亡，国土沦丧，白山黑水惨遭日寇铁蹄践踏。沦为亡国奴的耻辱震撼着爸爸的心。他无比愤慨，常常跟思想进步的同学一起谈论时事，发泄心中的不满和仇恨，写文章抨击时弊，表现出强烈的抗日救国的愿望。他立志投身教育，唤起下一代和民众的觉醒。

1934年，爸爸从省立师范毕业。那时国破家亡，毕业就是失业。当时爸爸已有妻室子女尚待抚养，没有工作，在家看着旁人的冷眼。就在爸爸求职若渴的时候，有一位同学鉴于爸爸的才华，荐举爸爸到日伪省政府供职。同学多次来找都被爸爸谢绝了。高薪厚禄，洋楼汽车，这对有些人来说，那真是求之不得。可爸爸却对妈妈说：“山河破碎，国难当头，我堂堂七尺之躯，怎能爬行混迹官场，为虎作伥，那还是中国人吗？”

经多方奔走，爸爸才找到一个在当时社会地位卑微的小学教员的职务。这是他短暂的一生为之奋斗的职业。他怀着教育下一代、唤起民众觉醒的志向，满腔热情地踏入教育生涯。他先后在盖平县的蚂蚱庙、尚和寨、永安屯等学校任教。他把阶级仇、民族恨化作对学生的爱，他把学生看做是光复中华、振兴中华的后备军。爸爸从自身的经历深知辍学的痛苦。他在教学期间看到家庭贫困的学生上学有困难，常常慷慨解囊相助，给学生买书买本、交学费。他对学生关怀备至，希望他们成才。那时，日本法西斯一面踏着中国人民累累的白骨，一面却狂叫着什么“中日亲善”“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在东北推行奴化教育。爸爸背着日本人和汉奸，想方设法教育学生要牢记亡国的耻辱、法西斯的罪行。当时学生要学日语，上课时师生要用日语问候。爸爸自己从不讲日语，并告诉学生：“我上课，你们不要说日语，这是小日本在奴化我们。咱们是中国人，不讲那鬼话。”还说，“日本话用不着学，再过几年就用不着了。”爸爸还常常给学生讲民族英雄岳飞和文天祥的故事，以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时，爸爸用名王矜人，笔名矜人。他解释说：“矜”字有同情的意思，“人”是人民大众，表示同情并解放劳苦大众的思想。他信仰共产主义，并对妈妈说：“这个家要是我说了算，就把地卖了，把钱分给穷人。等赶走小日本，全国解放了，那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都过上好日子。”他还跟妈妈说：“苏联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了。关

内共产党领导闹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将来实现共产主义,世界大同。”这些话,在我懂事后,妈妈不知跟我说过多少遍。

蚂蚱庙小学是爸爸教育生涯的起点。与此同时,和爸爸一道从省立第三师范毕业的同学花喜露也回到盖县归州任教。两人来往密切,志同道合。他们二人常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以文会友,结识了李光海和很有才华的于家麟。他们反满抗日的思想是一致的。在民族魂的感召下,他们四人结合在一起,组织成立了“鲁迅文学研究社”,用鲁迅两个字的英文名字头称为“L·S文学研究社”。他们以“鲁迅文学研究社”作为联络扩大组织、宣传抗日救国的阵地。当时,他们四位友人被称为盖平“文化四友”。后来的《行行》和《星火》社团就是以“鲁迅文学研究社”为先导,以四友为核心主办发展起来的。

在归州国民优级学校

李吉恒

李吉恒 笔名毅夫,1923年生,李季生的弟弟。花喜露在归州小学任教时的学生,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新京记者养成所学员,长春某报社编辑。在长春被捕后于1944年8月10日与鲁启智、冯策勋、王家贻、阎家珍一起被押解到盖县。退休前系鞍山市自来水管工程公司干部。

1938年2月1日,我到盖县归州国民优级学校读书。花喜露老师教我们的语文课。他不仅教文言文、白话文,还向我们介绍课外读物,让我们阅读《鲁迅散文集》、冰心的《寄小读者》等。还指导我们练习写作,给我们每个人都起了笔名,给我起的笔名叫驰子。

1940年,我考入盖县第一国高念书。花老师始终和我保持着通信联系。后来他到沈阳凌云街公所工作去了。一次,花老师从沈阳来到盖州,领我到于家麟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于家麟。花老师给我介绍说:“这就是驼子,你没看见他罗锅吗?”当时我是个学生,对老师的朋友我当然肃然起敬。他俩谈论些什么,我也记不清了。总之,看到他俩的友谊是特别深厚的。在于家麟家里吃完饭,他俩就领着我逛大街。后来于家麟有事走了,花老师就把我领到钟鼓楼上的图书馆。花老师选出两本书,一本是

《法兰西革命》，一本是《惠特曼诗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两本书你要好好看看。”这谆谆的教导，使我终生难忘。直到1946年，我在《凯旋周刊》当编辑时，才对那两本书有较充分的理解，并在《凯旋周刊》上摘登了惠特曼的诗。

在康宁堡国民优级学校

姜涛

姜涛 原名姜宗璐，1928年生。姜静芳的小弟弟。伪满盖平县正黄旗村康宁堡小学校、清原县国民高等学校学生。1947年入关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前系鞍山市政府秘书长。

1940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践踏着祖国的大地，东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时，我还是个12岁的少年，在家乡盖县正黄旗村康宁堡国民优级学校读书。这年，花喜露老师从归州小学转到了我们学校任教。他中等身材，话音洪亮，他平易近人和敢于斗争的作风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极力推行法西斯的奴化教育，宣扬封建迷信，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麻痹群众斗志。花老师勇于向世俗观念挑战。当时我们许多同学的名字都带有封建的色彩，诸如忠、恕、贤、淑之类。他到我们班级不多天，就亲自给大家改名。记得他给一位原名叫韩喜珍的女同学改名为韩光，另一位改名为陈慈。花老师还经常用科学道理破除学生思想中的迷信、愚昧意识。我们家乡有座美丽的宝泉山，山半腰有个狐仙堂。小学校就坐落在山脚下。在老百姓中间有个“狐仙”的迷信传说，什么“冲了狐仙大祸临头”啦，“不拜狐仙要头疼”啦，等等。一天，花老师带着我们来到了狐仙堂。我们不叩头，不作揖，这儿摸摸，那儿碰碰。然后花老师用手拍打着“狐仙”的脑袋，对我们说：“这根本不是什么仙，而是人用黄泥做的偶像！”第二天，他还特意问大家：“你们谁头疼了？”同学们调皮地摸着自己的脑袋，相视大笑起来。

花老师经常领我们到宝泉山上，面对巍然矗立的望儿山和点点航帆的西海，画写生画。有时教我们用树皮拼贴一些山水风景、花鸟虫鱼之类手工画，有时给我们讲故事，对我们进行爱家乡、爱祖国的教育。每逢春秋两季，花老师总爱组织我们到望儿山去旅行。给我们娓娓动听地讲述那望儿山古老的传说。并且针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略行径,添加了许多增强民族意识的情节,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牢固地树立作为中国人的意识。这在东北沦陷区来说,实在是极为可贵的。

花老师不顾日伪的严密封锁,在这个远离县城的偏僻的乡村小学,向同学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他在学校创办了一个图书室,向我们推荐和介绍了鲁迅、茅盾、郭沫若、张天翼、巴金等人的作品。在他的热心指导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名家的著作,从中接受了许多革命的新思想。由于花老师在指导我的阅读中,经常同我兄弟般地切磋研讨,更进一步增进了我们的师生之谊。我把他当做自己的良师益友,他也认为我是他的得意门生。他与其他学生也相处得很融洽。他公开反对旧教育制度下师生之间的“猫鼠关系”,反对体罚学生。宣称他和学生们是兄弟关系。一次,一位淘气的小同学不知因为什么事,真的把花老师惹火了。花老师一怒之下,打了这个小同学一个手板。可当他看到小同学眼里的泪花,心立刻软了下来,十分内疚地向小同学道歉说:“老师发脾气,不好,不对……”

三、从《行行》到《星火》

《行行》创刊

王锡成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年，日寇已将辽南地区以邓铁梅为代表的革命武装镇压下去，站稳了脚，把人们统治得敢怒而不敢言。接着，铁蹄又踏入华北，不久就挑起了卢沟桥七七事变。这时一些不愿做亡国奴的知识青年，由于思想上受压抑而苦闷，不约而同地寻找抗日救国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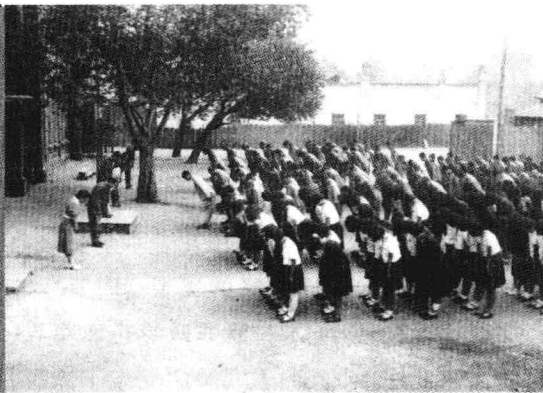
我和同村的于家麟经常议论时事，找些新旧小说阅读，当我们从三郎（萧军）和悄吟（萧红）的《跋涉》中得到启发，从巴金的《灭亡》里看到新的希望后，我们暗暗地议定共同走反满抗日的路。就在这时，于家麟与田贲同志结识了。他们两人是在伪报刊上发表作品而结识的。不久，我们又通过书信，结识了田贲的许多友人和学生。

田贲从辽南海城奉天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后，就到盖县熊岳归州小学教书。以后他介绍给我们的友人中，就有与他一道毕业的同学王克范（笔名矜人，当时在盖县尚和寨小学教书）、李光海（笔名铁励、周行，当时在复州湾盐务分局工作），还有他的学生张吉宽（笔名殷拳，当时是盖县一高学生）、刘永良（笔名刘英、赤婴，盖县一高学生）、石岱宗（笔名力飞、卞和之，当时辽阳一高学生）、王凤云（女，笔名田丹、丹群，当时沈阳第三女高学生）、孔庆举（当时营口商科国高学校学生）、穆玉琪（女，笔名稚枫，当时盖县女高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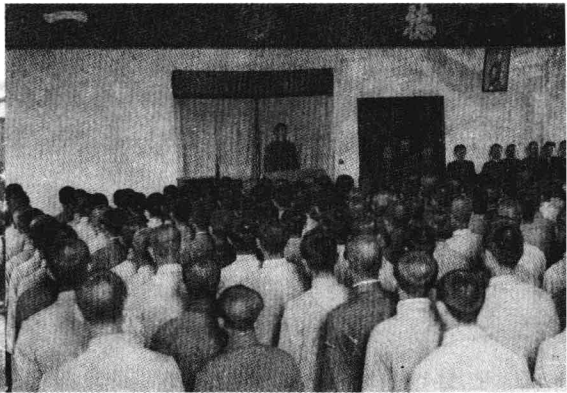
1936年夏，我回盖县“住家”（即学徒放假）。有一天下午，驼子和花喜露、王克范还有几名花喜露的学生（可能是张吉宽、刘永良）一起聚集到我们村东双顶山的山岗上，研究今后怎样反满抗日的问题。结论是得组织起来，多读多写，增长才干。要以文会友，宣传反满抗日思想，扩大反满抗日队伍，伺机寻找地下抗日组织。并决定除以公开身份写稿投向合法刊物外，还要出一个秘密刊物，以此团结同人，刊登一些不能在公开报刊上发表的诗文。当时议定秘密刊物在花喜露的学校出版，因为那里有油印工具，又有不少进步学生，条件好。由花喜露负责编辑。最后研究这个刊物的名称

时,我们正向山下走。花喜露嘴里念着《古诗十九首》里的“行行复行行”诗句,就对大家说:“我们也要干着看,刊物就叫《行行》吧!”刊物叫《行行》,我们组织起来的这个小集体就叫“行行”同人。

《行行》由田贲同志利用业余和寒暑假时间在两年里出了两期。我曾写过两篇稿子,一稿是散文《阿傲的厄运》,一篇是短诗《缝穷的姑娘》,都刊登了。这时同人队伍有所壮大。田贲又提议,为了能够多发表一些青年学生同人的作品,再印行一本刊物叫《星火》,意思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暗喻我们的反满抗日活动终将胜利。应该说,那时我们这些人,在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的思想指导下,以隐晦的文艺作品为呼声,启发扩散反抗情绪,在政治上虽然幼稚,一经组织起来,就感到有了力量。



伪满学校的朝礼



奉天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对学生进行精神训话

《行行》创刊

门文东

一切有民族气节有爱国之心的人,无不对日寇的罪行恨之入骨,义愤填膺。家住在盖平县东门外天台街的于家麟,不能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于1933年愤然从西关中学退学,在家从事写作,揭露日伪的罪行。他又联系了住在本街的王锡成和我等青年,经常在一起传阅进步书刊,练习写作,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唤起民众觉醒。

与此同时,花喜露、王克范、李光海同时从省立海城三师毕业。花喜露到盖平归

州小学任教,王克范先在盖平蚂蚱庙小学,后到盖平永安屯小学任教,李光海到复州湾盐务分局工作。他们耳闻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也愤然拿起笔,写文章揭露日伪反动派。

于家麟和花喜露等人,都是盖平县人。在双方还没有见面之前,就从报纸上和通信中成了文友。1936年夏天,王锡成在营口一家中药店里做店员,休假回到天台街老家。在于家麟的授意下,几次到归州小学去和花喜露接头,花喜露非常赞成他们互相联合起来的主张。他说:“要想不做亡国奴,只有起来斗争。要想取得斗争的胜利,就得唤醒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奋斗。请你转告家麟兄和文东兄,我们学校一放暑假,我就邀克范和铁励到天台街去拜访他。”

按照约定,8月的一天,我们都到于家麟家里聚会。为了这次聚会,于家麟、王锡成和我事先做了准备,买了不少水果和点心。这天刚吃完早饭,王锡成就到盖平县火车站去接老花。于家麟在家里等着。

十点刚过,一辆“二马车”就停在于家大门外,于家麟急忙去迎接,可还没等迎出屋门,就看见从大门外走进一个穿着灰色袈裟、露着光头顶的小个子和尚,他不禁吃了一惊。于家麟认识这个和尚,他本来是个日本浪人,名叫木村,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窜进了东北,活动在大连到沈阳一带的南满铁路线上。于家麟的父亲当时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在世时和木村有过交往。那时于家麟还小。木村既非政界也非军界,还不像个商人,可他的活动能力却很强,就连东北军的团长、于家麟的父亲于沛源,也对他客客气气的。九一八事变后,木村好一阵子不知去向了,后来不知怎么当了和尚。1935年,木村和尚突然跑到老于家来串门。1936年初又来过两次,每次来除了谈些于团长的往事以外,就是极力夸赞于家麟的才华,劝于家麟到伪县政府里去做些事儿。盖平县日伪当局曾几次请于家麟出去做事儿,都被于家麟拒绝了。木村和尚又来说项,这使于家麟对他起了戒心。

这天的聚会是很秘密的,连我们的家属也不知道聚会的内容。可偏偏叫这个日本和尚碰到了。于家麟眼看木村和自己的母亲唠得很投机,一时半会儿不会走,就决定换一个地方聚会。我们把事先准备好的食品全拎出去,到东双顶山去野游。

盖平县城北对称地耸起两座山来,这两座山又各自有着两个圆圆的山头,很是好看。所以当地人就给它们起名叫东双顶山和西双顶山。那里草木茂盛,郁郁葱葱。我们兴致勃勃地直奔东双顶山而来。王锡成、李光海两人身高步大,捷足先登,一直向山顶爬去。花喜露爬到半山腰停了下来,向四周瞭望了一会儿说:“我看在这一野游就挺好,此处虽没到山巅,离山脚已经很远了,在这里大声说话山下也听不到,山

下的来人,我们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距山顶还有一大段距离,山背后也听不到我们的说话,山后要有人来,我们也可以及早地发现。我看这地方真是很好的露天密室,在这儿开会研究问题是绝不会泄密的。”

于家麟往山坡上一坐,看了看大家,首先开了腔:“老花、克范和铁励第一次到我家来,就叫日本和尚给搅了,使我没能很好地尽地主之宜。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吧……”

没等他说完,王锡成打断他的话,笑着说:“你不用介绍了,一看见你的罗锅,谁都认识你啦。”大家发出一阵笑声。于家麟8岁时从磨盘上摔下来,脊椎骨受伤,从此变成驼背。但是他很乐观,写稿时也以驼子为笔名,所以大家也这样称呼他,并无贬义,反而显得亲切。接着王锡成就一一作了介绍。到会的6个人就是伪满时期盖平县反满抗日爱国文艺活动的发起人,也是盖平县进步文艺团体“鲁迅文学研究社”的早期成员和地下秘密刊物《行行》《星火》的创始人。

于家麟接着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今天的聚会,就请我们的老大哥喜露兄来主持吧。”我们6个人虽然年龄上下差不了多少,可最数花喜露年龄居长,时年24岁,其次是李光海、王克范。居中的是我,时年22岁,于家麟、王锡成年龄最小,只有20岁。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看到自己的家乡和同胞惨遭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怎么也平不下这口气,所以就自发地行动起来,要尽自己的所能,拿起笔作武器反抗侵略者。听了于家麟的推荐,大家一致同意请花喜露主持会议。花喜露却客气地说:“今天我第一次来到天台街,第一次登上双顶山,和你们来比我是客人,怎能反客为主呢?今天的聚会一定请家麟兄来主持。”就这样,于家麟却之不恭地主持了东双顶山的聚会。紧接着大家就开怀畅谈起来,倾诉着郁积在心中的愤怒。

花喜露慷慨陈词,他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以来犯下的种种罪行讲到东北同胞沦为异邦亡国奴的苦难生活,说到激动之处,竟站了起来,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手里拿着血淋淋的屠刀,嘴里却喊着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他们对中国人民除了实行亡国灭种的大屠杀以外,还要泯灭我们的民族意识,对我们的青少年实行种种的奴化教育,对我们的同胞采取各种毒化手段。你们看看,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县城里,日本人和汉奸特务就开了多少家大烟馆,设了多少家妓院,常此下去我们的民族真要遭到灭顶之灾啦!唤起民众的觉醒,号召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起来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行动起来……”花喜露的一席话,真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群情激奋,你一言我一语,情绪达到了沸点。

花喜露从衣袋里掏出一卷稿纸,在大家面前晃了一晃,接着说:“过去几年,我们写了很多稿子,可是能有几篇在报刊上发表呢?日本的文化特务对报刊控制得非常

严,稍有锋芒的诗文都要被砍掉,即使一些进步报刊给发表出来,一旦被特务们查出,报刊的编辑和主笔就要受到迫害,大连《泰东日报》的前主笔不是遭到了迫害吗?我们的稿子发表不了,我们的呼声人们就听不到。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去揭露敌人的罪行,怎么去唤起民众啊!”他的话突然停了下来,用热辣辣的眼神看着大家,静了一会儿,才接着说,“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我们的诗文发表出去,让广大的民众看到它。”

花喜露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们一致同意创办一个自己的刊物,发表那些在公开报刊上不能发表的诗文。“我们马上就着手办刊物,可是要想办好一个刊物,光靠我们几个人分散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能够联系团结更多的爱国进步青年的组织,有了组织就可以步调一致,统一行动了,我们的力量也就大了,才能把刊物办好。从收集稿件到编辑印刷,没有个严密的组织是不行的。”

我们从上午讨论到中午,吃完了带来的各种食品,躺在山坡上休息了好一会儿,又讨论到太阳偏西。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成立一个文学社团,作为指导活动的核心,于是伪满时期盖平县“鲁迅文学研究社”诞生了。我们要通过“鲁迅文学研究社”来传阅革命进步书刊,联系团结更多的爱国知识青年,研究写作,宣传反满抗日。“鲁迅文学研究社”的第二项工作,就是办一个自己的刊物。在东双顶山的会议上,我们研究了如何办自己的刊物。花喜露说:“这个刊物必须是秘密的,不能让敌人发现,同时这个刊物还必须是公开的,不光给我们内部的人看,要使更多的青年学生、文艺爱好者能够读到,否则就起不到它的作用。所以在我们自己的刊物发表诗文,也必须用化名或笔名,它就是被特务们截去了,特务们也不知道是谁印的,查不出是谁写的。我们发展社员,联系同人也必须慎重,防止泄露了我们的秘密。”

接着大家又研究了印行刊物的具体事宜。最后决定这个秘密刊物由花喜露、于家麟二人主编,利用花喜露教书的归州小学有油印工具的方便条件,在他们学校印刷。资金由大家提供,于家麟拿钱最多。这个刊物叫什么名字呢?大家又讨论起来。有的人提出叫《学灯》,有的人提出叫《奋进》,有的人提出叫《呐喊》。名字提得不少,可都觉得不能尽如人意。这个刊物的名字还真有点不好确定。它既要有深刻的含义,能激发人们的斗志,还不宜太旗帜鲜明,不能让敌人从它的名称上嗅出异样的味道来。大家正在讨论时,突然发现由后山坡钻出两个人,这两个人来得很突然,好像有意冲他们来的,刚从后山坡转过来,就离我们不过几十米远了。于家麟立即辨出那是盖平县伪政权控制下的两个小特务,一个叫赵景文,另一个外号叫周歪脖子。

这两家伙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呢?真奇怪,我们第一次聚会在家里就碰上了日

本和尚去串门,到山上又有两个小特务溜了过来。难道这真是偶然的巧合吗?一时间大家没空去想这些了,而是立即停住了讨论。花喜露小声说:“拿出野游的样子来,吃东西的吃东西,说笑的说笑。”王克范比较内向,一向较少发言,这时他突然说了一句:“我们唱个歌吧!”紧接着他就带头唱起《开路先锋》歌:“轰!轰!轰!哈……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这一阵大声齐唱,惊动了那两个小特务,他们站住了脚直愣愣地向这边望着,既不好再向前来,也不愿意就此走开。其实于家麟、王锡成和我早就认识这两个小子。以前这两个家伙是盖平县街面上的无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日本鬼子来了以后,他们就认贼作父,当了特务。

于家麟机智地站起来向他们喊道:“喂,那不是赵、周二位吗?怎么也有兴致跑到山上野游来啦,快过来吃点水果吧!”其他人不理那个茬,照样大声地唱着。这两个小特务还真不太敢惹“于少爷”,所以就不再往前凑了。只好老远地大声喊:“原来是于少爷,你们真有趣,比我们可轻松多啦。我们是公务在身,怎敢偷闲野游哇。今天早晨有两个烟鬼偷了商号的东西,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们只好出来找找,你们看见有人过来吗?……”“除了我们几位,这山上再没有看见别人来,我们在这里又说又唱,连鬼都吓跑了,哪里还有小偷、烟鬼敢上这里来呀!”两个小子听了于家麟的话,恼也不是,好也不是,只好灰溜溜地转下了山坡,走了。“轰!轰!轰!哈……轰!”大家的歌声更洪亮了。接着就是一阵哈哈大笑。

花喜露一本正经地说:“今天出现的和尚和特务,不管是不是针对我们来的,我们都要引以为戒,绝不能掉以轻心。敌人狡猾得很,无孔不入。我们今后和敌人斗争,光靠热情是不行的,还必须靠智慧。”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大家纷纷站起来准备往回走。我们6个人迎着落日的余辉,向山下走去,个个都心情愉快,感到这次聚会很有意义。

快走到山根底下的时候,花喜露突然站住了脚说:“我想起了一个刊名,你们看好不好?”

“快说说看!”大家催问着。

花喜露说:“《古诗十九首》里有一首《行行复行行》,我看咱们的刊物就叫《行行》怎么样?”

“‘行行’在诗里是走了又走的意思。我们的刊物叫《行行》有什么意义?”王锡成问道。

花喜露答道:“它意味着我们要行动起来,也要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共同抗日。特务们要是看到了这个名字,绝不会理解它的真意。”

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刊名好,取自《古诗十九首》有文学色彩,含义深刻能够鼓舞大家,敌人又摸不着头脑。就这样,我们创办的秘密刊物也确定下来了,有组织的活动开始了。

当天晚上,花喜露、李光海、王克范由我陪同,都住在馥馨香铺里。

后来知道,木村和尚是一个披着袈裟的日本特务,因为特务机关从报刊上嗅到了盖平县文艺青年的抗日气息,有意派他来收集情报。花喜露等人曾几次研究要除掉这个家伙,都没找到好机会,那是后来的事。

1936年的秋天,第一期《行行》油印出来了。8开白纸单面油印,再折叠为两页,装订成16开本,共40多页。参加东双顶山聚会的6位同人都写了诗文登在上面,还登了一些花喜露的学生及其他人写的诗文。其中花喜露写的《螃蟹的厄运》深刻地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行决不会有好下场,最终必将像螃蟹一样被煮、被吃掉。这第一期《行行》的封面画的是三个人打着雨伞在泥泞的道路上奋勇地跋涉。三人为众,画面的含义表明“鲁迅文学研究社”的同人们要不畏艰险地共同奋斗。

《行行》自创刊的第一期开始,不定期出版,每期间隔一两个月不等,撰稿人越来越多,如花喜露在归州小学的同事葛雷,他的学生殷拳、刘英、力飞、田丹和于家麟的朋友张克恩、汪士硕、许默语、许庆春等都是《行行》的撰稿人。《行行》的发行量越来越大,甚至发行到哈尔滨、长春、齐齐哈尔、双城、本溪等地。

那时候,我们几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不分你我。由于于家麟家里比较富裕,我们经常在他家里吃住。在一起谈天说地,唱歌。安娥作词的《渔光曲》,聂耳作曲的《筑路歌》,王人美唱的《天涯歌女》,都是我们爱唱的歌。当时有个上海出的电影《花木兰》,中间有个插曲“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厢?月亮照我窗,月亮照我床。”抒发思乡之情,我们也爱唱。有一首《莲花落》,“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我们更是经常唱。



伪满时期的文学作品



盖平县街头城墙

《行行》改名《星火》

门文东

花喜露为什么想到要把《行行》改名为《星火》呢?这里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

那是在1938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归州小学院子里静悄悄的,花喜露在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看着“行行”同人的来稿,突然从学校大门口传来了堂役的喊声:“花老师在吗?有客人来访。”花喜露从窗户向外一看,一个穿着西装的大个子走进了校园,直奔办公室而来。花喜露立刻警觉起来,马上把桌上的稿件拢起来,锁进抽屉里。还没等他出去迎接,那人已推开了办公室的门。第一句话就是:“喜露,还认识我吗?”花喜露稍一愣神,就一步跨上前去,紧紧握住来人的手:“你穿了这么一套衣服,真叫我一时认不出来了,我还以为是特务找上门了呢!”接着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来人是花喜露的老同学,少年时期的知心朋友,名叫王耀季,此时已改名为田琛。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流亡学生到了关内,后来又在同志的帮助下到日本留学。花喜露早就知道他是一个有才华的爱国进步青年,对他非常崇拜。

“你这是从哪儿来?”

“从日本东京来。”

“从日本东京来?”花喜露重复了一句,紧接着直截了当地问道:“是带着日本人的使命吧?”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带日本人的使命呢?”

“说得好,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那你为什么而来呢?”

田琛说:“回家休假探亲,今天特地来拜望你这位老同学。”

两人坐下来畅叙阔别之情,越说越投机,越说越亲密。从这天起,他们就你来我往,或聚会宝泉山上,或漫步渤海之滨。在田琛离家之前,他们几乎天天见面,相互倾吐心声。

田琛在去日本留学之前,就已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到了东京以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的中国留学生,在东京成立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他此次回国主要是联系国内抗日力量。他通过和花喜露的多次接触,了解到花喜露的爱国热情和反满抗日行动,看到了《行行》和花

喜露等人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文,对花喜露的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几次暗示花喜露,中国共产党在关内,在长白山领导着抗日武装斗争,在全国各地领导着地下抗日斗争。要想取得抗日胜利,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后,由于受田琛的启发,花喜露对中国共产党非常神往。田琛还给花喜露看了很多革命理论书籍,如《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还给他讲了抗日必须发动工农大众,讲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使花喜露更加心明眼亮。所以花喜露才提议把《行行》改为《星火》。

在田琛的培养和帮助下,花喜露参加了东北救国会。之后,他时时不忘用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他的学生和“星火”同人们。可是为了保密,他始终没有把和田琛的关系告诉于家麟等人,因为那时他已发现于家麟等人的思想倾向“三民主义”。

就在花喜露参加东北救亡总会的同时,以于家麟、李光海为首的一些“星火”同人结识了《营口新报》副刊编辑王觉。王觉是营口人,也是个爱国青年。我后来才知道他是营口地区国民党地下党部书记长。他以《营口新报》副刊编辑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表面上他给日本人办报纸,实际上他也组织一帮人,借用《营口新报》副刊这块地盘,出了一个《辽河》半月刊,刊登一些以隐蔽方式指责日伪的文章。

“星火”同人向《营口新报》投稿,有些也被王觉采用了。王觉想扩大他的组织,就有意接触“星火”同人,想把“星火”同人也拉到他的组织里来。所以就于家麟、李光海等人有了来往。

花喜露、于家麟为了进一步扩大“星火”同人的队伍,于1939年10月30日,又



当时学生传阅的文学图书

在大连的《泰东日报》上登了一则“通告”,其内容是:盖平县的花蒂儿、驼子等人发起成立“盖平文艺通讯”组织,此组织以学习文艺、指导写作为宗旨,愿意报名参加者,请将履历一份、相片一张,邮到盖平县城东门里振兴东商号王敬音收,并写明通信地址,以便通讯指导。李光海还油印了《盖平文艺通讯》小报,寄给报名参加的人。此“通告”登出以后,先后有不少人报

名参加。如:大连市某某玉石商店店员杨世代(笔名岛魂)、盖平县唐屯小学教师裴湘澜(笔名躬化)、大石桥的李文中、海城公济当铺的孙彦琦(笔名冷燕)、营口商科学校的张文华、北安县的长流、齐齐哈尔银行办事员周廷安(笔名辽心)和白菲等。自他们参加了“盖平文艺通讯”以后,“星火”同人每期都给他们寄《星火》半月刊,并互相通信联系。花喜露、于家麟等还亲自到盖平县唐屯小学去会见裴湘澜等。这些人也常给《星火》投稿,增加了“星火”同人的力量。“星火”同人最盛时期,发展到五六十人,还不包括他们的同学、同事、学生和朋友。地域涉及到北至哈尔滨、齐齐哈尔,南到大连等十多个大中小城市,但始终以盖平县为中心,而各地的同人也多是盖平县籍人。

王觉把《星火》搬上《营口新报》

王锡成

《行行》出版之后,因为新发展的青年同人多起来,花喜露和驼子研究,又多印了一个刊物,名叫《星火》,意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暗示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反满抗日集体,一定会发展壮大,取得胜利。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虽然组织起来了,同人也在不断扩大,感到有了一些信心和力量,但是每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多数是教员和学生,所以只能在寒暑假里有空闲时间活动。平常只能靠书信往来和通过作品互相交流感情。只有驼子没有工作,他和一些同人接触较多。我曾同他一起到过花喜露的学校,到过复州湾李光海那里。花喜露身边的不少学生被培育成“星火”同人,如张吉宽、刘永良,还有石岱宗、孔庆举、王丹群、穆玉琪等。他们毕业后升入国高,到哪里就在哪里活动,宣传日伪罪恶,团结志同道合的人,推动了盖县反满抗日的斗争。记得驼子为了扩大同人,曾在报纸上公开征求“文友”,提出凡爱好文艺、属于盖平县籍、有作品之人,都愿结为通讯友人,建立通讯关系。记得应征的有十几人,大石桥的“里军”、海城的“曲晚”就是那次发展的。

同人们当时的思想非常活跃,聚到一起除了谈论反满抗日的迫切与重要,就是议论祖国的命运与前途。当时以花喜露为一方,一贯的论点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应仿效苏联走十月革命道路。他经常向同人介绍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和一些阶段斗争知识。以李光海、驼子为一方,经常提出中国太落后,抗战胜利后得走一段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然后才能学苏联。这种政治见解上的分歧,经常引起争论,最后解围的还是目前的任务,只能是反满抗日。我们希望赶快找到地下抗日组织,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反满抗日就好。

这时“行行”同人的创作也开始了大丰收,不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作品。如《大同报》《泰东日报》《盛京时报》《大北新报》《新满洲》《麟麟》、华文《大阪每日》等。田贵同志的著名长诗《孙二祖宗上西天》就是发表在《地平线》上的。大家的政治思想也在不断活跃,不时利用一切机会聚到一起,探讨社会生活,寻找斗争出路。

1938年,我结束了学徒生活,第二年又转到一个叫“忠信昌”的药店去工作,行动上自由多了。我与葛雷和《营口新报》文艺副刊的编辑王觉熟识了。我就把他们介绍给驼子和花喜露。那时了解到王觉在营口也有一帮搞文艺写作的人,他们出过《野火》和《辽河》文艺副刊,还开设了一个文具用品商店叫“丰乐商店”。记得“丰乐商店”开张的日子,我们好多同人都参加了祝贺。好像就是在那次,花喜露、驼子、王觉定下了在他编的副刊上也给我们辟个文艺副刊。开始每月一期,后来半月一期,刊名叫《星火》,编辑由花喜露和驼子负责。我在营口工作,最后稿子由我送给王觉,每期由王觉给我们三十几份副刊,由我发给每位同人。这时“星火”同人的名义就公开化了。

1939年至1940年两年间,《星火》文艺副刊共出了二十几期。这时是“星火”同人士气最旺盛的时期。在哈尔滨、双城、沈阳、本溪、辽阳、海城、盖平、复州湾这些地方都有“星火”同人,而且每一个地方的“星火”同人都在不断地扩大,如张吉宽、刘永良到盖平第一国高后,就结识了郁庆令(铁汉)、陈玉立、王祖烈、张克恩、潘作佩。石岱宗(卞和之)到本溪国高上学后就结识了李季冬(胡沙)、李太岩(风荫、李侃)、孟方平(广远)等。这时驼子和花喜露都忙于编辑《星火》副刊和与同人联系。驼子没有工作,他做的就多一些。所以在同人的心目中,都把花喜露和驼子作为领袖。

在这几年里,花喜露曾先后调至两所学校,最后调到熊岳南的康宁堡小学。葛雷也由老花介绍到那里教学。驼子和我与其他一些同人曾在假期去过两次那个学校,除了交流对《星火》副刊的意见外,更多的是谈论政治时事。也就在这个期间,驼子向我谈到花喜露可能与地下共产党组织有联系,因为花喜露经常把一些阶级斗争知识和社会主义学说在同人中传播。驼子又说:“王觉一帮可能是地下国民党。王觉以佛教徒为招牌,成天吃素,见到和尚就下拜。”我也有同感,就在暗地里观察这些人,看到他们在热爱祖国、反满抗日的观点上、言行上还是一致的,是招人敬佩的。

我在沈阳了解的《星火》

王丹群

1937年春,我从归州两级小学毕业,考进了盖平县立女子中学。这时花喜露除了和我们离开学校的同学保持联系外,并和他所团结的一些青年作者在归州秘密油印地下普罗文学刊物《行行》和《星火》。他经常给我写信要我写稿,寄给我鲁迅、巴金、郭沫若、丁玲等作家的著作,还有《战争与和平》《钦差大臣》《娜拉》《死魂灵》《母亲》《巡案》等外国文学名著,这些书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了世界更大的天地。

1937年寒假,田贲写信告诉我:除了《行行》油印刊物,为了团结更多的青年学生,又秘密油印《星火》刊物。他说:我们要组织起来,用文学启迪人们的心灵,教育人们去战斗。开始我们的力量很小,就像一点火花,但是它会越来越大,“星星之火,



女子国高学生王丹群书刊



王丹群在奉天第三女子国高



王丹群在奉天第三女子国高(1940年)

可以燎原”。我们一个人燃起一把火,它会照亮一角,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燃起一把火,就会照亮整个中国,我们的组织就叫“星火同人”吧。要把革命的星火撒向人间。我看完他的信,心情十分激动。晚间我悄悄地燃起了一支火把,我看着那亮亮的火花,就好像走在革命斗争的行列里。

“星火同人”到1939年年底发展到三十余人,主要是青年学生。那时我们都觉得田贲是我们青少年的最好的老师、朋友。他教给我们广泛的知识,讲革命道理,大家都愿找他,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他都能解答明白,而又引起你去深思。所以不管是他教过的学生,或是经人介绍而认识了他的青年,都叫他“花老师”。“花老师”是大家对他的尊称,现在都称他是革命的领路人。

田贲最尊崇鲁迅,他说鲁迅的骨气最硬。就因为他最厌恶阿谀奉承,1939年冬他被排挤离开了归州小学,当时他非常气愤,他还作了一首诗,现在我只记得两句:

“归州五载曾何益，两袖青风一卷诗。”在归州的五年是他经常怀念和不能忘记的五年。

1940年我们全家从盖县搬到奉天，我从盖平国高转到伪奉天省立第三女子国民高等学校。这所学校在课程设置上，除主要是会计课外，还设有理化、家事、缝纫、手工艺、烹饪、日语。家事这门课主要是灌输贤妻良母思想，女子在家庭、社会都是附属的人。这所学校有日本校长一人，舍监和体育老师都是由日本女人担任。舍监叫斋藤美智子，她趾高气扬，以“大日本”人自居，心眼狠毒，同学们都叫她“小辣椒”。她除担任舍务工作还担任缝纫课。

斋藤美智子每次上课走上讲台后，就贼溜溜地瞪着眼睛望着学生，如果有的同学稍疏忽一点儿没站正，或眼睛没看着她，她就大发威风，训斥一通，有时是十几分钟站着，待她满意了，才用不恭敬的日语“スワレ”（坐下），让学生坐下。她上服装制图课时，嘴像爆豆一样“ンンかろ——ンまごxx厘米，ンンがり——ンンまごxx厘米……”直到图画完，她就站在一旁，给学生一分多钟的思考，然后就叫值日同学把黑板上的画图擦掉。这时她就严声厉色地提问，如果有的学生回答稍不准确，或者没画完黑板上的图，她就一把拽住学生衣领推出教室，在门外罚站。像这样被罚站的事是经常有的，所以同学们上课时都胆战心惊的。

在舍务管理上有这样的规定：上课前她检查宿舍是否整洁；晚下自习八点半后她到宿舍点名。有一次我忘记带上第一节课的书，我急忙回宿舍去取，正好被斋藤美智子看见，不容分说，她咔嚓一声把门锁上。我被锁在宿舍里两节课，后来是打扫卫生的老大娘偷着把门打开放我出去。

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文化生活贫乏。但沈阳毕竟是大城市，有书店、电影院、戏园子、杂耍场。女学生酷爱看电影，便利用星期天仅仅大半天的时间，三一群俩一伙自由结伴走出校门，去书店看书，去电影院看电影。女孩子都有爱美的心，喜爱最漂亮的女明星，经常收集女明星的照片和电影场景剧照，例如当时最红的女歌星周璇，她主演的影片全是歌剧，每曲歌声都打动女学生的心。例如周璇主演的《十字街头》《渔家女》《三笑》《西厢记》《恼人春色》《疯狂的世界》等影片，每次上映必看，甚至反复轮看。当时电影票价便宜。李丽华主演的《茶花女》，陈云裳主演的《花木兰》，龚秋霞主演的《古塔奇案》以及风行的侦探片《珍珠衫》《播音台大血案》《大破隐身术》《陈查礼探案》等，同学们看得都很投入。看完电影逛商店，中街最大的百货公司“吉顺丝房”“老天合”，太原街的“满毛”“山中景”等商店。逛完百货店再到“稻香村”买些糖果小吃儿，边走边玩溜溜达达返回学校。

但是,我不满足在电影院子里混日子。因为,田贲灌输到我那少年心中的向往自由、上进的种子要发芽,再也压抑不住了。

1940年春季开学不久,我接到田贲来信,他告诉我,为了扩大宣传,《营口新报》文学副刊《星火》公开发行。由田贲等主编、夕澄汇稿和向《星火》同人分发报纸。我记得田贲在《星火》副刊发刊词上严肃申明:“《星火》是为人们开花的,不是为任何人插花的。”并在私人写信当中申明,“期望读者不止于知识层,且应有农夫、樵子、老妇和壮汉”。这是在沦陷区东北辽南文坛树立的一枝左翼奇葩。

初秋的一天晚上,睡觉的预备铃响了,舍监就要来点名了,大家按顺序在自己的床头前站好。这时,一号床的于同学没注意在自己的脚下掉了一小片纸,她刚要弯腰去捡时,“小辣椒”一推门进来了,她把眼睛一瞪,冲着于同学哇啦哇啦吵了一阵,然后对着全宿舍同学喊着:“恶恶,恶恶……”大声喊了一顿,然后把门一摔走了,并下命令:“不许睡觉!”已经过11点了“小辣椒”还没来,大家研究选舍长去和“小辣椒”商量,让于同学检讨自己不对赔个礼,可是“小辣椒”就是不放过,并说了一大堆“支那人小猫、小狗不如”等污辱我们的话。大家听后都很气愤:我们是人,不是小猫、小狗。我说:“我们是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我们有权利睡觉。”于是我和二床的海、三床的浦先睡下了。我们三个人约好:“小辣椒”来了,我们就打呼噜,要推我们也不起来。在我们三个人的影响下,全宿舍除舍长还和“小辣椒”交涉外,都睡下了。12点的钟过了,听着吧嗒、吧嗒的拖拉板声,“小辣椒”来了,她推门一看,我们都睡下来了,气得她“あきるすさよ……”可是我们谁也没有起来,有的还打着呼噜,气得她把脚一跺,一甩袖子走了。

这件事给我的启示很大,有压迫就要有反抗,只要大家团结去抗争,就能胜利。于是我写了一首小诗,刊登在《营口新报》田贲主编的副刊《星火》上。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诗的内容我还记得很清楚:

天阴沉沉,
我伏案宁思,何日光明!
几只苍蝇,嗡嗡乱飞,
叭!叭!
打死害人虫!

天阴沉沉,我们要做雄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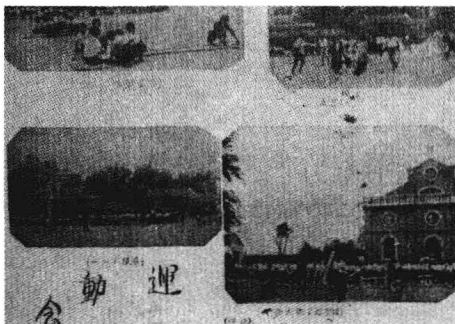
用坚硬的翅膀，
扇去天之乌云，
啊！人们欢呼：
蓝天！蓝天！
太阳出来了！

当年冬天，由于该报主编王觉（国民党员）发现《星火》副刊内容“左”倾，便威胁说：反满抗日可以，宣传赤化不行。并提出要与他主办的副刊《辽河》合并。田贲坚决抵制，并在《星火》后两期上发表了杂文《吃气息》和《舒愤懑》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星火》被迫停刊，共出二十余期。《星火》的生命虽然是短暂的，但它为革命点燃了星星之火。

这一时期，田贲在《星火》副刊上除了刊有诗和杂文外，还发表了小说《幽静的山谷》，在《地平线》上发表了长诗《孙二祖宗上西天》等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都是反映当时东北沦陷区辽南农民和劳苦大众对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的侵略、压迫、剥削所进行的英勇反抗。



奉天省立营口女子国民高等学校防空演习(1943年)



营口女子国民高等学校运动会(1943年)

“消寒雅集”

王锡成

1940年寒假，《星火》已经出刊一年多了，驼子和花喜露告知我，要借这次假期，把能请到的同人都请到，大家在一起总结总结出刊情况，还要成立一个“读书会”，就

是把大家的进步书刊聚集到一起,以便互相传阅。这次集会的地点在王克范工作的学校里,盖县尚和寨小学。为了掩人耳目,大家给这次集会起了个名字叫“消寒雅集”。即使这样,也要隐蔽一些,以防特务注意。一些学生同人,放寒假后,比较早地就到了尚和寨小学。记得本溪的石岱宗、李太岩到得就挺早,一高的学生张吉宽、刘永良、陈玉立、王祖烈、潘作佩等也较早,他们把这次“雅集”当成过寒假。朋友聚到一起非常愉快,王克范、驼子和我都成天在学校里。

记得一天晚间,花喜露、王克范、李光海、秦玉筠、门文东、孟方平等人都到了,驼子和他们在西屋开了一晚上的会,天明这些人又都走了。

第二天,驼子向我们这些没参加会的同人介绍说:昨晚他们与王觉争论一宿,为的是《星火》副刊问题。王觉提出把《星火》与《辽河》合并成一个副刊,花喜露不同意。双方争执得很厉害,最后王觉表示如不合并,《星火》今后就不能出了,花喜露也表示,宁肯不出也不合并。他们就是这样的不欢而散了。在场的同人非常气愤与惋惜,提到我与王觉比较熟,可去找他争取一下。其实,王觉也是个爱国青年,营口市人,1917年出生,与驼子同岁,比花喜露小四五岁。1930年他从营口商科高级中学毕业后,任《营口新报》文艺副刊编辑,在营口从事反满抗日活动。帮助《星火》把进步文章发表在《营口新报》文艺副刊上,自己也在报纸上刊载过多篇作品。他是地下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干。现在看起来,王觉为什么要把《星火》并进《辽河》,花喜露为什么坚决不同意,是不是有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歧和斗争,很不好说。因为当时花喜露还不是共产党员,而当时的王觉已经在国民党里是个专干了。在“一二·三〇”事件之后,1942年1月13日,王觉在长春被日伪警特逮捕,5月13日死于重刑之下。死得也很悲壮,这是后话。也许当时王觉要扩大地盘,扩大势力,不满足于对“星火”的支持,要把它并到自己的势力范围里,他可能是有这个考虑的。1944年我们被日本人抓起来关进监狱的时候,从敌人的审判中听说国民党员王觉要利用文艺活动组织什么“青年自觉社”,如果这是真的,花喜露坚决不同意把《星火》并过去,就是有原由的了。

本来这次聚会没有通知王觉。由于我与王觉关系比较好,就顺口说了这个集会,没想到他不放过这个机会,就真的来了。事后好多人都埋怨我。当时我同刘永良与李太岩三人去营口找了王觉,我们之间又吵了个脸红,不愉快地回到学校。这次“消寒雅集”,本来是想加强《星火》的出刊质量,加强同人之间的团结,不料《星火》从此却停刊了,这无疑是对“星火”同人的一次打击。

《星火》停办

门文东

到了1940年末,日伪特务步步紧逼,把他们的魔爪伸向《星火》半月刊和“星火”同人。特务们在秘密追查《星火》撰稿人的真实姓名和地址。

花喜露、于家麟等人觉察了这种情况,考虑着如何对付敌人,于是决定利用寒假召开一次“星火”同人和王觉等人的秘密聚会,共同研究对策。这次会议一连开了10多天,地点是在王克范工作的尚和寨小学。那时学校已经放假,我们就利用学校的教室和宿舍,接待各地来的同人。名义上是利用寒假搞一次老同学聚会,联络友情,进行消遣。驼子和田贲还给这次聚会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消寒雅集”。这次到会的人很多,都吃住在学校里。来聚会的人有的拿米、有的带菜、有的出钱,好不热闹。白天聚在一起又说又笑又唱,显出一派师生度寒假、“消寒雅集”的气氛来,晚上主要人物就秘密开会进行研究,其他人放哨的放哨,玩的玩,睡觉的睡觉。这次到会的人除了花喜露、于家麟、李光海、王克范、王觉、门文东、王锡成以外,还邀请了在长春编辑《新潮》杂志的铁汉。到会的还有张吉宽、张克恩、刘永良、石岱宗和孟方平等。先后到会的有20多人。

这次集会本打算研究如何更好地和敌人作斗争,可是在会上,王觉迫于形势的压力,提出《星火》锋芒毕露,已引起敌人的注意,今后如果办下去,就必须由他来编的主张。并又一次提出在他的副刊上“发表抗日文章可以,宣传赤化不行”。花喜露坚决反对合并,并提出“抗日是不能退却的”。争论了大半宿,结果闹得不欢而散。最后,由于意见的分歧,《星火》就此停办了。

王克范叫我参加“消寒雅集”

汪士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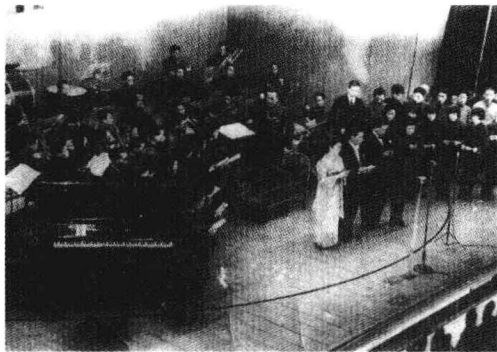
汪士硕 1924年出生,营口第一国高学生,是王克范在蚂蚱庙小学教书时的学

生,与“星火同人”有联系,1944年被捕,1945年5月4日被判决“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退休前系营口鲅鱼圈渔场主管会计。

我少年时代,王克范老师就在我们村的蚂蚱庙小学教书。他是我的班主任,不但教我们文化知识,还经常向我们传播爱国思想。他给我的第一本书就是《飞浪》校刊,那是花喜露老师在归州小学主编的进步刊物。我从那本刊物上受到了爱祖国、爱人民的教育。我初小毕业后,升入盖县文庙国民优级学校。这期间,王老师调到永安屯小学教书,仍不断地借给我革命进步书刊阅读,如鲁迅的《呐喊》、高尔基的《母亲》等。

我16岁那年,考入营口市第一国民高等学校。虽然离克范老师远了,但他还是经常寄给我《营口新报》星火副刊阅读,他还常来信叫我替他买书报,主要是买华文《大阪每日》和《新满洲》等。那里经常刊登盖县“星火”同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的文章。我买到了叫我先看,看后再给他寄去。使我从中受到了教育和启发。

我在营口市第一国民高等学校读二年级的那年,王克范老师来信叫我放假后到他那里去。当时他已调到尚和寨小学教书了。原来,“星火”同人在那里召开秘密会议,取名叫“消寒雅集”,研究《星火》副刊出版和其他反满抗日活动的问题。白天大家在一起玩,晚上就秘密开会。在那里我看到了花喜露、于家麟、门文东、王锡成等人,还有《营口新报》副刊编辑王觉。这些人的身份,克范老师当时没告诉我,事后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反满抗日“星火”同人的骨干。他们开完会经常唱歌。我记得唱的是《大路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我也学会唱了。他们每天吃高粱米粥、咸菜。那次会议使我很受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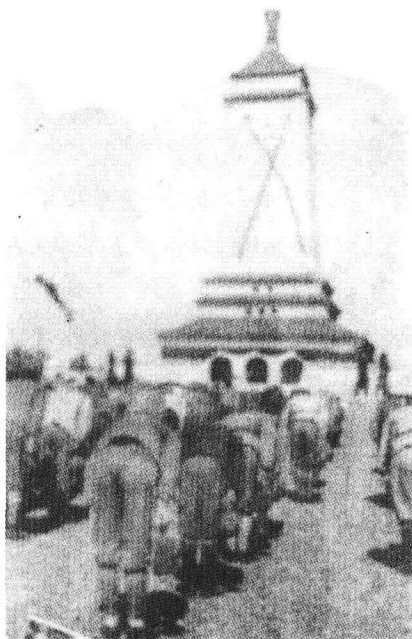
伪满“建国十周年”歌曲发表会
(1942年1月11日)



伪满举行“大东亚建设博览会”
宣传“伪满建国十周年”成就

到工人中去

石岱宗



学生参拜新京(长春市)“忠灵塔”

我考到本溪国高后,连续三年,我都利用寒假之便,到花老师身边聚会半个月或20天左右。第一年寒假在母校归州小学,他把亲手刻印的地下文艺刊物《行行》拿给我看。

1938年寒假,一天深夜,我们读完了书,搬过《子夜》《倪焕之》和他翻译的大部头《屠场》当做枕头,躺在炕上之后,他捻灭了煤油灯悄悄地对我说:“今后,我们不能光读读书、写写文章了,还得多多发展朋友,做一些别的事……”正好,墙上的挂钟敲了12点,他便划一根火柴,看着那火光,说:“就以每年的今天作为纪念日吧。要让我们所发展的朋友都来划一支火柴,你闭上眼睛想一想,几年之后,在东北这块黑暗的土地上,白山黑水之间,在这个时间里,各地若都能亮起这样的火光,那该有多么好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然后,向我讲了“单线发展”的一些规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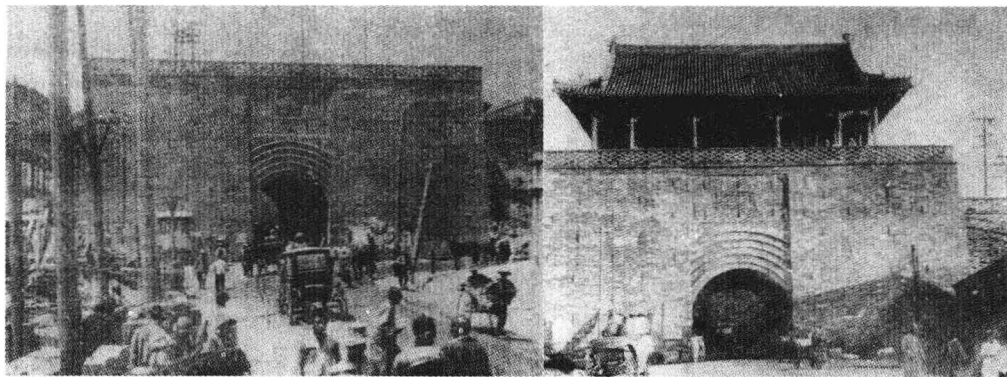
后,油印的《行行》(刊登成年人的作品)和《星火》(刊登青年作者的作品)就秘密出版了。

1939年,我到本溪国高的第三个寒假,我到镶黄旗小学去看望田贲老师,向他汇报我在本溪发展了李继东、李太岩等三个人时,他告诉我:“到现在为止,我们《行行》和《星火》同人已有30左右的人数了。”

1940年春天,与《营口新报》主编王觉达成协议,我们得编印一份副刊,名字就叫《星火》,在该报公开发表,《星火》由田贲主编。由当时在营口工作的夕澄集稿,每两周出一次,田贲在发刊词上写了大意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文章不是为谁插花的,而是为人们开花的。”“期待于它的读者不止于知识层,且应有农夫、樵子、老妇和壮

汉。”后来,我们才发现王觉是一个国民党人,当时的协议实质上是在共同反满抗日这一统一战线思想基础上达成的。尽管当时我们只是以“奴隶的语言”,利用敌伪的愚昧及其力不从心才出现的一点空隙而进行微弱的战斗,而且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还没有发现什么,这却不能见容于王觉。到了冬天,见到《星火》的左倾色彩越来越鲜明,他竟直截了当地以“反满抗日可以,但不许弄普罗文学,宣传赤化。如不改弦更张,那就只得停刊了”这样的话来威胁我们,迫使田贲在《星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吃气息》的杂文,对王觉进行了一次有节制的批评和斗争。然而王觉并不肯接受,直到经过一场面对面的辩论。那是在盖县城南郊尚和寨的一所小学校里进行的,即所谓“消寒雅集”事件。“消寒雅集”是我们自己起的名字,以防引起日本特务及走狗们的注意,而故意这样称呼的。尽管王觉已被驳得张口结舌,说不出所以然来,但他是该报的副主编,大权在握,最终还是把《星火》给停刊了。不过,即使是这样,田贲还是在《星火》的终刊号上,把另一篇早已写就了的、题为《舒愤懑》的杂文发表出来,对王觉进行了揭露和痛斥。

写文章是没有地方发表了,又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使自己在反满抗日方面大有作为,当时已成为像我们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的最大苦闷。“光靠交朋友也不行,因为总也超不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田贲作了这样总结之后,就在1941年的冬天,在沈阳东关找到了一个职员的位置。当时只知道那附近有许多工厂,田贲要到工人群众中间去。



奉天大西门

花喜露住处“五步高”附近的奉天大南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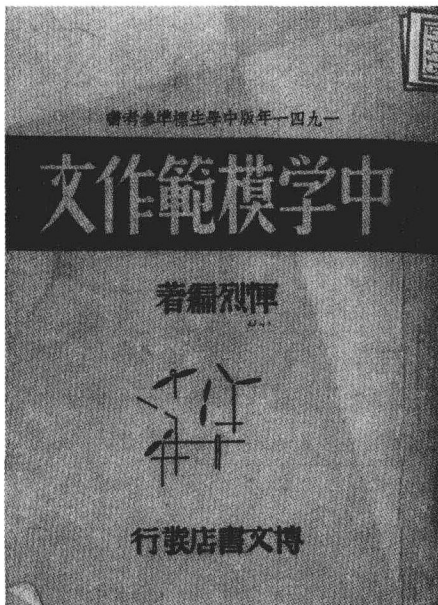
王觉、于家麟去长春

王锡成

进入1941年,我患了一场病,卧床在家。从驼子口中不断听到一些消息:花喜露被盖县教育局说成有赤色嫌疑,勒令他出境,不准在盖县教学,以后不知去向了。王觉辞去《营口新报》副刊编辑到长春《大同报》副刊当了编辑,与《大同报》编辑李季疯在一起;李光海也辞去了复州湾盐务局一个分局局长的职务,去长春和几个友人创办了一个新时代出版社。后来还听说驼子也给拿了一些本钱。

入秋,我病已痊愈,驼子与门文东找我去趟哈尔滨,一路上可去看看没见过面的“同人”,归来还可到长春看看李光海他们办的出版社。我们先到双城,与许默语(魔女,噩匹)、许庆春(雷力普),还有黄竹雅、孔方等畅叙了两天,又一起去哈尔滨会见了孙芸筠。后来我与驼子到了长春,那时王觉、李光海等人都在南洋旅社住。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因食宿困难我就先回家了。

学生阅读的《中学模范作文》,书内“日本”用又又代替(上海博文书店1941年出版)



從這些事實去看來，我們可以知道這套編輯的意義與目的。雖然是在當時的執政政府，然而這套書的出版，從物產的修政的卻是帝國主義，特別是又又書。它用力量幫助又又書，出面打擊當時的革命力量，從動書時的所謂執政政府所應採取的，今天又又書的對子才與鐵錘的政府。這套書的出版，他們說「三·一八」起就子才也成爲「懸殊與中國人民的對子才和漢奸了。我們這一次起來抗戰，從歷史的意義上說來，並不是在「九一八」或「九一八」或「九一八」以後的在，而是從「九一八」以後的在。從這一點說來，我們現在的抗戰是在「九一八」以後的在。

几个月后,驼子从长春回到盖平,告诉我日伪对“思想犯”镇压得很凶,北满一些作家被捕,我们得隐蔽一个时期,以免不测。不久,又告诉我王觉、李季疯被捕了,新时代出版社的李光海也出逃了。新时代出版社据说从创办到解体只出了两本书,有一本叫《法国败了》。后来又听说李光海、石岱宗、李季冬已先后逃亡关内。

四、“五步斋”的故事

我们的房子五步见方

王丹群

我不止一遍地读过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反法西斯战士尤利乌斯·伏契克在法西斯监狱中秘密写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对第三章“二六七号牢房”中的名句“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永记不忘。可是，我们在沈阳租住的房子虽然不是牢房，却比牢房还小，这间饮马水房五步见方，除了木板搭的床铺就没多大空地方了。所以田贲把它戏称做“五步斋”。

那是1941年春，我回到归州小学当了教师，但这时学校已冷冷清清，没有当年那种活跃气氛了，《朝会歌》早就被禁唱了，只有校门两侧还镌刻着田贲当年自编自写的隶体字对联：“高本自卑知勤求方能进步；级防躐等惟循序乃可图功。”学校还规定学生放学后不许在学校停留，真使人冷清苦闷。

这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到熊岳去看望田贲。我们在四处飘香的田野上走着、谈着，那挂满枝头的苹果，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这是我们父老乡亲用血汗浇灌的成果，这是我们的家乡。可那一道道铁丝网，却使我们不能越雷池半步。这一切又使我们感到那么生疏，那么仇恨。田贲说：“看看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国家，已经变成了异邦，难道我们还等待吗？不，不能！洋人除了侵略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还要奴化我们的思想，我要到最艰苦的斗争中去……”以后田贲写了《故乡·异邦》的诗寄给我，痛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就在这年冬，田贲在熊岳小学给学生讲了都德的《最后一课》后，乘车北上来到沈阳参加了革命，从此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田贲到沈阳后很长时间没给我写信，直到1942年春才接到他的来信，他告诉我



王丹群与同事

他当了街公所的小职员,很忙,除了工作、学习、写文章,他还要自己做饭,徒步走几里路去上班,他住的房子叫“五步斋”。

1943年5月他要我到“五步斋”来取东西,当时我想可能是有好书不便邮寄,所以要我去取。我和他约定时间在大东区凌云街公所会见了,然后领我到大南街他的住处“五步斋”。这是我第一次来“五步斋”,“五步斋”是一间又小又黑不进阳光的小屋。

田贲来沈阳后,开始是和两个青年学生住在一起的,之后又在贾玉冈同志家住了些日子,为了找一个合适的住处是费了好大劲的。他说他既不能住有东邻西舍的大院,又无钱租独门独户的深宅,而那个原来是饮马水房的小屋虽然潮湿简陋,却是四面无靠,来往方便。

田贲给房子起名叫“五步斋”,还有一个用意就是为了便于和爱国青年朋友们接触、通信联系。“五步斋”是不暴露地址的暗号。田贲在这冬天冷如冰、夏天热如炉的小屋里,除了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外,还以山川草草的笔名在《盛京时报》文学版发表了《向何处去》《寂寞之语》《大众语与文艺》《观剧书感》《塔·城·一切建筑》等文学评论和理论文章。这些作品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东北沦陷区文学的方向,是值得珍视之作。

为了充实自己,以利战斗,他不知疲倦地学马列主义、看文学书,还学日语,舍不得空过一分钟。有时夜里看书忘掉了吃饭,想起来已是第二天的晨光了;有时米没煮熟忘掉添煤,炉子熄灭了;有时炉火过旺烧糊了,他是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度过了两个冬春。

田贲爽朗地说:“咱们整饭吧,饿肚子是不能干事的,时间宝贵。”于是,他把黑面搅成浆糊状,然后倒在锅里一摊,不到一小时饭菜全好了。

田贲风趣地说:“你能说出来饭菜的名称吗?这就是什么高厨、名师也做不出来的‘自由饼’、‘解放汤’。”

好一个富有革命意义的饭菜!我们围着一张小凳子吃了饭。

饭后,田贲问我:“你是来拿东西的,你看我这里一无钱,二无宝,你想拿点什么?”

我莫名其妙:“那你叫我来做什么?”

这时,他严肃地对我说:“我是让你来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这比什么东西都重要。石岱宗,你上一班的同学,早就认识了吧,目前他要进关,现在形势非常险恶,日寇加紧统治,手段更加残酷,东北的爱国青年有的要在沦陷区隐蔽地进行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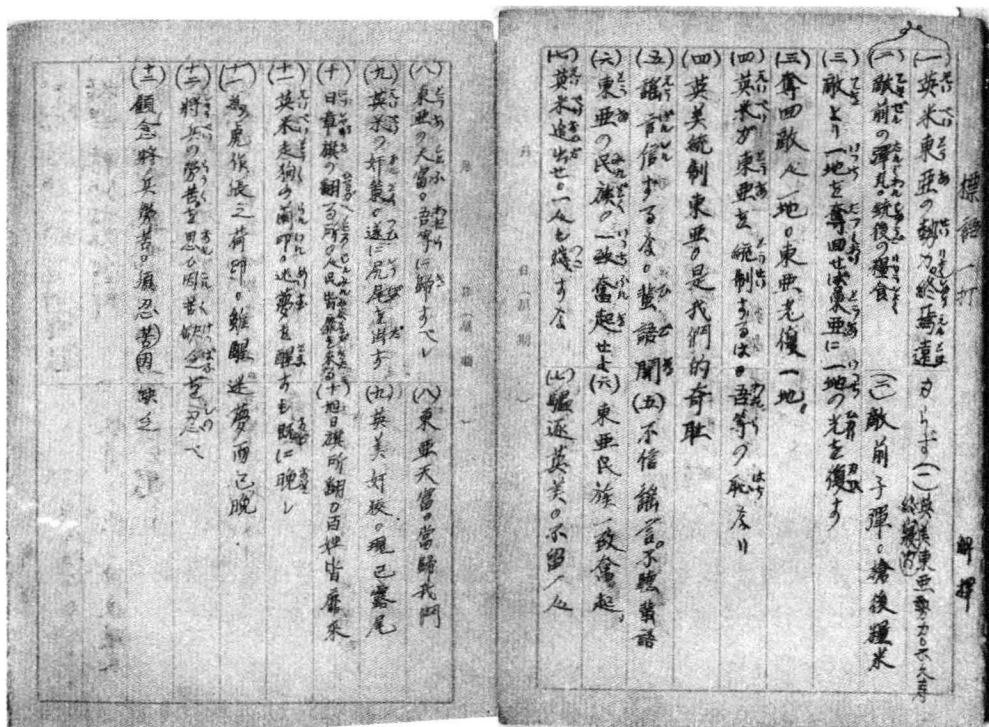
争,另外呢,对一些革命思想坚定的青年也要支持他们到解放区去,到抗战前线去,这是要经过艰难险阻的呀!奉天火车站就是一关。你要机警地把石岱宗送上火车,我不便去送,时间紧迫,午前就走。”

田贲叫我们两人以姐弟相称。又嘱咐我不要紧张,装得要像,注意敌人耳目……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晚上乘车返回了归州小学。

送走石岱宗后,我的心情很不平静,难道我们女青年就不能走吗?我给田贲写信告诉他4月间侯赓芝、穆玉琪曾来归州小学找我,我们也要到实际斗争中去。田贲回信说:“如果这里更需要你呢?”

1943年7月,组织决定我和田贲结婚并来到沈阳。我们仍住在大南街“五步斋”。他说:“从现在起你就是革命同志了,你来不是享福,而是革命的需要,要准备吃苦,要有不怕死的胆量。”他还说:“革命要懂革命纪律,这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地下党的领导来,不问,不听,不能向任何人讲;少接触邻里,不认识的人不说话。”他给我改名王清,让我装作是不识字的农村人。给我的任务是每天要抄写革命理论书籍。因为当时革命书籍来之不易,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来传播;天天要写日记,主要记社会情况,晚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满洲国国高学生抄写的宣传标语



標語一打

日一四期

(一) 英米東亞の朝日及び馬達カトナ (二) 英米東亞を力て六年

(一) 敵前の彈丸銃後の糧食 (二) 敵前子彈。發後糧米

(三) 敵より一地进行奪回せば東亞に一地の光を復す

(三) 奪回敵一地方。東亞先復一地方

(四) 英米が東亞を統制するは吾等の恥也

(四) 英美統制東亞は我們的奇恥

(五) 謠言信する者。謔語聞(由)不信謠言。不聽謔語

(六) 東亞の民族の一致奮起せば(六) 東亞民族一致奮起

(七) 敵米進出せ一人も憚らず (七) 驅逐英美の不留一人

(八) 東亞の大富。吾等に歸すべし

(八) 東亞大富。當歸我門

(九) 英米の打撃。遂に尻尾を叩かす (九) 英美好後。魂已盡尾

(十) 時勢の翻る所。人民皆奮起す (十) 日旗所翻。百姓皆奮起

(十一) 英米走狗の前哨。進軍を阻むも既に晚し

(十一) 為虎張皮之荷印。難眠。迷夢而已。晚

(十二) 將士の勞苦を思ひて。敵の進軍を忍ぶ

(十二) 顧念將士勞苦。願忍苦難

(十三) 顧念將士勞苦。願忍苦難

(十三) 顧念將士勞苦。願忍苦難

(十三) 顧念將士勞苦。願忍苦難

要谈读书体会,有时会被他考住,因此我要加倍努力。

我的新的有意义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记得这年冬我趴在凳子上抄了大半本《政治经济学大纲》,同时使我初步懂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工人阶级革命性最强、最坚决、最彻底……

田贲还常去本溪,领导那里的男、女国高学生的读书活动。本溪的读书活动开始是石岱宗组织的,石岱宗走后的负责人是邓崇仁(现名邓周立),第三任是张万昌(现名张村夫),最后的一位负责人是马魁明。这些爱国青年在日伪极其严酷的统治下,想尽了各种办法进行活动。

为了安全,搞秘密工作经常换住址是必要的。12月末我们搬到小东街一段94号,“五步斋”留给姜毅住。陶炎本来也想往关内走,田贲对他说:“走也革命,留也革命。”意想留陶炎在沈阳,但陶炎坚决要走,我们研究最后还是留下姜毅。田贲设法介绍姜毅到伪满奉天飞机制造厂当了一名工人,秘密了解日本飞机厂的情况。

陶炎走时,给我们送来了一张旧三屉桌,这时我们才有了唯一的一件家具,再也不用趴在凳子上写字了。搬到小东街后,有了火炕,屋子也宽也亮了。为了减少姜毅同志生活上的困难,晚饭就留他和我们一同吃,饭后我们一起学习和讨论问题。有一次讨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了弄清“否定之否定”,一直谈到深夜,最后还是田贲给我们讲清了,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之一。

在阴云密布的白色恐怖下,搞秘密情报工作要时刻提高机警性,严格遵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纪律。我们对来往信件立即销毁,在抄写革命书籍时拆开单页,万一有人来,就假装废纸扔掉。

田贲走上革命

侯洛

侯洛 花喜露的同乡和盖县西关中学、奉天第一中学时的同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留学日本,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日本留学生救国会成员。花喜露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时的上级领导。离休前系中共天津市委调查局局长。

田琛和我是1936年一个从山东济南、一个从天津漂洋过海到日本读书的。我们

都是留学日本的抗日救国会的成员。田琛 1938 年末,利用学校放寒假之机回到他老家盖平归州村探亲,得知花喜露在他们村任小学教员,颇受乡亲父老与学生爱戴,从花喜露过去教过的学生中了解他是一个正派的有志气的有学问的老师。遂决定造访花喜露。两人相遇,一见如故,非常亲热。但在进一步谈到政治问题时,由于双方都是多年来没有来往了,所以田琛对他比较谨慎,不过在田琛告别花喜露回日本时,还是有所表露,田琛对他谈到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国内形势分析了抗日战场上国共两党的形势,并建议花喜露要善于团结一些有才华的青年,和他们交知心朋友,以备将来有用。花喜露听后感到很新鲜很兴奋,希望不久能见面再详谈。

花喜露和田琛同志交谈后,感到有了希望,但田琛同志却很快离开家乡,又回到了日本,他当时确是十分苦闷,也感到很痛苦。

1940 年 1 月,根据组织决定,我们这批留日青年毕业后全部回到东北,继续做情报工作。因此,我到了沈阳,田琛到了长春。还有的同志到了哈尔滨,在东北形成一个情报网。田琛回到东北后便决定继续向花喜露开展工作。

花喜露在文学活动时期与盖县于家麟(笔名驼子)经常有来往,有时还在一起从事文学创作。开始时,他认为于等亦为反满抗日进步青年,久之,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便逐渐发现于家麟等人所宣扬的言论已属国民党一套理论,所主张一切要听命于中央正统政府。这样,爱好左翼文学的花喜露便和于家麟等人发生了分歧,这分歧也影响了那些团结在花喜露周围爱好文艺的青年。于是在盖县便无形中形成了两种力量,一个是以于家麟为首的国民党力量,一个是以花喜露为首的左翼文学力量。当然这两种力量都不是公开的,而是在暗中活动。非当事人是不容易了解到的。我们经过分析研究,决定要花喜露逐步和于家麟等人切断来往。鉴于花喜露和他们搞文学活动较久,如要仍留在盖县,很难不相往来。遂决定调花喜露来沈阳工作。当时对他做了三条规定:一是停止文学活动,不再公开发表作品;二是长期埋伏隐蔽,不再从事教育工作;三是和于家麟等人切断联系。花喜露除对第一条提出意见外,其他两条完全同意执行。后来经过研究决定,因为他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已有了深厚感情,仍可用隐晦含蓄方式写作品,但不能公开发表。因为在当时的东北,搞文艺活动,发表文章,最容易引起敌人注意。花喜露调沈阳后由贾玉冈同志领导,当时贾玉冈的掩护职业是在“奉天放送局”即辽宁广播电台工作。花喜露的掩护职业是在大东区凌云区街公所当一名小职员。因为这个地区有“奉天兵工厂”和“满洲飞机制造厂”,还有其他军事工厂,是伪满洲国军工生产重要基地。

花喜露到沈阳后,生活是很艰苦的。住的是大南街高家大院原来做水房用的一

间五平方米的屋子。他很有趣地把这间屋子叫做“五步斋”。每日吃两餐,都是自己做饭。那时东北人被日本侵略者看做是“三等人”,不准吃大米饭,吃大米饭是犯法的,属于经济犯,所以只能按定量规定吃高粱米和玉米面。煮高粱米是费时间的,他又不会做饭,有时只好吃半生的。花喜露多年在农村和小城镇做教育工作,当小学教师是有经验的,也颇受学生和家長欢迎。因此,之前生活是比较安定的。现在环境、职业都是新的。就是在这样清贫的生活中,他毫不在乎困难和艰苦,在“五步斋”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他放下多年文学创作上的旺盛精力,搁笔从事情报搜集。他来沈阳不久,就借工作之便利用各种力量和社会关系,收集到伪满洲国最大军工生产的详细情况和这个地区职工对时局的思想动态。这些对我们当时掌握沈阳军工生产情况和职工思想动向以及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我军进入沈阳都起了不小的作用。他还绘制了大东区一带兵工厂与“满洲飞机制造厂”详细地图,以备我军解放沈阳和提供盟军轰炸时使用。

1941 年 12 月 7 日(夏威夷时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对美国宣战了,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对东北的野蛮统治和法西斯镇压也进一步加强了,12 月 30 日即所谓“12·30”事件,日本宪兵队对在东北的国民党地下人员实行大逮捕,牵连数百人入狱。对此,我们亦必须提高警惕,严密组织,进一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便决定将花喜露所收藏的所有马列主义书籍和左翼文艺书籍全部销毁,并减少活动,编好口供,以防万一。

为了搞好掩护,1943 年组织决定让他与王丹群结婚。不久,花喜露搬到小东街一段 94 号院内。巧得很,同院内住着一位奉天志诚银行中级职员齐贯一,这是参加我们东北地区情报组织多年的同志。如果任何一个同志

伪满洲国国民高等学校阅兵式



发生了问题,双方的领导是会很快就知道的。但他们俩并不交叉,而且互不相识。他是一个偶然机会找到这个住房的,因为该地区也属于大东区管辖,是经过区管辖同事介绍的。花喜露搬到新居后,有两间屋子,并且有了王丹群的照顾,生活上就比较安定了。所以花喜露又逐渐开展情报活动了,这时他的工作也较顺利,获得了不小的成绩。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欧洲战场,德国法西斯进攻斯大林格勒遭到毁灭性打击,苏军转入总反攻。英美联军在即将结束北非作战之时,越地中海进攻意大利。同年9月意大利投降,墨索里尼被处死。日、德、意法西斯同盟已死一盟伤一盟。这时美英在太平洋战场对日本也转入了总进攻,日本已决定收缩战线。日本法西斯的崩溃也为期不远了。当时我们东北地区情报组织作出估计:在日本法西斯崩溃前夕,必将对东北人民特别是一批被他们怀疑的知识分子,实行残酷镇压。因此决定,向全体同志进一步加强革命气节教育,继续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同时要提高警惕,积极搜集情报,迎接胜利的到来。当时,斗争是极其复杂而严峻的,工作是紧迫的。

在此形势下,1944年3月间,贾玉冈和我到花喜露那里,和他讨论入党问题和有关工作问题时,花喜露表示:“我绝对像保护眼球一样保护组织的机密和党的纪律,死而后已。”同时,他还朗诵了文天祥的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学校纪念册扉页上的第二个
“国歌”“建国操”(1942)



田贲加入共产党

贾玉冈

贾玉冈 又名贾毅,花喜露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时的上级领导。离休前系中共中央调查部干部。

田贲同志 1941年参加革命后一直是我直接和他联系,他过去是用笔发动群众,

组织群众和敌人进行斗争的。参加革命后虽然仍需要写一些东西,但情况不同了,从我们情报工作来看,对田贲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要求少写一些东西,在文化战线上掌握友人和敌人动态;二是利用公开职员的身份深入调查敌伪的活动情报、战略上的情报。田贲表示“坚决做到”。事实证明他是忠实地按组织要求做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田贲在大东区凌云街公所当一名小职员,单位不大,但位于日伪军工生产的重地。田贲在这里工作两年多,做了大量工作。如飞机制造厂每月生产的是什么型号、性能、规格,伪奉天造兵所的各兵工厂的生产状况、发展方向、各种武器性能都是掌握的,同时还随时了解工人及其家属的思想情况和生活情况。

田贲除搜集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情报,还对东北文化战线做了调查研究,这对我们掌握文化战线情况起了很大作用。当时他除了写一些内部阅读文章外,也写了不少语言隐晦而有战斗力的文章,对日本殖民统治进行揭露,对当时宣扬“日满一心一德”“日满协和”等汉奸文艺之类的作者和作品都有揭露和抨击。田贲在《期待于今年者》文章中是这样写的:“从羊肠路上继续微行,也要控制自己,步伐不失严正,代万民发声。即一点也好,但要力求真挚。”这是对汉奸文人的一个警告,指出了文艺战线的方向。田贲做到了少写、写得精干,同时又发挥了作用。

田贲同志在学习上是刻苦的,在“五步斋”没有电灯时,点个烛头也学习。他学了大量马列主义理论书籍。他在生活上也是十分艰苦的,自己做饭,冬天穿件薄棉衣,脚上穿双“水袜子”,样子像今天的胶鞋,但大脚趾和其余四个脚趾分开,中间有道缝,所以又叫“丫巴袜子”。

日本法西斯为了严酷统治中国,从我们那时的经验来看,日本特务每年都要有一次大清查、大逮捕,而且一年比一年凶狠。1944年3月,我们已经得到了日特要行动的情报,及时和田贲研究,同时作出决定:一是清理东西;二是如果一旦被捕,要知道日本人是抓一个是一个,很少让你出来。我们做一名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宁肯牺牲自己,也决不暴露组织和同志,这是党的纪律,我们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有这一决心。田贲表示一定按党的指示做,如有不幸,“到我为止”。

这年4月田贲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和侯洛介绍的。但不幸的是田贲于4月28日夜就被捕了。经过研究,根据田贲同志的表现,我们认为田贲同志是经得起考验的,因此我们谁也没有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

田贲同志在狱中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以自己的身体保护了组织和同志。今天我还记得他说有一个叫矢野的日本“法官”,一面使用严刑一面问他:“是谁领导你的?你是共产党哪个部分的?”田贲说:“没谁领导我,我是中国人,我知道我自己应

该怎么干。”就这样,田贲在敌人酷刑下,誓死不屈,做到了“到我为止”。

花喜露给我的影响

陶炎

陶焰 原名姜宗璜,又名陶炎,1924年出生。姜静芳的三弟。伪满奉天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读书会成员,1943年入关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前系中国科学院沈阳林土(应用生态)研究所所长。

1941年,我就读于沈阳大东门外的奉天第三国民高等学校。为了摆脱学校住宿的束缚,有更多的课外活动,我和同班同学在学校附近的魁星楼街租到一小间民房,约十平方米。在这处小天地里经常聚集三五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谈天说地。当时虽然受日本奴化教育,但我们都清醒地知道自己是中国人,青年人的心灵充满着探索、憧憬。

就在这一年,花喜露从盖平来到沈阳,想找一个不为别人注意又活动方便的地方住。就找到他归州小学教过的学生臧光华。我们见面之后,又知道他也是我四弟姜宗璐(现名姜涛)的小学老师,因此,我们都叫他花老师。他开始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当时他以机关小职员的身份做掩护,早出晚归,白天异常忙碌,晚上又要读书写作,与我们生活一处有诸多不便,便提出要另租房子。正好我们住的小平房对面另一间房子闲着,我们和房东高老太太说妥后,他就自己搬到这间只有五平方米的小房住下,他自称“五步斋”,屋里搭个板铺,铺前生个火炉,连做饭带取暖,此外屋内一无所有。这间平凡的小屋,现为沈河区魁星楼路金觉寺巷26号,就是他在沈阳时期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开始接触花老师时,我们只知道他是作家、诗人,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在东北地区有许多文艺界朋友,是位很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的知识渊博,对一些事物有着新颖的观点,因此获得了我们这些年青学生对他的敬佩。

他住在这里时,晚上时间不是读书就是写作,从不间断。这间小平房异常简陋。他写作的诗文有时给我看,有些不能发表,有些以隐晦的语言写成诗文发表在当时《盛京时报》的副刊上,我记得他以“山川草草”和“黑田贲夫”的笔名写过一些新诗,

登在各种报纸和杂志上。读过他的诗文,会给人以坚强的力量。

我当时喜爱文学,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以及普罗文学,凡能找到的书刊全部先睹为快。但在敌伪统治下有的是禁书,不易借到。花老师到来之后,他向我们提供了许多中外文学作品,从巴金的《家》到茅盾的《子夜》,从外国文学中的《死魂灵》到《铁流》等。这些优秀著作我们都能从他手中借到。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拿一本《鲁迅杂文选》向我介绍说:你要读鲁迅的著作,鲁迅的骨头最硬,他的反抗精神最彻底,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我曾如饥似渴地读过一些文学作品,似懂非懂,但从中确实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促使民族意识的觉醒。

与花老师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他既是一位有修养的文学家,更是一位坚定的反满抗日的革命者。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官僚、业主、资本家都充满着仇恨,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群众深表同情。这些不仅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也体现在他的日常谈吐之中。我们相处久了,他对我们这些单纯的青年学生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坦率地谈出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并经常鼓励我们要做一个爱国主义者,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求得民族的解放。他曾多次对我说:“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推翻日本侵略者,不当亡国奴。”并经常对我们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他曾多次表示,要革命就不怕牺牲,假如我被捕坐牢,绝不投降。他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样地深深刻在我的记忆当中。由于受到他的鼓舞,促使我下决心逃出伪满的牢笼,冒着危险也要走向抗日的革命洪流。

花老师在沈阳大南小平房居住的这段时间,生活异常艰苦,屋子又小,四面漏风,冬天非常寒冷。他每日自己煮高粱米饭,吃土豆白菜,我从来没看见他喝酒或者有什么娱乐活动。在这样清贫的生活中,他始终情绪饱满,生活乐观,充满胜利的信心。后来,他的爱人王丹群同志搬来,那清贫的生活依然如故。

1943年冬,我从国高毕业,决定逃亡关内投奔革命,曾向他表示我的去向。他对我说:要革命哪里都一样,走也好,留也行,都能为革命工作。当时我尚不能理解他作为地下革命工作者,希望我能留在沈阳从事地下工作的意愿,但又不便明确提出,因为我的流亡,方向虽然明确,但投奔何处都不清楚,当时我没能体会他的意图。我是流亡学生中的幸运者,从山东青岛直接进入山东革命根据地,进入抗日战争的行列。

20世纪40年代初,在沈阳受他直接教诲的同学还有杨伯甫、郭继仪、孙世箴、郑振铎等,也都先后参加革命工作。

“自由饼”“解放汤”

石岱宗

1942年冬天,田贲带我到他那个雅号“五步斋”的住处,听了打算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想法,他仔细地作了一番考虑,便说:“可以,就由你去闯一下也好。”他用深邃而又灼热的目光望着我说:“你的目的不应只是去鲁艺学习,你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打通一条通往延安的路!”这样,在他的鼓舞下便把我要进关的事最后决定了下来。待假造的“出国”证等准备就绪,已是转过年的5月份,我到沈阳来向他告别,他两眼闪着激奋的亮光为我念了他那首热情澎湃的长诗《到前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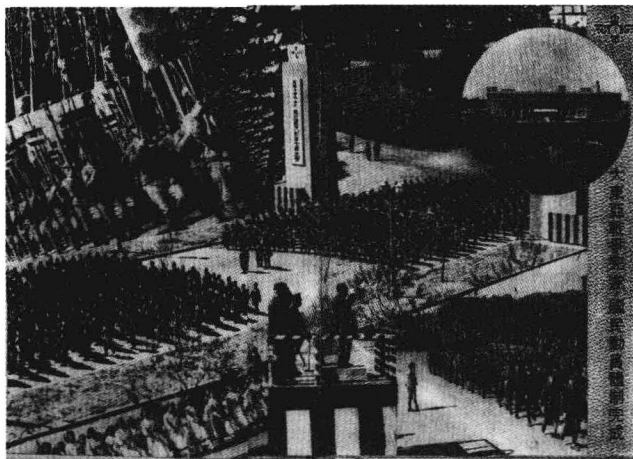
把自己先属于自己的朋友
属于群众,
到前面去!
冲着暴风雨,
到前面去!
到斗争的前面去,
到铁的阵地,
到力至永久的
青春!

那是在他自己居住的压井房的小屋里尽量压低着嗓音读的。但,它在我的耳边却像一曲高亢而又嘹亮的进军号。接着他又亲手做饭来为我饯行,因为没有擀面杖,只好把油饼放到锅里用铁勺来压。结果,被压出来角,不成为圆形了,他便俯到我的耳边悄悄地说:“这是自——由——饼!”打了几个鸡蛋,甩在煮着螃蟹腿的鲜汤里,他又情不自禁地再次俯到我的耳边,风趣地说:“这是解——放——汤!”喜悦之情实是难以形容的。在吃饭当中,我们研究,规定了我在途中给他写信时应使用什么样的密码,以及到达延安后最好能亲自回来一次,实在回不来也设法使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能够找到他等。临别,他又一再嘱咐我:“为了胜利地完成任务,路上一定要小心

谨慎……”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也是为了这一点，后天我就不到车站去送你了。”但，他还是把我送出很远很远，直到我上了电车，还觉得他的目光仍在我身后注视着……

沈阳城像个活地狱

姜涛



伪满洲国“大东亚战争”动员会

1943年，花老师到沈阳大东区供职，我考入清原林科国高，假期回家往返途经沈阳。我总想着去看看花老师。记得一次去看望他，他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兄弟那样，一会儿拉拉我的手，一会儿拍拍我的肩，问东问西，问长问短，询问着家乡的一切。他特意领我逛了一次沈阳城，他说，一定要开开眼界。他领我先看了沈阳繁华的中街、三经巷和日本人的住宅区，然后又领我看了北市场、贫民窟、妓院街。他对我说：“一面是花天酒地，纵情任欲；一面是忍饥挨饿，备受蹂躏。偌大个沈阳城，不正是一座人间的活地狱吗？”

一面是花天酒地，纵情任欲；一面是忍饥挨饿，备受蹂躏。偌大个沈阳城，不正是一座人间的活地狱吗？”

花老师领我逛街

李吉恒

1943年底，我从盖县第一国高毕业了，在毕业旅行时，曾到过沈阳，住在小南门里奉天第二女高附近的小旅馆里。我给花老师打电话，他来了，领我和李昌毓、孙世

藩三个人到街上溜达。李昌毓和孙世藩就这样认识了花老师。花老师领我们边走边唠,他说:“你们到奉天不能尽看大马路大楼房,应该各处都走走的。”他把我们领到工夫市去了。到那里一看,阴沟里臭水熏人,卖破烂的到处都是,烟头也卖。乞讨的老人、小孩,穿着破更生布的衣服,还有披麻袋片的,尤其是“半掩门”的妓女更多。当然也看到一些旧书摊。看了这些,当时我们有些不理解,就问花老师:“你怎把我们领到这个破地方来呢?”他回答说:“同学们,你们不知道,这才是社会的最底层,不看看这些哪行?高楼大厦谁能住上?看一看有好处呀。”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

1944年4月的一天,我又到沈阳去旅行,这时我已经在新京一个报社当编辑。在站前亚洲旅馆我打电话邀出花老师,我俩沿着马路一边谈着话,一边向小河沿走去。到了小河沿,几乎人都走净了。我俩就并排坐在凉棚底下的凳子上。他说:“刚才你给我去电话,我不知道是你,所以让别人接的,因为现在这个地方有风声了,长春怎么样?”我告诉他长春有不少书店经理和报社编辑被抓走了。花老师告诉我说:“看书要加点小心,言谈更要小心,尤其是你的职业与众不同,你的后面还不知跟了多少狗呢!”后来听说,花老师就是在见我的那天晚上被日本特务逮捕的。

田贲领我们到娼妓街

李昌毓

有一次,我们一高学生到哈尔滨旅行,中途到奉天(沈阳)游览。李吉恒等同学邀我去看望田贲,我欣然同意。他见到这帮年轻学生很高兴,便利用这个机会领我们到奉天最黑暗的一角——贫民窟参观。这里住着最下层的市民,阴暗、潮湿、污秽、贫穷、卖淫,无怪不有,不堪入目。有一条街,全是卖淫的娼妓,一排排小木板房,里面只容纳一张板床,有的有一条破被子,有的只有一条麻袋片。每个门口站着个妓女,如同海滩上每个洞外趴着一只螃蟹一样,她们浓妆艳抹,妖冶狐媚,有的年轻风骚,有的半老徐娘,全不顾羞耻,嘴里秽声浪语招引过往游客,甚至走上来搭肩挽背,把游客往屋里强拉硬拽。她们每天都在饥饿线上挣扎,说这里是出卖灵魂与肉体的市场,也不为过。这让我想起杰克·伦敦写的《深渊下的人们》,这里与伦敦东市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人间地狱。不过那里是被大资本家统治着,而这里却被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着。

田贡一边领我们看,一边指点给我们,在这个最黑暗最贫穷的地方,那些苦力、那些娼妓、那些乞丐,都是被剥削者、被损害者,被社会所抛弃,是极少公平的。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他并以明显的对比,说那些五光十色的高楼大厦只是表面现象,而这些贫民窟、工夫市和卖淫街才是这个城市的本质。这虚假的繁华景色正是从对穷人的敲骨吸髓中建筑起来的。他用这个悲惨世界的现实来启发我们的思想觉悟,以唤起我们对劳动者的同情,对统治者的仇恨。他的教育更增强了我们反满抗日的决心。

花老师送我《妇人与社会》

孙萌

孙萌 原名侯庚芝,笔名潜萌、施弟,女,1927年出生,伪满盖平县女子国高学生,因参加《辰星》出版、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1946年参加革命,先后在《安东日报》《辽东日报》《东北日报》《辽宁日报》做编辑工作,1954年被错定为“胡风分子”受迫害,“文革”中到岫岩插队,粉碎“四人帮”后回《辽宁日报》工作,离休前系《辽宁日报》责任编辑。

我认识花喜露老师是因为同班好友穆玉琪小学时是他的学生。我没有跟他念过书,却和许多青年一样尊敬地称他为花老师。从玉琪那里我知道他是个革命诗人,写过不少有爱国思想的诗文。

那是1942年的寒假,花老师答应我们去见他,我和穆玉琪来到沈阳找他。当时他已离开学校到沈阳大东区公所,当上一名职员,后来知道,那是用来掩护身份的公开职业,实际他在这个军工厂集中的地区为党做情报工作。我和花老师一见面就被他的爽朗和热情所感染,同时也感觉到他的机警和谨慎。这次见面,我向他提出不少问题,有书本上的,也有现实生活中的,这时我已读过不少左倾进步的书籍,虽然幼稚却敢于议论,看着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地发议论,他微笑不语。听我讲完了,他说:“你们都是有梦的孩子啊!”接着又说:“有梦是好事,但不能忘记现实。”什么是现实?我明白他指的是反满抗日。他又问我们都读过什么书,还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对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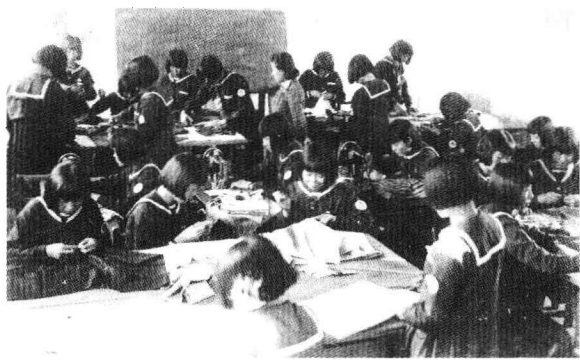
田贲赠送给孙萌的《妇人与社会》

些问题的看法,他严肃地对我说:“你想得对,要勇于做剥削阶级的叛逆者。”他让我再读一读屠格涅夫的《门槛》和《前夜》,还借给我一本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我明白他是在鼓励我做叛逆者的决心和勇气。这次见面,他还领我们去逛了旧书摊,回来特意从一条贫



盖平女子国高学生学习缝纫

民集中居住的街里穿过。他为什么不领我们去逛繁华的大街,偏偏来到这个地方?看得出他是在向我们进行阶级教育,让我们认识社会,引我们树立更高的理想。在回来的路上,他同我们讲社会上为什么有穷有富,他还说:“不变革社会制度,不解放劳苦大众,你们说的妇女解放都是空洞的口号。”后来他送给了我一本德国社会主义者倍倍尔写的《妇人与社会》。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从这本书里,我懂得了妇女和无产阶级同是被压迫者,甚至在无产者不是奴隶时,妇女就已经是奴隶了。我明白妇女要解放必须参加阶级斗争的道理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从家跑出来参加革命,我什么衣物都没带,却把花老师给我的这本书挟出来,至今仍在手中,成为一份珍贵的纪念。



以后,我同穆玉琪还来过沈阳,除了借书,就是听花老师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他总是用革命的思想影响别人,并且注意捕捉青年学生的思想,正确地加以引导。我总忘不了一次对我思想有深刻影响的谈话,那是我说我喜欢《灭亡》里杜大心的勇于牺牲精神,花老师立刻说:“那种勇敢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主张变革社会制度,不主张盲目冒险和谋杀。”说到这里,他问我:“你说杀死一个李总督,再来一个王总督怎么办?”这次谈话他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革命和冒险不同,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

才是真正的革命。这对纠正我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情绪和消除我当时思想上受到的虚无主义影响起了决定作用,使我的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花老师是个目标明确、脚踏实地、注重实践的人。他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去出风头(指投稿)。要多读书,多做事,多团结进步同学,扩大抗日力量。他要我们关心现实斗争,每次见面他都给我们讲国际国内形势,提高我们的民族觉悟。记得有一次去沈阳,他已搬家,两边都住有人家。那是一个夜晚,我和穆玉琪围坐桌旁听他给我们讲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怕被邻居听见,他在纸上写德、意、日三个字,并画上圈,说这是三个法西斯,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讲到中国抗战,他说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国民党反动而腐败,中国将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还讲了毛泽东和朱德是为了劳苦大众的。就是这次,我们知道本溪有个学生已去了延安,后来还有两个学生,一个去了山东解放区,一个去了太行根据地。花老师讲得激动了,就低声教我们唱《大路歌》,参加革命后,每唱这支歌,我都会想起那个夜晚。

我的作者田贲

秋莹

秋莹(1914—1995) 原名王之平,笔名秋莹、王秋莹、阿柯、王锦河、谷实、黄玄等,辽宁抚顺县人,东北沦陷时期作家。历任伪满《民生晚报》《大同报》《盛京时报》记者、编辑,日本投降后担任沈阳中苏友好协会文化部长兼《文化导报》主编。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去故集》《小工车》,长篇小说《河流的底层》,评论《东北沦陷期文学概况》等。

我与田贲文字上的接触,大约是在1942年前后。

东北文艺界,虽然在日本侵略者的漫长统治下,但仍然迂回曲折地前进着。从1939年开始,由于同人刊物的陆续出版,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繁荣和昌盛。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和出台《艺文指导要纲》之后,不但私人组成的文艺社团相继解散,属于官方和半官方的各种期刊也逐渐衰微。有些作者已不愿意执笔或者只是写些远离现实的文字,有些作者被逼写鼓吹“大东亚圣战必胜”的“献纳”诗文。这时,在我所编辑的刊物中,《文选》早已停刊,连比较小型的“每月丛编”出完《文颖》后也无力续出,

但《盛京时报》的“文学”版仍由我担任编辑。这个刊物的供稿者,多是《文选》同人,他们本来就分散于各地,《文选》停刊后逐渐失去联系。

《盛京时报》的“文学”版,每周只占半版,以文艺评论、批评介绍为主,间或刊登一些有针对性的杂文和诗歌。由于容量有限,特别欢迎尖锐犀利的短文。为了保持“文学”版的一定水平,在每期选稿时,我总是希望发现有才能的作者。

有一天,我读到一篇署名山川草草的文章,立即引起我的重视。这篇文章对当时文艺界比较熟悉,好像是经常写作的人,但通讯地址却是“大东区凌云公所”,收信人是田贲。我很惊奇,比较知名的作者我多半认识,为什么同在一个城市,却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给他回信,希望他常寄作品。后来,他果然不断有作品寄来,除评论外,还有诗与杂文。他的诗怀博大、刚健深沉、意境雄浑、格调高昂,与当时充满忧郁和轻愁的情调迥然不同。“文学”周刊有个小专栏“一页评论”,文章限于三四百字,他写过好多篇。但是对他写的文章的内容,我都不记得了。只有《塔·城·一切建筑》始终留有深远的印象。接到这篇文章后,我约他有机会作一次面谈,并要他指定时间和地点。不久便接到他回信,定的地点是城内鼓楼南一家镜子铺。这一天下班后,我和陈因按照预约的时间来到那个镜子铺。陈因是《文选》的发起人,我俩同在《盛京时报》做编辑。当时我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就是日后复兴《文选》吸收他加入。

我们等了很久,没有等到,只好向镜子铺的柜台打听。他们漫不经心的回答,我感觉好像田贲经常来这里等人。我们又到鼓楼北商务印书馆闲谈了一个多小时,再回到这里,仍然没有等来。此后,再也没有接到他的来稿。联系到他的通讯地址,这是伪政权的最基层,摊派劳工,挑“国兵”,都是他们干的。田贲是什么身份?为什么失约?为什么连封信都不回?当时我们很难理解。

后来,我由于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注意,在1944年底逃亡到上海。因工作落空,只好回到《盛京时报》报社。在日本投降前夕被逮捕。

日本投降后,我参加中苏友协的工作,因为筹备作家联盟的文艺组织,结识了郁其文(铁汉)和田贲的学生殷拳等人,才知道田贲被捕和在狱中的表现。他失约的原因,应当就是突然被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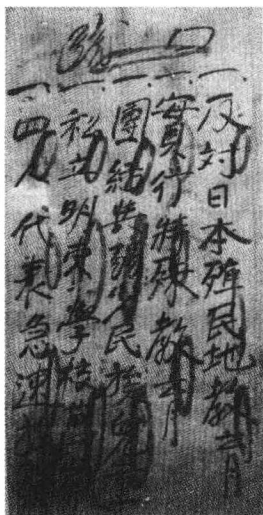
五、《辰星》《大地》与秋灯书店

《辰星》《大地》出刊背景

王锡成

朝鲜族私立学校的
反日标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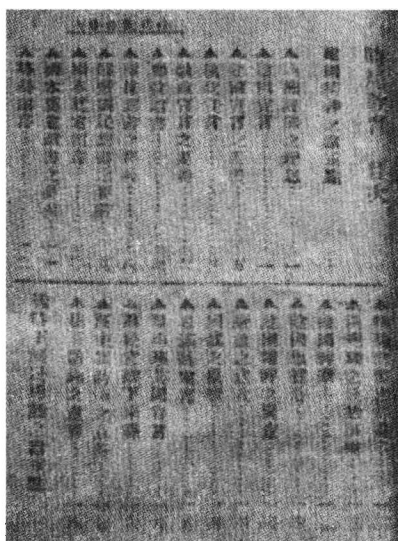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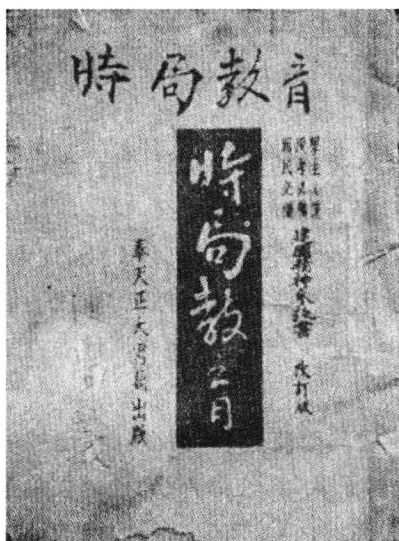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为了使学生“能明确圣战的意义,巩固其克服时艰的觉悟,并祈愿武运长久,圣战必胜的同时,更向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上,誓出以协力奉公的至诚心”,加强了所谓时局教育。学校活动、教师的课堂教授都要“对应”时局,一切知识的灌输像宣战的诏书,都对宣战的必然性进行宣传。企图让学生树立与“圣战协力”的精神。在墙报上,贴着东洋地理图和战局的图片。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出版物都弥漫着军国主义宣传内容。我有一本标明“学生必备、升学必备、国民必备”的“建国精神”参考书《时局教育》,是战时体制下教育主要内容的高度浓缩。该书解释的词语都是当



布满铁丝网的集团部落



时社会的“流行语”，可以从这些词语了解当时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社会主义文化。其中，关于“建国精神”的内容有：满洲建国之理想、建国宣言、建国宣言之要义、执政宣言、即位诏书、即位诏书之要义、回銮训民诏书之要义、国本奠定诏书、国本奠定诏书之要义、时局诏书、时局诏书之要义、满洲国之政治组织、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塔、“建国精神”之真意、康德之意义、国旗之象征、日满议定书、日满华共同宣言、高松宫殿下来满、汪主席访满之意义、德王访满之意义。战时下国民活动之重点是国民训、国民训释义、国民实践决议文、国民动员大会、青少年团、勤劳奉公队、国防妇人会、国民储蓄运动、国民防谍、学校报国团、时局教育练成会、厚生运动、东亚厚生大会、废品收回、兴亚奉公会、诏书奉戴日、防空日、防空及防空学校、国民仪礼、正午默祷、国势调查、职域奉公、国兵法实施之目的、国家总动员法、国民总服役法之主旨、防空教育、国人防空之重要、防卫法、正当防卫、紧急避难、时计炸弹、飞行铅笔、照明落下伞、毒瓦斯之防御法、烧夷弹之防御法。“时局教育常识”主要有一心一德、人的资源、人种法、人道主义、人头税、入籍、八紘一字、三民主义、大本营、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建设博览会、干涉中国事变、反枢轴军、文化、文明、日德意三国协定之内容、日德意三国联盟、日华新条约、日本访华三特使、日之满关系三原则、治外法权、协和会与政府之关系、协和会之精神及工作要纲、协和会之机构、东亚新秩序、金属报国、非常时、非战斗员、俘虏、宣传战、政治犯、国事犯、国家主义、国际联盟、焦土战、富家强国运动、殖民地、统治经济、结社、增产报国、煽动、领土、领空、领事裁判权。



伪满进行“建国精神”教育的《时局教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把“建国精神的彻底发扬”列为教育方针的首要之点。随之,在课程设置上,将“国民道德”和“国势”(地理、历史)两门课程合并为“建国精神”。其教授宗旨“本乎惟神之道,阐明为国民者所当进之路途,使之确立忠良国民之信念”,“基于日满一体不可分、大东亚共荣、世界新秩序建设之一贯的信念,阐明其使命及地位”等。伪文教部还公布了《建国精神教授要目一览》。一年级为“皇帝陛下”、“帝旨奉体”、“建国”、“国土”、“国民”、“家”、“忠孝”、“建国之理想”、“学生之使命”、“礼法”;二年级为“建国神庙”、“国体”、“德性之涵养”、“智能之涵养”、“身心之锻炼”、“情操之陶冶”、“勤劳”、“本分”、“公益”、“礼法”;三年级为“惟神之道”、“先人之伟业”、“至诚”、“和”、“尚武”、“公正”、“礼让”、“慈爱”、“报恩”、“道义”、“礼法”;四年级为“日本之国体”、“东亚之共荣”、“我国之使命与国民之道”、“国民生活”、“政治”、“国防”、“经济”、“文化”、“教育”、“国民之觉悟”、“礼法”。每一课要目中又分若干细目,即具体的讲授提纲。“建国精神”科的另一部分内容为“国势”。所谓“国势”指的是地理、历史。在1941年以前,地理、历史课分别开设,主要是被颠倒和歪曲的内容;1942年以后,地理、历史合为“国势”;1943年起又将“国势”并入“建国精神”科,称为“建国精神(国势)”。“建国精神”科与过去的“国民道德”科相比,着重宣传的内容和变化是突出宣传天照大神。将过去宣传的“满洲建国,即以王道为极则”改为“发于惟神之道”,并宣称“王道政治,乃基于惟神之道之皇道所延长之王道也”。“王道”成了“神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是该课程最为重要的目的。把日本奉为伪满的“救世主”,亚洲的盟主。与日本“一德一心不可分离”,要“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拼命为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卖命效力。

日本宣扬“惟神之道”,强制伪满洲国把日本天皇的家神天照大神,当做自己的祖神加以供奉崇拜,以此来达到对中国人思想、精神的统治和奴役。这一时期的教材也增添了《惟神之道》《万邦无比的国体》《神敕》《八统一宇》《教育敕语》《现人神》等宣扬日本神道和伪满“建国精神”的课文。给学生灌输敬神思想意识,使孩子们从小就敬畏日本,误认为日本是恩人,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无与伦比、拥有最优秀素质和文化的国民。因此,理应感谢皇恩,尽忠于日本。

伪满后期,日本发动的所谓大东亚圣战的败局已定,日伪的血腥镇压越来越残酷,抓劳工往往是有去无回,所谓的“勤劳奉仕棒子队”到处都有。到处成立关押反满抗日人士的反省院、矫正院,思想犯的帽子满天飞。过年过节吃一顿大米饭都成了经济犯。这时驼子找我和门文东、张克恩(一高时张吉宽的同学,已到盖平县兴农合作

社工作)研究,想把盖平县几个国高的学生通过“星火”同人组织起来,再把读书会搞起来。不久,在一高通过李昌毓秘密油印了文艺刊物叫《大地》,在二高通过臧永昌也出了个刊物叫《辰星》,在女高还通过侯赓芝结识了几个学生。

驼子的活动

门文东

1941年,驼子和王觉、李光海一起到新京去创办新时代出版社,在那里经王觉和李光海介绍,驼子加入了地下国民党。回来以后他又和李光海介绍我加入了地下国民党。当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期。驼子广交朋友,能团结不同派别的人。如花喜露(田贲)是共产主义者,李光海是国民党,王克范是无党派爱国人士,他都团结得非常好。在个人关系上他们是亲密无间的,这几个人经常在他家吃、住、拿、用,他乐意是从。我也常参与其事,也就和花喜露、王克范、李光海交上了朋友。驼子善于团结各阶层的人,比如我是个学徒,王锡成是个店员,张克恩是个小职员,郁庆令、张吉宽、李昌毓、臧永昌都是学生,他都能真诚相待,团结得很好。在他的组织下,这些人又成立了“读书会”,出版了油印刊物《大地》和《辰星》。他很健谈,讲起道理来别人很爱听,在他的号召下又办起了秋灯书店。驼子确实是一个爱国者、民主主义者。自从花喜露去奉天做地下工作以后,盖平县“星火”同人的活动,他主持的分量加重了。

驼子为人很仗义,敢于担事。1943年秋,李季疯从新京的日本监狱里逃出来,跑到盖平县找他,是他联合其他“星火”同人把李季疯掩护起来,一切吃用都由他供应,并担着很大的风险。如果被特务知道了,他要同罪的,可他从来没考虑这些。

《辰星》与《大地》

李昌毓

如果说秋灯书店在阅读和启蒙方面起到积极作用,那么《辰星》《大地》的出刊,

以及在敌伪报刊上开辟写作阵地，便是以笔作刀枪起到了进行反满抗日的宣传作用。

出刊物，既要有写作能力，又会提高写作能力。铁汉和驼子曾多次向我们讲解写作的基本知识，比如标点符号的种类和用法、各种词的用法，特别要用好“的、地、底、得”等词。在写文章时，要注意几个重要环节，如要有巧妙的构思、突出的主题、合理的布局、曲折的情节、生动的语言、简洁的文字、集中的典型，等等。事先还要积累素材，想好中心，选好人物，做好计划，拟好提纲，这些都是写好作品的必要条件。要使作品做到自然、真实、生动，特别要练好写作技巧。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学生，只是在铁汉和驼子进行必要的指导后，就开始写作了。而锻炼写作的最好方法就是自己出刊物，自己锻炼自己。

1943年五六月间，驼子又向我们提出搞秘密刊物的想法。因为在伪满报刊上发表文章并不容易，而且有诸多不便，不能畅所欲言。自己出刊物既能锻炼初学写作的学生，又能更好地传播进步思想。

依据驼子的提议，六七月间我便和二高的臧永昌等几个同学共同研究出一个秘密油印刊物的计划。经过多次谋划，定下这个刊物名叫《辰星》，意即辰州（盖县古名）天边几颗小星将会迎来祖国的黎明。刊名确定后，稿子由一高、二高和女高的学生写，同时也邀请驼子、门文东、王锡成等人撰稿，以提高刊物的质量和影响力。委托臧永昌集稿，我们共同定稿和编排，由他亲手刻印。刊物印出后，不仅字迹娟秀，而且美观大方，颇受欢迎。里面不仅载有小说、散文，还有诗歌。除驼子等人撰稿外，一高有李昌毓、孙世藩、李吉恒、门恩义、杨士绵和赵廷奎等人，二高有臧永昌、王德祥、周建涛、于思惠等人，女高有侯赓芝、姜静芳、穆玉琪、赵俊芬等人。这实际已超出了学生的范围，也超出了二高的范围，它成了一个带有广泛性的刊物。不过它主要由二高主办，臧永昌负主要责任。它确实起到了宣传反满抗日的的作用，驼子等人对它很满意。

《辰星》出刊后，驼子要求我们今后再出刊物时范围应小些，便于保密和减少暴露。一高爱好文艺的同学较多，再联合出刊物难以满足需要。因此，我们在驼子同意下，由一高单独出一种秘密文艺刊物。经过我和孙世藩、李吉恒、杨士绵几个同学酝酿研究，在九、十月间出了一个名叫《大地》的刊物。它的意思是我爱大地，大地是我的母亲。借以反对敌人统治，怀念伟大的祖国。

这个刊物几乎全由一高的同学撰稿，内容多为散文、诗歌。说它是一本诗歌专辑也未尝不可。这也许因为同学刚涉及写作，故多爱写诗吧！

当然，这个刊物里的诗歌内容各异，又各具特色，有些诗写得还是蛮有诗意的。

有隐喻反抗侵略的,有讽刺现实社会的,有憧憬光明、追求真理的,有抒发个人情感、表达雄心壮志的,有热爱自然风光、赞美祖国河山的,等等。撰稿的同学在接到约稿后都比较认真努力,都想用自己的笔写出诗的最佳意境。它会激起互相比赛的热情。稿子是由我收集,共同审查,共同编排的,由杨士绵刻印。他的字刻得工整美观、精巧细致。油印机、油墨等工具是利用星期天教职工不在校的机会,由我们几个同学从庶务股偷偷弄出来的。忙了一整天才印出来,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在这个刊物上撰稿的有李昌毓、孙世藩、李吉恒、门恩义、杨士绵、迟金镇、赵廷奎、李连泰、张文廷、高玉元、王盛伦、赵俊九、洪声钜、赵怀范等同学,此外还有李明轩。《大地》撰稿者经过这次锻炼,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思想觉悟和写作能力。《大地》虽然是一种尝试,但毕竟它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写作热情。它像《辰星》一样,受到驼子等人的较好评价。

我们除自己出文艺刊物外,还积极向伪满各报刊杂志投稿,利用这些刊物宣传反满抗日思想。我们经常投稿的刊物有《大同报》《康德新闻》《工商月刊》《新满洲》和《实话报》等刊物。经常投稿的有殷拳、铁汉、舒啸、舒展、臧晶、银燕等同学。当然,其中以铁汉发表的作品为最多。

一高同学还在《新满洲》上开辟过学生专辑,写稿的有李昌毓、孙世藩、门恩义、李吉恒、杨士绵、赵廷奎等同学。

在我发表的一些作品中,有两篇作品给我印象最为深刻。一篇是以狂奔为笔名发表在《康德新闻》上的一首诗《夏日》,中心意思是在七月流火的日子,农夫冒着烈日在田园里铲除杂草,以保护禾苗的茁壮成长。暗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统治。另一篇以舒啸为笔名发表在《蒙疆文艺》上的小说《马族的悲哀》,描写横暴的主人为了要骅骝马为他效力,狠命地鞭打它们的情景,而骅骝马并不驯服,便以咆哮和扬蹄来反抗主人的虐待。借以启示人们对敌人的法西斯统治,必须给以坚决的反抗。这篇小说本来是寄给在《新潮》当编辑的铁汉的,但他的杂志不好发表,便寄给《蒙疆文艺》,幸好被其采用。

二高同学在《康德新闻》上也发表过专辑,是以臧晶为主稿的。他们在和我们共同发展盖平县学生进步文艺活动上,和女高一样配合很好,是有成效的。

创办油印刊物《辰星》

臧永昌

臧永昌 笔名臧晶、臧青镜,1927年出生,伪满盖平县第二国高学生,领导二高进步学生积极参加“星火”同人组织的读书会,主编《辰星》油印刊物,1944年5月被捕,被判5年徒刑,1945年8月19日出狱,参加革命。离休前系辽宁省成人教育研究所《职工教育》编辑部编审。

臧永昌在盖平第二国高(1944年春)



用象征含蓄的手法在伪满报刊上发表文章,不能痛快地直抒我对日伪的仇恨,不能明朗地倾吐出我追求真理、憧憬光明的胸臆。这也是朋友们的共同心情。我决定和几位知心同学发起办一个反满抗日的秘密油印刊物。

10月上旬的一天,我和寄宿学校的周建涛、王德祥商量,他俩爽快同意。我说:“这个刊物可以叫《辰星》,不用早晨的‘晨’字,用盖平古称‘辰州’的‘辰’字。”王德祥说:“这双关意思很好!一个早晨,一个辰州。”周建涛说:“在这辰州古城里,我们要像黎明前的晨星似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又说:“下礼拜音乐先生能找我刻歌篇,钢板铁笔到了我手里,我们就用它刻《辰星》。”我说:“我先在家刻,礼拜天上午,你们到我家帮着刻,总能刻完。”王德祥说:“我刻封面。”周建涛说:“下午,我找堂役老大爷开办公室门,就说要用油印机给先生印歌篇。”蜡纸和用纸,由我去买;约稿的事,由我去办。一切筹划就如此作出来了。我们没有“前怕狼后怕虎”,自始至终是兴奋愉快的。

第二天早晨,我去一高找到李昌毓,午间去秋灯书店见于家麟、王夕澄,晚上又去侯赓芝家见她,对他们说了关于《辰星》的筹划。他们表示同意,并要分头向朋友们约稿,也嘱咐我慎重行事。我说:“大家看后,不保留,烧掉!”三四天以后,他们把集来的稿件交给了我。有17人写出了稿。为了共同的信念、目标,我们的心绪在一起,血溶在一起了!“盖一高”有李昌毓(舒啸)、孙世藩(舒展)、门恩义(辰藩)、杨士绵(杨波)、李吉恒(毅夫)、赵廷奎;盖平女子国高有姜静芳(银燕)、侯赓芝(潜萌)、穆玉琪

(枫君);“盖二高”有周建涛(亢)、王德祥(陌)、于恩惠(洁心)、臧永昌(臧晶);社会上有于家麟(驼子)、王锡成(夕澄)、门文东(铁键)。在建国大学读书的陈杭(我的表兄),有一首诗在我处,我也编上了。作品都是短小的,篇篇发出了对日伪的恨、对祖国的爱。诗歌《有一天太阳会沉到底》,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必亡。银燕的诗,借飞蛾扑火自焚表达为真理不惜生命的心态。于恩惠在散文中抨击了伪官吏们的荒淫无耻的生活。我的长诗《可怜的人》,写了被日伪抓去的劳工的悲惨遭遇,对日伪荼毒生灵的血腥罪行做了控诉。我还为刊物写了卷头诗,大意是:黑暗的天空,颗颗晨星闪烁着道道光芒,它们在迎接那即将来临的黎明。

礼拜天上午,我和周建涛、王德祥刻完了《辰星》。他俩返回学校,我吃过午饭带着刻好的蜡纸,去到学校。周建涛请校役老大爷开了办公室的门。我们三人轮替着,两人印,一人在门外放哨。学校里静静的,只有几个同学在操场玩球。当那16开的一张张白纸清晰地现出了我们手刻的字迹时,我们激动极了。当晚,我装订出了25本《辰星》,每本有30多页。第二天,把它分发了出去。李昌毓和他的十几名学友在一高随后也编印了秘密刊物《大地》。

田贲突然来到我家

王锡成

1943年初秋一天清晨,田贲与田丹同志突然到盖平来到我家。他们说是回故乡探亲,顺道看看我。两年多不知他们的下落,久别见面,喜悦之情是不可言状的。除叙离情之外,我又找来驼子等老友看望他们,在一起畅叙。并约好他们从熊岳归来和我一起回沈阳。

这时,我失业已有两年多了,在家乡种植中药维持生活。种的药材经常拿到沈阳出售。这次我才知道他们那五平米斗室的住处。在沈阳停留期间,田贲曾带我走了好多工人居住区和贫民窟,边走边上抗日救国和阶级教育课,嘱我努力提高自己,以便今后多做革命工作。这时我正失业在家,对他那种不明朗的态度很难过,因为好多友人早已认为田贲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多么希望他给指条明路,并带领我们工作,可是这次使我失望了。

这之后,我因日伪老是挑劳工和“勤劳奉仕”队,招架不了,又去找田贲,他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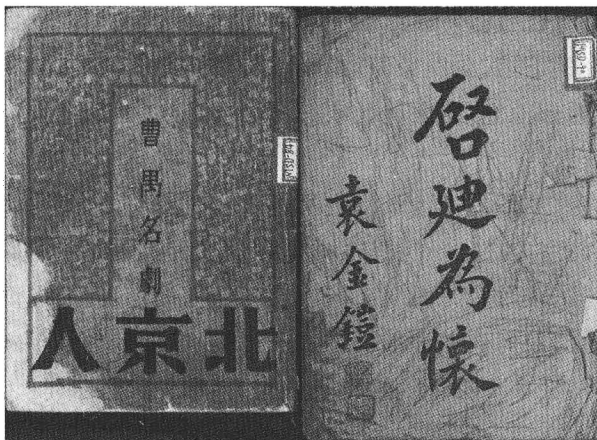
在他工作的大东区公所开了个假身份证,使我得以摆脱了不少麻烦。

田贲对人热情,但警惕性很高。事隔七八年之后,当我与田丹同志在革命队伍里相聚,在回忆田贲同志的时候,田丹告诉我,那次去找你本来是要给你介绍个工作的,看你与驼子接触很密切就作罢了。他和我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是因为他看出了驼子是国民党,而我与驼子是同乡又关系密切,不产生政治上联系是对的,现在想起来,还对他怀有崇敬之情。

花喜露回盖平

臧永昌

《辰星》印出后的1943年10月下旬,我见到了久仰的共产主义者、革命作家花喜露。一个礼拜六午休时,王夕澄骑车到学校门前找我,告诉我花喜露从奉天(沈阳)回盖平来了,约定次日上午去天台村会面。这是我早就有了的心愿。次日,我遵时去了。先在城里走了两条胡同,再出东城门,绕路前往天台村,王夕澄在村头等着我,领我去张可恩的家。进了屋,有一个陌生人坐在炕沿上,他见我进来,站起迎前,紧紧握住我的手。我说:“花老师,你好!”他两只明亮的眼睛凝视着我,温和地说:“我们第一次见面,随便坐吧!”他中等个,30岁左右,脸有些苍白,举止从容。我靠着李昌毓坐在条凳上。于家麟、王夕澄、门文东、王矜人、张可恩,有坐炕上的,有坐炕沿的。我年



伪满洲国出版的图书

龄最小。大家都想听听远道而来的花喜露谈谈,他也想了解一下盖平的情况。关于读书会、秋灯书店、《辰星》《大地》,花喜露说:“一定得小心,活动要绝对秘密。”

大家最关注的是战局的发展。当时,美英联军已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下了台,意大利无条件投降;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中苏联红军取得伟大胜利后,希特勒法西斯已溃退出它侵

占的苏联广大领土;在国内抗日前线上,八路军新四军正在反攻。大家议论到这些时,激奋欢悦之情莫不溢于言表。

于家麟说:“日本、满洲陷入绝境了,最后的胜利即将来临。”

花喜露说:“敌人越临近死亡,越要猖狂!”他说:“在奉天、新京、鞍山,日伪天天成批抓反满抗日分子。”从他口中,得知他教过的也是我们熟悉的学生,有的已逃往关内投奔共产党去了。

听了花喜露、于家麟等人的精辟见解,看到花、于这两位带头人密切合作地共同推动盖平的反满抗日活动,我愈发增强了爱国抗日的斗争信念。

就在这次秘密会晤后的当晚,我在侯赓芝的家里也第一次见到了花喜露的爱人王风云。她穿着蓝布旗袍,朴素文静,谈吐非凡,是位有着革命气质的大姐。她又给侯赓芝、穆玉琪带来几本很有价值的书,其中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和《社会主义 ABC》。这些书,后来我也借看了。

《大地》出刊前后

杨士绵

杨士绵 笔名杨波,1925年出生,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参与油印刊物《大地》的出版、投稿和读书会活动。1944年5月被捕,在盖平县警察署和奉天第一监狱受刑,1945年5月4日,在伪奉天省高等法院被宣布“犹豫执刑”狱外监督。退休前系鞍山市自来水管工程公司干部。

阅读文艺书籍,在盖县一高部分同学中,成为一种好习惯。越是年级高的学生,阅读的人数越多。有的还能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这些人不仅在学业上是各年级的上等的好学生,在老师和同学中也有较高的威信。他们阅读的书刊,书店里买不到,都是秘密传阅的。由于上述需要,我二年级时(1942年)结识了当年三年级的李昌毓。他品学兼优,为人稳重,是三年乙级(班)的级(班)长。他看的书多,经常写稿,不时从报刊上能看到他以笔名舒啸发表的文章。我经常向他借阅书籍,请他指导如何写稿以及改稿等。在低年级学生中,我也结识了许多同学。如赵廷奎,他交游广,同二高、女高的一些同学也有联系。因此,他的书籍来源渠道多。又如张登玉,谈

论问题,特别是关于文艺方面问题,不仅幽默,而且颇有己见,酷似一位小评论家。再如高玉元、王盛伦、张文廷,不仅是文艺的爱好者,而且是该班学生的拔尖者。这些同学,又各自结识了爱好文艺的众多同学。他们之间借阅、传递书刊,漫谈交流心得,窃语国事心事,切磋琢磨互相启发,增进感情,加深友谊。这样,在盖县一高的上下左右诸同学中,形成了一支志同道合的爱好文艺的队伍。

二高的同学,在当时最高年级学生臧永昌等组织领导下,于1943年秋,自己刻写油印出版了一个秘密刊物,名叫《辰星》。该刊的稿件,除他们本校外,还有女高和一高的。一高的李昌毓和我各登一篇稿子。我的那篇稿子是经李昌毓拿去的,因为他同他们熟悉并有交往。《辰星》出刊后,除李昌毓和我各得一本外,还通过其他途径很快传到一高爱好文艺的同学中来了。爱好文艺的同学对《辰星》的出刊赞不绝口,不仅认为内容好,更认为这是一桩新鲜事。有些同学甚至说:“我们一高落后了,人家二高比我校建校晚,且爱好文艺的同学也不如一高多,竟能出自己的刊物,我们一高为什么不能出自己的刊物呢?”在大家迫切要求下,一致赞同一高尽快出自己的刊物。

为什么要出自己的刊物?就当时我们思想状况而言,是想通过这个办法,把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起来,交流作品,锻炼和提高写作能力,想通过此法,把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一个集体。

《大地》的出刊是在李昌毓的领导下进行的。一高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全校各年级爱好文艺的进步同学,由一位最高年级的同学作为领导者,在校内组织领导这项活动,对校外负责沟通各方的联系。该人毕业后,再由递升为四年级的一位同学担任。历年如此。到了1943年,李昌毓是我校的四年级学生,所以一高的文艺活动就由他来领导了。从决定出刊一高自己的刊物,到《大地》的定名,以及其他重大事情,都是经他同意的。但由于李昌毓当时处于毕业前夕,每日早起晚睡,忙于复习功课,作好升大学考试的准备,他就把出刊的一些具体工作交给我来做了。在他的指点下,我同大家商量和筹划出版一高的刊物。首先,秘密地召集了爱好文艺的同学开会,到会10人左右。会上大家一致赞同要尽快出版自己的刊物,为此要在一高范围内约稿;预定了交稿日期;进行具体分工,刻写蜡纸、筹款买纸以及油印等事。一致同意保守秘密。在商议给这个刊物取什么名字的问题上,大家七嘴八舌,起了不少好听的名字。商议的结果是我提出用《大地》的名字,被大家采纳了。因为我们一刻也不能离开大地,它是生养我们的母亲,我们将在大地上成长,我们有志青年,应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去浇灌它,使沦陷的大地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大地》出刊过程中,最为费事的是刻写蜡纸。不仅要一字一字地、一篇一篇地

去刻,而且要找个隐蔽的,不为同学们所看见的地方。同时又不能耽误正课,只好利用业余时间。刻写蜡纸多数同学以前没刻过,怕刻的不好影响刊物的质量。我这个具体组织者,不愿让别人增加麻烦,况且我从高小时起就帮助老师刻写过,于是,我自告奋勇,主要由我来刻写。开始时,我利用星期六的晚上和星期日,独自一人到教室去刻。这样进度太慢了。为了加快进度,改为每晚自习到教室去刻。这样,时间一长,就被同班的同学发现了。他们问我刻写什么,我只好如实地告诉他们刻写稿件。其实,爱好文艺的同学平时的一些举动,他们也能猜测个大概。这样,他们也不再问了。我以为,反正我班住宿同学知道了,再秘密地独自一人到教室去刻写不仅费事,而且容易增加同学的猜疑。于是在晚自习时间,改在宿舍里刻,只是找个灯光明亮的地方就行了。在刻写蜡纸那些日子,由于连日刻,右手的食指指尖都磨出老茧来了。由于刻写量大,怕不能准时出刊,后来我只好将一小部分稿件交由其他同学去刻写了。这样,按预定时间刻写完毕。

最费脑筋的是油印问题。如果说刻写蜡纸可以半公开地进行,那么,油印和装订成册就不能公开了,绝对不能公开,必须秘密地进行。否则,一旦出事,就要大祸临头。对此,参加投稿的同学都非常清楚。当时最头痛的是油印机问题,无论是个人或集资都买不起,况且日伪统治者规定也不许卖给私人,显而易见怕用来搞印刷。借用呢,向校外借没有门路,于是,只好在校内打主意了。那时一高只有几台,由学校专门机构掌管使用,没有正当的理由,是借不出来的。然而主意和时机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趁一年甲级给他们班印公用材料的时机,本来可以在星期六印完,故意拖延时间,要等到下周才能印好。中间隔个星期日,给负责管理油印机的老师说好,油印机暂放在一年甲级教室。这件事,就由当时该年級的级长张文廷负责完成,因为他也是《大地》投稿者。到了那个星期日,在纸张油墨等准备齐全的情况下,我们四五个人提前吃完早饭,按照事先的分工,待张文廷打开他们教室的门锁后,我们在那里大干了起来。油印的油印,折叠的折叠,最后分拣装订成册。经过连续奋战,到晚饭前终于突击完成了。用8开纸印成的《大地》第一期终于出刊了,共印了40册左右。这是大家思想、行动一致的结晶,是大家辛勤劳动的成果。参加投稿和爱好文艺的同学接到这个刊物,莫不欢欣雀跃。

《大地》的发刊词和编后话是李昌毓写的。为《大地》写稿的还有:孙世藩、李吉恒、高玉元、赵廷奎、关振国、李如东、王盛伦、张文廷。以上诸人当年皆为一高学生。他们之中,除孙世藩外,均于1944年5月在盖县被日伪逮捕,同年8月送至奉天第一监狱。当时还有一位社会青年——门文东也参加了《大地》投稿,并同时被逮捕。

我因忙于刻写蜡纸,没时间写稿,就顺便摘抄两天的日记作为应急。题目是《亘寰日记摘抄》:一篇是给同姓叔叔的一封信,大意是感谢他来信鼓励我好好读书。我回信向他保证,我要像辛勤的老师那样,在学习的园地上,勤于耕耘、施肥和浇水,使之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它反映出我那时想奋发向上、将来有所作为的心境;另一篇是抨击当时县城内交通秩序混乱,要求按当时的交通规则行事,一律“左侧通行”。后来被日伪当局逮捕过堂时,他们硬逼我说这是影射要人们“左”倾。

1943年深秋,《大地》第一期出刊后,参加投稿的同学以及许多爱好文艺的同学,纷纷提出尽快出刊第二期,并表示全力支持,愿刻写蜡纸,支援所用款项等。于是,我开始张罗着出第二期,并开始组稿,力争第二期的稿件质量更好些。但是,由于形势紧张,日本法西斯在战场的失利,日伪统治进一步加紧,对学校不断地进行搜查。以往多是半年进行一次大搜查,到了1943年下半年,不仅次数增多,而且是突然的、连续的,有时甚至连续进行三次。当学校门口的大钟突然被敲响时,所有的学生和绝大部分中国教职员,此时不论是在课堂上听课、授课,或在宿舍自习、娱乐,或在菜园劳动,都要立即跑步到学校的大操场紧急集合,按年次、班次排好队,听候检查。这时按日本人事前的部署进行检查:一方面,对在操场的学生进行逐个搜身,从上衣兜到裤兜,从外衣到内衣,检查是否带着或藏有所谓违禁物品;另一方面,到教室和宿舍进行有重点的翻箱倒柜的大检查。这样经常的大搜查还不算,还经常有戴着墨



秋灯书店的图书

镜的特务,闯进学校到处转悠。同学们当面不说什么,背后就骂他们是丧尽天良的狗杂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李昌毓同学研究如何出第二期《大地》,并由他去请教于家麟。于家麟的意见是:“严守秘密,提高警惕,努力工作,以待时机。”可是第二期《大地》没来得及出刊,1944年5月的大逮捕就开始了。

我参加油印《大地》

高玉元

高玉元 笔名兰丁,1928年出生,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为《大地》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退休前系辽宁省盖县第一工业局副局长。

1942年,我从本班同学赵廷奎(花喜露的学生)那里借阅了很多文艺书籍。从此,我也爱上了新文艺。这时,秋灯书店开设了,进步的文艺书刊在盖县开始广泛流传。我也曾去购买和借阅书刊,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巴金的《家》,冰心的《寄小读者》等。当时一高同学中间阅读新文艺作品已形成风气。有的同学甚至在课堂上偷看小说,有些同学开始练习写作了。李昌毓和二高的臧永昌时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而郁庆令毕业后即能从事《新潮》杂志的编辑工作,颇受同学们的尊敬。这些都在影响和鼓舞着不少同学要走向新文艺之路。

1943年10月,由四年级学生李昌毓为首,三年级学生杨士绵、二年级学生赵廷奎协助,串联十几名爱好文艺的同学写稿,自编自印,出版了《大地》。主要编审人是李昌毓和杨士绵,杨士绵还兼刻钢板,我帮助油印(借学校的油印机,自费买纸张),还搜集过稿件。

关于《大地》的取名,记得在出版《大地》的首页曾刊载过鲁迅的一段话,大意是大地上本没有路,因为走的人多了,自然踏成了路。可能是来源于此。投稿的都是一高的同学,刊登的都是新诗和散文,近20篇,我投了一篇《秋晓》,婉转地宣传反满抗日思想。李昌毓的新诗《无题》,现在我还能断续地背下几句:



伪满洲国国歌

傻孩子,你还睡,再睡——
 就不给你面包
 日未亮,天又未晓,趁着黑暗里
 燃起一把火药。
 ……
 你别看他对你好,其实——
 他暗中藏着一把刀。

这首诗当时对我们的启发影响很大。《大地》出版后,李昌毓把投稿的同学召集在一年甲级教室开会,告诉我们要经常练习写作,希望大家努力学习、互相帮助等。最后,着重嘱咐我们要好好保存《大地》,严防丢失。以后,我常听赵廷奎说李昌毓和杨士绵常去于家麟家和秋灯书店学习、座谈、研究写作。他在归州小学的花喜露老师写作水平很高,对他帮助很大等。当时,在盖县文艺青年学生中花喜露、于家麟已是颇受崇敬的核心人物。我曾读过他们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非常敬佩。由于我对文艺刚刚接触,非常幼稚,不敢高攀,只是默默地读书学习。一时间,我迷恋了新文艺。

《大地》出版后,在一高校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投稿的人逐渐增多。至1944春,已搜集到的稿件超过了第一期出版的作品,正筹备出版第二期时,听说瓦房店师范学校学生被捕了,我们急速销毁一切而停刊了。

我参加油印《大地》

关云车

关云车 原名关振国,1922年出生,伪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参与《大地》的出版和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日本投降后参加革命。离休前系吉林省体育学院教授。

1942年是日本法西斯统治东北更加疯狂的时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抓壮丁,

抓劳工,要粮食,要钢铁,无所不尽其极。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使东北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当时盖平县一高三年级学生李昌毓联络一高、二高、女高学生组织起读书会,传阅鲁迅、巴金、高尔基等国内外进步作家的书籍。进而自己编写、油印了《大地》。

大约是1943年秋,我记得是在盖平一高教学楼二楼西侧的教室里,由李昌毓、杨士绵主持,我和赵廷奎参加油印的。封面是《大地》二字,封里是鲁迅头像,像下抄录有鲁迅的一首短诗《傻孩子》,这首短诗原文我记不全了,只记得有如下诗句:

傻孩子,
你别看他对你笑,
那笑里藏着杀人的刀……

《大地》第一期共刊登一高、二高、女高20多人的稿件。我写的是一首短诗,是想通过对松树和大海的描写,抒发被奴役的悲愤心情,故取笔名松音。为防备敌人迫害,第一期《大地》所有作品都用笔名,所以在20多人中我只认识李昌毓、杨士绵、赵廷奎、高玉元、王盛伦、洪声钜。我记得洪声钜写的是一篇描写秋风的散文。

《大地》的出刊,尤其是引用鲁迅的诗句,向盖平县青年明确指出日本法西斯鼓吹的“大东亚共荣,王道乐土”纯系骗人的鬼话。用“别看他对你笑,那笑里藏着杀人的刀”,号召热血青年快快起来抗击日寇血腥统治,勇敢地投身到爱国洪流之中。

秘密传阅《辰星》《大地》

赵俊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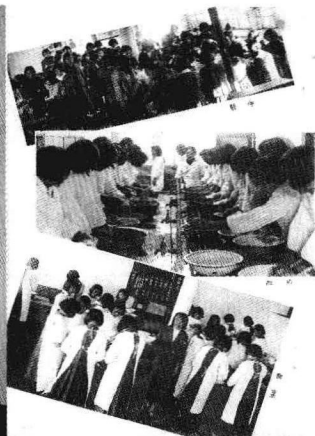
赵俊芬 女,1927年出生,伪满盖平县女子国高学生,参加读书会和为《辰星》投稿等反满抗日活动,1944年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离休前系辽宁省总工会干部,是臧永昌的妻子。

当时在盖县3所国高学校中,有的爱国学生拿起笔,用隐晦的手法写文学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但难以直抒对日寇统治的仇恨,于是,便秘密编辑油印地下刊物。

奉天第一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学生上课场景



女子国高学生家政课



1943年10月,以一高李昌毓、二高臧永昌为首,串联一高、二高、女高20余名爱国学生写稿,先后编印出《辰星》《大地》两本秘密刊物。《辰星》的“辰”字既指盖平的古称“辰州”,又有“晨”意,它的卷头诗写着:“晨星在夜空中闪烁着光芒,迎接着即将到来的黎明。”《大地》的取名之

意,是“我爱大地,大地是我的母亲”,借以反对日寇侵占东北,怀念伟大的祖国。

两本刊物在一些有爱国思想的同学中秘密传阅着。刊物充满了反满抗日的思想内容。有反抗侵略,控诉法西斯暴行的;有讽刺现实,揭露黑暗统治的;有憧憬光明,追求真理的;有抒发个人情感,表达雄心壮志的;有热爱自然风光,赞美祖国河山的。如《可怜的人》《有一天太阳会沉到底》等诗文。女高同学姜静芳的诗《卖梨人》写了在日寇铁蹄下东北人民极端贫穷、饥饿的悲惨遭遇,控诉了日寇残暴统治的罪行。我写的短诗《希冀》,投在《大地》刊物上,写一个夜行者跋涉在狂风暴雨的黑夜里,希冀着东方的曙光。

辰州的火种

姜静芳

姜静芳 笔名银燕,女,1928年出生,伪盖平县女子国高学生,积极参与《辰星》的出版和投稿,参加读书会,曾在伪满著名刊物《麒麟》上发表诗作。1944年5月被捕,1944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离休前系沈阳市公安局干部。

1943年秋季的一天,我在侯赓芝家结识了盖平二高学生臧永昌。他也是一位爱好艺术写作的同学。他说他们学校要出个专刊,约我写几篇稿子。时隔不久,我又接到一高学生李昌毓打来的电话,也约我写稿准备出学生专刊。当时我在学校住宿,学校里有电话。

我给他们分别写了几篇诗歌。记得一篇是《卖梨人》,描述在日寇的铁蹄下,东北人民那种极端贫穷、饥饿的悲惨情景,控诉日寇残暴统治的罪行。还有一篇,标题已经记不起来了,大意是飞蛾围绕烛光,宁愿烧得焦头烂额,也要投向光明,抒发个人向往祖国的决心。

当年冬天,毕业前夕,侯赓芝同学交给我两本油印刊物,一本是一高同学李昌毓主编的《大地》,一本是二高同学臧永昌主编的《辰星》。这是多么好的刊物啊!它是播种机,在辰州大地上播撒反满抗日的火种;它是燎原之火,将在辰州大地燃起熊熊革命烈火。

承前启后的一步

孙萌

1943年盖县二高由臧晶主办,一高由李昌毓主办,先后出了两本油印秘密刊物。在这上面有三个国高(即一高、二高、女高)的爱好文学的同学写的稿子。这些诗或文,不用说都抒发和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两本秘密刊物的出现,标志着盖县爱国学生的文学活动,承前启后又前进了一步。到伪满后期,这种文学活动,通过宣传爱国思想和组织团结进步力量,成为对敌斗争的手段。只是后来它的暴露,有那么多人被捕是始料不及的。但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盖县学生的秘密文学活动,使敌人是那样的惊慌,那样的害怕,像疯了一样,抓捕学生,把县城的所有能押犯人的地方都塞得满满的。当然,这不是偶然的。20世纪50年代,过去一起住狱、当时在外交部任日本科科长陈抗,押送一批日本战犯来沈阳受审。当时我在《东北日报》工作,他来看我,他说这批战犯就有主审我们案件的特务股长前渊,据他交代,这是在日寇投降前夕最大的一次案件,他们把这个案件叫“桃园事件”。我在另一份资料里看到是“桃园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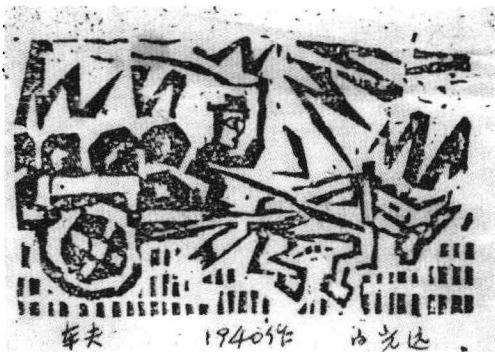
于家麟提议开书店

王锡成

《营口新报》上的《星火》副刊停刊以后，田贲去了沈阳。1941年，于家麟等几个“星火”同人又把《行行》移到哈尔滨《大北新报》的副刊上公开发表，年末因日伪特务制造了“一二·三〇”事件，《行行》也被迫停刊了。于家麟就到长春去办出版社。1943年夏，于家麟从新京（长春）回到盖县，找到在盖县的“星火”同人研究，要重新组织反满抗日的宣传阵地。

1943年中秋节前，驼子向我们提议，为了继续把同人扩大，也为了安排一位老同乡商人李勤甫的生活，想在城内开办一个租书店，连租带卖，作为我们活动的据点，会起到一定作用。记得中秋节的夜里，驼子、门文东、张克恩、李昌毓和我到王克范的学校，

这时克范已调到



他的家乡永安屯学校教书，一起研究了开租书店的事，议妥大家集资，驼子多拿点。当晚我们是秉烛交谈的，所以给书店起了个名字叫“秋灯”租书店。借阅图章是由驼子设计的，辰州（盖平县的古称）版图做底衬，点着一盏古式油灯，灯花熊熊四射，既雅致又有意义。不久，我们在城内伪道德会的门洞北侧，租到一间房子，“秋灯”租书店成立起来了。

中秋赏月办书店

门文东

在于家麟的领导下，一些“星火”同人深入到盖平县第一国高、第二国高和女子

国高去联系新的同人,经那里的毕业生、“星火”同人张吉宽、郁庆令的介绍,发展了一高学生领袖李昌毓、二高学生领袖臧永昌、女高学生侯赓芝等一些新的“星火”同人,盖平县几个国高里的学生于1943年8月份又开始油印反满抗日的刊物。一高油印出版了《大地》,二高油印出版了《辰星》,女高学生也向这两个刊物投稿。写稿的进步学生很多,又增加了不少“星火”同人。于家麟等人想开办一个书店,作为传阅进步书刊、联系更多同人的阵地。

一天傍晚,我刚刚吃过晚饭就回到香铺账房。这是我的习惯,有事没事,只要吃完晚饭,必定再回到香铺账房来,或看书看报,或练字练写文章,每天都要10点以后才能回家。我家就在香铺的西邻,中间只隔一个大门,来去很方便。于家麟和我住在一个院,也是香铺账房里的常客,因为于家麟是这个香铺的股东,天天来也不引人注意。我们就利用这种条件,经常请“星火”同人到香铺开会。当时香铺的大掌柜胡乾乙老先生,是一个同情和支持反满抗日爱国活动的开明人士,他知道于家麟我们在香铺里的活动,不但不阻拦,还提供了很多方便。后来“星火”同人被捕,胡乾乙老先生也受到了日伪特务的刁难和摧残。

这晚,我刚刚坐下,于家麟就进来了。紧接着王锡成、张克恩也跟了进来,柜房的伙计一看这个形势,心里就明白了。因为这些人都是常客,往往一来不是开会,就是研究怕别人听到的问题。所以他打了一个招呼,就到下屋工友住的房间里去休息了。

于家麟往炕上一坐,就开门见山地说:“锡成和克恩是我特意请来的,咱们还得研究研究开书店的事。现在日伪特务控制非常严,想要公开出刊物很困难,开书店是个好办法……”

王锡成没等于是于家麟说完,就急忙接茬说:“说开就开,还老研究什么呢?再不建立个据点,我们‘星火’同人就没有‘老家’了。”

接着我们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对开办书店的资金问题、经理人的问题、地点门市问题和怎样活动问题进行了研究。一直研究到后半夜。最后于家麟说:“这事还应当请克范和李昌毓、臧永昌参加研究。那些在外地的同人就不用请来研究了,办成以后再通知他们去。八月十五快到了,我想利用王克范他们学校放假的机会,大家都到他那里去,最后决定开书店的问题。”

1943年的中秋之夜,于家麟、王锡成、张克恩、李昌毓、臧永昌和我,有的带月饼,有的带苹果,有的带葡萄,傍晚之前先后来到王克范工作的永安屯小学。当时学生都放假了,老师们也都回家过节了。王克范自从接到于家麟的电话,说中秋之夜一些同人要到他那里“赏月”,他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星火”同人要集会。所以这天师生

们一离校，王克范就把做会议室的教室布置起来。首先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四个美术字——“中秋赏月”，接着把十多张学生书桌并在一起，还特地从家里摘来了苹果和葡萄，又准备了十多支白蜡烛，每个人前面都给准备一支。这是他们每次夜间开会的习惯，主要是防止突然空袭警报而断电。

于家麟一走进教室就风趣地说：“好闷气的排场呀，又准备这么多的蜡烛，有什么说道吗？”

“今天我们赏月，干脆就不点电灯啦。”王克范说。

“那也用不着一个人面前点上一支呀。”于家麟向窗外看了看说，“天上有月亮，屋里点上一两支就可以了嘛。”

王克范一本正经地说：“我这个主人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各位同人，只想叫每个人都心明眼亮一些，所以就每人给准备了一支蜡烛，你们如果拒绝了，就实在叫我难堪了。”

于家麟幽默地说：“主人真是用心良苦啊，既然有这样的苦衷，那我真是却之不恭了。来吧，咱们都点起蜡烛来。”

大伙一边说笑一边拿出他们各自带来的好吃的东西，接着就把自己座前的蜡烛点着了。还真有点欢庆的气氛呢。

王锡成突然警惕地说：“这样大声地说笑，这样明灯蜡烛地点着，不会引起外人的注意吗？”

“放心，就是再加上大喇叭，也无法叫别人听到。整个学校，除了操场南头大门口的传达室里住着一个打更的张大爷之外，再无别人。如果说还能有谁偷看我们的活动，偷听我们的说笑，那只有后面的大山啦。”王克范说。

我们首先研究书店资金的来源问题。我估算了一下，租房子，添些必要的设备，雇佣经理人，购书成本和活动资金，加在一起至少要先准备出200元现金。于家麟说：“开书店不比出刊物，出刊物不用租房子不用雇人。这次开书店要比以前印刊物的花费大得多啦，我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得靠大家来想想办法。”王锡成说：“我们大家来集资，都来当书店的股东，当然是赔钱的股东。”

张克恩放下手里的苹果，神秘地说：“我还可以动员日本人出些钱。”大家一听就会心地笑了，只有李昌毓和臧永昌两个学生有点莫名其妙。其实，盖县“星火”同人多年来的活动，日本人是拿了不少经费的。张克恩管的兴农合作社仓库，就是我们的“银行”。一到经济困难时，就把兴农合作社仓库里的东西卖上一些，这就是日本人的“赞助”。

于家麟说:“大家要量力而行,不能影响生活,多少不限。我先拿出100元,作为开办书店的紧急之需,先把书店开起来。”我说:“家麟先拿出100元,我们马上可以着手租门市、买设备,购进一部分书刊。等大家集资和日本人‘赞助’的钱上来了,有多余的再退给你一些,以免你负担太大。”除了于家麟外,都靠工资养家糊口,每人拿出10元钱。李昌毓、臧永昌还是学生,也主动拿了钱。

圆月已经升到中天,山村、大地、岗峦洒上一层银辉。看到这景色,有的吟起诗来。王克范拍案而起,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

过了好一会儿,于家麟又把大家请回了原座,感慨地说:“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条件尚不成熟,为时尚早,我们还是来研究书店的问题,大家看看请谁来做经理人好。”在座的同人都不适合做书店的经理,因为书店的经理人若是一个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马上就会引起日伪特务的注意,对于书店的工作很不利。于家麟提出请歇业的老商人李勤甫来做书店的经理。他是盖县城里的老买卖人,市面很熟,人缘很好,又善于经营。李勤甫和于家麟还有些亲戚关系,论辈分,于家麟还得称其为表叔。我和王锡成也都认识李勤甫。经过大家决定,由于家麟出面去请李勤甫出任书店经理。

关于书店的门市问题,王锡成多次奔走,现在已基本有了着落。有一间门市,一间后屋,就在城里鼓楼北路西,伪满“道德会”的旁边。那地方是个比较繁华的商业区,人来人往整天不断。前屋卖书,后屋住人,每月房租要5元钱。

事先谁也没有想到在书店的字号上讨论的时间最长。这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字号上费了不少劲。有的人提出叫“勤学书店”,有的人提出叫“奋进书店”,等等。大家提来提去,反复推敲,都觉得不能尽如人意。大家认为这个书店的字号既要有深刻的革命含义,还不能太锋芒毕露;既要让人们一看就能认识和记住,又不能落入俗套;同时还得使自己人一看到书店的名字就受到鼓舞,又不能让日伪特务嗅到什么味道。

于家麟久久地看着眼前蜡烛跳动的火焰,又不时地看看窗外的夜景,提议说:“我们这个书店,今天就是成立纪念日,今天正是中秋节,我们秉烛在这里研究书店的问题,我看就叫秋灯书店怎么样?秋天是丰收的季节,预示着我们的工作将取得丰硕的成果,灯能在黑暗中给人以光明,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这和我们以前印发《行行》《星火》和现在一高、二高同学们油印的《大地》《辰星》还有些内在的联系。鲁迅在他的《秋夜》一文中提到,灯可以照着他读书写文章,让我们的‘秋灯’也照着我们读书写文章吧。”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这个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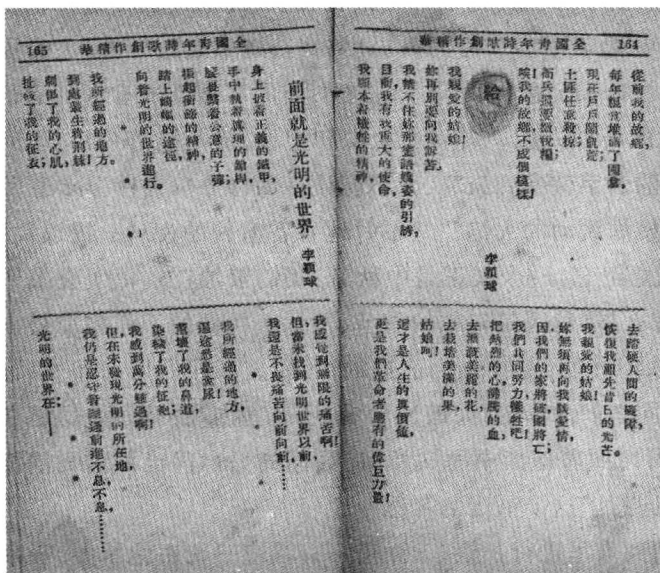
会后,于家麟把李勤甫请到家里进行长谈。李勤甫一口答应一切由他承办。于家

麟嘱咐说：“大叔，我们那些人谁也不能出面，一切只能在暗中工作，将来到店里去就是你的顾客了。”“好，好，你们在背后支持我就行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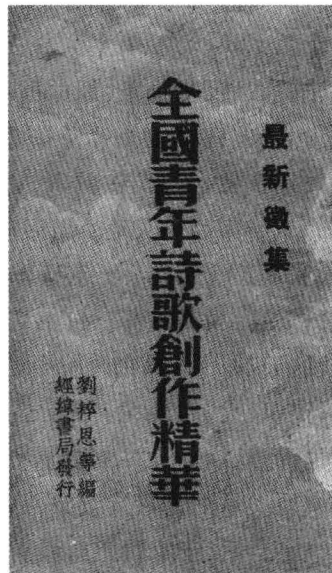
就这样，没过半个月，“秋灯书店”的招牌挂出去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招来了好多看热闹的人围在书店门前，一些李勤甫的老同行出出进进来为他祝贺。这些表面文章做得和其他买卖开业一模一样。店铺的书架上摆的都是《三侠剑》《大八义》《小五义》和《金粉世家》《啼笑姻缘》之类的书。任何汉奸特务到这里来，也看不出什么破绽的。可是书店的后屋，李掌柜的炕柜里却装满了王锡成从奉天地下书店买来的各种各样的革命进步书刊，还有郁庆令托鲁琪从新京亲自送来的各种革命进步书刊。其中有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灭亡》、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还有外国翻译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复活》、杰克·伦敦的《深渊下的人们》等文艺作品。也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及《社会发展史》和各种进步报刊杂志。这些书刊并不是公开出售的，只能由于家麟等“星火”同人介绍来的读者，才能从李勤甫的后屋看到这些书。

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把书店办得更好，于家麟又和我等几位“星火”同人研究了办书店的分工问题。除了李勤甫做公开的经理人外，一切和书店有关的事务由于家麟总负责，王锡成负责采购书刊和对外联络工作，李昌毓负责一高学生的借阅工

秋灯书店出售的图书《全国青年诗歌创作精华》(民国36年再版)内容



秋灯书店出售和借阅的图书



作,臧永昌负责二高学生的借阅工作,侯赓芝负责女高学生的借阅工作,门文东负责社会青年的借阅工作和一些财务工作。

就这样,“星火”同人利用秋灯书店,在盖县警察特务的眼皮底下,进行着出卖、借阅和传递革命进步书刊的工作,起到了推动盖县爱国青年学生反满抗日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于家麟为书店起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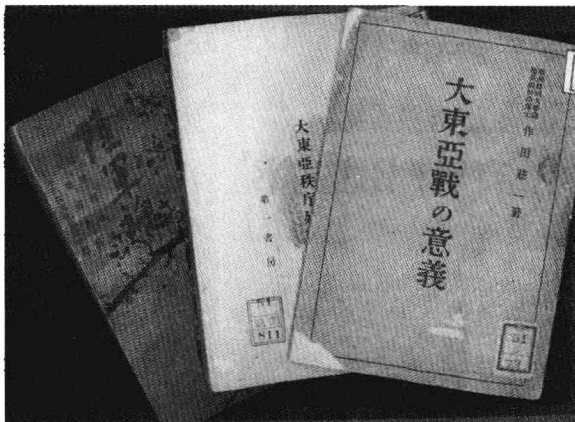
臧永昌

读书和写作的队伍形成了,而且建立在爱国的思想基础上,并拥有许多进步的书籍,这就具备了成立一个抗日爱国的读书组织的基本条件。秋天到来时,于家麟、王锡成、王矜人、李昌毓和我研究决定成立“读书会”。在这个秘密的爱国组织中,传阅进步书籍,交流读后感,密切友谊,相互勉励。我们确定,和这个组织发生关系的,必须可靠。实际上,读书会成立之前,它的活动已进行了,在 20 余人中传阅了百余本进步书籍。

不久,于家麟、王锡成、门文东、王矜人又找李昌毓和我,筹划开办一个书店。于家麟为书店起了名,叫“秋灯”,象征着希望和光明。资金由朋友凑集而成,于家麟出得多一些。经理是于家麟请来的他称之为表叔的李勤甫。老先生 50 岁左右,宽厚实



“秋灯书店”图书



“秋灯书店”里宣传“大东亚圣战”的图书

诚,办事细心。店址设在城内鼓楼北路西,和伪满“道德会”毗邻。它铺面不大,前屋租售言情、武侠、公案小说,后屋藏有进步书籍,借给相知的朋友。于家麟、王矜人家里藏书多,向书店供应;铁汉在长春通过益智书局姓邵的同乡购书,交华青放假时带回盖平送到秋灯书店。秋灯书店的开办,为古城的文化生活添了一道光彩,为读书会的朋友们提供了见面、交谈、联系的地方。

拿五元钱参加书店

李吉恒

1943年暑假,我的同班同桌李昌毓问我:“你拿五元钱参加书店干不干?”我说回家商量商量。因为我家住农村,很穷,所以也没拿钱。他说:“那也好,以后就常去书店看看,有好书就借着看。”实际这个书店就是“秋灯书店”。外面摆放的都是些武侠小说,里屋才有文艺小说,我们可以借看的。当时李昌毓就曾借给我歌德的《浮士德》,还有《北京人》等。在我们三年级乙班的几个同学中,以李昌毓为中心,组织我们写稿,向长春的《新满洲》杂志投稿,还真的发表了。我记得我写的一首诗《北风》就发表在那上面。当时我的笔名叫毅夫,李昌毓叫舒啸,孙世藩叫舒展,门恩义叫泥牛。也就在这一年,我们都写稿并在《大地》《辰星》这两个秘密的刊物上发表了。因为这两个刊物是三个国高部分同学共同办的。当时我记得是二高的臧永昌负责刻版印刷。女高也有人参加,每个人还都发了两本。

给秋灯书店买书

铁汉

郁其文 原名郁庆令,笔名铁汉、苏生、芷莎郎,1923年出生,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参加“星火”反日活动;毕业后去新京任《新潮》编辑,1944年4月被捕,被判10年徒刑。1945年8月19日出狱后,曾到盖平县于家麟的国民党县党部任宣传科干事,后任中共沈阳城工部学联秘书、《沈阳日报》编辑,1957年被错划为

“右派分子”,在遭受迫害下乡劳动改造的恶劣条件下保存花喜露手稿,改正后任《沈阳日报》主任编辑、辽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一个军官与两个隐身女》、《神秘的红叶》等长篇小说。1997年去世。

1943年春,我到长春在《新潮》月刊当上了编辑。我利用我的编辑权力和人事关系,为驼子、李昌毓、臧晶、银燕及盖县三个国高学生发表作品,在《新潮》和《新满洲》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驼子的诗《小驿》,发表于《新潮》上,应视为他的代表作。这首诗写一个抗日战士远出归乡,在小驿下车后目睹故乡凋零残败的景象愤而重返抗日地区的情绪,不论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很强。可惜这期《新潮》失落了,不能示给后人。

1943年秋天,接得驼子寄来的钱,求我给他开办的秋灯书店买书。我这才知道有这个书店,他未明说,我也料到用意何在。正巧长春益智书店主管销售的邵某某是盖县同乡,便通过他把益智书店库中长期不敢出售的进步书买了六七十册。怎么给他呢?邮,怕查出来,露了马脚。恰巧在王道书院读书的鲁琪要回盖县,便托他捎回,亲手交给驼子。

我和鲁琪是因编者与作者的关系而相识,因为是同乡而相近,更因为爱国而成为知己。鲁琪在《新潮》上发表过一篇小说,写一对反封建的青年最后出走到远方去,暗示投奔抗日联军。小说发表后,伪满“首都”警察厅的日本特高科把我“请”去,质问我为什么发表这篇作品。让我说出作者的名字和通讯处。我说不认识作者,记不得地址了。特高科斥骂我一天,半夜才放。事后通知《新潮》月刊社长要负责监视我这个“思想不良”的左倾分子,年终我就被辞退了。

这场几陷囹圄的灾难,反而使我和鲁琪成了莫逆之交。我的托付,他视为义不容辞。拎着两大包禁书,毅然登上火车,到秋灯书店交给了驼子。诗人驼子与鲁琪从此产生了友谊。不料,日本特务追查秋灯书店书籍来源时,鲁琪被查出来,于是,他成为盖县爱国文艺事件的一员,更因



“秋灯书店”里上海出版的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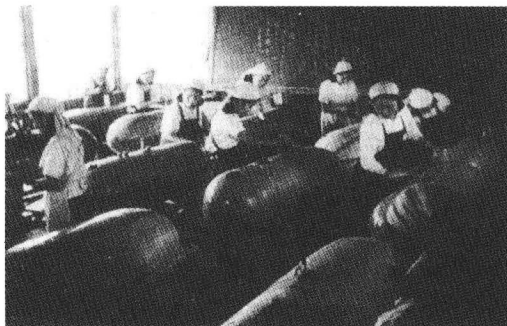
他有反日作品,而成为被判刑的成员之一。对盖县青年爱国抗日斗争一切均不得知并毫无联系的鲁琪,是我将他牵连进来。但是,他是盖县青年,他是个反满抗日的爱国者,他和我们共过患难,我们回忆这段历史时,又怎能忘记他。

胡同口那个小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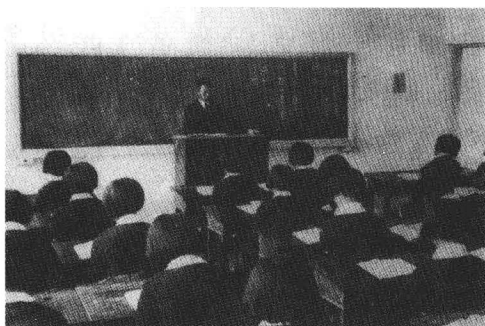
孙萌

我想起离我家胡同口不远的那个小书店——秋灯书店。我从秋灯书店借过书。前屋一排书架上摆的是对外出售的一般书籍,我借的书自然不是书架上的。我记得有果戈理的《死魂灵》、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还有《丹顿之死》,手抄本《千人针》(写日本人民反战的)等。我敢说那是当时我们读书的一个书源。书店只有一间门市,前屋经营的全是日本当局许可的一般书籍,既卖又出租;里屋则是藏龙卧虎之处,他们搜集了当时禁读的进步书籍借给进步学生看。有人回忆说“当时秋灯的进步书都藏在掌柜的炕柜里”。这些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我看到的那些书,包括左倾进步的书,有很多是来自这个渠道。小书店取名“秋灯”,“秋天夜里的一盏灯”。在那个日本帝国主义毁灭文化、毁灭教育的黑暗年代,在漫漫的黑夜中,这个小书店,说它是一盏灯,是向光明摸索的一丝光亮,是名副其实的,一点儿都没有夸大。应该说,它的确像秋夜里的一盏灯。办书店的人,是想用这盏灯照亮人们的心,照亮暗夜中的路。

读书活动,通过阅读进步书刊,把进步学生从思想上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反帝



女学生在“勤劳奉仕”



女子国高“国民科”课课堂

反封建的革命力量,有的则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和影响,书对我的思想影响的确是非常大的。因此,每每回忆起那段岁月,我首先就想起读书活动。那就像一团火,燃烧起我们的革命热情。

门文东常借给我书

汪士硕

1943年初我从营口国高毕业了,分配到盖县兴亚银行工作。这年秋天我和王锡成、于家麟等人一起到营口县桥台铺王克范的家里取书,每人都带回来很多书,其中还有日文的,如《亚细亚讲座》等。还有一本是《政治军事篇》,书里有插图,从图中我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照片,里面还有一页有蒋介石、汪精卫的照片。这些都是买不到的禁书。后来我知道那都是为开秋灯书店准备的。

门文东在馥馨香铺当会计,与我工作的兴亚银行有工作上的联系,他常到银行来办事,在开设秋灯书店时,他让我集过资。以后他就常借给我书看,还让我写读后感。后来我才知道,门文东是读书会的社会青年负责人。这时我的思想和“星火”同人更一致了。1944年春,我调到盖平县大巴岭小学教书,当时全县小学教师在万福庄集训,王克范老师是我们的班长,每天领我们出操。日本人规定一切口令必须用日本话喊,可克范老师偏用中国话喊,把日本教官气坏了,上去一脚把他踢倒在地,接着又打了好几个嘴巴。但坚强的克范老师还是用中国话喊口令。

六、读书活动

读书活动背景

李昌毓

我们年轻的时候,条件非常差,可是大家读书的热情却非常高。得到一本书不容易,到十里八里外去取书,一点儿不觉得累。下一个阅读者催得紧,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抢着读。住校生夜里偷偷点个小煤油灯,真是灯光如豆,那才真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现在的年轻人可好,学习条件那么好,读书却很被动,没有热情,缺少动力。我看到孙子这样子,很不理解,责怪也没用。我们那时候是为了求知而读书,现在的学生是为了考试而学习,难怪不一样。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发动“大东亚圣战”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

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气势汹汹,数月间接连攻占了我国香港、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新加坡等重要城市。日军每攻占一个城市,日伪当局都要在当天晚上举行所谓“祝捷大会”,强迫学生和市民参加,并且要游行庆祝。这一冬春的天气十分寒冷,冻得浑身直打战,脚和耳朵都出现冻疮,特别是心里根本不愿意小日本在战争中胜利,对那些祝捷讲话根本没有心思听,也一点都听不着。祝捷会的最后要分别用汉语和日语三呼“万岁”,在用日语喊“万岁”时,我们实际上喊的是日语“万岁”的谐音“半载”,那意思是小日本不用咋呼,用不到半年就得完蛋。

果然,到1942年6月就看到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攻势作战的失利,报载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随后,美军在阿图岛全歼了日军山崎联队,联队长山崎保代被打死,报纸上报道消息的同时,公布了日本统治当局将这个送死疆场的法西斯军官奉为“军神”。这两次失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极大的打击,明显看出小鬼子是“颓”了。此后,一再举行的不是祝捷会,而是追悼阵亡官兵的所谓“招魂

祭”,气氛低沉,再也不喊“万岁”了。

1943年9月,报载意大利巴多里奥将军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随后俘虏了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德、意、日轴心国鼎足的一条腿断了一条,站不稳、站不住了。那一年还接连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日本联合舰队的两个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和古贺峰一先后在南太平洋丧命,我们内心里都庆幸日本海军的老本联合舰队完蛋了。此后,报纸上报道日本生产出了新的战斗机“神风号”,日本飞行员驾驶这种飞机直接撞美国军舰,这些为日本天皇效命的人都被奉为“军神”,隔几天就报道一批,我们知道这是小日本快要垮台的记录。

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同学开展读书活动。我上一班同学郁庆令,笔名铁汉,是我爱好进步文艺的第一个启蒙者。我们思想一致,志趣相同。他使我同进步文艺和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写作上同现实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铁汉性格刚毅,作风朴实,为人耿直,态度和蔼可亲,不骄狂自傲。对朋友热情真诚,乐于助人,说话直率,光明磊落。他经常借给我们书看,也经常向我们介绍自己的写作体会。他沉默寡言、善于观察,沉默使他思索入理,观察使他运笔奇妙。他敏而好学,创作思维活跃,勤于写作,报刊杂志上经常刊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文笔流畅、生动简洁、清新活泼、立意新颖、风格明朗,颇受欢迎。其作品形式多样,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也有杂文,不论哪种形式,都紧紧地与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以促进民族的觉醒。他的文章多用苏生、芷莎郎、铁汉等笔名发表。他在伪满进步青年作家中是比较有成就的一个。他对盖平县学生进步文艺活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殷拳领我走进杂货铺

铁汉

我们上一班同学殷拳(张吉宽)与我们互相传书和都在报上发表文章而成为好友。我随后知道他周围有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如刘永良(刘英)、刘兆祺、吴鸿显(吴山)等。殷拳给我留下一种成熟、有见解的印象。那时,我在心中认为改动“国歌”者必是他们。唱了半年多,学校中的日本人并未发觉,却有一个姓侯的教师听出了异样。于是每当学生唱“国歌”他便竖起耳朵走到学生中间。其实,他是愚蠢的,学生们很聪明,他走近时,唱原词,走远了,便唱改动的词。这令他大为恼火。于是他报告给日本

校长,日本校长便杀气腾腾下来查,结果仍徒劳而归。

我对侯老师的行为很气愤,见之便怒形于色,这家伙便想到在报上常写文章的铁汉,怕不是这小子吧。于是对我格外注意。过了一段时间,把柄没抓到,栽赃我不认账。有一次,他硬是找茬打了我一顿,我悲愤交加,想弄把枪打死他,再把盖县日本县长杀掉。我向殷拳谈了我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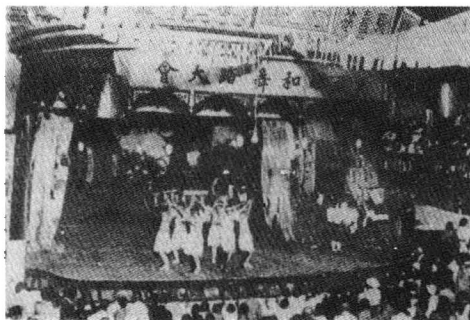
“你想做巴金《灭亡》中的杜大心吗?”殷拳像大哥哥那样笑着,“你打死一个汉奸,还有另一个汉奸来干,你把这一个日本县长打死了,会有另一个日本鬼子来当县长。而你自已说不定被人家捉起来,杀死了。”

短短数语,顿开茅塞。我叹道:“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这,我可担当不起。这些话,都是花老师教诲的啊!”于是,他讲了花喜露怎样教育他认识社会、认识真理的几件事情,我对花老师肃然起敬。

1940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殷拳领我走进盖县东门里一家门面很小的杂货铺。这是于家麟当股东的振兴东杂货铺。拐进里面一间光线微暗的房间,室内坐着两个30岁左右的人。殷拳介绍这就是花老师和驼子。花老师紧紧攥住我的手,极其亲热地把我拉到他的身边坐下。

这次会面与谈话,应当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开始,花老师像唠家常似地问我的家庭情况、个人情况、都读过什么书。驼子并未插言,但是当我提出要当作家的理想时,他俩都同我攀谈起来。这次谈话内容十分重要,至今回忆起来也没发现花老师和驼子有何观点分歧。他俩循循善诱地启发我,写文艺作品不是为自己争名夺利,不是无病呻吟,不能搞风花雪月,不能出卖人格去写庸俗黄色的作品,文艺应该是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现在文坛(指伪满洲国文坛)出现论争,有的说为艺术而艺术,有的说为生活而艺术。后者是正确的,文艺就是要表现生活、再现生活、暴露现实、指导时代。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做大众的代言人。



“民族协和”舞蹈大会

这是一次从为文到做人的重要启蒙。他俩谁也没讲反满抗日,更没讲政治党派,但他们的观点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

他俩答应借好书给我看,并接纳我参加“星火”活动,共同切磋写作,并可在《星火》上发表作品。从此,我从殷拳那里,读到了花老师转来的大量革命书刊。如《大众哲学》

《联共党史》等。从驼子那里借到了《跋涉》《母亲》等大量进步书籍。我对《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这一类马列主义书籍读不懂、啃不动,看了一半便放弃了。尽管如此,我的思想确实有了不小的提高。如从《大众哲学》中我懂得了人活着就是要斗争,要追求真理,要改造世界,为实现全人类的幸福而献身。又如看了高尔基的《母亲》,懂得了只有被剥削被压迫者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从事地下革命斗争,才能推翻不合理的旧制度,建立人人平等自由的新社会。这些书拨亮了我的眼睛。那种不甘做亡国奴、不甘忍受封建统治的反抗情绪和要求民族解放的爱国热忱燃烧起来了。

过去,我反满抗日的思想是模糊的、不自觉的,这时也变得明确了、自觉了。

于是,我写出了《打铁歌》一诗,发表在《营口新报》的《星火》副刊上。原诗查不到了,凭记忆,开始有这样的诗句:

叮当叮,叮当叮,
让炉火燃烧得通红,
我们不怕流血流汗,
要从黑夜打到黎明。

接着便有“赶走跑进家园的豺狼”之类词句。

不久,我在振兴东那间小屋里第二次见到花老师和驼子。花老师微笑着望着我说:“铁汉哪,你这个铁打的好凶啊!”我不知是褒是贬,羞红了脸。他亲切地拉我坐在他身边,非常含蓄地和我讲起来诗贵意境,诗贵含蓄,而切忌直白。驼子接着讲了如何运用象征,如何起兴、比拟、夸张等。这些话看似平常,我全心领神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统治,我们写文章太直太露,特务们会发现的,那样就是自我暴露了。

“善于保存自己,才能善于打击敌人。”驼子这句话,我至今还记得。这比我过去懂得的“小不忍则乱大谋”还要深刻。

花老师问我有没有要好的同学。我说有几个。他建议我和要好的同学秘密组织读书会,互相传书、讨论、研究写作。人不宜多,必须可靠。至于为什么要秘密,他说:“因为日本人搞愚民政策,不让我们读进步书,如果公开就会被当做思想犯抓起来。经过学习,同学们慢慢就会明白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怎样热爱自己的祖国了。”这次会面,驼子还就读书会的传书方法和讨论问题及联系问题讲了许多。我因为读过《母亲》这本书,自然明白他俩是地下革命领导人。我参加了地下斗争,当然是革命了。告别他们二人归来,我顿觉我的人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我铁汉从此是一个爱国

战士,是个革命者了。

自豪的同时也产生了恐惧感。一旦被日本特务发现,会被杀头的。然而一想到与其为奴隶苟且偷生,不如为自由英雄而死。诵起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名诗,便觉得我应无愧于“铁汉”二字。

读书会——爱国——革命,硬是被我串联在一起,因为他俩谁也没讲什么主义,连一点暗示都没有。我想他俩看出了我政治上的幼稚。

这次“交待任务”是冬天。临分手时,他俩通知我寒假时去尚和寨小学王克范那里去参加“消寒雅集”以文会友。我高兴地答应了。不料寒假时因为家庭“逼婚”遗憾地错过了这个良机。

要把读书会建立起来,首先在我们盖平一高同学中物色对象。那时,铁汉这个笔名经常在报刊上出现,所以,盖县二高便有同学羡慕我这个“小作家”,主动和我交朋友,“请教”我写作方法。

和我最好的朋友,便是下一班同学李昌毓。通过他,我又认识了孙世藩、杨士绵、李吉恒、高玉元等人。后来,我未见过面的都由李昌毓做了详细介绍。书是由驼子、殷拳那里传来的。我对李昌毓除了未交代花老师和驼子及之间关系外,有关写作问题、

日本殖民当局拍摄的辽南农村打场场面



人生问题、爱国问题,都是把他俩对我的讲话照本实发。

李昌毓的写作水平与爱国觉悟提高得很快。一高的读书会被他领导和组织得很出色,杨士绵与孙世藩成了他的左膀右臂。

一高读书会的成功,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只有更多的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反满抗日的斗争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啊。于是我就把目光投到盖县女高和第二国高校园中去。

盖县女高的姜静芳(银燕)和我有通信联系,是个文友。我除了让她联系爱好写作的同学共同读书外,也愿意让她负责把女高读书会组织起来。由于某种客观原因我们始终未见面,读书会的深入问题无法在信中谈及。但我们心有灵犀,总是多少会在文艺中表现自己热爱祖国的感情。银燕身边的孙荫、穆玉琪、张慕兰等五六个人,我都清楚。

接着便是通过盖县二高的臧永昌(臧晶)组织了读书会。他的写作水平与爱国觉悟提高得更快,当时令我非常惊讶,后来才慢慢明白,是由于他和花老师有了接触等原因。二高的读书会,我记得除了周建涛、于恩惠外还有几个同学。这些学生后来之所以成为爱国抗日运动的中坚人物,就是因为有了读书会的基础。

学校越来越乏味

李昌毓

1940年的春天来得很迟,而且非常寒冷。我刚踏进海城日本语学院,便接到家里寄给我的信,说我被盖县国民高等学校录取了,让我去报到。我向院方提出了退学,就返回了家乡。

来到盖县国高后,学习内容多了,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这所学校是农科,学制4年,毕业后可以考大学。除了学习国语、地理、历史、数学和日语外,还学农业、畜牧、兽医、林业、园艺、植物等课程。此外,还设有国民道德课。从课程设置看,既不像中学又不似中专,更非职业学校,完全是殖民地的教育体系,十分畸形,是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的。学生学的知识既片面又不系统,而且,历史课程和其他课程中的一些课文纯属捏造和歪曲史实。在语文和日语教材中称中国是“支那”,不讲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只讲“满洲国”是附属于日本国的,满洲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有钢铁、煤炭、大

豆、高粱等。教育学生要热爱“满洲国”并为之效力。说日本天皇和满洲“皇帝”是神的降临,主宰世界。臣民和学生对皇权要绝对信奉和遵从。

日本以工业发达的民族优越感自居。他们说: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秀的民族,独立在世界上。满洲人工农业生产落后,头脑不开化,需要日本人帮助开发“满洲国”,使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国民生活大大地好起来,这就是“日满亲善”,帮助“满洲国”建立“王道乐土”的国家。

日寇为了长期霸占和统治东北人民,除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控制外,还在文化上对东北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从小学三年级到国民高等学校,都开设日语课。使东北青年一代经过奴化教育精通日语和熟悉日本民情,以便变成日本的奴仆,成为帮助日本统治东北人民的工具。《本国地理》只讲东北一地之地理,《本国历史》只讲东北满族的发展史,而《国民道德》讲的却是孔孟之道,日满亲善,甚至胡说伪满皇帝之始祖是日本的天照大神,而溥仪则成为日本天皇的儿皇帝了。把关里、关外截然分开,使学生不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更不知道自己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其目的就是向学生灌输奴化教育,为日本帝国及其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效力。并且日本老师规定不许使用汉语喊口令,必须改为日语口令,随后立即应用于所有课程的课堂,连日常的朝会等集体活动的整队甚至军事教练的所有口令都必须使用日语,整个伪满时期的所有学校都是这样。一切场合对人员点名都必须用日语“哈伊”应答,犹如汉语“到”的意思。伪满时期的许多官方文书中使用了相当多的日语汉字词汇,例如强制征收粮食叫“出荷”,商量问题叫“打合”,接受办理事务叫“受理”,管理登记签到叫“受付”,火车票、船票叫“切符”等。伪满后期颁布的各科教科书,尤其是所谓的《满语》教科书里,不仅大量掺进日语汉字词汇,而且掺杂了相当多的日语假名词汇甚至语句,当时人们称之为“协和话”,既非日语,亦非汉语,其目的显然是要消灭汉语,进而消灭汉族,这就是日伪强制推行的所谓“满语”的真实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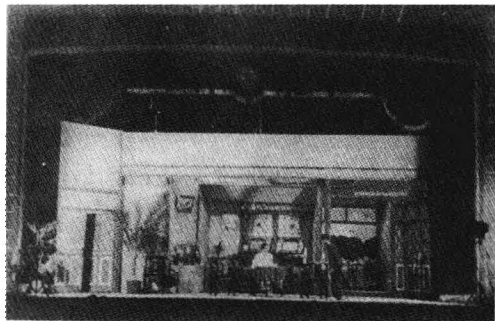
学校设有农场,每个年级都划有土地,种植谷物和蔬菜,还饲养牛、马、猪、鸡。学生轮流到街上卖菜。学校设有教官,实行军训,学生穿着规定的制服。在街上,低年级学生见到高年级学生必须敬礼,不敬礼挨打活该,这种法西斯教育还美其名曰“阶级服从”。提倡“绝对服从”是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一级压一级,一级服从一级,下级服从上级,最后全民服从伪皇帝,伪皇帝服从日本天皇。天皇是至高无尚的,是上天派到人间统治一切的。服从是“绝对”的,不准问为什么,叫你咋样就得咋样。在学校,低年级学生要服从高年级学生,校外相遇要敬礼,如果是早晨上学时相遇,敬礼的同时还要高喊“欧要斯”(日语早安)。哪怕你是从后边超越到前面去,也要这样做,不然要

挨打嘴巴的。一年级小孩没人太理会你，四年级学生专打三年级学生，三年级学生就拿二年级学生出气，二年级学生是挨打最多的学生，每到年底快毕业时四年级学生就开始紧张，甚至毕业典礼刚完，三年级学生就开始报复，特别对平时爱打人的毕业生，群起而攻之。如此反复，循环不已。我比较老实，四年中只挨打两次，一次是在队列里说话，没注意被从后边过来的“值周生”（四年级）捅了一拳，差点把我打趴下，好在没打第二拳，算我幸运。那时人们的思想都麻木了，挨打是家常便饭，谁也不笑话谁，但还未泯灭反抗报复心理，所以给老师起外号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也算是一种精神安慰。

军事训练受到特别重视，每周4节课，配备3名教官。训练严格、艰苦，像正规部队一样搞法西斯那一套。从单兵教练开始，队列立正稍息，战术有射击、投弹、刺杀、劈刺等，直到战术班、排的攻防。夏天毒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冒油，冬天下大雪全身一片白，常常有人在队列中晕倒。

朝会，星期一和下雨天在大礼堂，其余时间在大操场。星期一比较隆重，全校师生员工全体参加，礼堂正面是日满两国国旗，先唱日本国歌，后唱满洲国歌，由校长用日语宣读《回銮训民诏书》，再由教导主任用“满语”宣读：“朕自登基以来，极思恭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夙愿克遂，朕与日本天皇亲如兄弟……”是溥仪访日回国后颁发的训民诏书。从此日本国从友邦就升格为“亲邦”了。“亲”，日语读“欧牙”，是父母之意，日本国就成了“满洲国”的父母之邦了。向皇室遥拜也是先向日本帝宫遥拜，后向满洲皇宫遥拜。凡此种种都是日本在先，满洲在后，日满亲善。最后校长训话，无外乎为大东亚圣战读书，报效皇室、报效国家之类套话。

学校实行“勤劳奉仕”制度，经常迫使学生参加劳动。“勤劳奉仕”就是义务劳动，占去不少教学课时。低年级学生年龄较小，体力不足，安排的还不算多，进入三年级后就逐步加强。平时校园内部的平整操场、植树种花、打扫卫生等零星劳动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做，校外占用整块时间的如修建日本神社。日本人自称大和民族是天之骄子，是神的后代，是上天派到日本这块土地上为王，统治群民，繁衍后代，建立八纮一字、万世一系的国家的。日本京都有伊势神宫，是专门供奉“天照大神”的，“亲邦”的祖宗当然也是“满洲国”的祖宗，



大同剧团演出

所以在伪都长春也建立一个“建国神庙”，以祭祀“天照大神”。为祭祀侵华战争和成立“满洲国”而死亡的日本鬼魂，各地都建立忠灵塔、神社。培养教育学生要忠于小日本，死心塌地地做驯顺奴才。

国高4年时间所学到的知识很少，这正符合敌伪的愚民政策，没有知识，不学无术，越荒唐对他们的反动统治越有利。学生对此只能应付，全无学习积极主动性。因此，有些学生便去发掘另外的知识领域，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東西。

我们对学校的课程越来越感到枯燥乏味，便在同学间兴起一股文艺热。我从第一学年后期，便开始喜欢上文艺书籍和《营口新报》的副刊《星火》。除和本班同学孙世藩、李吉恒交上朋友外，又由他们介绍和上一班同学郁庆令（铁汉）及上两班同学张吉宽（殷拳）交上朋友。在他们影响和帮助下，我读到一些进步文学作品，也开始练习写作。在盖县国高（后改为一高）这几乎成了风气。这风气当然是与田贲、驼子等作家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

以文会友，以友从善。我在与同学、朋友的交往中，思想上互相启蒙，写作上切磋琢磨，受益匪浅。我的第一篇作品是首诗——《田大妈的忧郁》，发表在《新满洲》月刊学生栏内。它描写一个老大娘的贫困生活和痛苦遭遇。我开始对劳动者的不幸，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关注。虽然它还不是很成熟，但毕竟被采用了。自此之后，我经常读也经常写，作品也不时被刊登出来。在这期间，我结交了不少朋友，有的是同学，有的是社会上有识之士，他们都以文见长，不是作家便为诗人，最少也是文艺爱好者。如本校的殷拳、铁汉、舒展、毅夫、辰藩和杨波等同学，二高的臧晶、王德祥、周建涛等同学，女高的潜萌、银燕、枫君等同学，瓦房店国高的石攻等同学，社会上有驼子、田贲、门文东、夕澄、矜人、衣云和李明轩等人。他们都比我年长和资深，在写作上都有较高的水平，所以我十分尊重他们。对女高的那几位同学，由于条件的限制，虽未能会过面，但彼此都很熟悉，也可算作神交了。

在同这些朋友的交往中，对我影响和帮助最大的要算铁汉、驼子和田贲了。他们不仅对我的成长，而且对开展盖县的爱国文艺活动，特别在学生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3年是盖县进步文艺活动最旺盛的时期。它的标志是读书会的开展，《辰星》《大地》的出刊以及秋灯书店的设立，都在积极地进行着。

为了在学生中开展读书活动，以达到对学生的思想启蒙，由驼子提议和门文东等人的支持，我们开始在学生中筹组读书会。正如高尔基所说：“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命伴侣和导师。”选择书籍与选择朋友同样重要。驼子提议：一高由我负责，

二高由臧永昌负责,女高由侯庚芝负责。此时,殷拳已去吉林师范大学学习,铁汉已去新京(长春)《新潮》杂志当文学编辑,我已是一高四年级学生,在我身边联系着一批进步学生。除我和孙世藩、李吉恒等同学,包括第二国高的文昌等同学已和驼子认识外,我们又把杨士绵等同学介绍给驼子,以便在我们离开一高后,他们可以继续在驼子等人的指导下开展进步文艺活动。

作为读书会的成员,一高有十多名学生,二高有四五名学生,女高也有四五名学生,如果再加上其他一些人,大约有二三十人,可谓继《星火》同人之后的一时之盛。

读书会是在秘密中开展活动的,有的同学知道,有的同学不知道。反正凡参加收集和借阅进步文艺书籍的,都是这一组织的成员。开始是在几个要好的同学中借阅,后来又扩大到其他同学中去。书的来源,都是由分散的个人藏书中收集起来互相传阅的,效果很好。后来,我又同驼子到大石桥南桥台铺王克范家去收集。他藏书很多,从两大木箱的文艺书籍中选出三四十本好书,秘密带回盖县。

我们先后读过的中外文学名著,有中国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夏衍、叶圣陶、曹禺、田汉、胡风、郁达夫、张天翼、丁玲、冰心、臧克家、何其芳、闻一多、卞之琳、艾青等30多人的;外国的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契诃夫、普希金、巴尔扎克、莫泊桑、但丁、海涅、歌德、果戈理、莎士比亚、杰克·伦敦、雨果、泰戈尔、易卜生、安徒生、罗曼·罗兰、高尔基、萧洛霍夫,还有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和有岛武郎等30多人的。此外,甚至还能看到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社会主义ABC》等书。这些书是人们追求革命、正义、民主、自由、和平与爱情,反对专制、压迫、邪恶、黑暗、愚昧和自私的指路灯火,它照亮我们的思想,开阔眼界,振奋民族精神,鼓舞革命斗志,激励我们为祖国的自由和光复而奋斗。

可见,进步书籍和艺术作品对影响人们的思想、推动社会的前进,有多么重要。故而想到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为何要弃医从文的深意了。正如鲁迅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迸发的火花,同时又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所以敌人才千方百计地把它列为禁书。而田贲和驼子等有识之士才如此重视它在青年学生中的作用。而我们一旦看到几本好书,就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甚至觉得是一种高尚的享受。有的同学为了怕流失,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也要把它全部抄录下来,想从它那里得到智慧和灵感,有助于自己的写作和成长。

为了增强读书效果,保全好书籍,我们对每本书编成号码,并在书的最后一页贴上标签。上面印着注意事项:(一)要明确本书写作宗旨和目的;(二)要认真阅读,避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三)要写读书心得,探索书中真理;(四)要及时传阅,交流学

习经验；(五)要爱护书籍，勿使丢失或破损。以引导同学明确读书目的，讲究学习方法，注重学习效果。

在读后传阅时，便将自己的读后感谈出来，或有重点地分别介绍，如你介绍《罗亭》，我介绍《野性的呼唤》，他介绍《母亲》。或利用小型集会介绍读书经验体会，这样更受欢迎，无形中便在盖平一高、二高和女高的某些同学中形成一个读书网。我们对那些好书都着了迷，如鲁迅的《彷徨》《呐喊》，巴金的《死去的太阳》《灭亡》，茅盾的《子夜》，果戈理的《死魂灵》，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书。当时书市上，虽然充斥着言情小说、武侠小说，还有为敌伪效劳的五花八门的反动书刊，但我们都不屑一顾，而宁愿冒着风险去传阅这些“禁书”。

这些书，无疑唤起了我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从而对经济困难的同学积极进行援助活动，如对本校同学殷拳的接济，给西安县（今吉林辽源县）国高寒金的经济支援，还参加集资办“秋灯书店”，加强对反满抗日的宣传，还利用“赈灾”和本校的“农场祭”的文艺演出，揭露封建礼教，演唱革命歌曲，影射日寇剿灭抗日志士的凶恶和残忍。

同时，我们还发动同学反对学校舍监对学生粗暴管理和对伙食的漠不关心。一次，利用舍监训话的机会，要求改善伙食，舍监置之不理，我们一大群人一窝蜂似地跑出校门要找上级请愿，这可吓坏了那个舍监，脸色变得煞白，怕闹出大事，慌忙跑到操场上截住学生，立即答应学生要求，才算了事。这些无疑在广大学生中起到积极的影响。

读书会的书有些放到了秋灯书店，有些仍然继续借阅，这样更扩大了借书范围，除了学生还有社会青年。

读书会达到了提高思想、锻炼写作的目的。我们坚信，日伪的反动统治迟早会灭亡，对祖国的胜利充满信心。大家都说：“日本船念个丸（完）嘛！”这不能不感激驼子等人为培养青年学生所作的努力。读书，这一活动直到我们被捕才停了下来。



日本殖民当局拍摄的辽南农村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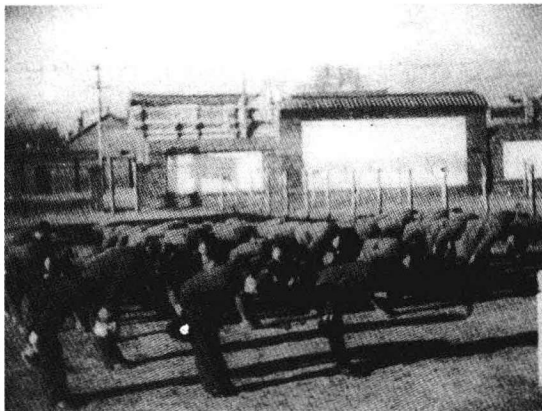
我厌恶透了奴化教育

臧永昌

每天朝会向伪满皇宫和日本皇官行 90 度鞠躬礼遥拜,用以强制灌输忠于伪满洲国和“大日本帝国”、忠于伪皇和日本天皇的思想以及坚定对“天照大神”的信仰,企图让中国学生彻底忘掉中国。每天早自习必须分别背诵伪满的所谓《建国宣言》、1934 年溥仪即位为伪皇的《即位诏书》和 1935 年伪皇溥仪第一次访日的《回銮训民诏书》等殖民地文书。其中,背诵次数最多的是《回銮训民诏书》。朝会后,全班同学进入教室站立,由班长先念“诏书”,随后大家跟着齐声朗诵全文,两年里背过不下数百遍,以至事隔 60 多年后,到现在我还能够全文背诵出来。

伪皇溥仪这篇汉奸文书的基本意思是将日本侵略者美化为亲热的友邦,要东北人民都像他那样甘心继续当“亡国奴”。我念小学时候,年龄小,不懂事理,出于儿童争强的心理,学校让背诵《回銮训民诏书》就使劲傻背,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等到上国高的时候,年龄大些,事也懂得多了,对 1940 年伪皇第二次访日回来发布的《国本奠定诏书》就不那么认真傻背了,所以如今就不能全都记得了,但基本内容有印象。开头说:“朕兹为敬立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国自肇基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蒸蒸日上。仰厥渊源,念斯丕基,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所以才要建立一所“建国神庙”,供奉“天照大神”,要人人感激和衷心崇拜。说实在的,当年对这些东西就已经有莫大的反感,所以虽然是浪费了一些宝贵的时间,但心灵上并没有受多大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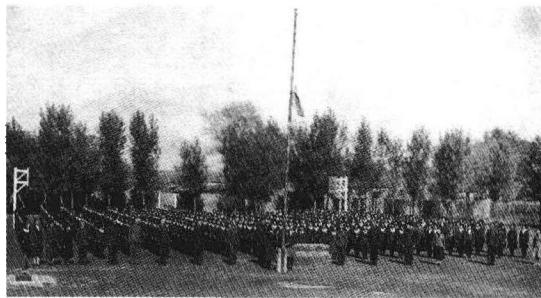
我上国高时,每星期一还举行“诏书奉戴日”。上午第一节课,全校师生齐集礼堂(其实只是将两间教室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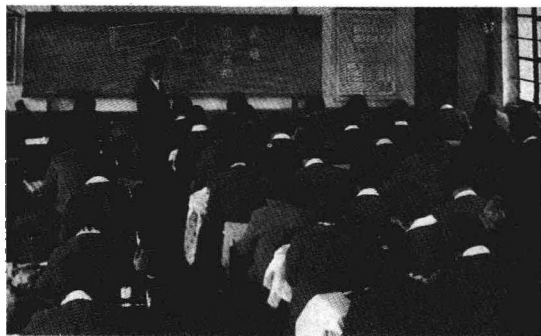
强迫民众向日本天皇遥拜行90度礼

的活板墙打开的一个大教室)肃立,由一位戴白手套的老师从存放处将装在圆筒里的“诏书”取出,放在一个日本式的木质祭器上,捧着走往讲台,全体师生按口令向这东西行注目礼。到讲台时交给校长或其他有资格的人,这个人像接受多么珍贵的东西一样谨慎小心地接过来。这时候,全体师生听口令一起行 90 度鞠躬礼,当时叫做“最敬礼”。随后将卷着的东西从筒子里取出,从左向右打开,然后轻声朗读。若是日本人念,取来的就是日译本,如果是所谓“满系”人念,取来的就是汉语本,多数时候是念《回銮训民诏书》,有时候念《国本奠定诏书》。每周一都要这么折腾一次,每次一个小时,一年 40 多个小时,4 年就是 160 多个小时,这不仅让青少年时代宝贵的光阴就这样被荒废了,而且翻来覆去灌输骗人的谎言,在青少年身上打牢“日满协和”的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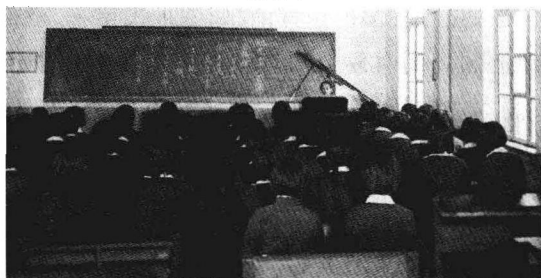
女子国高的升旗仪式及课堂



朝会



裁缝课



音乐课

记不得是 1942 还是 1943 年了,伪政权公布了伪国务院总理张景惠撰写的所谓《国民训》,一共五条,有汉文和日文两种。各机关、各学校必须在每周一朝会时集体朗读,学生每天朝会都必须集体朗读。如今我还记得其中的第一条是“国民须念‘建国’渊源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与前后颁发的那个《国本奠定诏书》几乎一样,我对这个胡说八道的所谓《国民训》从心里就讨厌。

日伪为了灌输奴化思想,唱殖民地歌曲也很普遍。首先必须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从谋划和占领我国东北全境时候起,就已经将其当做是自己的领土,打算长期霸占。但是,为了欺骗东北和全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才建立了伪国、伪政权,立了伪执

政、伪皇帝,而且在所谓《建国宣言》《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等殖民地文书中将其装扮得似乎真的是一个独立国家,与日本真的是平等友好的邻邦。这样的奴化教育也表现在歌曲上,我上小学的时候学过一支儿歌《乐园大满洲》,歌词是:

好朋友,好朋友,
大家牵着手,
同向乐园走。
乐园在何处,
就是新兴国家大满洲。

还学过一支《建国运动会会歌》,歌词是:

滔天胡沙吹去了,
风和日丽杏花开,
晴空荡漾春光好,
新天地内何快哉。
这般大的新生命,
辟开大地涌出来。

这些歌曲也都是把伪满洲国装扮成新兴独立国家的模样,都以欺骗东北人民及其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为目的。可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疯狂,就不惜把这种欺人的外表撕掉了。在伪皇帝溥仪的《国本奠定诏书》中就明白地说:伪满洲国得以建立和存在“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也就是说伪满和日本一样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和日本天皇陛下的臣民,所以才由张景惠用所谓的《国民训》公开训令东北人民崇拜“天照大神”。这种情况也表现在歌曲上。1942年,伪满洲国庆祝所谓“建国”十周年时候的《“建国”十周年纪念歌》中就有“八纮一字奏钧天”的歌词,意思是我国东北这个地方也属于“天照大神”生成的“八纮一字”,是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后于1942年又编出一首“国歌”,取代旧“国歌”。歌词是:

神光开宇宙,
表里山河壮皇猷。

帝德之隆，
巍巍荡荡莫与俦。
永受天祐兮，
万寿无疆博海讴。
仰赞天业兮，
辉煌日月侔。

这就从根本上说，东北地方自古以来就都是由“(天照大)神(之)光开(的)宇宙”了。若非日本帝国主义迅速灭亡，东北肯定会像朝鲜一样直截了当地被日本吞并。

伪满末期，太平洋战争吃紧，学校强迫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练队列、刺杀，进行分列式。也教唱一些军歌，有些歌我现在还会唱。伪满军军歌歌词是：

五色兮吾旗，
五色兮吾徽，
旗徽飘扬兮，
天伫地巍。
矢我多士兮，
同心努力。
亲仁善邻兮，
永好无畏。
礼义甘露兮，
皇军之武；
忠信甲冑兮，
皇军之威。
尚礼义兮怀忠信，
皇德皇军兮，
天与人归。

伪满海军军歌歌词是：

旭日东转到处光辉烂，

大地春,飞烟敛,
白山碧草长,
黑水轻波溅。
新国建,新国建,
同文日满应亲善。
海上波涛险,
破浪男儿愿。
漂轮急,舰旗黏,
但知身许国,
哪怕风云变。
新国建,新国建,
同文日满应亲善。

伪满学生既然非常讨厌殖民地歌曲,爱玩爱唱的青少年当然要别处寻满足。那时候,书店和商店为了赚钱,大量出售上海周旋、龚秋霞、李丽华、陈云裳等明星歌星及其演唱的歌曲唱片,这些有中国形象的东西对青少年有很大吸引力,价钱又不贵,许多学生就像如今的“追星族”一样搜集,自己或和要好的同学在家里学唱,以满足对文娱生活的渴求。这也是伪满时期青少年抵制奴化教育和怀念中国的一种表现和心理反映。

我厌恶透了日伪的奴化教育,课余时间大量地阅读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每每读到深夜,甚至把书带到学校,在课堂上冒着危险放在膝盖上偷偷地看。当时,盖平城无书店,有两三家杂货店、文具店带售少量书刊。我买书的好去处是几十华里外的商埠营口市,那里的书摊上有从上海偷运过来的进步书籍。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营口日本宪兵曾大肆拘捕“反满抗日分子”,但也没法杜绝书摊上暗中贩卖进步书籍。当然,买卖时要防备日伪警特的耳目。

读了许多文学书籍,我便情不自禁地写起文学作品来。在写作中,我以象征含蓄的手法抒发了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怀念祖国的思想感情。我用臧晶、臧青镜为笔名在《康德新闻》日报副刊《新文坛》《康庄》,《新满洲》杂志,大连《泰东日报》文学副刊上,先后发表了《童年的回忆》《学校里的老嫠夫》《海之赠礼》《家园里的孩子》《孩子们别了》《迢遥寄》《仲秋夜》《雁南飞》《同院的一家》《张半仙的故事》《白华和丝丽》等小说、散文、诗歌10余篇。

我在盖平和另两个国高中爱好文学的爱国学生建立了友谊。在盖平女高,有侯赓芝、穆玉琪、姜静芳等;在盖平一高,有李昌毓、杨士绵、孙世藩、门恩义、李吉恒、赵廷奎、高玉元等。我还和瓦房店国高的爱好文学的爱国学生石攻等人有了来往。特别幸运的是我认识了进步作家于家麟(驼子)、鲁启智(华青,王道书院学生)、郁庆令(铁汉,《新潮》杂志社编辑)。经于家麟介绍,我又认识了社会上爱好文学的爱国者王锡成、门文东、王矜人、张可恩、孔庆举等以及张继宽(吉林师大学生)。他们都是反满抗日秘密刊物《行行》与《星火》的同人,秘密集会“消寒雅集”的参加者。在我认识的女高、一高的学生中,有些是共产主义者、革命作家花喜露在熊岳教高小时的学生。他们把从花喜露那里借来的进步书籍转借给我,于家麟、王矜人、鲁启智和他的弟弟鲁启仁(凤城国高毕业生)也把他们的藏书借给我看。

我把已读过的鲁迅、巴金、高尔基等人的著作,也借给同班好友周建涛、王德祥、于恩惠、王永泰。把我们几人写的散文和诗编成《盖平二高学生作品特辑》寄给《康德新闻》副刊主编张罗先生,后来发表了。我们在课前课后、午休或星期天,往往凑到一起,海阔天空地谈这谈那。我们谈起邓铁梅、苗克秀在九一八事变后率领义勇军打日本,从凤城打进岫岩,打到盖平附近的熊岳、营口、大石桥等地的英雄事迹,对他们被俘后誓不投降、视死如归的大义凛然气概很是敬佩!当谈到盖平的两个大汉奸冯涵清(伪司法部大臣)、金荣桂(伪奉天省长)背叛祖国、为敌效力的罪恶行为,我们恨之不已!

这样,在盖平三所国高学校的学生中,都有了一股暗中活跃着的爱国力量。他们在读进步书和文学写作中结下了志同道合的友谊,还和外地的爱国学生有了联系,并且取得了社会上爱国人士的扶助引导,共同汇合起来,进行了反满抗日的爱国活动。

读书和写作的队伍形成了,而且建立在爱国的思想基础上,并拥有许多进步的书籍,这就具备了成立一个抗日爱国的读书组织的基本条件。秋天到来时,于家麟、王锡成、王矜人、李昌毓和我研究,决定成立读书会。在这个秘密的爱国组织中,传阅进步书籍,交流读后感,密切友谊,相互勉励。我们确定,和这个组织发生关系的人,必须可靠。实际上,读书会成立之前,它的活动已进行了,在20余人中传阅了百余本进步书籍。

我要化作银燕

姜静芳

1940年,我考入伪奉天省立盖平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在学校里,我陷人民族压迫、强制奴化的苦闷之中,这里每日讲的都是所谓“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日满协和,共存共荣”等一些滥调。不管酷暑严冬,每天要上“朝会”,默读日本天皇诏书。

有一天,寒风刺骨,大雪纷飞,同学们冻得直跺脚,日本教师认为这是不满情绪,便罚全校师生站在鹅毛大雪里一个钟头,不许动一动。师生们愤怒地注视着雪地,把仇恨深深地埋在心里。

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一位日本体育老师,一不顺心就命令我们这些女孩子到东门外一面街(妓院所在地)去跑步,她自己却站在城墙上指挥,往下扔石子儿砸学生取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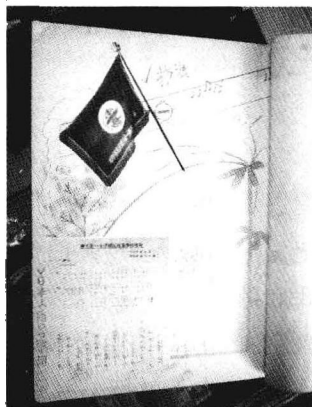
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践踏下,受尽奴役凌辱、掠夺屠杀之苦,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

自从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更是变本加厉,颁布什么《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设置“思想矫正辅导院”“保护监察所”等,用以镇压所谓思想犯、嫌疑犯。对我们同胞施以残酷统治,滥杀无辜。

奉天第一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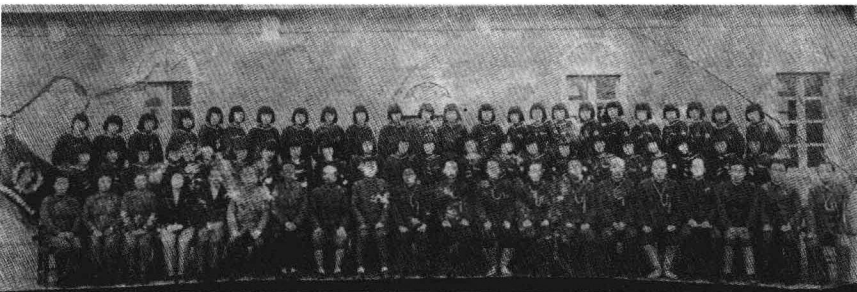


奉天第一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校旗、校歌



面对日寇的凶残、民族的危难,我的心中堆满了恨,积满了怨。为了抒发内心的愤懑,我拿起笔来,写了许多诗歌、散文,用“银燕”的笔名发表在伪满的报刊杂志上。“银燕”的意思是我要化作一只纯洁矫健的燕子,冲破狂风暴雨飞向蓝天——祖国。我的诗歌,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从而引起一些爱好文艺写作的进步青年朋友们的共鸣,纷纷给我写信,支持我,鼓励我。吉林师范大学的张吉宽、王盛家,盖县一高的郁庆令等同学都给我写过信。本校同学侯赓芝、穆玉琪、赵俊芬等同学,也经常和我凑在一起,研究写作,交换进步书刊,我们形成了一个进步的集体。我们也常去盖县进步作家于家麟创办的“秋灯书店”,借阅一些进步书籍。当时,盖县的革命爱国气氛很浓。

盖平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毕业班全体合影(1943年)(后排右六赵俊芬,左九姜静芳)



盖平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寄宿生毕业前合影(1943年12月12日)(前排左三赵俊芬,中排右一姜静芳)



阅读进步书籍

赵俊芬

身受着奴化教育的凶残压迫,同学们没有屈服,对日伪更加仇恨。我开始暗中阅读进步的文学作品和革命的书籍,在书中寻找慰藉。我读了鲁迅的《呐喊》和《狂人日记》,巴金的《家》《灭亡》和《新生》,巴金翻译的波兰作家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等。我和陈桂兰等几个要好的同学(我们都是住宿生)常常在晚自习以后偷偷把书带到教室,放下防空灯罩,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有时读到深夜。为避免这些违禁的书被发现,我们白天就把书藏到宿舍后边一个夹道里,上面放块石头压着。这些书给了我们

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启迪和生存的力量,唤起了我们的民族觉悟,点燃了我们的爱国热情。

同学们暗中传阅的书还有《大众哲学》《社会主义 ABC》以及丁玲、茅盾、老舍、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这些书,是同学从进步的小学教师或亲友处借来的。我的下一班同学穆玉琪和我的同班同学姜静芳的弟弟从小学语文教师花喜露那里借来了一些进步的文学作品和革命的书籍。



首映第一期演员



首映二期演员

女友来访

王丹群

1941年春,我回到了母校盖平归州国民优级学校任教。可是在日伪奴化教育的严密控制下,花喜露在校时那积极向上的活跃气氛没有了,墙报“春潮”、校刊“飞浪”随着花喜露同志的调出不再出刊了,花喜露同志作词的《朝会歌》,也没人再唱了。当时的报刊上,充斥着讨好日本帝国主义的“献纳诗”,为日本发动的所谓“大东亚圣战”鼓气。我记得当时《盛京时报》上刊登的一首诗就是极力鼓吹仇视英美两国,强调亚洲团结的:

在世界上,
有黑奴没有白奴。
历史上,
有“黄祸”没有“白祸”。

辉煌的太阳升起来，
东亚民族大团结。
一心一意一条枪，
戳穿英美恶魔！

这样压抑的气氛，我简直就要窒息了。我虽然当了老师，可我还怀念那失去的学生时代。

我到归州小学的第三个春天——1943年的春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的宿舍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她们是那样兴致勃勃，见到我高兴地跳了起来说：“想不到吧！”当时我确实觉得意外。她们一位是我在归州小学念书时低年级的同学穆玉琪，另一位是穆玉琪在盖平女高的同学侯赓芝。这两位朋友的到来，使我沉闷的情绪为之一振。

晚饭后我们三个人来到学校后的小山包上，望着殷红的夕阳吻落入海，好久谁也没说话。“你俩是来玩的？”还是我先问了一句。“我们是来找你的。”她俩一起回答。“有什么事？”“我们来和你商量商量，我们该怎么办？”这一句“怎么办”，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我哪有什么办法！爱国，不甘当亡国奴，又没有办法和敌人斗争的苦闷思想，我又何尝不是和她俩一样呢？可她们大老远来跟我要办法，我该怎么办？我默默陷入了深思。“我们回去商量商量吧！”天黑下来了，我们顺着羊肠小道回到宿舍。

第二天我们来到大海边，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它的胸怀那么博大，那么深远，我们高唱《渔光曲》《大陆歌》。我们高喊：“大海！大海！”此刻我哪有办法呢，唯一可以倾诉一点儿思想的《营口新报》副刊《星火》被迫停刊了。可是此时我又不能说没有办法，让她俩失望。“现在我们要多看书充实自己，女孩子要冲破第一个牢笼，就是封建礼教，争取妇女自由，要做好准备迎接斗争。我们不是常说，严冬过去，春天就不远了，黑夜的尽头，就是曙光……”我这是一套无实际内容的良好愿望，哪里是什么办法，不过当时却也温暖了她们的内心。我们谈着，望着，大海的远处出现了一个黑点，逐渐升起来了，一艘渔船靠岸了。好一船金光闪闪的黄花鱼，在阳光下显得那么耀眼。

我买了五斤鲜鱼回到学校，我们共同吃了午饭。不知她俩此行是否得到了答案，下午却欢快地和我告别，回盖平学校去了。

书籍,我的朋友

孙萌

我出生在辽南古城盖平县一个富裕人家。父亲当盖平伪商会会长,同二房在一起生活。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终日将自己锁在家里,以泪洗面,我也从小没有父爱,终日以书为伴、以书为友。我在阅读巴金《家》的时候,对书中表达的反封建思想很容易就接受了。

1941年,我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本县女子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女高),在县城里就算是最高学府了。我是多么希望能多念点书,多学到一点知识,可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开学以后,每天上朝会,都要默念日本天皇诏书;在课堂上,日本教师张口“日满一德一心”,闭口“大东亚共荣圈”,说日本人是来帮我们建设“王道乐土”的。听了这些话,让我想起小时候经常听母亲叨咕的往事:她遇上过反俄国^①,她说那时候大鼻子(指日俄战争中的俄国兵)来了,大姑娘小媳妇一放声大哭,他就吓跑了,小日本鬼子可不行,又奸又坏,心最狠。当时从母亲这些述说中,我知道了我是中国人,中国很早就受外国人的欺负。想到这里,我立刻明白了日本老师讲的那些话,就像童话里那个“狼外婆”,用谎话哄骗我们这些小孩子,狡猾虚伪。

“国高”是伪满洲国1938年实行“新学制”后国民高等学校的简称。六年制“国民优级学校”毕业后考入。“国高”设置的课程倒不少,只是都是为侵略者的需要服务的,例如:语文课本不叫语文或国文,而叫“满语”;《本国地理》只讲东北地区的地理;《本国历史》也只讲东北满族发展史。把关内和关外截然分开,称东北为“满洲国”。另外,学校经常“勤劳奉仕”,占去大量学习时间,所学的知识很少,这正是侵略者的愚民政策,越没有知识、没有思想,越对他们的反动统治有利。

在学校里,日本老师非常霸道,随便斥责和凌辱中国学生和老师。教体育课的日本老师凡足,我给她起名叫“日本婆”,丈夫死在侵华战争中,她视中国学生为仇敌。一脸凶气,从无笑容。对学生张口就骂,抬手就打,把学生当成宣泄对象。我就挨过她的打,还罚过跪。有过这种遭遇的学生不止我一个人,我曾听一个上一班同学说,有

① 指1904至1905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

一次她们班上体育课，没听指挥，惹怒了这个“日本婆”，她竟令学生到东门外一面街（妓女街）去跑步，她自己站在城墙上指挥，往下扔石子砸学生。当时听了这个情节，在我心里激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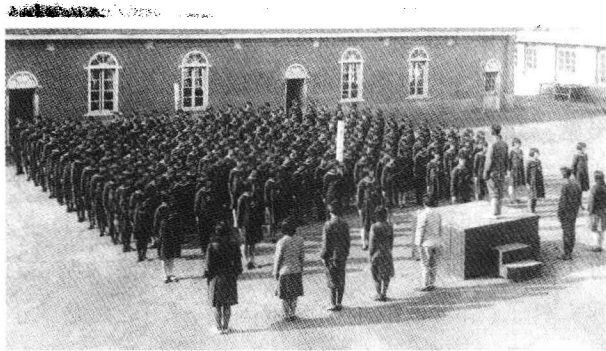
盖平女子国高球队获奖（后者是日本教师凡足）



愤怒与仇恨久久留在记忆中，甚至多少年之后想起这件事还感到屈辱和痛苦。

在学校里，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我陷于深深的愤懑与苦闷之中。在一个中学生幼稚的心灵上，过早地懂得和留下痛失祖国

盖平女子国高学生举行朝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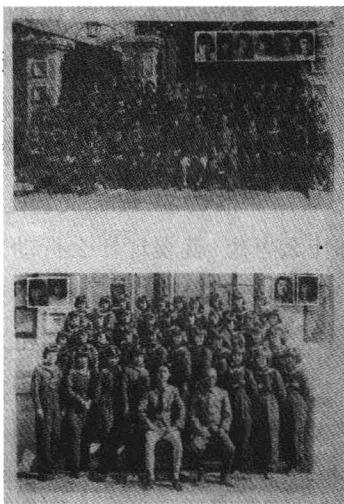


之苦、亡国之恨，这是一种极大的不幸。我该怎么办？我这个从来都用功的学生，对功课越来越失去兴趣，越来越反感，而且萌生出一种抗争的心理。上日语课，我把课本坐在屁股底下，还鼓动同学也不要学日语。这显然是幼稚而错误的。由于我放弃了学习一国语言的机会，以至日本统治东北 14 年，我竟听不懂日本话，不能读日文书，这是一种损失。逃课读课外书，也算是我的一种解脱苦闷和抗争的方法。体育课能找理由不上就不上，豁出去挨打挨罚；家事课——学烹饪，学缝纫，10 次我有 9 次不去，我找地方看我喜欢的课外书。我自幼就爱看书，特别爱看小说，现在看这些书就不仅是兴趣和心灵的寄托，还似乎有对一种反抗心理的满足。

凡是能看到的书我都看，我开始喜欢起文学。这时在校内校外兴起一股文学热，盖县男子和女子国高都有学生用笔名在报刊发表作品。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说过“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做亡国奴该是东北人最大的苦闷了，也许正是这种苦闷，使盖县的一些学生包括我自己走上了爱好文学的道路。在学校内，我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结成朋友，有上年级的姜静芳和姜兰茹姐妹，有同班的穆玉琪等。姜静芳以“银燕”为笔名，经常在一些刊物上发表新诗，对那些抒发现实苦闷的诗，我早有共鸣。我

在营口学生周刊上看到穆玉琪以“枫君”为笔名写的诗,我的心激动不已,后来又是通过她我认识了花喜露,引我走上了革命斗争之路。

我们几个人常常躲过日本老师的眼睛,聚在一起,研究写作,交流读书心得。十几岁,可能是爱写诗的年龄,不会写也写。我这个从小就爱看小说的人,也拿起笔写诗,虽然幼稚,但总是抒发了满腔郁闷,这是我与文学结缘的开始。文学也是引我觉醒走向进步的桥梁。由于爱好文学,以文会友,后



营口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毕业纪念
(1943年)(上四年甲班,下四年乙班)



营口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朝会
(1943年)

来我才得以认识和接触那些对我进步有决定性影响的师与友,才得以读到那么多好书,那么多给我指引斗争之路、走向革命的好书。

我和校内爱好文学的同学交往的同时,由于看书,也是由于爱好文学,我认识了我家有亲戚关系的臧晶。他是盖平县二高的学生。我们小时候就在一起玩过,上国高后一次偶然相遇,他跟我借书,同时把他手里的两本书借给我,我记得一本书是《茵梦湖》。从此我们成为交换看书的书友。他爱看书,也喜欢文学,经常在文学杂志或报刊上发表新诗和散文。后来他在校外又结识了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和朋友,如盖平县第一国高的殷拳、铁汉、舒啸等,这些人都经常以这些笔名往报刊投稿。通过臧晶我认识和知道了一些外界的人和事,扩大了我的读书来源。当时,有不少书我都是从臧晶这个渠道看到的。一高这些爱好文学的学生和女高的银燕也有通信联系,当时在盖县青年学生中,有那样一种关系,就是所谓以文会友,以文交友,互不识面,却都互相知道。后来这种关系,在一部分人中,是通过读书活动联系起来的。

盖平学生走上文学活动这条斗争之路,是有历史渊源的。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者推行文化法西斯专制,敌伪的宪兵特务,对思想文化领域已经是无孔不入,严厉查禁报纸和刊物。我年龄小,不知道当时的大情况和大环境,但是我知道盖平这个不屈的文化小古城的斗争经历——那是九一八事变过后几年,日寇把辽南

地区的反日武装邓铁梅的部队镇压下去,接着对东北人民的压迫和蹂躏更加变本加厉。这时盖平有些爱国青年,思想上受压抑而苦闷,不约而同地起来寻找抗日救国途径。这里我知道的有代表性的人如花喜露、于家麟、王锡成、门文东等。不论他们后来是参加共产党还是加入国民党,不管他们后来走上那条道路,当时,他们冲破日本人的严密监视,经常在一起议论时事,阅读进步书籍,暗暗议定共同走反满抗日的路。这路怎么走?他们反复阅读鲁迅的《呐喊》,认为鲁迅提出的首先最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提倡文艺运动。用他们的话说:“接受什么教育,就发展什么思想;有什么思想,就表现什么行动。所以要读有用的书,再写出自己的思想,这就是行动。”1936年,他们创办了《行行》和《星火》两个秘密油印刊物;花喜露在学校还成立了“鲁迅文学研究社”,目的是和爱好文学的学生研究左翼文学。他们的刊物办得很活跃,这“星星之火”已烧到盖县、营口、本溪、复州等地。他们通过这些刊物,以文会友,扩大力量,并发表一些伪报刊不能发表的反满抗日的文艺作品。这些文艺作品启发和扩散了反抗日寇的斗争精神,对于在黑暗中向前摸索的人们,无疑是一种希望和光亮。至于那时花喜露以“田贵”为笔名,于家麟以“驼子”为笔名,写出的那些诗篇和短论,有的发表在报刊上,在当时文禁森严的情况下,则更是举向敌人的投枪。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文学活动,说明在敌伪统治的14年,不仅有文学,而且有进步的文学,有过反抗斗争的文学。他们都是无畏的战士,他们都应该在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盖县这些爱国先驱者们,后来在政治观点上虽有分歧,但是,在反帝反封建抗日救国这个大目标上,当时应该说是一致的。正因为这样,对盖县学生来说,他们都是启蒙老师,都是抗日爱国的领路人。

这就是盖县在日寇侵略和统治的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对我自己来说是幸运的;对所有要求进步的学生,我想都是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盖县学生的文学活动和读书活动,就是在这种历史影响下出现和开展起来的。

那时,在敌人眼皮底下,我们小心地、谨慎地传阅着那时被列为禁书的中外文学名著和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我还记得我得到一本好书时的喜悦与紧张心情。常常是在深夜,我钻进我家的小西屋,躲过敌人的眼睛,也躲过母亲的干扰,守着一盏灯,贪婪地读着到手的每一本书,常常是彻夜不眠。我还记得我读三郎、悄吟的《跋涉》,读巴金的《灭亡》,读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和瞿秋白等“五四”后的名人作品。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作品,我们差不多都读过了。这些文学作品多是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压迫剥削,鼓舞反抗斗争。从这里我们知道了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给我们启示,让我们看到希望,为我们指明了必须走抗

日救国救民的道路。我们还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如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有些则是普罗文学如《母亲》《铁流》《毁灭》等。西方的文学名著,如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狄更斯、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我都读过;易卜生的剧本、泰戈爾的诗也使我深深地迷恋过,给过我很大的影响,如泰戈尔“拨下肋骨,燃起火炬”的诗句,至今仍记在心中。到了1942年接近花喜露以后,我读书的内容又有些新变化,这时也是我思想的转折期。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社会主义ABC》《社会发展史》,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讲座》,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等开始在我们当中传阅。这些理论书大多是我和穆玉琪往返沈阳从花喜露老师那边弄来的。说起运书,至今还能回味那种紧张而又神秘的心情,坐在火车上,包里放有禁书,生怕有人搜查,真是体验了小说里写的做地下工作的心情。这些书带回来就在一定范围内传阅。这些理论书不像文学书,有些不能完全看懂,看不懂也生吞活剥地看;看完了还在一起议论。什么改造社会、解放劳苦大众、消灭剥削和压迫、妇女解放等,这些大问题我们都敢于奢谈和议论,甚至还争论什么否定之否定、什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去吃梨子等这类哲学问题。虽幼稚却十分认真,常常争得面红耳赤。那时,对这些社会科学著作虽然不能有较深的理解和体会,但是那些深入浅出地讲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其中的一些原理是认识中国社会和帝国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它指明了消灭剥削和压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从这些书中,明白了社会不平、帝国主义侵略和人民苦难的社会制度根源。要改变这种情况,不但必须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侵略者,而且还得革旧的“吃人”的社会的命;而在殖民地的东北革命的锋芒必然首先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者赶出去。在当时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应该说思想又前进了一步,它为我后来参加革命走上征途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酷统治和在学校里只能受奴化教育的情况下,这样一些书,对于我们的确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我的民族觉悟、阶级意识、反封建的思想和勇气,以及对人生的认识、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都是从这种启蒙和教育中得到的。那些进步的文学作品,那些革命的理论,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既仇恨民族敌人,也决心与封建家庭决裂和斗争。我读了巴金的《家》,我就想,我一定要成为觉慧这样的人;我看了屠格涅夫的《门槛》,我则向往做那个勇敢女郎那样的女英雄,在我参加革命穿上军装时,我还想到《门槛》里的女郎和《夜未央》中的苏菲亚,一种革命的豪情充满了全身。可以说,书熏陶了我、塑造了我、铸就了我的心灵和性格,是书引导我走上了斗争与革命之路。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我一生的经历中,真是一本书

能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1987年，我在《辽宁老年报》上写了一篇小文，题目就叫《书，伴我一生》，我摘下片段，作为我从盖县学生读书活动中所受影响的总结。我说：回顾半生，每遇坎坷，我都感受到书给我的力量。在奴役中挣扎的学生时代，躲开敌人的眼睛，守着漫漫长夜，我贪婪地读着鲁迅、巴金等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读着高尔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人的文学名著。在那时候，这些书就是一盏明灯，照亮了黑夜的路；就是一声声号角，催我奋起战斗。书给我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在敌人的监狱里，在日本法西斯的酷刑下，在我眼前浮现的是《夜未央》中的苏菲亚，是《门槛》中的那个勇敢的女郎，是勇敢赴死的丹顿和杜大心。有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吗？不！这些书里的英雄，使我在面临死亡时，感受到了他们给我的力量。



营口女子国民高等学校 1.四年甲班 2.四年乙班 3.织毛线活

营口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四年乙班毕业纪念 (1943年)



革命的路有风也有雨,在坎坷挫折中,当我软弱、当我委屈时,是学过的革命理论使我信念坚定,是书中的那些革命英雄人物:忘我乐观的保尔·柯察金,坚定不屈的伏契克,还有受苦而不诉苦的牛虻,给了我坚强起来的勇气和决心。

盖平进步学生的读书活动,是在当时日寇统治条件下所能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方法。它团结了进步同学,扩大了抗日力量,宣传了革命思想,不仅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而且在实际上,通过传阅进步书刊,把学生从思想上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有的则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和影响。所以每每回忆盖平那段斗争岁月,我都首先想起盖平学生的读书活动和文学活动;而我们在当时日寇统治那样严酷的条件下,能看到那么多好书,不能不感激那些为我们提供书源、开拓道路的先驱者。

学生读书会

洪声钜

洪声钜 1921年出生,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参与《大地》出版和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日本投降后参加革命。离休前系国家标准局设备监督局副局长。

1942年初,我考入伪满盖平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当时,书店里出售进步文艺书刊,同学中有的习文,有的练武,成为风气。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学校环境影响下,我虽然还只是个21岁的学生,但也开始对新文艺发生兴趣,接触和阅读了许多鲁迅、茅盾、巴金、冰心等文学大家所著的小说和杂文,并开始练习写作。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大约是这年秋天,由高年级同学铁汉(现名郁其文)、李昌毓(现名李实)等同学策划和组织了“学生读书会”或叫“读写研究会”,主要活动内容介绍读书心得、交流写作经验、



伪满“优秀剧目”《王属官》剧照(1938年)

组织写稿投稿等。我记得当时二年级参加的同学有甲班的王盛伦、张登玉，乙班的高玉元、赵廷奎，丙班的关振国（现名关云车）和我。后来这些同学都写了稿并在《大地》上刊载。参加“学生读书会”和在《大地》《辰星》上刊登文章的还有二高和女高的同学。通过这项活动，确实把爱国学生组织起来了，在辰州大地上点燃了星星之火。

本溪办起读书会

石岱宗

我是田贲在盖县归州小学时的学生。我考上本溪国高以后，在田贲的影响和指导下，在本溪国高办起了读书会。田贲到沈阳以后，仍然给我们以指导。

1939年，我在本溪发展了李继东、李太岩、孟方平三人。1942年，在本溪又发展了邓周立。周立同志也和我们一样，发展朋友、编辑文艺小册子、传阅书籍——如他曾传阅诸夏怀霜社出版的《海上述林》等。按照已定好的规矩，他应该属于本溪读书会的第二代，但因我已决定进关，他也就划入第一代，从而认识了田贲。

田贲去本溪指导读书活动

王丹群

田贲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期间，经常去本溪，领导那里的男、女国高学生的读书活动。本溪的读书活动开始是石岱宗组织的，石岱宗走后的负责人是邓崇仁（现名邓周立），第三任是张万昌（现名张村夫），最后的一位负责人是马魁明。这些爱国青年在日伪极其严酷的统治下，为了读革命进步书籍，寻求真理武装自己，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进行活动。有时变更集合地点，有时分散联系，市内不能开展活动，就把书搬到乡下，直到“八一五”日寇投降，他们都参加了革命。

田贲去本溪住在我家

邓周立

1941年我在本溪国民高等学校读书,我与田贲的学生石岱宗相识。他在田贲同志的领导和帮助下,在本溪国高同学中组织读书活动。我们除了在一部分同学中秘密传阅革命进步的文艺作品之外,还在男子国高编写了手抄本刊物《铁流》《黑焰》,在女子国高编有《春之花》。主要是通过阅读、写作活动,团结了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

1943年5月,石岱宗逃离伪满到关内参加抗日。为了保持与本溪这一批青年的联系,田贲同志与我建立了直接的来往。大约是在6月间,田贲由沈阳来到本溪市,住在南山我的家中。我们两人促膝长谈,一直到深夜。我详细介绍了本溪青年读书活动的开展情况。田贲关切地嘱咐我:在读书写作活动上,可以尽可能多团结一些同学和青年,但在政治思想上,则要注意识别别人,谈问题要慎重。我们不仅谈到读书、谈到思想,还谈到当时伪满文艺出版和刊物的情况。我还记得谈到伪满出版的《青少年指导者》刊物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什么现阶段不能讲“日满协和”。因为满洲人(实指中国人)文化水平低,无法与日本人平等。田贲指出:这是“大被蒙头主义”,属于小骂大帮忙一类。可以蒙蔽一些不满日伪统治的人,要揭穿它,不要上当。第二天,田贲同志去本溪市工源,这是新开辟的工业区,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区。我想他是去开展工作的。

自此之后,我多次去沈阳田贲的家中。田贲和田丹同志住在沈阳市大南门外一条小巷子里一个小院的门房。那是不到5平方米的“斗室”,生活极为清苦。我每次去,田贲、田丹都亲切地接待我,关切地询问我的读书、生活情况,讲说文学创作,评述国际、国内的斗争形势。

有一次谈到田贲同志以“山川草草”的笔名,在《盛京时报》上刊登的《塔·城·一切建筑》这篇杂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在伪满文化统治极其严密的情况下,在伪满的“大报”上刊登出来的,从而也就在文艺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不仅需要作者机智隐晦的文笔,也需要副刊编辑的勇气。当时的编辑秋萤同志,很有胆识地刊登了这篇文章,并给田贲同志写了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会面相叙的意愿。但在当时,出于党的地下工作保密的需要而不能如约结识,田贲同志深感惋惜。

有一次,田贲把日文刊物《改造》中一篇文章指给我看。文章以《延安的曙光》为题,介绍了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吸引了大批国民党地区的青年和敌占区的青年参加抗日。还介绍了“抗大”(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艺”(鲁迅艺术学院)的情况。我也是多么心向往之啊!这对我以后去太行抗日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还有一次,大约在6月间,田贲同志拿出《盛京时报》给我看。在很不醒目的栏目里,有一条关于第三国际解散的消息。报纸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田贲向我明确指出:这决不是共产主义的失败,不会削弱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各国共产党可以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战斗。我在当时还不能充分理解他的意思。现在回想起来,田贲在政治上是多么敏锐,对国际共产主义形势的分析又是多么深刻。

1943年8月,我已决定逃离伪满。临行前我向田贲、田丹同志告别,并介绍同班同学张村夫与田贲建立联系。田丹帮助我准备行装。把用作路费的金戒指暗缝在呢大衣的领子里,并在第二天亲自到沈阳火车站为我送行。与我同行的有我的同班同学孙强、王抗和王勇。我与张村夫同志谈好:如果我到达延安或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地区,寄信时就在信封背后左侧写上发信地址。我非常幸运,在到达北平(北京)后,有了直接去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机遇。我们经彰德(安阳市)穿过封锁线,顺利到达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涉县。我从涉县寄发给张村夫同志两封信,如果他把我到达太行涉县的消息告诉了田贲同志,他一定会为我们感到宽慰。

本溪读书会对我的影响

苏晨

苏晨 1930年12月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市,伪满奉天省立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工业化学科毕业。1945年12月参加革命,曾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战士生活》杂志编辑组长、《海南前线》报副总编辑、光明日报社驻广东记者、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花城出版社编审等。1948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主要作品有《野芳集》《常砺集》《小荷集》《流水集》《访韩纪事》《窗外那么美》《心平好开卷》《汨汨的流水》《洛湖居向学》。

记者采访我时曾经问我:“看您的履历,您出身于军旅,没有受过专门的文学教

育,但是看您的作品,最大的感觉就是您的文化视野相当开阔,古典文学积淀深厚,当称是学者型的作家,那么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其实,在我们那一代,我在军队里算是有文化的了。伪满洲国的时候,小学叫国民学校,中学叫国民优等学校,高中叫国民高等学校,6年的教育时间压缩到4年,也都开始分科了。我们学校是工科,一级一级筛选上来,也是不容易上的。经过又一次淘汰率更高的升学考试,我也又一次以榜首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很有些名气的奉天省立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录取于工业化学科。

“国高”实行“阶级服从”“剑道”训练等日本“武士道”的一套。低年级学生见到高年级学生要立定敬礼,高年级学生可以“训”低年级学生,可以打低年级学生,不许还口,更不许还手。高年级学生必须用日语训话,低年级学生也必须用日语答话。在“国高”,起码是每天两堂的日语课不许说中国话,进入教员预备室必须全说日语。偏偏我的“国高”一年级“级任教师”又是日本老师,名字叫石田茂三郎。他和学生更是全说日语。

学校里,我们的化学老师是1928年的党员,校内高年级有个读书会,后来走出很多进步分子;但是也有国民党的力量,也有日本特务,是一个很复杂的环境。殖民地的日子是很痛苦的,吃大米都算是犯罪,叫做“经济犯”;心里头有对日本的不满情绪,让日本人知道了,就定你一个“思想犯”。我姐姐从乡下给我们家拿点大米来,我们吃的时候都要把窗帘拉上,把桌子放在炕底下。当时日本人打人根本没有理由。在那种环境下长大,本能的就有种想要反抗的欲望,想离开家。

我15岁就参加了共产党,在学校入的党,我读书是读得很好的,当时我读的工业化学,考试从来都是第一名,但是我是党员啊,要服从组织的安排,战争年代一切工作重心围绕战争,我就离开了学校去军队。我16岁时已经当指导员,带领一个连打仗了。

我的看法是人文科学是可以自学的。很多学者还不都是自学的?没那个机会跟哪个老师学。我连这个机会都没有,就是爱看书。打了胜仗,人家捡战利品,我总是抢书。比如解放沈阳时,有很多好东西,我是整了一麻袋书——讲究一切战利品要交公,可是书不用交公,我就自己留着。朝鲜战争我去前线采访,部队打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找书。

回顾我的一生,我愿意用“行行复行行”来概括。这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句,是革命烈士花喜露等人在伪满洲国创办的油印刊物名字的来历。我这一生,就是走啊走,走个不停,前进,永远向前。我的力量是哪儿来的?我爱读书的习惯是怎样形成

的?不能不使我永远难忘我在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受到的熏染。我不认识花喜露,我也没有参加过他号召和组织的读书会。但是,我确实是受到花喜露和他领导的本溪国高读书会的熏陶。

在伪满上学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少时间上课,当然也没有时间让你学习。因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线拉得很长,兵力、战争物资都严重匮乏,它把伪满洲国当做资源库、大后方,搞“全民皆劳”“勤劳奉公”,学生天天“勤劳奉仕”,我们工科国高的学生就到发电厂劳动。一天,我在厂门口,忽然被日本哨兵用一种粗暴的命令口吻叫住,让我到他那儿一下。我有些害怕,又不敢不过去。原来是他掏出一枚5分钱的硬币,交给我,指着不远处一个瓜摊儿,让我去给他买两个香瓜。因为要赶时间上班,我来回小跑着替他把瓜买到,交给他,回身想走。不知道为什么,他还不让我走。只见他用战斗帽的“防空垂帘”擦了擦瓜,在枪托上把瓜磕开,就地甩去瓜子,便吃了开来。吃到只剩下不能再吃的瓜屁股,给了我。香瓜屁股是苦的,不能吃。我以为是让我替他扔掉,就替他扔掉,又转身要走。他竟破口大骂,追过来,照我屁股狠狠踢了一脚,差点儿把我踢倒。他说:“我好意留下一些给你吃,你却扔掉,你太瞧不起我了……”接着又骂了我一串儿很难听的话,还拉动枪栓端起枪来吓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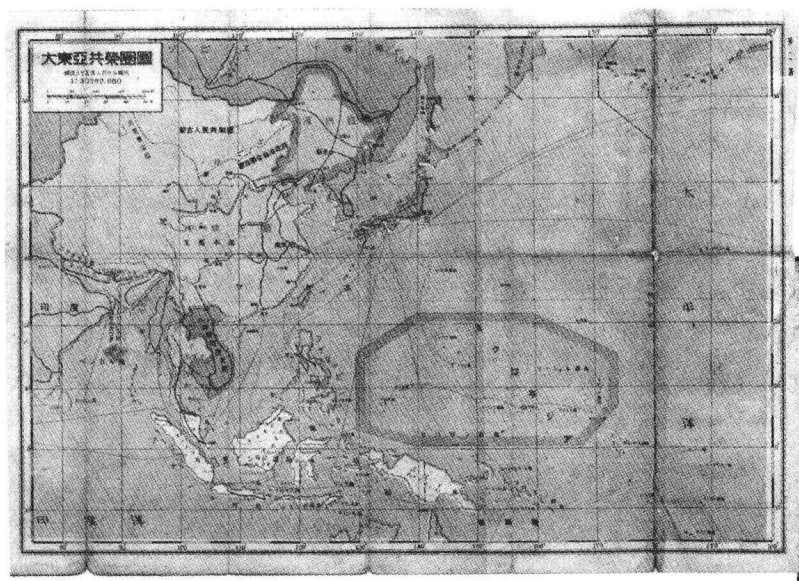
我急忙跑进发电厂,因为迟到一小会儿,又被日本工头骂了一顿。

本溪国高很不平静,虽然像我这些低年级学生多半还是少年,可是我们的“级任”老师石田,也是派入学校的日本特务,有个同学一到“日曜日”(即星期天),就到石田家去拍马屁干零活,打一周来同学们思想政治方面的“小报告”。他和同学发生矛盾,有一句口头禅是“我四个字要你命”:“四个字”指“思想不良”或“反满抗日”。后来还听说,广赖副校长、总务主任白滨,这两个日本人都都是特务。

当时我并不知道日本特务机关为什么这样“青睐”我们本溪国高。后来才知道,原来高班学长中,有由进步作家、共产党员作家花喜露在校外领导的读书会。读书会的带头人,先后有石岱宗、李继东、李太岩为首的一些学生,受花喜露的启发,为寻求抗日救国道路,自发地组织读书活动,读鲁迅、茅盾、巴金、艾思奇和苏联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前几届读书会的负责人陆续入关参加革命去了,后来有孟方平、王竞成、郝燮竺等人参加进来,接着组织读书活动。他们组织的读书活动,在日本人的严密统治下,改变了学生之间的风气,也培养出了好多人才。如20世纪50年代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李侃(李太岩),就是“读书会”的带头人。李侃离开学校以后,“读书会”的带头人是马忠骏,他领导“读书会”创办了地下秘密文学刊物《铁之流》《黑焰》《铁笛》。过些时候,因为斗争的需要,马忠骏、邓崇仁、王抗、王勇4位高班

学长秘密进关,到太行山区参加八路军,投身抗日战争。这件事在学校私下里秘密传开,极大地强化了同学们的爱国观念和民族意识。

早些时候我年龄还太小,没能被“读书会”的高班学长吸收,参加他们的光荣斗争,这自然遗憾。但是,在他们带动的读书、爱国、自强不息的风气影响下,我也从中受到了教育。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不久,马忠骏回到本溪,回到母校,和我们促膝谈心,动员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立即响应,1945年12月参加了革命。1946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候我也不过才15岁,说来还是少年……



“大东亚共荣圈”
地图

七、李季疯越狱来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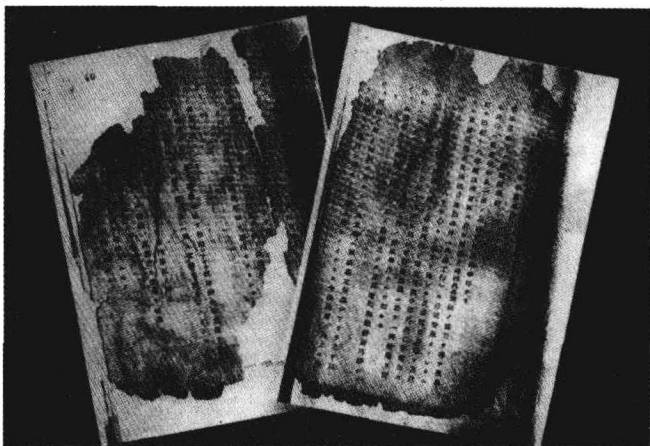
李季疯第一次被捕越狱

李平

李平 原名李萍,李季疯的妻子,与李季疯同时被捕。因怀孕生孩子保释出狱。李季疯死后,嫁给铁汉。

李季疯^①是1941年12月30日在新京西三马路福丰旅社被伪首都警察厅逮捕的。李季疯是伪首都《大同日报》的编辑,又是“满洲国”各大刊物上经常发表各种体裁作品的著名作家,经常出席各种官方、非官方的文化集会,受聘为伪治安部参谋司的嘱托,也是那时社会上颇有地位的知名人士。他的那些充满左翼思想的战斗杂文,不仅为追求理想的青年所热爱、所共鸣,视他为“满洲文坛上的鲁迅”,也为开始注意

记载侦察逮捕李季疯经过的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档案



李季疯(1917—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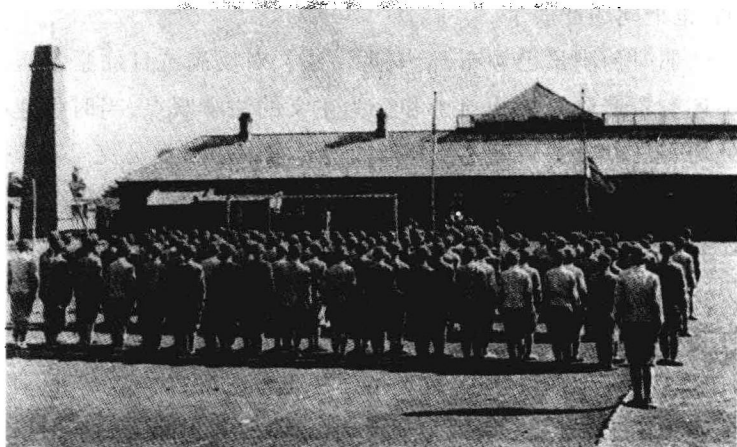


^① 原名李福禹,笔名季风、季疯、李季风、李季疯、磊磊生、亦醉、方进等。1919年出生,辽宁辽阳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婚姻之路》《夜》,杂文集《杂感之感》等。三次被日本宪兵逮捕,两次越狱,1945年8月23日被国民党“铁血锄奸团”暗杀于沈阳街头。

文化领域情况的特务机构所重视。现在既知他是这个左翼抗日青年组织的重要成员,又已逮捕,就认为他是找到这个组织所联系的国民党、共产党重要人物的合适人选,而且一旦争得他的投降,在知识青年中将影响巨大。所以对他的审讯,不但不严刑拷打,反而“优礼”有加,动之以利害,进行劝说诱降。

李季疯从被捕后敌人对他的态度中,洞知敌人的阴谋,决计加以利用,以便伺机逃走。他利用他特有的条件对敌展开了特殊形式的斗争。在被捕后不到半个月,即向特务科特高股特务田中侦夫撒了一个大谎,说他认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长春的重要负责人。特务让他把这些人的名字、地址写下来,他说,这些人没有固定地点,只能领着去认。当敌人要带着他去认时,他又指着身上的衣着和蓬头垢面的样子说,这样只能失败。最后派了八个特务把李季疯送到站前大和旅馆,先住几天,洗澡、理发、换上新衣裳,再去领他们认人。

李季疯在允许活动的范围内,仔细观察这所当时最豪华的旅馆,发现厕所有个窗户,可以打开,决定从这里逃走。他洗澡、理发完毕,夜间睡觉,特务将衣服、鞋帽全都拿走,只给他一套和服睡衣和拖鞋。特务见他睡下,还响起鼾声,戒备有些放松,将近半夜都困倦睡着了。李季疯假装去厕所,打开窗户,跳下楼去,虽然摔伤了胳膊、手,伤了小腿,万幸,还能行走。楼下不远处就是大马路,一辆人力车从火车站走来,李季疯喊他,他来到李季疯身边吃了一惊:在这寒冷的冬夜,这个人怎么穿着睡衣、拖鞋站在街头?李季疯急忙说:请你救救我,我反满抗日,被抓来,是刚从楼上跳下来的。车夫立即扶他上车,说我也是中国人,便狂奔起来。遇上一辆马车,又转由马车将季疯送到他的小组成员于长春家。当夜剃成光头、戴顶毡帽、穿一身破棉袍,挑着八股绳的担子,凌晨,沿着去吉林的公路疾行向前。于、李俩人到了吉林,在一个熟悉的书店住下。这次越狱成功,于长春返回长春,为李季疯筹措远行的路费。



锦州师道学校升日本
国旗、仍满洲国旗

李季风第二次被捕越狱

李平

李季风逃跑后,直到第二天清晨特务才发现李季风不见了。搜寻之后,发现是从厕所窗户逃走。伪首都警察厅立即派人各处搜查、四路堵截,一无所获。这样的政治犯越狱,对敌人震动很大。但是,李季风逃离长春之前,曾给他领导的小组交通员周云霞(周义侠)写过一封信,让她逃跑。周云霞见信慌了手脚,让她的干哥哥带她跑。她的干哥哥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惊慌失措,让特务抓去,只打了一棒子,就把季风和于长春逃跑的事全说了。1942年1月19日夜,特务到于长春家搜捕,正是于长春回长春筹款的第三天,当即被捕,接着李季风也从吉林被捕回。

敌人从周云霞口中得到一些李季风小组成员的情况,加上敌人从李季风、于长春、周云霞家中搜查到的书籍、信件、文稿等线索,不久就掌握了小组的情况,但没有立即逮捕。直到1942年六七月间对“一二·三〇”事件主要被捕人员审讯告一段落,才在7月将小组未捕者高守义、白光正、张国臣、韩文达、张京浩、段式斌、贾永芝等人逮捕。我因是李季风的妻子,和他同时被捕,因怀孕、分娩,这时已保释在外。

这些被捕者,最初在刑讯中也不肯承认敌人已经掌握了的情况。在日本特务把搜查来的证据或者其他入交代的材料摆在面前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的事情也就无法不承认了。当然,他们也在不断地设法串联口供。这类串供,减少了所受的酷刑,也把问题冲淡了。

那时伪满虽已颁布《治安惩治法》,对反满抗日加紧镇压,但有的日伪司法人员中还有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和行为主义的法学观点。当时伪建国大学、伪大同学院等处均有马克思主义著作公开借阅,日本书店出卖马克思观点的书籍也完全合法。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也把这批被捕者视为“一二·三〇”事件中的“左翼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思想犯”的罪名,加上又正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节节胜利时期,因此对文艺界这样的犯人似乎还想采取怀柔政策,所以经伪首都警察厅审讯转伪新京高等检察厅再审讯先后五个月的结果,有的人,先受伪检察厅如下一番“训示”：“你错了……你们这些青年都很可爱,你们的思想也都正确;虽然你们反对满洲国,然而由此可以证明你们是关心国家,因为知道国家不好,才想起来反对。这比只知糊里糊涂遵从命

令的一些官吏强得多。但是你竟贸然盲动,不计利害,这是你的错误。作为一个学生,只应安分读书,便算尽了你的责任……如果你有机会得到自由,站在你学生的岗位上吧!”过了一段时间,又勒令在印有“余以至诚,宣言今后决不再犯罪,决不再行反满抗日,如违誓言,今后听凭重惩”的《宣誓书》上签名,然后释放;有的人,则由伪新京高等检察厅上诉伪新京高等法院,由“法院判执行犹豫三年而释放”,虽然释放了,却在敌人监视中,随时可以重新逮捕,所以只是假释。至于这个“左翼文化运动”的“主魁李季风,从昭和十五年以来发表的作品中有浓厚左翼意识的,广播十四件,创作、评论、散文、诗等十八件,合计共达三十二件”。这样“罪行”的人,也没有判处徒刑,却不释放,仍在伪首都警察厅关押。

特务关忠显在供词中写道:“在‘一二·三〇’事件以后,我就改变职务,担任文艺团体视察,直到1945年5月。”所谓“‘一二·三〇’事件以后”,是指伪首都警察厅把“一二·三〇”案件转交伪新京高等检察厅以后,那是1943年初。这时,关忠显这个不小的汉奸的儿子、特务科里中国人文化最高的、在“一二·三〇”案中又以“功”受赏的人,调任文化方面的专职,说明敌人已经重视对文化方面的监视了。到了1943年春夏之交,李季风又和关沫南、王光逖(关、王是在哈尔滨逮捕的左翼作家)等三人被送到伪首都警察厅后面一个秘密拘留所,特务科命令替他们检查报刊文字。显然这是敌人利用他们以期能够“以毒攻毒”!既要利用,也就取掉犯人的刑具,去厕所、清扫、打水都有自由。他们吃饭,都由外面饭馆送来。只是不得跨出外门,在室内不能穿鞋,限穿日本木屐,另有特务新保、赵东坡两人看守。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季风和关、王两人商议,老作家已经出了名,日本特务不能轻易下手,就找些不轻不重的文字加以应付,同时观察形势,积极筹划二次越狱。

我每周都送去一次食品、杂物。10月中旬,按李季风的要求,送去一双棉袜子。11月5日,下雪天气,趁赵东坡上街之际,李季风跑了。那天,剩新保一人正和王光逖漫谈,李季风提着水壶去前面打水,几步跨出外门,丢掉木屐,穿上棉袜,在纷纷扬扬的雪中,拐到大街,直穿马路,很快就消失了踪影。后来敌人发现李季风不见,外面初冬的雪随落随化,马路上了无遗痕,哪里去了?后来把他在辽阳的弟弟抓来逼问,在他岳父家四周密布暗哨,凡与他有关的人、地,无不查清搜遍,再向各地发出李季风的照片,在全东北缉拿。1943年过完,就是整个1944年也还是没有得到一点儿线索。这说明李季风不但第二次越狱成功,而且能够长期隐遁下来!

伪首都警察厅的斜对门是“满洲国协和会本部”。1943年11月5日那天,李季风按预定计划逃进这栋楼里,找《青年文化》主编王天穆。王天穆认出是李季风,先惊

后喜,编辑赵仁昌、王家仁和王天穆都是爱国志士,他们共同为营救李季风脱险动起脑筋。想来想去,认为暂不能行动,便安排李季风藏到厕所里,由王天穆送去衣服、食物。第二天半夜,住宿的日本人发现在这个厕所虽多次敲门,常有人在,引起怀疑,嘟嘟囔囔地走了。李季风觉得再藏下去肯定要暴露,向王天穆要了个在协和会工作的人的名片,趁天黑跳出厕所的后窗,钻进大同公园,从大同公园走出,沿南岭直奔范家屯火车站,乘火车去了抚顺。

李季疯到抚顺投靠冰旅

李平 铁汉

抚顺有李季风的战友高德生,但他隐隐约约地听说了敌伪在知识分子中进行过大逮捕,而且下意识地感到高德生可能已经被捕,所以他到抚顺没有找高德生,而去找并不相识的、在抚顺市邮局任职的冰旅。他在拘留所“检查报刊文字”时,看到了冰旅刊于《华文每日》上的长诗《静静的辽河》和小说《灰色的命运》,诗后注有作者地址“抚顺邮局”。《静静的辽河》中有这样的诗句:

敢说人们已瞎了眼?
敢说人们已死灭了良心?
他们分清了黎明与黄昏。
但光明的心田,
总被凌辱渗浸,
希望有新的启示与人性在鸣,
荒冷的塞外,燃起了灼灼的烈薪。
如今,
他们仿佛是灿烂的春花,
被暴风雨摇断了枝茎,
净朗天空的旅雁,
被猎人击中。
他们,他们呀!

在世界的角落里，
度着艰苦的人生。

李季风认为能写出这样心声的人,对他的如此处境一定不能袖手旁观。

冰旅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冰旅是辽南地区负责人高德生领导下的成员张烈的笔名。据张烈回忆说:《静静的辽河》这首长诗,是在“一二·三〇”事件爆发后,张烈的良师益友高德生、詹靖国先后被捕,给张烈很大打击的情况下写的。当时张烈剃光了头,也准备被捕,和他们共同赴难。他的思想极端苦闷,“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于是《静静的辽河》一首长诗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于1942年发表于《华文每日》杂志上。他对李季风也已通过高德生及其作品有了深刻的了解。在高德生那里,常常看到李季风给他的来信,提出这样那样隐而可思议的问题。高德生还把李季风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杂文介绍给他。如“我不知道什么叫真理,我以为真理必是为了多数的幸福与光明的指针。我不知道什么叫公平,我以为那公平必是取得了多数人的表面与内心的同意”等。当时在文坛上,通过李季风的杂文,那种抗争的激情,给他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认为李季风在敌伪统治下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是一个代表东北青年向日本帝国主义反抗的闯将,在心目中对他产生一种崇敬之情。

李季风找到抚顺邮局,知道冰旅已经离职去抚顺日报做记者。于是又去抚顺日报社。关于他们见面和打通关系的经过,张烈回忆的情景是:

“来访我的人三十来岁(时年26岁),头发不长,手里拿个布提兜,一身洗过几次的制服,我迎接他。你是张烈先生吗?是。他顺手递过来一张名片:沈阳协和会,贾家民。然后说:如果你不忙,我们谈谈好吗?我们出了报社。他说:我很爱好文学,读过你不少东西,这次来抚顺办完事,顺便拜访,想和你做个文学上的朋友。从这个话题我们进行了交谈。他又说,可以到贵府上拜望一下吗?我不好谢绝,就陪他走到市郊戈布街我那墙上结着白霜、没有火炉的‘寒窑’。我的妻做了简单的饭菜,吃完已经7点多钟,他还没有走的表示。我的小桌上堆着当时出版的一些杂志和几本禁书。他一边翻着杂志,一边提出一些敌伪时期文坛上知名作家叫我评论,还问到早期的萧军、萧红。最后他指着《华文每日》上李季风的一篇文章给我看,内容大概是说,一个人认为可做的事,自可任劳任怨去做,认为不可做的事,决不可盲目苟合去做,做与不做的关键在于应不应做的焦点上。然后问我,你对这个作家有什么看法?啊!李季风是被捕两年了的反满抗日分子呀!我怎么评论?坐在我面前的贾家民闭着眼睛等我答复。是贾家民?还是日本的密探?半晌我没有作答。说吧!有顾虑吗?凭直觉他不是密探。

我毅然说：我对这个作家很崇拜，因为他的许多文章潜藏着不当亡国奴的思想，鼓吹青年起来反满抗日！这时贾家民睁开闪光的眼睛说：冰旅先生，你看我是谁？你不是贾家民先生吗？不，我是李季风，刚从长春监狱跑出来的。我惊讶！是真的吗？真的，我是李季风，找你是为了躲藏！停了无声的片刻，突然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彼此都不能自己地落下热泪。”

李季风从此就隐蔽在张烈的家里，深居简出，他们每天晚上都谈到深夜。张烈是独生子，高、詹被捕，他幸免于难，他的父母知道此事，总是担心出事。很多天，连假日也不见回家去，父亲就来看他，正碰上李季风正在捉虱子。二老反复严厉追问儿子：你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张烈被逼不过，对父亲说了实情。在今后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上，和父母起了激烈争论，父亲气得给他下跪……弄得张烈十分苦恼。日子多了，李季风从张的情绪中看出了问题，一针见血地提出。张只好以实相告。李季风说：老人不理解我们，并不奇怪，应该原谅。最后他说：我走吧！往哪里走？进关。山海关你能过去吗？从热河古北口进关，那里的检查松。就在张烈为李季风筹备远行旅费期间，他又提出进关之前要去盖平看看驼子，但不知地址。张烈立即给在沈阳医大读书的朋友李文中拍电报，邀回抚顺，问清了驼子的通讯地址。在他离开抚顺前，还一定要看望高德生的夫人张培芝。第三天晚上张烈陪李季风到张培芝处，他们在暗淡的灯光下，紧紧握手，潸然泪下。他安慰她、鼓励她，要她带着小女儿好好地生活下去，以迎接胜利。张烈为李季风筹到100元旅费。李季风在这里住了将近一个月，即将离别之前，给第一个救助他的王天穆寄去一个暗告平安的明信片。他明天就要登路远行，生死未卜，身边又一无所有，就以他那憨厚低沉的声音一口气唱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临别纪念。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中，张烈和李季风激动得拥抱在一起。第二天天快黑了，张烈把他送上火车。

李季疯投奔驼子

铁汉

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李季风很清楚自己无法进关。那时热河沿长城一带日寇制造了一个无人区，古北口根本不通行。他说进关，是为了减少张烈的精神负担，实际是要投奔盖平的驼子。他和驼子又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比和张烈的关系近，他就

会先去找驼子了。驼子的地址还是张烈找李文中问到的。其实也是“以文会友”。

驼子也是个反满抗日的爱国青年,把季风藏起来了,先在张克恩家,因张克恩所在的兴农合作社因为财务出了事,怕受检查,又安排到王锡成家中。根据季风的要求,驼子和锡成到沈阳找田贲,田贲同意掩护李季风。1944年2月初,春节前,由锡成陪同把化了装的李季风送到田贲家中。李季风与田贲畅谈几日,田贲又把他送到本溪自己的一个朋友家里住下来。不幸的是4月间田贲被日本特务逮捕了。

驼子的本名叫于家麟,田贲的本名叫花喜露,都是辽宁省盖县人,早在1938年就以文学爱好建交。日伪档案中有如下记载:“从康德五年(1938年)八月以来,于家麟和花喜露等人,为启发民众的民族思想而组织了秘密文艺团体L·S(鲁迅)文学研究会,并秘密刊印《星火》《行行》作为机关报。从康德七年(1940年)六月接触了任《营口新报》编辑的东北党务专员干部王觉,在王觉的帮助之下,利用该《营口新报》文艺栏,企图进行公开活动,并进一步组织范围更广的活动。”

此时,王觉已于1942年初“贞星事件”被日伪逮捕,5月13日被打死在狱中。但一些同志在出狱之后,又陆续开始恢复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同时在张宝慈的领导下,开始了再建工作。1943年10月10日,纪念“双十节”,还组织了外围团体读书会,设立了借书室、移动图书馆等。以通过读书研究文艺、发表作品,巧妙地获得了一般知识青年的信任。1943年以后,又创立“青年自觉社”。

驼子和田贲等人组织的鲁迅文学研究会,是一个以文艺活动为中心、思想左倾的青年爱国组织。后来与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系统的干部王觉接触,并在他帮助下利用《营口新报》文艺栏公开出版《星火》。1942年5月后,在张宝慈领导下,东北地下国民党进行各种反日和发展组织的活动。以上这种演变,基本上是鲁迅文学研究会中驼子等人的情况,张克恩就是驼子等1943年在盖县活动中的重要成员。而田贲等人继续按照原有的方向前进。

夕澄是《行行》《星火》两份油印刊物的参加者,也是和王觉建立关系的联系人。他回忆说:“1939年秋,我在营口结识了葛雷(原名葛庆文),通过葛雷又结识了《营口新报》的副刊编辑王觉,后来我们通过王觉,得以在《营口新报》副刊上出个同人文艺副刊,经田贲与驼子确定把《星火》公开移到《营口新报》上来,由田贲主编,因我在营口工作,就由我承担汇稿和给同人分发副刊的任务。《星火》副刊,先是一个月一期,后改为半月刊,约一年左右时间,一共出了20多期。至于《星火》的停刊,并不是因王觉被逮捕,而是王觉的反对。当时和田贲持同观点的卞和之(本名石岱宗)回忆道:田贲在发刊词上写了大意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文章不是为谁插花的,而是为人’

们开花的’，‘期待于他的读者，不止于知识层，且应有农夫、樵子、老妇和壮汉’……尽管当时我们只是以‘奴隶的语言’，利用敌伪的愚昧，及其力不从心才出现的一点空隙而进行微弱的战斗……却不能见容于王觉。到了冬天，见到《星火》的左倾色彩越来越明显，他竟直截了当地说‘反满抗日可以，但不许弄普罗文学，宣传赤化，如不改弦更张，那就只得停刊了’。田贲在以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后，便逐渐发现于家麟所宣传的言论已属国民党一套理论，主张一切要听命于中央正统政府。这样酷爱左翼文学的花喜露便和于家麟等人发生了分歧。这分歧也影响团结在花喜露同志周围爱好文艺的青年。1941年底，田贲离开盖县，到沈阳大东区凌云街公所当职员，经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老同学侯洛的介绍，参加了中共地下情报组织，调查日伪军工生产情况。”

了解了以上这些情况，也就了解了驼子、张克恩、夕澄等人救助李季风再转由田贲送本溪隐蔽的原因了。

后来韩又新又把李季风送到董国材家隐蔽。此后李季风接受了给罗大愚编辑地下刊物《东北公论》的工作，李季风的上级叫高士嘉，此人是仅次于张宝慈的罗大愚的第二助手。1944年7月下旬，罗大愚扩大国民党组织，把左的也吸收进去，口号也是统一战线。这样韩又新、李季风一起加入了国民党。

李季疯住在我家

王锡成

1943年深秋的一天，被日伪逮捕起来的李季疯越狱来到“秋灯”租书店。他讲到他是逃出监狱的，要求我们掩护他。同时讲到王觉已死在狱中。他这两年成天替日伪特务机关审阅文艺报刊、登记黑名单，花喜露、驼子的名字都在黑名单上，要格外小心。当时驼子把李季疯安排到张克恩家。当时张的爱人和孩子回了娘家，张克恩家里有地方住，没有别人，也方便。住了两天，并替李季疯拔去两颗牙，改变一下脸型。不幸的是张克恩在兴农合作社管的仓库丢了东西，日本人把张克恩禁闭起来，幸亏张抽空给门文东挂了电话，说日本人可能搜查他家，叫他赶快转移李季疯。当晚李季疯移到我家。日本人还真的搜查了张家。这样一波动，使我们感到李季疯的安全成了问题，应赶快将其掩护起来，又苦于没有好的去处，驼子叫我去找花喜露看看，估计他

会有办法。当晚我到了沈阳与老花计议,他答应了,只是要求我们暂时与李断绝关系,李也要与外界断绝联系。第三天我们就将李季疯送到了沈阳。直到光复我出狱后才又见到李季疯。更不幸的是,六七天后听说李季疯被国民党的特务枪杀在马路上。

我见到的李季疯

李昌钰

在日本的严密统治下,环境那么恶劣,心里十分压抑,我们小小年纪,正是好奇和有热情的时候,却都显得十分老成。我们都已经养成了习惯,我们不该问的决不多问。一次我去驼子家,他把我领到前院一处土平房里,给我介绍一位客人,说他姓吴。我见这位客人微白略胖,缺了一颗门牙,言谈说话很有风度。后来才知道那人便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著名作家李季疯,躲藏在他家。可见他为了朋友安全而不顾个人安危,实在难得。

李季疯第三次被捕及原因

郑新衡

郑新衡 原名李金山,1915年出生,后名李季若,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东北青年学生自发抗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因在1941年夏逃离东北,流亡入关,幸免于“一二·三〇”事件。著有《“一二·三〇”事件始末》(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

1945年初,李季风看到了蒋介石密令:三分抗日,七分剿共,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他为了政治清白,不但提出退出国民党的申请,要求强烈,而且一定要批准手续。1945年4月中旬某日,李季风按照与张宝慈的约会,前往张处办批准手续的途中,第三次被日本特务逮捕。在逮捕过程中,曾和日本特务摔打,并向过路百姓高呼:“我是李季风!我反满抗日!”显然这是借围观人之口,传知有关人士,防止牵联。

关于李季风二次越狱和三次被捕,给特务们的印象很深,特务关忠显在1960年

12月15日的供词中还写有：“李季风二次越狱逃走，首都警察总动员，大举搜查，很久未发现消息。过了很长时期，据日本人说，李季风在沈阳大街上被捕了，当时他还大声呼喊着李季风被捕啦！”

关于李季风第三次被捕的原因，既没找到文献记载，也没有口碑资料。但是，一些人士在私下里，出现了几种看法：

其一，李季风不但坚决要求退出国民党，而且还一定要批准手续，无疑会引起罗大愚、张宝慈等人的气愤甚至仇恨。李季风的被捕，又恰在应张宝慈之约前去办理批准手续的途中。“八一五”光复后李季风出狱，由于继续要求张宝慈给予退出国民党的批准手续，却在应张宝慈之约前去办批准手续的途中，张宝慈派人将李季风杀害于沈阳街头。所以认为李季风第三次被捕，是张宝慈事先向敌人告了密。

其二，在田贲、驼子等人被捕的“桃园工作”后，伪奉天警务厅长三宅秀也“对所捕人员加以刑讯，以彻底抓捕国民党抗日人员为目的，继续进行侦察逮捕工作”。并于“1944年12月召开了市、县特务科（股）长会议，指示搜查方针，组织特别搜查班”。就在李季风被捕之后，也是“1945年4月中旬，派省特务科员在奉天市北关区逮捕了国民党东北党部负责人张宝慈，监禁于特别拘留所。转移到长春隐蔽的罗大愚也于一个月后的5月20日被捕”。所以有人认为李季风第三次被捕，是在敌人加紧搜捕罗大愚、张宝慈等人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缉捕在案的李季风而加以逮捕的。

其三，李季风被捕后为敌人看稿子，从中发现、提供左翼进步文学工作者的线索，是叛徒。李季风从狱中两次成功逃出，决不是偶然的，是敌人导演的苦肉计，目的是通过李季风找到反满抗日的文化界人士。甚至认为日伪故意留个口子，暗中允许李季风逃跑，然后用他作诱饵，钓捕左翼反满爱国人士。李季风第二次越狱走的这条线，都被日本逮捕了。顺序又恰是与李季风走的顺序相反，先是本溪孟方平，而后是沈阳田贲，再后是盖平于家麟等人。这些人的被捕不能说他无关。罗大愚、张宝慈被捕与他也有关系。这些人认为，罗大愚、张宝慈等国民党人被捕，是李季风漏出的线索。所以，国民党锄奸团才暗杀他。

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反复调查也没有搞清楚，所以存疑。不过，共产党出版的刊物、文章，一般都把李季风作为左翼文艺战士来看。其原因，一方面是他确实写了许多对日伪不利的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另一方面，他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既然国民党是反动派，李季风当然就是革命派了。

李季疯是个什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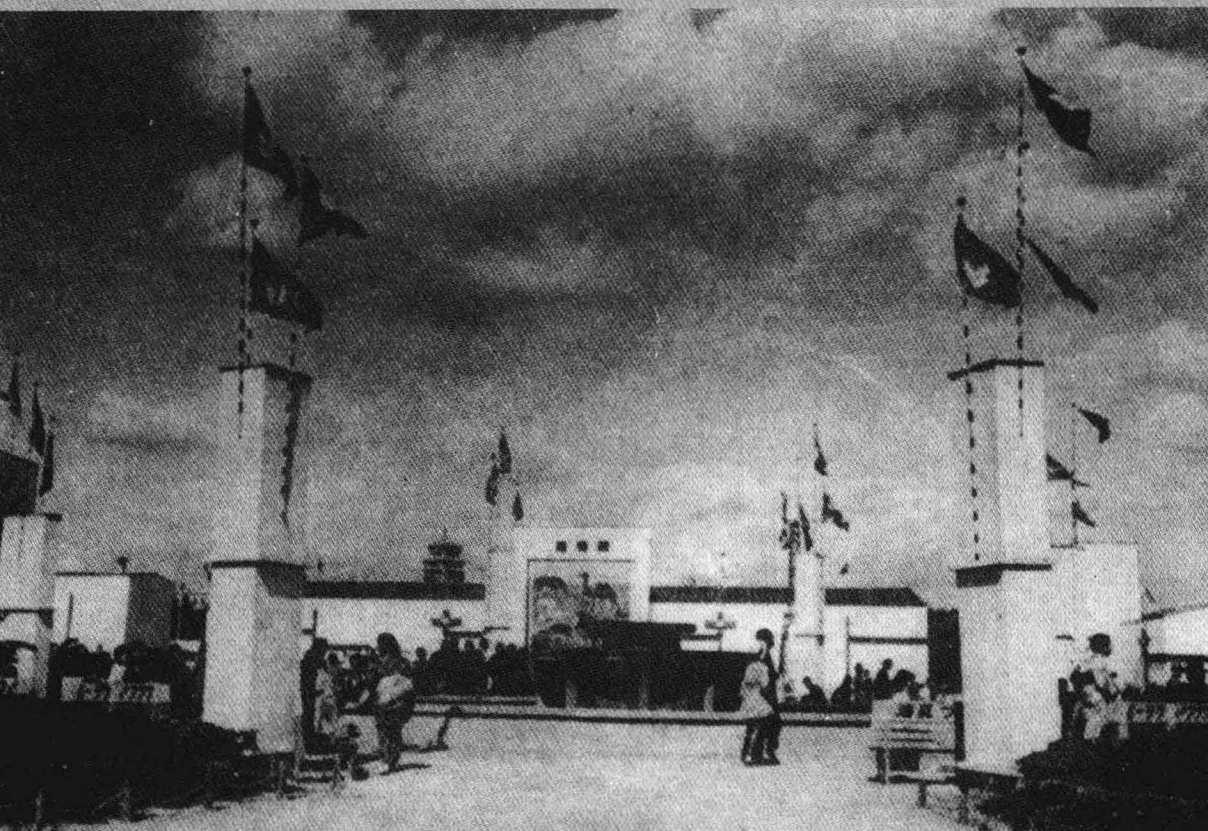
李季生

李季生 1922年生,伪满洲国通信社满文部校对员、编辑。做地下工作,被日伪逮捕,后释放。离休前系沈阳市公安局处长。姜静芳的丈夫、李吉恒的哥哥。

李季疯是个作家,他的作品对东北青年影响很大。这话不假。但是,他在被捕之后的行为,大家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敌人让他看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从中提供文艺界反满抗日分子的线索,他干了。他还能够两次逃跑。敌人看守那么严,他为什么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逃出来?是不是敌人故意地让他逃,然后再根据他的行踪找到新的线索抓捕更多的爱国青年?花喜露被捕是在李季疯从花喜露家里走了之后。这些都是偶然的吗?日本投降之后,他被国民党“铁血锄奸团”特务杀害于沈阳街头。原因也恐怕不只是他要退党。我在公安局工作,我看到的国民党档案说,李季风是帮助日本特务抓捕国民党的民族败类。

下编

“桃园”，绽放的血花



“桃园”，绽放的血花

我是王
把生命发出万道光
监狱里没有阳光
我怀揣十万个太阳
烈火中化作凤凰
折断翅膀也要飞翔
还历史一个公道
长夜过后是天亮

一、大逮捕在进行

田贲突然被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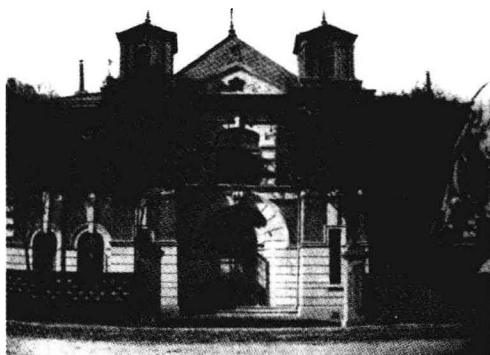
王丹群

说起“桃园工作”，你一定会想象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其实不然，那是日本侵略者对“星火”抗战文学团体进行大逮捕、大镇压活动的代号。敌人给大逮捕起了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很容易使人们想象到春天的桃园，桃花绽放，灿若云霞，婀娜多姿，光彩照人。敌人的“桃园工作”，就是迫使“星火”青年绽放生命的血花……

1944年4月28日深夜，田贲突然被捕了。那天，我们唯一的女儿才出生14天。

但是，他和我都很镇定。我们用坚定的目光互相表示决心。

我们早已有了思想准备，因为组织上已经把掌握的敌人要开始大清查、大逮捕的情报告诉了田贲。田贲不止一次对我说：“万一不幸被敌人逮捕，我们都要做到‘到我为止’。这是每个革命者的气节。我们参加的是地下情报组织，我的直接领导你都见过。所有这些只有你知道，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要懂得革命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一个人倒下了，千百万人起来了，革命者是杀不绝的……我们都要做好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



伪奉天警察署

田贲被捕，姜毅同志不能久留，他去找钱，我们准备一起逃离。恰是在我女儿满月这天，没盼来姜毅同志，一群日伪特务却闯进了门，这回他们不是抓人就走，而是住下了。他们气势汹汹地问我：“你丈夫的组织在哪里？マルケス明白不？领导人是谁？朋友是谁？”

田贲被捕，姜毅同志不能久留，他去找钱，我们准备一起逃离。恰是在我女儿满月这天，没盼来姜毅同志，一群日伪特务却闯进了门，这回他们不是抓人就走，而是住下了。他们气势汹汹地问我：“你丈夫的组织在哪里？マルケス明白不？领导人是谁？朋友是谁？”

“你不说再过几天你丈夫就上断头台了，你说了就可以免死……”

我说不识字听不懂，“什么马鹿哭似的”，和他们打岔。整整拷问了7天，敌人一

无所得。最后他们威逼田贲的弟弟花盛露写了保证书,意思是:你嫂子跑了抓你,你跑了抓你父亲及全家。另外甲长要监视我,如有行动警察随时可逮捕。这就像几条绳索紧紧捆住了我。可事情又是这样巧,特务走后的第三天姜毅同志回来了,他高兴地说:“这回我们可以一同走了,因为钱没准备足,才晚来了几天。”多亏他晚来了。我简短地告诉了他这几天的情况,催他快离开这里。

姜毅走了,他越过长城,到青岛进入山东解放区参加了抗日队伍。

敌人还以各种诡秘的办法来探听情况,有时扮作田贲的同事、朋友,有时又扮成小贩,使我与人们好像隔了一道墙,没有人敢和我说话,只有隔壁的齐贯一大哥、大嫂和他们的孩子偷偷来帮助我。

1987年当我看到《辽宁党史通讯》第2期《巩天民传略》时,我才知道齐大哥当时早已参加党的晋察冀社会部直接领导的秘密情报组织。但那时由于是单线领导,我们是互不了解的。后经过多方了解,1989年我才找到了他的次子,我当年的“小助手”齐雨藻(现广州暨南大学教授),但齐大哥和大嫂早已逝世了。

我知道的花老师被捕

李季生

我弟弟李吉恒是花喜露的学生,师生关系很好。从弟弟那里得知他不仅书教得好,而且善于团结同学,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弟弟进了盖县一高,花老师已到奉天(沈阳)工作,他们仍然不断往来。弟弟常向我介绍花老师的一些情况。我还时常从报纸上读到花老师用笔名“灵莎”“黑田贲夫”发表的文章。我很喜欢他的作品,受到一定教育,从而逐渐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尊敬、爱慕之情。

1943年秋,一高毕业生到新京(长春)毕业旅行,我选了《中国古代英雄传》《中国当代英雄伟人传》两本书让弟弟送给花老师。

1944年5月,盖县学生反满抗日事件暴露了,花老师也被捕入狱。我的内弟姜宗珺(姜毅)从奉天赶来新京给我们送信时,曾经向我介绍了花老师被捕的经过。

在盖县学生反满抗日事件暴露不久前一个春夜里,花老师家里突然闯进来两名不速之客。一个是盖县作家于家麟,一个是《康德新闻》、新京《大同报》记者李季疯。据说李季疯这是第三次从新京伪警察厅监狱里逃出来。为了逃避缉捕,他把十指的

手指肚放进开水中烫过，以毁掉指纹。李逃出新京后，首先逃到盖县找到了于家麟，又会同于家麟专程来到奉天拜访花老师。他们三人为了讨论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是跟着国民党走还是跟着共产党走的问题争论不休，整整辩论了一个晚上，谁也没说服谁。天亮以后，于和李一同离开花家。整个晚上宗琰都在旁边听，没有发表意见，但他是站在花老师一边的。

花老师曾经是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领导下的“东北救亡总会”成员，受到他的影响觉醒起来的许多青年，都投奔了抗日革命根据地。宗琰的弟弟宗璜（陶炎）和他要好的同学臧光华（花在归州小学时的学生），就是深受花老师的影响，国高毕业后，毅然决定闯过伪满“国境线”山海关，抵达北平准备奔向解放区的。因为臧光华阑尾炎手术，迟迟未能成行，耽误了时间。

这时，我爱人姜静芳已在辽阳被捕。宗琰和我遂决定去北平会同宗璜一同去解放区。大约是6月初，我们在出发前，决定把花老师的爱人王丹群和女儿铁虹带上一同走。当我们来到花家时，王丹群在家里。王丹群见我们突然出现，非常吃惊。我们说明来意，王丹群很慌张地说：“不行，我走不了！你们太危险了！特务刚刚出去，你们赶快走！”原来特务还在花家守候，妄图抓捕同党，不得已，我们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乘车南下了。

后来，我在火车上被捕。宗琰好歹混过山海关，会同宗璜投奔胶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了。

田贲被捕后我到沈阳

王锡成

1944年4月的一天，我来沈阳办事，顺便到田贲家探视，当时田丹（王丹群）同志的女儿才出生半月，她见我来非常惊慌，告诉我说田贲被捕了，她的住处四周可能有特务监视，叫我快走。还说田贲临走讲到“到我为止”的话。我问她敌特搜查拿去了什么。她说到处都翻了，拿了几本书，叫我速返盖县告诉同人隐蔽。次日早晨我给田丹买了点鸡蛋就匆匆坐火车返回盖县了。田贲的弟弟花盛露也来看望哥哥、嫂子，和我一道走的。

回到盖县，该通知的同人都通知了。5月，日伪特务在盖县展开了对“星火”同人

的大逮捕。我先是跟着于家麟躲到他表弟冯连稻家里，敌人抓不到他，就采用株连九族的办法，把他全家和亲戚十几口人都抓走了。第二天，我就从冯家出来。我在那里没有亲戚，往哪里躲？我往东山跑，我茫然不知所措，躲到山上，不知道往哪儿跑，往哪儿藏。我把鞋挂在树上，躺在山上，心里想：看鞋尖冲哪个方向就往哪个方向躲。结果鞋子冲我家的方向，我只好快快地回到家里。我想，这也省得家里人替我受苦。就这样，我被日伪特务以“违反治安法”的罪名，在家里逮捕。敌人逮捕我时，把家里翻个底朝上，房梁上、房包上，都掏了，连张纸都不放过。同时被捕的有 20 余人。在盖县警务科遭毒刑逼供达 4 个月，于同年 9 月，被敌伪移送至奉天小南门第一监狱。

没出两个月，在盖县的同人和一些青年学生，大都被捕了。有的逃到山海关，也被抓回来。驼子和王矜人被捕后押解到沈阳，大部分人在盖县监禁审讯。如盖平二高的学生就是在卧龙泉矿山劳动中被逮捕的。秋灯书店被查封了。日伪特务在盖县刑讯四五个月，入冬将我们一案的人押送沈阳第一监狱。

仅我能记忆起的这次被捕入狱的有：花喜露、于家麟、王克范、门文东、张吉宽、张克恩、孔庆举、许默语、许庆春、李勤甫、鲁启智（鲁琪）、李昌毓、臧永昌、喻庆令（铁汉、郁其文）、杨士绵、李季生、李季恒、赵廷奎、张文廷、高玉元、门恩义、王盛伦、于恩惠、周建涛、王德祥、赵怀范、赵宝峰、关振国、赵恂九、迟金镇（赵更）、姜静芳（女）、赵俊芬（女）、穆玉琪（女）、侯赓芝（女，孙萌）等 30 多人。此外，还逮捕了一些学生和被捕人的家属，有几十个人，没送监狱，后来从看押的地方释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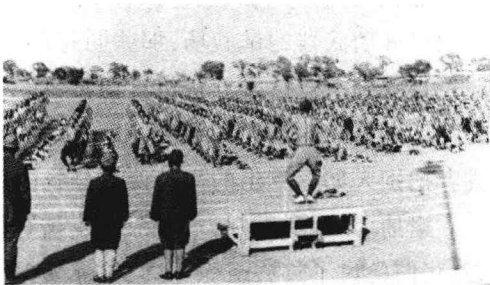
伪满后期“国歌”

花喜露被捕后的组织认定

侯洛

1944年4月中旬,花喜露同志要求参加共产党,组织已经批准了。贾玉冈同志和我已约好5月1日向他宣布,并举行简单入党宣誓。却突然获知他于1944年4月28日夜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对此,我们一直不了解被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组织对花喜露同志被捕是很重视的,甚至研究贾玉冈同志和我要不要离开沈阳。最后我们一致认为花喜露对革命是坚定不移的,在敌人面前能实现他的誓言,能经得起敌人的法庭、监狱考验,因此,决定暂不离开沈阳。事实证明花喜露同志被捕后,组织确实安然无恙,他确实是一个坚贞不屈的合格共产党员。

花喜露被捕的原因,在日本投降后才搞清楚。原来日本特务一直注意东北搞文艺活动和发表文艺作品的人,因此,他们专门设立机构,利用一些搞过文艺的民族败类和叛徒,调查利用文艺活动进行反满抗日的人;更重要的是审查发表在东北各地报刊、杂志上的文艺作品,然后集中起来,经过这些败类分析研究,得出属于何种政治倾向的作品和人物的结论,提供给敌人。花喜露就是经过这些败类分析出来的“思想左倾,有共产党嫌疑”的人物。因此敌人便将他逮捕,捕后在他家中搜查出一本还未烧毁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的残留部分,便如获至宝,确定花喜露是共产党无疑。这是敌人多年来想方设法要查出在辽宁省南部即他们所说的南满洲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一直没有捕捉到一点线索。因此,花喜露被当做最重要罪犯。敌人对花喜露使用软的、硬的手段严刑拷问,重点是要知道:“你的领导是谁?”“你何时何地参加中共的?”“你们的组织还有哪些人?”“你来沈阳是干什么的?”通过这些审讯,敌人不但没有从花喜露口中获得一点儿他们认为有用的材料,反而使花喜露清楚地了解了敌人并没有抓住他任何把柄,我们的组织也没有出任何问题;敌人之所以逮捕他,只是出自他的文学作品和文艺活动上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应付敌人的。此时他深深认识到我们要他停止文学活动是正确的,调他来沈阳也是对的。



伪满洲国学生赤露做“建国体操”

敌人在无可奈何中,便对花喜露同志每天晚上从7时起到次日凌晨7时止,进行了长达7个月之久的轮番审讯,他们还不间断地使用法西斯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什么吊大挂、过电、灌辣椒水、压杠子、皮鞭抽等,竟使花喜露同志昏死过11次。但他在敌人面前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以自己的血和肉保卫了组织和与他联系过的同志,的确确地做到“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组织的机密和党的纪律,死而后已”的誓言。由于敌人从花喜露口中一无所获,又无确凿的证据,最后敌人以“思想左倾,有共党嫌疑”判处他15年徒刑。

我在长春被捕

铁汉

我被捕的时间是1944年4月末。盖县事件的大逮捕尚未开始。逮捕我的不是特高科,是敌伪的新京保安局,这是直属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秘密的特务组织。我被押于长春绿园秘密监狱。这地方的看守全是日本人,审讯我的特务是中国通,名字我记得大概是叫吉田。因他长得黝黑、高大,我一直叫他“大黑塔”。与他一同过我堂的是个白俄青年人。在人们皆知的酷刑中,只有喝凉水我没尝到,过电却有9次,我的耳聋、牙落、记忆受损,恐怕皆源于此。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烙在我心头的仇恨,是没齿难忘的。

“大黑塔”一点儿也未提盖县事件,却将我发表的作品,共订成两册,摊在桌上,让我坦白如何用文艺反满抗日,然后让我交待参加什么党,领导人是谁,地下同志名单等。前者我极力辩解,后者我确实没有,他们不得不停止审讯。大约一个多月后,他们突然把我的眼睛蒙上黑布带,押上火车,送到盖县。绿园秘密监狱,后来成为日本关东军细菌武器的试验场,那些同我押在一起的中、日、朝抗日志士,都被残害死了。

当我到了盖县警务科留置场时,日本特务已经掌握了一切,审讯已近尾声。像在长春那样装糊涂已无济于事,唯一可做的,就是尽量把别人说成不是抗日不是爱国;或者把别人如李季生的作品说成是我的,但求能摘出几个人去,我也就心里安然了。

逮捕、酷刑和审判,不但未能使我们屈服,反而增加了我们与日寇誓不两立的决心。我们检讨了过去组织不严、领导无力、不懂武装斗争的缺点,私下里在发愤,一旦获释,将以最有效的地下斗争,报仇雪恨救中国。

抓捕驼子和门文东

门熙鼎

门熙鼎 1936年出生，门文东之子。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原任沈阳市北市区教育局干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回原籍劳动。退休前系盖县熊岳高中教员，系民盟熊岳支部副主委。

我生于1936年，当时我家就租住在驼子家院子里的前屋。驼子一家九口住在九间上屋里，他父亲早就去世了，家里有两位母亲、一个姐姐和一个异母妹妹，再就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的长女于晓桂比我大一岁，长子于声企比我小一岁，是我童年玩耍和上小学时的伙伴，因为他家房屋多，所以我总是在他家玩。驼子很喜欢和孩子们接触，一点儿没有烦我们的意思，我管他叫大叔，他很随和。他家的柜子和桌子上有好多书，但那时我对书还不感兴趣，也不认识那些书名。小孩子本来对贴在墙上花花绿绿的年画感兴趣，可驼子家的墙上却挂着几张字画，一点儿也不好看。据李昌毓回忆说那字画写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944年5月，日伪警察特务到驼子家的院子里来抓驼子和我父亲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4点多钟，日伪警察、特务来了一帮人，进院就把大门关上，把我们两家人都撵到上屋最西头那间房子里关起来，那是驼子二妈住的屋。驼子从后角门跑到馥馨香铺告诉我父亲，他们就都跑了。驼子的母亲、妻子、吃奶的孩都被抓走了，没抓我们家的人。但我们回家一看，炕也被刨开了，纸糊的天棚也都被扯乱了，真是遭了大难了。全家人都哭了……驼子家更惨了，都没法活了！

沈阳审判时的证言

于家麟

于家麟 笔名驼子、条条、灵昭、迢、迢迢、马它、贺草、马曳重、穆阿鹿等。1913

年生,在盖平中学读书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不久,盖平县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不能忍受日伪的奴化教育,愤而退学,在家自学和从事文学活动,与花喜露等成立“鲁迅文学研究社”,创办《行行》《星火》刊物,还经常在《诗季》《明明》《泰东日报》《大阪每日》等日伪报刊上发表诗文。1941年经王觉(营口地区地下国民党组织负责人)、李光海介绍,加入了地下国民党。并和王觉、李光海等人到新京(长春),组建新时代出版社,出版了《朝鲜短篇小说选》《法国败了》,正准备出版《英国向何处去》时,日伪进行“一二·三〇”大逮捕,逃回盖平县。1942年至1943年,与门文东、王锡成、张克恩等人创办了“秋灯书店”,组织盖平第一、第二和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学生开展“读书会”活动,并创办了《大地》《辰星》油印刊物,进行反满抗日活动。1944年5月初,被日伪特务逮捕,1945年8月9日被通知判死刑,8月15日奉天高等法院对他宣判时日本投降,8月19日出狱,受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委派回盖平县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并任书记长。9月份国民党长春某党部,又委派刘文斗为盖平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随之而来的还有张希鹏、赵洪发、林育明等。先说于的党部是假的,将其撵回家,后又要求与之合作,遭于家麟等人拒绝。1946年任盖县中学(今盖州熊岳高中)教员,1951年镇反时,被判15年徒刑,1954年沈阳审判时作为证人揭露日本战犯对“星火”同人的镇压罪行,刑满后回盖平县原籍,1979年去世。作品有《砂风曲》等。

伪满康德十年也就是1943年秋季,我和朋友王锡成、张克恩、门文东等人成立了一个出租图书的秋灯书店,目的是想进行文化工作,暗中传播进步文化书籍,以培养读者的抗日思想,对象主要是青年学生。

在开秋灯书店的同时,正好在青年学生中办起了两种油印刊物,一种是李昌毓主编的《大地》,另一种是臧永昌主编的《辰星》。油印刊物的稿件都是青年学生所写,内容是反映敌伪统治的黑暗、人民的痛苦、青年的反满抗日思想等。

秋灯书店开到第二年春,也就是1944年,在敌伪大抓“思想犯”的运动中,本溪湖的一个笔名叫方平的朋友被捕,他的本名是孟光远。他和田贲关系密切,结果把田贲也抓起来了,由于田贲手中有过去的油印刊物《行行》和一本张吉宽的日记,所以事情波及到盖平,我和许多人都被抓捕。抓捕我们的事,是以沈阳警务厅派来的日本特务为主,盖平县警务科和警察署协助干的。因为在这些油印刊物中检查出有反满抗日的内容,并违犯伪满《出版法》,还抓捕了许多学生。被捕后,我和王矜人被送到沈阳北陵拘留所拘押,和花喜露押在同一地点,其他人则押在盖平。经严刑审讯多

次,才被转到沈阳监狱。经“高等检察厅”的审理,有20多人被认为无罪释放;其他人则被判刑押于狱中,一直被押到“八一五”光复。

对日本战犯的控诉

冯连韬

冯连韬 于家麟的表弟,因于家麟躲在他家,受牵连被捕。1954年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时作证并出庭控诉。

伪满康德十一年,也就是1944年,旧历四月十九日晚,我在盖平车站被伪满盖平警务科特务加禾(日本鬼子)、赵金文(伪满警察署特务)和另外几名警察逮捕,逮捕后即送盖平警务科关押。

我被捕的原因是,我有一个表哥于家麟,因开书店传播进步书籍而被日伪称为思想犯。我们来往比较多,当日伪特务抓捕他时,他便逃到我家。我当时住在红旗园子,十七日夜,于和王锡成一同逃到我家,次日又由我家逃走,我在第二天早晨曾去天台看特务走没走,后被特务发觉,因此被捕。

因于家麟的牵连而被捕的达五六十人之多。计有:

于的家属:于侯氏,于的母亲;于史氏,于的二妈;于李氏,于的妻子;于家兰,于的二姐;于家云,于的妹妹。

于的亲属:于冶泰,于的姑父;胡秉刚,于的表弟,原系兴农合作社职员;冯连韬,于的表弟,原系宏泰号店员。

于的朋友:门文东,原系馥馨香铺会计;张克恩,原系兴农合作社职员;王锡成,原系小商人;郁庆令,原系沈阳报馆职员;花喜露,原系沈阳报馆职员,因狱中受刑惨重,出狱后不久死去;李琴甫,因在关押中受严刑拷打,出狱后死去;王矜人,原名王克范,教员,因遭受严刑拷打死于沈阳狱中;王家骥,原系沈阳报馆职员;陈子龚,原系馥馨香铺掌柜,在关押中因受严刑出狱后死去;彭尚信,原系牌长;陈玉立,原系职员。

被逮捕的学生:臧永昌,原系盖平第二高中学生;鲁启智,原系长春某中学学生;张登玉,原系盖平国高学生;穆玉琪,原系盖平女中学生;侯赓芝,原系盖平女中学

生；姜静芳，原系盖平女中学生；李昌毓，原系盖平某中学学生；王盛伦，原系盖平某中学学生；赵俊久，原系盖平国高学生；赵俊芬，原系盖平女中学生。

除上述名单外还有，但已想不起来了。在沈阳各地也有被捕的，但不知姓名。

我在被捕的第二天，日本警察和特务爪牙就对我严刑逼供，以后总是几天就一次毒打，用跪木棒子、压木棒子和倒背手吊起打以及灌凉水等酷刑加以残害。逼问我是否国民党员、青年自觉社社员和读书会会员等。有时被打得口鼻流血、皮开肉绽、死去活来。由于遭受多次毒打，致使我不能行动，加之又得了“回归热”，因此取保回家治疗 20 余日。同年 12 月，又因受刑过重，取保回家治疗 20 来日，直至 1945 年 4 月才将我释放。

同我一起被捕的人，大多数都遭受了这些严刑拷打。审讯室里被毒打的哭叫声终日不绝。有的因刑讯而死于狱中，如王盛伦等；有的因刑讯所致，放回家不久即死去，如花喜露、李琴甫等；有的被刑讯达 40 余次。刑讯后，有 30 多人先后被送交伪满奉天高等检察厅关押。1945 年 5 月由法院宣布释放一批，释放理由据说是《训民诏书》纪念赦免的，其余则被判刑，“八一五”以后才得以出狱，获得自由，获得新生。

“青年自觉社”与地下国民党

门文东

日伪警察特务当局出于办案保密需要，也是为了掩盖罪行，常常为镇压中国人民的案件起一个听起来与惨案无关联的名字，有时候这个名字还很好听。比如“贞星”事件是以发现反满抗日活动的日本特务的名字来命名的；“一二·三〇”事件是以逮捕行动的时间来命名的。“桃园工作”的名字绝对让你联想不到残酷。前些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营口市政协组织我们几位当事人对这个案件作了一些回忆，给田贲、王克范定了烈士。由于当时的形势，对共产党背景的抗日活动肯定得多一些，对国民党背景的抗日活动回忆得相对不够具体，这是可以理解的。

今天，思想进一步解放，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落实。我出于对历史负责，想说明一个基本事实：“桃园工作”是个国民党的案子，是日本特务发现了东北地下国民党的活动，才立案侦查的。“星火”同人是一个青年和学生自发组织的文学读书团体。最初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后来，因为攀上了王觉，王觉也是个爱国青年，是营

口人，是同乡，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经参加了救国会。当时他在《营口新报》做副刊编辑，他出于文学和反日的需要，同意把《星火》在他办的副刊上公开发表，给《星火》开辟了一个副刊。“消寒雅集”本来是大家兴致勃勃地来聚会和研究如何把《星火》办得更好，没有想到因为田贲和王觉的分歧而不欢而散，走到了相反的结果，《星火》从此停刊了。现在看来，我推测，王觉因为当时已经是国民党专干，是个相当一级的干部了，肯定是有意图的，要扩大势力。我们不敏感，田贲当时虽然在组织上还没有加入共产党，组织联系也不密切，但他的思想意识倾向于共产党，是与共产党一致的，所以才吵翻了。所以说，一个自发的爱国青年的松散的文艺团体，在反满抗日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它的一些成员在政治思想上又是有分歧的。这是很自然的。虽然当时不怎么明显，起码我当时没有觉察到。

此后，田贲去了沈阳，主要精力不在文学，而是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当然，由于自身的文学性和教师的经历，仍然与青年学生有许多联系，特别是他的影响比较大，主要是在沈阳和本溪产生影响，也主要是他原来在盖平的学生联系扩大的圈子，影响一些青年学生读书、写作，走上革命道路。田贲走了之后，盖平的读书、写作活动继续发展，秋灯书店的创办和《大地》《辰星》两个油印刊物的出版，都是在田贲离开盖平之后，应当说轰轰烈烈。这期间发挥作用的主要是于家麟几个加入了国民党的人和一些国高的青年学生。当然有的人仍然与田贲发生着一些联系，特别是田贲的影响还在。实事求是地说，作用还是于家麟的大一些。更何况于家麟有钱，对革命的资助也有一些。

当时的营口地区，地下共产党也有，地下国民党也有，都组织和领导进行反满抗日斗争。据中共营口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资料证实，1943年的时候，营口有4名中共党员。其中，市邮政局女职员陶冶（原名卜如珍）是张霖和边江介绍新加入共产党的。陶冶是边江的妹妹，抗战初期参加安国县抗日救国会，后到营口市邮政局工作。就是这一年，由国民党长春地区负责人罗大愚（罗庆春、魏忠诚）领导的“东北抗战机构”小组在营口成立。时任营口女子国高教员的杨友奎任组长，组员有20余人。杨友奎，出生于1904年，日本占领时期先后就职于营口县小学、营口女子国高。离休前系营口市第四中学教师。杨友奎领导的国民党营口抗战机构，焚烧了日伪兴农合作社仓库，仓库内的大量麻袋、木扁担等物被烧毁。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外围组织自觉社，也发展了40多人。可见，国民党的影响和活动比共产党大一些。

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都追查各种历史问题，特别是与国民党有牵连的问题，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前几年在回忆辽南青年文学活动时，都尽量

不提国民党,回避不了时就尽量寻找与国民党的分歧,在这种背景下,有人夸大田贲与国民党的矛盾就可以理解了。虽然没有说与于家麟有矛盾,但是给人的感觉,既然于家麟加入了国民党,田贲和于家麟也就保持距离了。其实不然,田贲去沈阳之前,我们几个人过往甚密,可以说好得就像一个人似的。田贲我们几个人是于家麟家的常客,吃吃喝喝、玩玩闹闹是常事。花喜露直接喊他驼子,于家麟一点都不生气,也没有贬低的意思,就像叫爱称似的。于家麟把李季风介绍到田贲那里,田贲二话没说,诚心诚意地掩护,又利用他自己在本溪的关系,把李季风送到本溪。由此可以看出,在反满抗日这一点上,我们大家是非常默契的。

“桃园工作”田贲首先被捕,但敌人是冲着国民党来的。从日本罪犯的供词和他们互相的揭发以及敌伪的档案,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从对于家麟、田贲等人判罪的轻重也可以看出来,因为于家麟与国民党有组织上的联系,所以判得重;田贲由于没有与国民党组织上的联系,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也没有暴露,所以相对来说判得就轻一些。

按照日本涉及“桃园”工作案件的当事人的说法,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冲着“星火”这个文艺活动来的,而是国民党领导的东北青年的活动。查来查去,查出了“星火”。他们把“星火”定性为利用文艺进行反日宣传,包括在“青年自觉社”里边。敌伪档案里关于重庆派国民党地下组织有下面记载:“盖平青年自觉社的情况是:自康德五年八月以来,于家麟和花喜露等人,为启发民众的民族思想而组织了秘密文艺团体 L·S(鲁迅)文艺研究会,并秘密刊印《行行》《星火》作为机关报。从康德七年六月接触了担任《营口新报》编辑的东北党务专员干部王觉,在王觉的帮助之下,利用该新报文艺栏,企图进行公开活动,并进一步组织范围更广的党的活动。”这里说的盖平青年自觉社的活动和事实都是关于“星火”的。但是,“星火”同人们在回忆中,都只说“星火”的活动,不提国民党的事,更没有一个人提到过“青年自觉社”。于家麟和花喜露也没有说到过“青年自觉社”。是他们不知道有这么个组织吗?那么,王觉知道这个组织吗?可惜他早就牺牲了。我推测,王觉应当是“青年自觉社”的主要人物。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于家麟是不是知道,我说不清。事实上,日本审讯时,必然要逼着我们供出与自觉社的联系。但是前几年大家都不提“青年自觉社”的原因,我想,一是这个名字就像“桃园工作”一样,可能是日本特务破获时起的名字,或者是只有王觉等少数几个人知道的名字,大家都不熟悉,所以不使用;二是在极左的年代,不提这个组织可以尽量不使历史问题复杂化,大家都被搞怕了。那时候,我和于家麟都给沈阳的国民党地下组织提供情报,用药水在普通书信的字缝里写情报,是张宝慈领导的,

也属于罗大愚的系统。王夕澄虽然也是地下国民党员，他不知道我们搞情报的事。不过，既然是国民党的关系，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方面的人，包括在台湾的和海外的，为什么没有人专门写过和回忆过“星火”和盖平县的读书活动呢？台湾国民党可是很重视党史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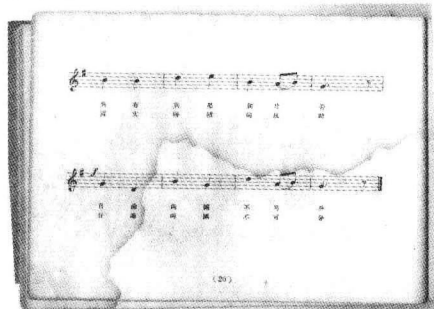


奉天北陵留置地(空闲土地)

爸爸王克范被捕

王剑华

1944年5月初的一天晚上，爸爸王克范对妈妈说：“今天有二位同人打电话通知我，老花（花喜露）在4月份就被捕了。我们的事情已经暴露了，我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一边说，一边开始整理书籍，他把和“星火”有联系的所有文稿、材料和书籍都找了出来，然后让妈妈把做饭的大锅添满水，妈妈帮着爸爸把这些东西全都烧了。整整烧到半夜，一大锅水都烧开了。妈妈不解地问：“为什么烧了？太可惜了。”因为妈妈深知爸爸爱书如命。爸爸说：“这些东西都和‘星火’有关系，如不及时烧掉，落入敌人手



伪满校园歌曲《日满不可分》

中就是证据,它会危及其他同人们的安全。”妈妈焦急地说:“那你也得赶快躲一躲呀!”爸爸说:“躲有什么用?已经来不及了。抓不到我敌人是不会罢休的,会把你们(指全家)抓去进行报复的,那帮法西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妈妈说:“可你被抓走了,这个家和孩子怎么办哪?”妈妈哭了。爸爸镇静地说:“你先别哭啊,要革命还能没有牺牲吗?革命不是为了自己,没有国哪有家!文天祥有句诗你知道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便我被抓了,无非一死,古人尚如此,我们又何惧!”烧完书刊,爸爸照常坐在灯下给学生批改作业。第二天照常坦然自若地去学校上班。

大概是爸爸焚书的第三天,日本特务机关的两辆警车同时开到我们家 and 永安屯小学。我

家大门有两个特务站岗,然后把我们全家人赶到一间房子里看管起来,其余的特务们恶狼般扑到爸爸的房间搜查。强盗们把天棚给拆了,炕给扒了,地也给刨了。查不到什么证据,就把爸爸的一些书给拿走了。在家里没抓到爸爸,所以特务们搜查完了也并不走,在等着。这时村头传来警车凄惨的叫声,那是去学校那辆警车已抓到爸爸又开回我们村通知这辆车走的声音。当时村里有人看见爸爸被头蒙黑布押在警车上。这时特务们才把我们全家人放出来,然后跳上车走了。

去学校的那一辆警车开到永安屯学校时,爸爸正在给学生上课。有两个穿着便衣的特务,不露声色地来到办公室问:“这儿有叫王克范的吗?”有人说:“他不在,刚刚走,给学生上课去了。你们有事找他,我到教室给你找。”在场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是特务,更不知道是来逮捕爸爸的。因为爸爸秘密从事“星火”活动外人是不知道的。特务马上说:“不用,我们在这等他。”下课时,爸爸回到办公室,两个特务问:“你就是王克范吗?”爸爸知道这两个人是来逮捕自己的特务,镇定地说:“我就是。”爸爸被特务抓走了。在场的师生被这从天而降的事情惊呆了。学生们都哭了。其实爸爸讲课时就已听到了警车的叫声,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心里很清楚了。但他仍然从容自若地给学生上完这最后一堂课。他这惊人的镇静、临危不惧的胆略是来自他坚定

不移的革命信念和视死如归的高尚气节。



对盖平一高的大逮捕

高玉元

1944年5月,大约在中下旬的一个早晨,县警务科组织全县城的警察、特务全部着便衣,秘密包围了学校。原计划外出劳动的三年级丙班也临时变更,全校师生一律不准外出。每天师生共同举行的“朝会”也匆忙结束,顿时空气十分紧张。这天不按课程表上课,各班都由级任老师(班主任)上课,同学们都感到气氛异常,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都默默地互相观望着这不幸的来临。突然,4个便衣特务闯进我们三年级乙班的教室,级任吕老师立即点名,首先点出赵廷奎,其次是我和赵怀藩、李如东。几个便衣恶狼似的扑向我们,扣上手铐,立即搜查书桌,又到宿舍翻查我们的行李、柳条包,并带走一部分书报杂志。其他班级的同学也同时按同样的方式遭到逮捕。然后把被捕的十几名同学用汽车送到警务科。因为当时逮捕的人太多,一时城内留置场容纳不了,便将我和赵宝丰、赵怀藩、洪声钜、关振国5人用火车押送到熊岳警察署。这次的大逮捕曾轰动一时。当时盖平一高被捕的同学有四年级学生杨士绵、赵宝丰,三年级学生王盛伦、李连泰、赵廷奎、高玉元、赵怀藩、李如东、洪声钜、关振国,二年级学生张文廷、赵俊九,计12人。已毕业的同学先后被捕的有张吉宽、郁庆令、李昌毓、李吉恒等。

上课时被捕

关云车

大约在1944年5月初的一天,我们正在上日语课,忽然警笛鸣响,警察包围了整个校园。四个警察和两个日本鬼子闯进了三年级丙班教室,叫我和洪声钜站出来,搜查我们俩的书桌后接着带上手铐,用毛巾蒙上眼睛,推上警车,直送熊岳城警察署关押起来。在这里关押的还有三年级乙班的高玉元等人。事情很清楚了,参加读书会活动和参与《大地》的人全都被捕了。这是日寇在东北大地上大兴文字狱的罪恶行径,他们企图用血腥的镇压扑灭盖县青年反抗日寇的爱国热情。这些法西斯恶魔用尽了灌凉水、过电、老虎凳、压杠子、上大挂、烧烟头等酷刑折磨我们。除了汉奸王翻译结婚那天,几乎每天不间断地拷打我们三个多月,至今我的上、肢和手仍留有伤痕。王盛伦同学就是因受这些酷刑牺牲在狱中的,他当时刚满16岁。

我的被捕

洪声钜

1944年春的一天上午,全校学生正在上课,突然开来几辆卡车,上面有荷枪实弹的日本警察和伪警察。他们一下车就包围了学校,并到各个教室抓人。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震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三年级丙班我和关振国当即被抓走推上汽车,开往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到熊岳城,被投进熊岳警察署监狱。同时还抄了我住的宿舍,从我的老家里抄走了《大地》杂志和他们认为可疑的东西。

日本侵略者面对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如临大敌,怕得要命。不仅把我们分割开来,每个监号只关一人使我们互不相见,而且特地从奉天等地调来日本警察加强对监狱的看守。并且调来日本警官和翻译对我们进行刑讯,非要我们承认参加“学生读书会和出版《大地》是秘密结社,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满抗日活动”不可。而且屡施酷刑,同学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就连同监的犯人们也为之泪下。

我在监狱里患了伤寒病，找来日本医生也治不好，已经奄奄一息。因为伤寒病是传染病，日本人害怕传染，才通知我家里允许保外就医。自我被捕就与家里断了音讯，直到这时家里人才知道我重病垂死在熊岳警察署的监狱之中。

我到家后，虽经多方求医诊治，但因病情严重，一直不见好转。日本人虽然怕传染允许我保外就医，但并没有放松对我的监控。除每两个星期要送一份医生对病情的诊断书外，还几次由日本警官带医生来验看病情，并派伪警察经常到家察看。一旦我病情好转，就想再拘回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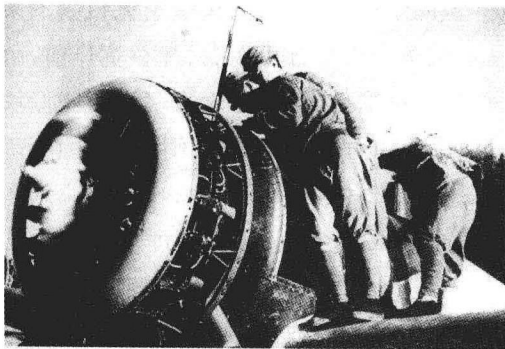
后来，我们这批被捕的同学都解往奉天第一监狱。1945年5月份，日伪在奉天要对我们进行宣判，我因病不能前往，他们强迫我的父亲代我出庭受审。结果是定为“思想犯”，有些同学包括我在内被判处“犹豫判刑”释放。什么叫“犹豫判刑”？实质上就是什么时候想抓就抓，也即是释而不放。还有些人被判刑，另外有的人如王盛伦同学就死在奉天第一监狱中。

在“勤劳奉仕”中逮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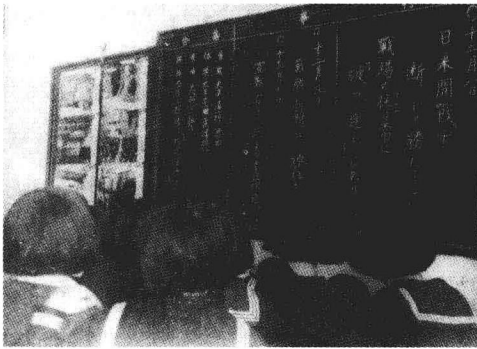
臧永昌

1944年春，我班进入毕业年，要进行一个月商业实习。全班学生被分散到城内一些较大商户，练习开票、做簿记、打算盘。随之而来的就是停课离校4个月的“勤劳奉仕”了。伪满规定，不参加“勤劳奉仕”，不能得到毕业证书。

4月，在级任先生（班主任老师）率领下，去了离城百里左右的卧龙泉莹石矿。两



“勤劳奉仕”中的学生在制造飞机木质辅助桶



“战时教育体制”课程表

辆无篷大卡车载着我们40余名“奉仕生”，坐在自己的铺盖卷上，抱着装有碗筷、水缸、盥漱用具等杂品的网兜。我还带了一个小木箱子，内有几本书和笔记本、纸张、笔等。车出东城门，开上大道，眼前亮出一派生机勃勃、万物复苏的春天景象。同学们陶醉在大自然的春之怀抱里，唱起歌来。但当车停在矿区街上时，一路上愉悦的心情一下子破碎了。望着我们的一些矿工和他们的家人都很羸弱，面黄肌瘦，衣服褴褛，住的是破陋低矮的茅草土坯房。他们想接近我们，却被戴着战斗帽、手持棍棒的日本人拦了回去。这一切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地方了，这是日伪奴役压榨劳动者的罪恶毒窟！我们被带到山中一处原是单身矿工住的土工房。工房有东西屋，两屋中间有两个锅灶，两口大水缸。屋内对面长土炕，铺着席子。后墙有两面小纸窗，阳光射不进多少。空气窒闷，霉气冲鼻。级任先生给我们定了铺位，他睡在炕头。这天午饭，是粗高粱米干饭，菜汤。做饭的是从矿区找来的两位中年朝鲜族妇女。下午，在级任先生的指挥下，打扫宿舍，清理房前房后的粪便、垃圾，挑水灌缸。晚饭吃了粗面大饼子。晚上，矿山也防空，放下黑红色纸合成的窗帘。8时就寝，级任先生捻熄了挂在他铺旁墙上的蒙着纸罩的电灯。

早上6时，“当番”（值日）生吹哨起床。早饭后的一小时以后或由级任先生集合训话，或者个人活动。8时，整队上山去矿坑前劳动。第一天，一个日本技师讲了莹石（ほたゐいし）的有关知识和手选矿石的作业规程，还讲了这种矿石的生产和“大东亚圣战”的关系，说制造飞机缺不了它。又有一个日本工头讲了十多条“惩戒须知”，态度很严厉。

“奉仕”生不和矿工混在一起干，要先在一个矿坑前开出一块手选矿石的场地。像我年龄一般大的同学即使光着膀子拼出全身气力，抡起镐头，也刨不动乱石头。震得虎口发痛，磨得手掌出了血泡。级任先生急了，调遣几个力气大、年龄大的同学猛干。他们也累得大汗淋漓，呼呼直喘。这时，其他同学用锹平地，向土篮子里装刨下来的石头，扔到山沟里去。场地开出了，矿工从矿坑里用工车推出矿石，卸在坑口前，由“奉仕”生用土篮子挑到场地上。不停地挑，肩膀压肿磨破了。场地上堆起一座座像坟包似的矿石小山，“奉仕”生以班为单位，用铁耙子和手从矿石里扒拣出光泽的莹矿石，装在土篮子里，经日本技师、工头巡查检定，级任先生以篮记数，再由学生挑到固定地点贮集成堆，待到一定数量，挑到山下装车被运走。超负荷、超时间、超体力的“勤劳奉仕”，使学生们腰酸腿疼，精疲力尽。从矿石上发出的那种硫磺味和岩石粉尘，更使同学们发呕呛咳。来矿山前，听说很多矿工得了矽肺病，大家准备了口罩，但戴得时间长了，憋得难受，摘下透透气，粉尘就乘机进了口鼻。同学们真怕在这“奉

仕”的4个月里患上可怕的矽肺职业病。日近西山头，熬到收工的时候了，有的同学边下山边气愤地说：“我真想回家不干了，不要那张国高文凭了！”

我们不和矿工在一起干活，但下工时，也能看到那些手提瓦斯灯、头戴柳条帽、一脸汗污、两眼血丝、披着漏花棉袄又满是泥水的矿工，极度疲乏地从矿坑里钻出来。后来，我在晚饭后找机会和到山里挖山菜或做点什么的矿工接触，了解到矿工的一些苦难生活。有一个矿工在矿坑里遭冒顶棚塌砸死。之后，他的妻子也病死，留下的十一二岁的孤女在矿区讨饭吃。

有一天，在选石场上吃过值日生挑送来的午饭后，一个指导我们选矿石的30多岁的朝鲜族技师走近我，蹲在我身旁，用不通顺的汉语和用铁榔头在地上写汉字与我交谈。他问我学校的课程有哪些，随后竟问我：“安重根，知道吗？”根据平日对他的观察，他不像奸细，我于是点了点头。他接着说：“安，杀了伊藤博文，了不起！”我不能向他表示出我对安重根的敬佩，而他却又说出了令我吃惊的一句话：“中国、朝鲜是兄弟！”这时，级任先生走来，我迅速地站起，向那位朝鲜人笑了笑，离开了他。我当时想，虽然日本侵吞朝鲜40多年了，并不能泯灭朝鲜人的爱国心、反日心。

矿区警察派出所对面有一家裁缝店，我去补过衣服。三位年轻女裁缝工都是从外地裁缝学校毕业后到矿区谋生的。经过两三次接触，我向那位管事的女裁缝说：“大姐，我有一个小书箱，宿舍地方小，不方便，我想在你们这里寄存一下。”她毫不犹豫地：“可以，就放在间壁后面吧！不过箱子要加锁，别丢了什么。”我的小箱子本已加了锁。这样，我就找到了放书的妥善之处。

到矿山“勤劳奉仕”后，我的读写并未停止。我在日记中写道：“正午休息时间，我和同学漫下到深谷间，在一块光滑的大白石上躺下，读着厚厚的《世界文化史》。”离我们工房不远，有一所小学。我和周建涛、王德祥晚饭后去过那里，和住校的一位老师商量：“白天干活，能不能让我们晚上来教室看点书？”这位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级任先生熄灯后，他和同学们响起鼾声，我们三人爬出被窝，蹑手蹑脚溜出工房，到了教室里，点起带去的小松油灯，在微淡的昏黄的灯光下，对坐着埋头看书或写东西。我在日记中写道：“月亮从夜的中天爬到开着的窗子里，我们三人才伸个懒腰，合上书搁下笔，把东西收拾收拾，挟在腋下，一同走出破落的教室。”“宿舍里别人早都睡浓，鼾鸣响动满室，我们三人不敢碰出一丝音响，悄悄地爬进自家的被窝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以听来的那个不幸孤女的凄惨遭遇为题材，写出了小说《小银》，用笔名臧晶在《康德新闻》副刊《新文坛》上连载了3次。我还整理出《矿山日记抄》，用臧青镜笔名寄给《新满洲》杂志，发表在当年第9期上。那时，我已入狱4个月

了。

殃祸袭来，噩运终于到临。一天，早饭后，离整队去矿坑还有半个多小时，我想利用这点儿时间读完《海上述林》最后几页。看完了，得赶紧送到裁缝店，藏进小书箱。我走出工房，吸着含有草木清香的新鲜空气，迎着缭绕山谷间的棉絮般的晨霭，去往偏僻处。就在这时，我一眼看到从东西两方奔来一些人，穿戴异常，气势汹汹。不好！是警特包抄抓人来了！我迅即回身退入工房。

腋下挟着的这本书怎么办？我急中生智，陡然想到前一天矿区工人来修理过西屋南炕，在炕梢的塌陷处漫上黄泥，用木棍支起炕席晾干。我几步跨入西屋，背着人把书投到炕席下面，拨倒支棍，书被盖住了。当我走出西屋进入我住的东屋时，如狼似虎的警特们闯进了东、西两屋。但这时我紧张的神经已放松下来，因为我身上的“罪证”消灭掉了。

《海上述林》这本书是花喜露的，是瞿秋白译、鲁迅编的马列主义文学理论书。书的封皮做了伪装，侯赓芝把它转借给了我。从这本书，可肯定书的主人和看书的人是怎样的人。书是上海出版的，怎么输入东北沦陷区的？都有哪些人传看了它？又经过谁传给了我？这些，如果书落到警特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我每想起这件事，颇感自幸，引为自慰。

日伪警特 10 余人，身穿中式便衣，手持短枪，横眉立目，杀气腾腾。为首的是一个日本人，矮个子，连腮胡，戴眼镜，长衫礼帽。他命级任先生集合全体学生，同学们分两排立定，屋内一片死寂。为首的日特掏出几张卡片，念出的第一名就是ゾウエイシヨウ，这是我的日译名。我离排站出。一个警特上来给我卡上手铐。日特接着念出的名字是周建涛。级任先生声音发颤地说：“请病假回家了！”日特发了脾气，大声骂“ほか！”又念出王德祥、于恩惠的名字，也给他们卡上手铐。我断定：《辰星》暴露了！

警特们搜查了我们三人和周建涛的被褥和放在脚下横板上的日用物品，但他们没有搜出他们所需要的“罪证”。我们被推搡出工房，押往矿区警察派出所。

一台载重大卡车停候在派出所门前。为首的那个日本警特指挥上车。他边把我推进驾驶室，边凶恶地向我说：“你的，大大的，死的有！”他守坐在我身旁。王德祥、于恩惠由其他警特押上后面的敞车厢里。

有几位矿工还有几个妇女和孩子站在他们的茅屋土房前，远望着我们三人被押上囚车。我想，他们一定恨死了万恶的日本鬼子。他们之中一定会有一个月前迎着学生们下车的人。派出所对面的裁缝店，此时紧闭着门窗。三位裁缝大姐再也见不到我了，我想，她们会探听到被抓走的就有在她们那里寄放箱子的那个学生。我心中深

怀歉意地暗暗念叨：“大姐们，你们受惊了！”

我的国高学生生活结束在1944年5月19日。这一年，我刚满17岁。

在矿山被捕

于恩惠

于恩惠 笔名洁心，1925年出生，伪满盖平县第二国高学生，参与油印刊物《辰星》出版、写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离休前系盖县盖州高中副校长。

1944年5月，盖县发生了大肆逮捕事件。当时我已是国高四年级学生（冬季毕业），正在卧龙泉矿山劳动。日本侵略者为了奴役中国学生，到毕业这一年必须参加体力劳动三四个月，名为“勤劳奉仕”。有一天的早饭后，已经到了应该集合赴矿区劳动的时候，但领导我们劳动的班主任刘老师，却迟迟没有吹集合哨子，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动静。

正当我们等待之际，刘老师突然出现，他让我们集合到一个寝室里去。我们50多人分住两个寝室。这时，在寝室的四个窗口也分别出现了两三个陌生人在往室内张望。在刘老师的身后，也出现了一个日本特务和几个便衣警察。刘老师拿起点名簿开始点名。就这样，臧永昌、王德祥和我被日伪特务、警察逮捕了。由于周建涛当时不在矿山，所以没有和我们一起被捕。

我被捕的原因是在盖平县二高升入二年级的时候，同班同学臧永昌向我约稿，目的是通过写文章联络盖县三个国高爱好文艺的同学，交流写作经验，启发爱国热情，鼓舞反满抗日斗志。臧永昌把我们写的稿子收集起来后，秘密的用油印机印了一本16开本的小册子《辰星》。在这一期上共登有20几篇诗文。

我们三个人在10多名日伪警察、特务的押送下，被分别送到了警务科和盖州警察署的看守所里（当时的看守所叫留置场）。警察署的留置场共有7个监房，每个监房可容4人到7人不等。我和一高的王盛伦同学一起被关押在7号监房。

被异母兄嫂骗捕

姜静芳

我从女子国高毕业了,在那日寇统治下的暗无天日的社会里,毕业就是失业。我要自立,我要奋斗,我要走上社会。1944年春,我来到新京(长春)投考一家杂志社当编辑,结果落选。经过李季生的姨父王耀纪同志的介绍,我在伪满官需局做了一个雇员。王耀纪就是田琛,是盖县归州人,当时是中共地下党长春负责人,公开身份是伪满国务院官需局属官。介绍田贵加入救国会的也是他。从此,我就在田琛同志身边工作。

1944年5月20日左右,我的二弟姜宗琏(即姜毅,当时在花喜露同志领导下,打入伪满奉天飞机制造厂当工人)突然从奉天(沈阳)来到新京,告诉我盖县的于家麟被捕,《大地》《辰星》被查抄,所有撰稿人大部分被捕,奉天的进步作家花喜露也遭到同样厄运,让我赶紧逃离新京。早在春天,我的三弟姜宗璜(陶炎)和同学臧光华(盖县人,花在归州时的学生)在奉天第三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后,二人一同闯过山海关,在北平等待机会准备到解放区去。于是,我们决定闯过山海关,到北平会同三弟一起投奔解放区。当时,伪满把山海关划为“国境线”,没有“出国证”是过不去的。我们正在想办法,就在这时,特务追踪到了我的住所——满光打字学校。特务并不认识我,拿着照片核对,我乘机从后门逃了出来。我找到了李季生,是他不顾一切,黑夜把我送到老家复县马家屯。并与二弟约好一同逃往关内,投奔解放区。

不幸的是,当我路过辽阳时,却被异母兄嫂骗至大哥岳母家,把我交给了守候在那里的盖县警务科特务赵景文,被连夜押送到盖县警察署。不久李季生也在火车上被捕。

由于我经常写东西发表,小有名气,穷凶极恶的日伪特务就把我当做女高学生的头头,进行严刑拷打。日本特务吉田、加部多次给我“上大挂”、“压杠子”,逼我供认反满抗日活动。越打我越恨,后来特务股长审讯,我干脆一言不发,直气得狗特务发了疯,把我一直吊打得昏死过去,才放下来,丢进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我的两腿被打得动弹不得,双臂被吊得失去知觉,躺在地上不能翻身。与我关在同室的是一位同学

的母亲，由于那位同学逃跑了，特务就把他的父母抓进来。这位同学的母亲一口水、一口苞米饼子喂我，是同学们的家长千方百计送进来的饭食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由于在那长期不见阳光、阴暗潮湿的监牢里躺得太久，致使我的双腿关节僵直，不能走路。日寇便派两名警察每天拖着我在院子里溜，才慢慢好转过来。

在逃跑中被捕

孙萌

1944年4月底5月初的一天，在沈阳和花喜露在一起工作的姜宗琰，突然来到我家，他是我的好友姜静芳的二弟，我们都叫他二哥。他说：“花老师被日本特务抓走了。你们同他有书信往来，怕搜查到信件，要有个思想准备。”我当即把在学校寄宿的穆玉琪找来。二哥把花老师被捕的情况说完以后，一再安抚我们：“别慌，你们都是学生，大不了担点嫌疑，一定要沉住气。”后来我们才知道，二哥是1943年去的奉天，花老师把他安插在一家军工厂当工人，担负着为我党收集敌伪军工生产方面情报的任务。当时我妈妈知道他是我要好同学姜静芳的弟弟，热情地留他在家吃了一顿饭。饭后我给他一杯漱口水，二哥笑说：“普罗阶级没这个习惯了。”说完他自己笑起来。显然他是想用他的幽默安抚我们的不安。

怎能不紧张？谁人不知，伪满宪兵队抓“思想犯”是要掉脑袋的，而我们毕竟都是十几岁的学生，哪里经历过这样的事？二哥走后，我和穆玉琪也没个章程，只能继续上学，硬着头皮等着。那段日子，真是心惊肉跳，吃不香，睡不实，我夜里睡觉都不敢脱衣服，常在半夜听到狗叫一惊而起，白天上学经过警察署门前，总觉得那两个持枪站岗的兵是在盯着自己，就这样几天过去了，好像在等着厄运的降临。正在这时，穆玉琪来找我，递过一封信让我看。她说：“你看，咱们的救星来了！”原来这是她过去的一个同学从北平来的信。他是一个月前同姜静芳的三弟一起路过北平要去山东根据地。信用隐语说他患病住在北平的医院，最近有人来东北，若想去可到奉天大南门里边业银行找杨伯甫。穆玉琪决定走，问我走不走，我说：当然走。出去，特别是能去抗日根据地，是久已向往而不得的事，何况现在大祸临头，这个机会真是天赐良机。于是，我们决定出走，躲开灾难，逃出这个牢笼。

1944年的5月初，正是盖平黄花鱼上市的季节，我在穆玉琪走后两天，逃出了

家门。那天早上家里正泡黄花鱼，妈妈忙忙乎乎，我脱去校服换上便装，从她身旁边擦身而过，她竟没有发觉。当时我已给正在矿山“勤劳奉仕”的臧晶写了信，是他把我送到奉天。我们到边业银行储蓄所找到了杨伯甫，我们本不相识，他可能已从穆玉琪口里知道我来，他当即把我送到他的同窗好友孙士箴家。在那里我见到了早到两天的穆玉琪，我俩像从笼子里飞出的小鸟，高兴地抱在了一起。随后我和臧晶到小饭馆吃了一顿饭才告别，当时我想这次分手定是永别，没想到未及两个月，我们又在日本监牢里重逢。我是因为花喜露被捕而逃出来的，走时盖平还是一片平静，怎能料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失败前夕酝酿的一个所谓“桃园工作”——一场血腥的大逮捕正悄悄地向盖平县的爱国者袭来。

我和穆玉琪在孙士箴家住下等候关内来人。我们称他们夫妇为大哥、大嫂。我因为是随(玉)琪来的，住在人家家里，开始总有些不塌实，以后看到杨伯甫忠厚正直，孙士箴两口子热情实在，姜宗琏二哥来说他也同我们一起走，找他的弟弟同去抗日根据地。我的心安定下来，只盼关内快点来人。那天宗琏二哥来说，走，需要一笔路费，问我们带了多少钱。我们都是逃出来的，哪里会有多少钱。我们商量之后考虑，我若回去，妈妈就不可能再放我出来，决定(玉)琪回熊岳家里弄钱，我在孙家等候。她走后我天天去大南门里的小书摊看书，约两三天后，我从旧书摊回来，孙大嫂说：“穆玉琪回来，给你留了个字条。”我一看那上面大意说：盖平出事了……指逮捕青年学生，当时我真的着急了。谁人不知“思想犯”是要坐牢杀头的，我怎好在这里牵连人家。我正在焦急沉思之时，很少言语的杨伯甫果断地说：“别急，我们不能看着你落在日本鬼子手里，让我们再想办法。”在这生命攸关的危急时刻，他对我这个间接认识的人能不避凶险，挺身而出，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早同花喜露有接触，是有民族觉悟并受革命影响的。杨伯甫和宗琏二哥研究一番之后，确定送我去彰武县农村杨的岳母家暂避，当时杨的爱人和孩子正在那里，更便于掩护我的身份。宗琏二哥则决定去山海关爬城墙，自己先走。临走时，他把一件栗色长衫给我留下，天热要我改成短袖穿，并说：“我过去以后一定设法和你们联系。你等候消息。”说完我们便分手了。

我去杨伯甫家住了一宿，决定第二天早车去彰武。在杨家我见到了杨伯甫的奶奶，我才知道他自幼无父无母，是奶奶抚养长大的，难怪他是那样内向和忧郁。可是，谁能知道，就在这个柔弱的外表下，却有一个坚强的灵魂，有一颗无私而火热的心。他与盖平本无关系，完全可以避开这场杀身之灾，而他为了正义，为了救别人，最后竟为掩护我们，死在日本法西斯的酷刑下。

到了彰武，远山近野已经是一片新绿，我无心欣赏这乡野风光，只觉得心神不定、焦躁难安，多亏有杨大嫂陪我住在这里。这是个家徒四壁的贫穷人家，可是老太太为了招待我这个“远戚”，仍然不时地把他们平时难以吃到的豆腐摆上饭桌。大嫂看我仍穿夹衣，把她的大衫给我穿上，把二哥给我的长衫改成短袖。好心人的帮助使我得以在这个偏僻的乡村渡过了10多天平安的时光，但终究厄运难逃，我和杨伯甫在这里同时被捕了。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被捕那天的情景。过午，杨伯甫突然进来，他神情紧张，急促地对我说：“情况紧急，这里不能待了，明天我送你去法库县同学家。”说完他去同杨大嫂说话，我就到地里挖野菜。不到一个小时，我在地里听到狗叫，抬头一看，只见两个人像疯子一样向我扑来。我明白了，是来抓我的。那个为首的是日本特务加布，另一个是汉奸特务赵景文。特务把我带回屋时，看到杨伯甫已被吊在房梁上。他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掉，却闭口不语，他的坚强给了我勇气，我镇定了。当天晚上给我们戴上手铐，包上脑袋，推上火车，不知道要把我们带向哪里。几个小时过去了，只觉得停下车，直到进到一间屋里才拿掉头上的白布，这时才知道我们是到了奉天站前的小衙门。解放后这里是站前派出所。这时看见穆玉琪已在那里。我和杨伯甫被塞进一个小不点的地下室。这时杨伯甫小声对我说：“敌人不问千万别提去关内的事。”这是我最后一次听他说话。然后又是包上头推上火车，还要往哪去呢？听着车轮有节奏的呼隆声，我的心七上八下的。因为我只知花老师被捕，我认为一定把我们送到沈阳，此刻我怎能想到盖县已有那么多学生被捕，我也想不到《辰星》会暴露，更没有想到由于我逃跑，此时全家老小包括已经分居的父亲和他的小老婆都被抓起来了。又是停车、下车，上了警车，被押进了一个屋子，已经夜半时分，开始仍然不能断定是在什么地方，当看到卷柜上放着一包包书，有一包写着我的名字，我才明白是回到了盖县，这是警务科。当夜未审，把我们三个人分别推进了三个监房。监房的地板上已经坐满了人。见我进去，紧靠门边的人往里挤了挤，给我让出一个座位。看守全部都是日本警察，据说是为这些“思想犯”，特地从奉天调来的。把女犯押进男牢房，看来是人满无处放了。这里是不许犯人互相交谈的，但是他们在地板上写字还是让我知道了一些情况。原来被抓的有三个国高的学生，还有些社会上的人，如驼子（已送到奉天）、王夕澄、门文东等，共有30多人，分别押在警务科和警察署两边的“留置场”，后来听说，还有几个人押在熊岳。另外还抓了些家属，不知押在什么地方。这么个小县城，抓了这么多人，难怪狱满为患，只好把犯人分开拘押。另外两名女生姜静芳、赵俊芳押在警察署那边，她们都是先我们被捕的，我和玉琪可能是最后抓到的。从此日夜审

讯,受尽酷刑,开始真正的地狱生活。

对我的第一堂审讯,是在我进来的第二天夜里,这里的审讯多在深夜。我多少有点思想准备,我从难友那里听说了各种刑法。有的对我说:你是逃跑抓回来的,恐怕得格外受些罪。果不然,一进审讯室,一个人高马大的日本鬼子便咆哮如雷劈头便问:“你说,你为什么逃跑?”是两个汉奸充当翻译,比日本鬼子还凶。后来知道这个日本鬼子是警务科特务股长前渊,是这次案件的主审者。后来听说,后边领导他的是奉天警务厅。我们的案件不是孤立的只是盖平城的事,看来日本人这次大逮捕是有预谋的。两个日本翻译,一个姓金,一个姓郑,都是铁杆汉奸。前渊看我没有回答,过来就扇了我一个大耳光,我顿觉脑袋轰的一下,两眼冒金花。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见过这种阵势,说不害怕是假话,光那吼叫声就够把你吓蒙了。可是我还清醒,我在心里提醒自己:别怕,要镇定,比这厉害的还在后头呢,反正豁出去了。前渊又叽里呱啦一阵,狗汉奸给翻译:“你想装死不是,快说你为什么跑?”

我在盘算该怎样讲,看样子,他们不知道我们和花老师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往这上牵扯。我便说:“我是听抓学生才吓跑的。”“不对,抓学生你怕什么?说,为什么要跑?”就这样一步紧似一步地追问,我含糊其词、驴唇不对马嘴地回答,气得前渊嗷嗷地叫:“你死啦死啦的……”说完又是一个大嘴巴。用刑在升级,用皮鞭往脸上抽,再后来是“上大挂”,特务拿来一条细细的绳子,把我的两手朝后绑在了一起,把绳子的一头系在窗上,这边一拉,人便吊了起来。两只胳膊像断了似的疼,全身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吊的时间长了,有时就昏过去了,特务用凉水往头上喷,醒过来再审。不说,又加上“压杠子”,就是把你吊起来,让你跪下,在你两条腿上加木杠,高头大马的特务上去踩,两个回合,全身的骨头都像碎了一样,昏过去就用凉水喷,醒过来再审,再压。每次过完堂都是拖回监房的。就是这样每天夜里都要审讯,夜深人静,常能听到从另外房间传来的号叫声。在我之后被抓回来的二国高学生周建涛,押在我所在的监房,我亲眼看见他因逃跑所受的非人折磨。抓进来就让他站着,不许坐,不许睡,也不给吃的,就这样站了一天一夜,然后拖出去严刑毒打,拖回来满脸都是血。至今想起我的心仍然隐隐在疼。

第一次审讯后,便围绕《辰星》油印刊物的出版和我写的两篇东西,逐字逐句分析,集中追问反满抗日思想和反满抗日组织活动。不说就上刑,说不清楚也上刑。通过审讯,很快便明白了我和穆玉琪被捕主要是因为两本秘密刊物被发现,与花喜露没有关系,我们放心了。在女犯放出上厕所时,我俩急忙交换审讯情况,互嘱千万别提花喜露和上关内的事。审讯,就像车轱辘似的,抓住一件事没完没了,只知一个

劲儿地喊叫，一个劲儿地上刑拷打，使受审者只苦于受刑，思想并不紧张。日本法西斯是凶残的，但也是愚蠢的。他对学生用尽酷刑，让你承认反满抗日，抗刑不过，承认有反满抗日思想，接着又拷打用刑，追问为什么反满抗日，为什么？这是你让我说的，那就只好说了。学生说在学校所受的奴役、日本老师非打即骂的强盗行为，在社会上抓劳工、服兵役，说话是思想犯、吃大米是经济犯等事实。

盖县这段审讯有两个多月，这中间我得了一次烈性传染病——回归热，高烧到40度不退。开始日本鬼子戴着口罩审讯我，后来可能是怕这病传染开，把我押回家隔离。只准许母亲一个人给我送饭，外间屋有两个警察日夜看守，日本特务吉田，每天早晚两次来量体温。大约七八天，体温稍降就又把把我押回警察署的“留置场”，又知道了有不少同学被捕。姜静芳和赵俊芬押在这里，我还见到了臧晶，他的脸苍白浮肿，作为《辰星》的主办者，不用问，遭的罪一定比别人多。我到警察署又继续被审讯，强行在他们已经编好的口供上画押以便向上起诉。连口供里写的是什么都不让本人看。

给杨伯甫报信

孙世箴

孙世箴 1925年出生，伪满奉天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学生，杨伯甫的同学，花喜露影响下的读书会成员，因掩护孙萌日伪逮捕时逃跑后参加革命，妻子被打流产致残疾。

1942年，我在奉天第三国民高等学校上学时，和几位同学结识了花喜露。花喜露笔名叫田贲。当时有“北有萧军，南有田贲”的说法。他曾带我们骑自行车前来北大营悼念国耻，提出在敌人的后方，笔杆子也能抗日，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在花喜露老师的影响下，我逐渐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沈阳做地下工作。那时我和同学杨伯甫一组，半夜一两点钟出去，经常到大南门、大西门、小河沿一带活动，杨伯甫刷糨糊，我贴标语。

1943年我们毕业了，一些同学决定“入关”当八路军打鬼子，我决定在敌后继续抗日。但是厄运随之而来，打算去关内的同学中，有一个女同学回家取钱时不幸被

捕。敌人不久就抓到了我家。当时我正好不在家，鬼子们就毒打我妻子。我妻子当时正怀孕，但还是被打得浑身是血，不仅流了产还留下了终身残疾。

敌人从前门刚走，我就从后门回来了。我妈说：“儿啊，你快跑，你媳妇有妈来照顾。”从此我开始流浪。我跑出来后，就去给杨伯甫报信，让他也跑。可惜啊，他最后还是被抓了，敌人用挂猪肉的钩子钩住他的双脚，把他倒挂起来，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凑钱把他送进医院，医生说脚已经烂了，只好割掉，但是不久双腿也开始溃烂，最后一个好好的人硬是这么烂死了。我的老师花喜露也被抓进大牢，但无论敌人怎么严刑拷打，他就是不承认，抗战胜利以后，因折磨过度死于家中。现在想起那段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啊！

大石桥全景



三宅秀也的“桃园工作”罪行

前渊秀宪

前渊秀宪 日本人，伪满洲国警佐，1944年7月1日由奉天省警务厅特务股长调到盖平县警务科任特务科长。负责“桃园工作”案件侦破、逮捕、审讯。1954年沈阳审判时曾提供笔录和检举书。在对被告三宅秀也作证时称：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对“桃园工作”中逮捕的于家麟、李勤甫、门文东等约300余名中国爱国者进行监禁、拷问。其中，奉天市约30名，本溪市约100名，营口市约100名，盖平县约60名，海城县约10名。

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伪满洲国简任一等警正。1943年3月由伪治安部警务司警务科长转任奉天省警务厅长。

他在“桃园工作”（一起检举全东北国民党事件）中的罪行：

1944年5月，在全东北进行一起逮捕国民党关系之际，作为奉天省警务厅长的三宅秀也制订了奉天省的逮捕计划，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指挥、命令省下全体警察官，对300余名中国人进行逮捕、审讯，将其中100余名送至奉天省高等检察厅法办。1945年6月，三宅秀也对“桃园工作”中积极进行逮捕审讯的警察官给予表彰，并发了奖状和奖金。

1944年5月，三宅秀也为实施“桃园工作”事件的一起大逮捕而对省下各警察官下达命令，我根据三宅秀也的命令，于1944年7月1日由奉天市警察厅督检勤务调到盖平县警务科任特务股长。1944年7月1日至8月15日，我在奉天省盖平县任警务科股长（警佐）时，积极执行一起大逮捕的命令。

1944年5月，奉天省实行了对中国国民党东北党部抗日组织工作人员的统一大逮捕行动。这次共逮捕了300余人。同年9月，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和奉天省高等检察厅次长村上主持，召开了由奉天省各市、县特务科、股长20多人，省特务科员、日本宪兵及其他有关人员共约50人出席的关于处理“桃园工作”事件的会议。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由警务厅长三宅秀也、检察厅检察官下川岩、省特务科长今岛寿吉，作了内容基本相同的指示命令：“‘桃园工作’事件，是中国国民党由地下活动转入半公开活动的开端，由于这种特殊性，应严加追查，进行彻底镇压。”会上，又由各市、县特务科、股长报告了对事件被捕者的审讯情况。我也报告说：“盖平县的审讯进行得顺利，年内可交送检察厅。”

在盖平县，与“桃园工作”事件的有关人员，逮捕拘留了52名。根据省特务科森井静警正的命令，我又命令部下，对盖平女中学生侯庚芝（女，18岁）、穆玉琪（女，17岁）及秋灯书店经理李琴甫（男，50多岁）等4人进行了审讯。其余是指挥督促奉天省特务科丸山正卫警佐等20名支援人员进行审讯。同年12月下旬，按省特务股长的命令，将32人送交奉天高等检察厅。其中12人于1945年6月被判处有期徒刑；20人因无事实根据被释放。

在审讯中，由我直接命令部下用棍棒殴打、吊绑、不准睡觉、使用电刑等，进行非人道的拷问。其中阎家珍因拷问导致不能步行。

在对盖平县与此事有关人员进行非法逮捕的同时，1944年5月，将部分被捕人员带到省特务科审讯。他们大部分是国高学生和国高毕业青年。他们是在盖平县国民党东北党部抗日地下工作人员于家麟、门文东、李琴甫等人的领导下，通过文艺工作，对中国人民抗日思想进行启蒙宣传的爱国者。

1944年7月下旬，根据奉天省特务科森井静警正的命令，我命令部下金警尉

等,将熊岳城初级学校教员孟宪义(中国人,男,22岁)、建国大学学生一名(男,20岁)作为前述“桃园工作”事件嫌疑者,非法逮捕。在拘留所拘留了近一个月,用棍棒殴打、使用电刑等拷问后,因未找到犯罪事实依据而释放。

三宅秀也在1944年7月至1945年8月15日期间,任伪奉天省警务厅长兼奉天省地方保安局长,我是三宅秀也的部下,担任了伪奉天省盖平县警务科特务股长职务。三宅秀也在这一期间,曾有两次指挥命令部下逮捕和迫害中国爱国者的事实。

在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期间,三宅秀也以奉天省伪警务厅长兼奉天省地方保安局长的身份,指挥命令伪奉天省所管辖的各县市警察官,对所谓“桃园工作”中所逮捕的于家麟、李琴甫、门文东等约300余名中国爱国者实行了监禁拷问,并且还派伪奉天省特务科长今岛寿吉,该科科长附森井静到现场督促、鼓励拷问。

在1944年9月,三宅秀也在伪奉天市朝日区杨武街兴亚塾召开了伪奉天省所属各市县的特务科、股长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三宅秀也在这个会议上指示说,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变迁,要加强镇压中国爱国者。然后,由伪奉天省特务科长今岛寿吉和各市县的特务科、股长报告了对“桃园事件”中所逮捕来的中国人民的审讯情况,最后三宅秀也又命令继续彻底审讯。

在这次事件中抓捕的中国爱国者的人数为:奉天市约30名,本溪市约100名,营口市约100名,盖平县约60名,海城县约10名,总共约300名。

对他们以毒打、灌凉水、过电等所有的方法进行了拷打和虐待。

后来我到伪奉天省警务厅联系工作时,从特务科长今岛寿吉那里和其他特务科、股那里听说,其中将奉天市的约30名、营口市约50名、本溪市约50名、盖平县的约50名、海城县2名,共182名,包括于家麟、李琴甫、门文东等送交到伪奉天省高等检察厅进行了迫害。

三宅秀也以奉天省警务厅长兼伪奉天地方保安局长的身份,在1944年12月上旬,让伪奉天省特务科长今岛寿吉在伪奉天市朝日区杨武街兴亚塾,召集所管辖下的各市县的特务科(股)长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三宅秀也在这个会议上指示说,各市县要分别组成一个或两个特别搜查班。1945年1月,这个搜查班开始了活动,在同年4月,得到了在东北的中国爱国者名簿。其后,三宅派遣了伪奉天特务科长今岛寿吉到“满洲国”警务局,在全伪满各省特务科长会议上将这个名簿散发了。另外,伪奉天省特务科又分别召集伪奉天省各市县的特务科长,布置了按照中国爱国者名簿进行抓捕的任务。

其结果,仅在伪奉天省管区内就抓捕了冯某、裴某等320余名中国爱国者,进行

毒打、灌凉水、过电等一切严刑拷打和虐待、迫害。后来将其中一部分人送到伪奉天高等检察厅进行了迫害,对其余的人继续进行审讯,一直到“八一五”。

上述事件,因我是三宅秀也的部下,在伪奉天省盖平县警务科任特务股长时,受三宅秀也的指挥命令而直接参加执行了的罪行。

“桃园工作”结束的时间,是在1945年的4月。“桃园工作”结束的时间,也就是“晓工作”事件开始的时间。“晓工作”事件开始抓捕中国人的时候,“桃园工作”就结束了。

三宅秀也说,“桃园工作”的结束时间不是1945年4月,而是在1944年7月结束的。关于这个事情,三宅秀也是在1944年的7月接到伪奉天省警务厅特务科长今岛寿吉的报告,说“桃园工作”结束的日期是在7月,但我记得“桃园工作”一直继续到1944年的9月。我是直接参加执行了这个事件的,同时将被抓捕的人送往伪奉天高等检察厅的日期,我记得是在1944年12月下旬,因而我记得“桃园工作”在1944年7月并没有结束。

“桃园工作”事件侦察经过

根川尤夫

根川尤夫 日本人,伪满奉天市警察厅铁西警察署特务主任、警佐。1954年沈阳审判时,揭发“桃园工作”事件:1. 1942年5月,在海城县发现青年反满抗日组织,根据海城地方保安局理事官(特务科长兼任)中村宣也命令特务股长井上嘉男逮捕5人;2. 根据伪满地方保安局长森田贞男的命令,1944年3月至6月,在奉天、本溪、营口、海城、盖平共逮捕以国民党东北党部负责人罗庆春、张宝慈为中心的中国青年反满抗日组织318人;3. 1944年9月,根据伪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等在奉天市兴亚墅召开省特务科(股)长会议布置,审讯后送检察厅人数:奉天25名,海城3名,盖平32名,营口、本溪等地40多人。

在1944-1945年发生“桃园”案件时,我任伪奉天市警察厅铁西警察署特务主任、警佐。我的证言完全属实。

1942年5月,海城县奉天省地方保安局的联络员在侦察中发现有中国青年反

满抗日组织的存在,地方保安局理事官(特务科长兼任)中村宣也立即命令海城县特务股长井上嘉男警佐进行逮捕。共逮捕5名爱国者,经审讯后,弄明了该组织的基本情况。

逮捕情况是:伪奉天省地方保安局,经过审讯、侦察,确认在奉天、营口、本溪、盖平等地有国民党地下组织。这个组织依照重庆的指令,以国民党东北党部负责人罗庆春、张宝慈等为中心进行活动。按照地方保安局长森田贞男的命令,自1944年3月至6月;有以下单位参加、实施了逮捕、镇压:

伪奉天省特务科(科长今岛寿吉)、伪奉天市特务科(科长保月义雄),逮捕35人;

伪本溪市特务股(股长井上嘉男),逮捕120人;

伪营口市特务科(科长佐藤明夫),逮捕100人;

伪海城县特务股(股长大石虎雄),逮捕11人;

伪盖平县特务股(股长吉田盘海),逮捕52人。

共计逮捕318人。

处理情况:1944年9月,伪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在奉天市兴亚塾召开了省特务科(股)长会议。会上,三宅秀也及特务科长今岛寿吉命令称:“国民党东北党部的活动已经半公开地进行着,在目前时局下,应彻底地进行镇压,以期覆灭这个抗日组织。”伪奉天高等检察厅思想系检察官下川岩,也作了有关对事件处理问题的指示。

各市县对被捕人员审讯后,送警察厅人员数:

伪奉天省警察厅特务科和伪奉天市警察厅特务科25名;

伪海城县特务股3名;

伪盖平县特务股32名;

以上合计60名。若包括营口、本溪的送检人员,达100名以上。

判决结果,被捕人员的大部分被判有期徒刑,在盖平县逮捕的于家麟被判处死刑。因“桃园工作”事件被判处死刑者,听说还有10人左右。

我任“桃园事件”检察官

下川岩

下川岩 日本人,1943年5月至1945年8月15日任伪满奉天省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指导和直接审理“桃园工作”案件。1956年沈阳审判时供认:盖平县逮捕约50人,送检察厅审理30人;本溪逮捕约15人,送检察厅审理10人;辽阳逮捕约15人,未送检察厅审理。

1943年5月,我应“伪满洲国”的招聘来奉天省高等检察厅任检察官,官级是荐任二等四级,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止,计两年多时间。

1944年5月至1945年8月,奉天省警务厅在全省陆续破获的国民党反满抗日人员的案件,叫“桃园”事件。在此期间共逮捕了多少人我已想不起来了,他们逮捕以后曾向检察厅次长和我报告过,人数是比较多的。据我所记得的,其案件的处理情况及我在此案件中所做的事情大致是:盖平县警务科在1944年7月间逮捕中国爱国者约50名,在审讯中,该警务科的特务股长前渊秀宪曾两次来检察厅向我报告审讯情况,我对他进行过指导。同年12月,我又到盖平县警务科亲自审讯了约10名中国爱国者,以后我指示他们把被捕者中的30名送检察厅,我和德田检察官共同进行了审讯处理,审讯后起诉了20名,释放了10名。本溪警务科逮捕中国爱国者约15名,由原检察官审讯后起诉了10名。我为搜集原检察官的审讯情况,去过该警务科一次。辽阳县警务科逮捕约15名,我曾出差去该县警务科搜集过他们对这些人的逮捕情况,但被捕者直到“八一五”也没有送检察厅,所以未起诉。铁岭警务科逮捕约15名。奉天省警务厅特务科和奉天市警察局特务科共逮捕约40名,我到市警察局搜集逮捕情况,并对其中30名进行审讯。这些就是我在“桃园”事件中所做的事情。我承认当警务科对中国爱国者进行审讯时曾作过指导,我也亲自参加过对这些爱国者的审讯和起诉,因此我深深地向中国人民认罪。

前渊秀宪他们当时逮捕的中国爱国者是用刊物之类的东西来进行反满抗日活动的,案件比较复杂,因此他曾来高等检察厅两次。我当时指示他,要好好地检查案件的内容与本人的供述是否一致,如刊物有反满抗日的的内容就是犯罪,否则就不是

犯罪,我就是这样对他指导的。

“桃园工作”事件供词

三宅秀也

三宅秀也 日本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伪满洲国简任一等警正,1944年7月由伪满治安部警务司警务科长转任伪奉天省警务厅长兼地方保安局长。1944年5月在全东北对地下国民党进行大逮捕之际,对伪奉天省警察官下达“桃园工作”命令,于1945年6月对逮捕审讯“桃园工作”事件的警察颁发奖状、奖金。1956年沈阳审判的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监狱,后释放回国。

我是三宅秀也。从1944年7月1日至1945年8月15日,我任“满洲国”奉天省警务厅长兼地方保安局长。

我在任伪奉天省警务厅长时,认识到伪奉天省是个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为了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必须要维持奉天省的工业生产。因此,为了确保这种工业的生产,必须将治安维持工作列为警察行政业务的重点。为此,我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伪奉天省的奉天市、营口、抚顺以及沿铁路的市和县上,以防卫为重点,进行指导。同时,以彻底扑灭以奉天市为中心的抗日救国活动的组织,来确保治安。我把特务和地方保安局的力量很好的团结在一起,实施了各项工作。

在我到任以前,检举国民党抗日人员的工作已经在伪满警务总局的领导下实施了。我到任的7月,这个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这个工作的名称叫“桃园工作”,但在这个工作当中并没有逮捕到该组织的领导者罗庆春、张宝慈。因此,我对在“桃园工作”中所逮捕来的人加以刑讯,根据被逮捕人的口供和从查获的文件中所得到的材料,以彻底抓捕国民党抗日人员和破坏抗日组织为目的,又继续进行了侦察和逮捕工作。

在此期间,为了抓捕残害抗日救国人员,我也曾召开过伪警察厅警察局长和各市、县警务科长会议,并召集了伪市长、特务科长会议。

1945年5月的伪奉天省各市县特务科长、股长会议,是在前伪警务总局召开的,在这个会议上传达了以伪警务总局在“满洲国”各省特务科长、股长会议上的指示为基础,规定了伪奉天省警务厅年度特务警察的工作方针。同时,也讨论了大逮捕

国民党抗日人员的准备工作,并作了必要的指示。

在1945年5月由于我的布置和命令,在沈阳、鞍山、本溪、辽阳、铁岭、盖平、营口等地,一次抓捕中国抗日救国人员320余人,并加以残酷的刑讯。这一事实有被害人的控诉书,证人证词,我都承认。

在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期间,我以奉天省伪警务厅长兼奉天省地方保安局长的身份,指挥命令伪奉天省所管辖的各县市警察官,对“桃园工作”中所逮捕的于家麟、李琴甫、门文东等约300余名中国爱国者实行了监禁拷问,并且还派伪奉天省特务科长今岛寿吉,该科科长附森井静到现场督促鼓励拷问。在1944年9月,我在伪奉天市朝日区杨武街兴亚塾召开了伪奉天省所属各市县的特务科、股长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指示说,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变迁,要加强镇压中国爱国者。伪奉天省特务科长今岛寿吉和各市县的特务科、股长报告了对“桃园事件”中所逮捕来的中国人的审讯情况报告之后,我又命令继续彻底审讯。

在这次事件中抓捕的人数为:奉天市约30名,本溪市约100名,营口市约100名,盖平县约60名,海城县约10名,总共约300名,对他们以毒打、灌凉水、过电等所有的方法进行了拷打和虐待。其中将奉天市约30名、营口市约50名、本溪市约50名、盖平县约50名、海城县2名,共182名,包括于家麟、李琴甫、门文东等送交到伪奉天省高等检察厅进行了迫害。

在1944年12月上旬,伪奉天省特务科长今岛寿吉在奉天市朝日区杨武街兴亚塾,召集所管辖的各市县的特务科(股)长会议。我在这个会议上指示说,各市县要分别组成一个或两个特别搜查班。1945年1月,这个搜查班开始了活动,在同年4月,得到了在东北的中国爱国者名簿。其后,我派遣伪奉天特务科长今岛寿吉到“满洲国”警务局,在全伪满各省特务科长会议上将这个名簿散发了。另外,伪奉天省特务科又分别召集伪奉天省各市县的特务科长,布置了按照中国爱国者名簿进行抓捕的任务。

前渊秀宪说,“桃园工作”结束的日期是在1944年7月。根据我的记忆,“桃园工作”的结束时间是1945年4月。关于这个事情,我是根据伪奉天省警务厅特务科长今岛寿吉的报告所知道的。前渊秀宪所讲的是“桃园事件”审讯结束时间,我讲的是逮捕结束时间。

“桃园工作”是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系统的抗日事件。事件起因是:从“康德”九年九月,在奉天市城里秋灯书店,侦察人员接触了群集于该书店的青年知识层和学生层,侦察知道了国民党及其外围团体的存在。奉天省保安局即将人员打入该组织

内部,进行侦察,从而获得成功。

破获情况:自4月22日至7月,扣押中国爱国者132名,破获了7个党团组织及3个外围团体。破获的党团组织有:奉天同人会(复兴会)、本溪同人会(系由奉天同人会分出)、盖平青年自觉社、营口协力同心团、新京东北抗敌青年团、东北青年会、东北抗敌青年先锋队。3个外围组织,两个在本溪,都没有明确的名称,一个是盖平读书会。

拘捕的大部分是20岁至30岁的青年,大部分系大学、专科学校毕业生及会英文的青年。

当时侦察的证据有:本溪湖煤铁公司情况调查、分析手册;伪造的进入中华民国证明书;伪造的印刷品的抄件;入党考验提出问题(钢笔抄件)。

盖平青年自觉社的情况是:自“康德”五年八月以来,于家麟和花喜露等人,为启发民众的民族思想而组织了秘密文艺团体L·S(鲁迅)文艺研究会,并秘密刊印《行行》《星火》作为机关报。从“康德”七年六月接触了担任《营口新报》编辑的东北党务专员干部王觉,在王觉的帮助之下,利用该报文艺栏,企图进行公开活动,并进一步组织范围更广的党的活动。

然而,当此之际,王觉于“一二·三〇”事件被逮捕而停止其活动。但是“康德”九年五月,又开始恢复了原有同志之间的联系。同时,在张宝慈的领导下,开始了再建工作。“康德”十年十月十日,纪念“双十节”,并组织了外围团体读书会,设立了借书室、移动图书室等。以通过读书研究文艺、发表作品,巧妙地获得了一群知识青年。“康德”十年以来,创立党团“青年自觉社”。

田贲被捕原因诸说法

郑新衡

关于1944年4月田贲被捕的原因,说法不一:

一说是日伪特务机关利用搞过文艺的民族叛徒,分析发表的文学作品,认为田贲“思想左倾,有共产党嫌疑”而逮捕的。1982年,给花喜露定烈士时,他做共产党地下工作时的上级领导侯洛同志就持这种看法。从当时日本特务警察副总监三田正夫《关于侦察利用文艺、演剧进行思想活动的报告》、1942年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编

纂的《思想对策资料——关于满洲左翼文化运动》都有类似的记载。

又一说是和田贲关系密切的本溪朋友方平(本名孟光远)被捕的牵连;田贲被捕后搜去“过去油印刊物《行行》和张吉宽的日记,所以牵及到盖平”,于是驼子等人也被捕了。孟方平,笔名广远。1920年出生,伪满本溪林业国高学生,受花喜露学生的影响,参加读书会。不慎被捕,他又供出田贲。退休前系沈阳市于洪区北陵乡水稻技术员。“文化大革命”中,曾对他的这一问题进行审查和批斗。原因是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本人曾供认过这个情节,“文革”之后,没有给他定性为叛徒之类,原因之一是年龄小,不是故意的;原因之二是证据不足,但田贲被捕到底是否真的因为他的牵连,也有不同看法。“文革”中有极左路线。不过,本溪同人则宁可相信他是始作俑者。20世纪90年代初,本溪召开当年读书会成员座谈会,没有邀请他参加,王丹群也将他从通讯录上删除。

再一说是伪满保安局档案的记载,说1942年9月,日伪满特务在沈阳秋灯书店侦知国民党及其外围地下组织,伪奉天保安局派人打入内部,侦察成功,1944年4月到7月破获了东北党务专员系统的奉天同人会、本溪同人会、盖平青年自觉社等组织,敌人了解了1938年于家麟和花喜露等人组织鲁迅研究会的情况,于是花喜露被捕。持这种看法的也有人认为,正是孟方平供出了田贲。究竟是哪种原因,无法判断,但是,在盖县和本溪救助李季风的这些人被捕后,李季风是怎样转到沈阳并与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取得联系的呢?这个问题我们未能查清。作为对个人的处理,组织上是慎重的,我们没有意见。但是作为历史,只能存疑。

二、黑狱中的太阳

“监狱是个大社会”

孙萌

1944年8月，我们被强行定案后，分批送往伪奉天高等检察厅，然后押进伪奉天第一监狱。

那是一个初秋的夜晚，晚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我们走出监房，戴上手铐，两个人绑在一起，押上北去的火车。第二天一早到的奉天，首先到伪高等检察厅，简单地审问了一次，没有动刑。过完堂就把我们送进伪奉天第一监狱。

走出一条胡同，远远就望见那座日本法西斯在殖民地专门为关押中国人设立的监狱。高的大墙，安着一排密密的电网；再往前走，就看那两扇又大又厚的大铁门，就像野兽的血盆大口，不知吞噬多少无辜的中国人！走进监狱，首先到的是戒护科，后来听说，犯人把这里叫阎王殿。进去一看，一面墙上挂的全是胶皮板子，不用问，这肯定是用来抽打犯人的。据说这种板子伤肉不伤骨头，因此，那些凶残的狱警打起犯来就可以更无顾忌，监狱犯人把这叫“胶皮炖肉”。这些自然都是入狱后听来和看到的。在戒护科登记了我们每个人的衣物，一个看守从墙上拿下一把大铁钥匙，叫我和姜静芳跟他走，他是送我们去女监。从戒护科出来走向女监仿佛有好几里路，好大的一座监狱！一路上我偷偷地张望这座人间

1946年发表的孙萌的《狱中日记》



地狱，院子好大好长，周围是一排排二层楼房，可能是监房，也许是工场。听说这里有好几个大工厂，犯人就是工厂的劳动力。往女监走的路上，我就看见一些穿黄色囚服的犯人，他们都是判了刑的已决犯，有的扛着木头，有的背着工具，看样子是在干什么活；还有戴着脚镣的犯人排成一列，在看守的监押下，艰难地一步步向前挪动。那一张张灰白浮肿的脸，那一双双空洞的大眼睛，掩饰不住所受的折磨和饥饿。这就是监狱，人间的地狱！从此我就被抛进这无底的深渊，要在这里待多久？三年，十年，一辈子，也许……想到这里，我的心不由得颤抖了一下，我还是第一次感到害怕。这时一只大手猛然推了我一下：“快走，站下看什么？”

来到女监，这是在监狱最后边的一个狭长的院子。从外面看去只是一面高高的墙，一个大得吓人的大铁门，铁门上有一个大得吓人的大铁锁头（监狱把锁头叫“疙瘩”，把钥匙叫“挑子”），我们跨进大门，转个弯进入第二道铁门，里边是一条黑糊糊的厅长走廊（监狱里管走廊叫号筒子），一字排开是几间监房。进来，在一号监房铁窗里的许多面孔中，我找到了赵俊芳，再往前走，在二号监房的铁窗前，穆玉琪已站在那里等候我们，她伸出手扯住我，我急忙回头看看身边的看守，穆玉琪撒开手，低声说：“你快去吧，我们有机会说话。”我点了点头，进了三号监房，姜静芳去了四号。看来，“思想犯”不能关在一起，我们4个人分住在4个监房里。

走进监房，铁门在身后砰地关上了。我望了望那扇大铁门，心想：从此真的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也许永远地隔绝了，仿佛有一种永远告别人世的哀伤涌上心头。忽然一个尖尖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都卖什么呆，还不快干活！”说完又冲着我指着那个小木板房说：“到茅房那边坐下，进来就得守这里的规矩。”这时我瞅了瞅这个小个子女人，穿一身黑色裤褂，看上去很凶也很精干。我很奇怪，她也是犯人，犯人对犯人怎么能这样？这时一个40多岁的女犯人把我拉过去坐在她的身旁。我是紧挨着茅房的第一个人，她往前挪挪是第二个。原来这是监房里的“土政策”，新来的人挨着厕所睡，等再来新犯，逐个往上窜。先来后到，这也算公平，我也就安心睡在这里。那个40多岁的女人，我来第一天她就表现出分外关心和亲热。她问我：“你和一号、二号的女学生是同案吗？”我谨慎地点了点头，我问她：“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叫张平，是从天津来的，才进来三天。”“为什么被捕？”“有机会再谈。”她说完忙着钉手里的衣服扣子。屋里的犯人都在钉扣子，地板上放着一捆捆黑色衣服。我明白了犯人不能白吃饭，每天都得干活。我正想着，又听见那个凶女人冲着坐在门边的那个老太太喊：“你老咕哝什么，快干活。”老太太吓得急忙抽针。我问张平那个凶女人是怎么回事，张平悄声告诉我，那个女人叫小白，是土匪的老婆，能双手使枪，土匪被枪毙了，她被判了

15年,在这里是“炕头”兼领做。她是这个监房的看守林老爷的腿子,在女监里是个女阎王,谁都得受她的气。什么老爷、腿子、炕头,都是些没听说过的新名词。又过了几天我才明白了,这都是监狱里特有的语言,它正反映了日本统治的殖民地监狱的龌龊和黑暗。女监共有四名女看守,犯人都管她们叫“老爷”,一个老爷管一到两个监房,在监房里都有自己的心腹,犯人给这些心腹犯人起名叫“腿子”,腿子专门为老爷服务,除了监视犯人、打小报告以外,一项重要任务是替老爷拉“猫蛋”。所谓拉“猫蛋”,就是替老爷物色家在沈阳本市又有钱的犯人,替她们和家里联系给带东西吃,看守从中勒取财物。我所在监房的大烟案李张氏就是小白给林看守拉的“猫蛋”。这件事瞒不过犯人的眼睛,在监房里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一开饭就会看到,这些总也吃不饱的犯人,都围在门前去等那个高粱糠饭团,这时插“猫蛋”的犯人,总是往后边退,她们不吃监狱的饭,等着腿子给送来好饭好菜。看到这种情况,谁都不敢吱声,怕老爷,更怕腿子。这些腿子常常就是监房里的头儿,所谓领做,她们都睡在离火墙最近的头号铺位,所以叫“炕头”。“炕头”对犯人十分苛毒,就像那些汉奸、走狗比鬼子还凶一样,她们专门欺侮老实的犯人,处处找你毛病。监狱压迫和剥削犯人的办法很多,在女监里还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女犯手巧,活计好,腿子就逼她们给老爷做鞋做衣服,左一件右一件没完没了地做,白天做不完,晚上不睡觉,继续干,做出的衣服和鞋,看守拿出去或卖或送人情,犯人则成为永不停歇的机器。四号监房有个小苗,是个农村妇女,就因为长年给看守老爷赶活计,累出痲病吐血,送进病监死去了。在日本侵略者统治的监狱,草菅人命的事是很多的。在女监里我还经历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农村妇女,只有18岁,丈夫暴死,婆家告她谋害,她不服地方的判决,从开原来到奉天上诉。来时正怀孕,老犯人都说:但愿她生个儿子可免一死。没钱没势,押了半年不审不问,最后还是不明不白地上了“小楼”(监狱把执行绞刑叫“上小楼”),至今我还记得临刑那天她那张苍白而痛苦的脸,我敢说她是冤屈的。至于把已死和有病还没死的犯人从大西门推出去埋掉的事,每天都有。这些看到的和听到的,都在折磨着我的心。不怪人家说,社会上有的事监狱里都有,社会上没有的事监狱里也有。

监狱就是个大社会,这里存在的种种龌龊和罪恶,在这里看到的中国人的命运与遭遇,正是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社会的缩影。在女监里,有政治犯,也有刑事犯,什么杀人犯、经济犯、盗窃犯、大烟案犯,等等。这些案犯的犯罪,反映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腐朽而黑暗的现实,也反映了封建的殖民地社会的种种不幸。从监狱看社会,使我学会和明白了不少东西。对我这个没有接触过社会的单纯的学生来说,不啻是上了一次大学,一次社会大学。我想起我看过的一本柏克曼写的《狱中记》,在这本

书里,他就说过“监狱是个大学校”,当时我还不不懂,现在我在监狱里也有了这样的体验。过去一些问题多是从书本上知道的,从书本到现实,使我进一步认识了一些事情。过去,我们都很关心妇女解放问题,常为旧制度下妇女的命运鸣不平。其实封建的殖民地社会在敌人统治下的东北,妇女都有些什么不幸,我并无实际感受和真正的了解。在监房里我听说有那么多所谓谋害亲夫的杀人犯,我跟她们唠嗑,了解她们的情况,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充满血泪和不幸的故事,几乎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她们都是贫穷的农村妇女,有的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有的因家穷被卖来卖去,有的被拐骗。从这些人的遭遇中,我明白了为什么说妇女的不幸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妇女要改变命运,包括被日寇统治的东北人民要改变命运,只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只有推翻旧社会,没有别的出路。

监狱是个活地狱,有鬼,也有人,有好心的人。我们在女监并未与世隔绝,这就要感激好人给我们送来一些信息,对于失去自由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信息更可贵的?知道花喜露也押在这个监狱里,就是一个已判刑当了杂役的“政治犯”杨野告诉我的。他同另一个也当杂役的“政治犯”,每天都给女监送活,把一捆捆衣服扔进监房。一次,他送活时塞给我一个小纸团,我坐在马桶上打开这个纸团,上面写着:“我见过花喜露,他希望你们坚强。”花老师也在这里!我激动得掉下眼泪。是的,“暗室里没有日光,我胸怀十万个太阳”。这是花老师在狱中写的诗,此刻,花老师的话,就是照亮我心中的太阳。我听说花老师在北陵留置场受尽酷刑,昏死过十几次,敌人从他口中一无所得,他实践了被捕时跟妻子说的“到我为止”的诺言。他被捕后,他所在的组织和同志,安然无恙,照常活动。他是用血和生命保卫了组织和同志的安全,正如他写的一首诗:“慷慨赴囚虏,挺身担大刑。愿将新血肉,烈烈试真情。”真不愧是共产党员,不愧是宁死不屈的中国人。我也听说,咱盖平县还有一位年长的爱国者,在知道了自己被判死刑后,仍然鼓励出狱的学生,写下“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勿忘祖国,勿忘同志”十六个大字,真是掷地有声,撼人心弦。这些前辈坚贞不屈的表现,对我们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还有什么可怕的,“这就是我们战斗的地方”,只有斗争到底,“干它一场”。

“汪精卫死了”也是杨野告诉我们的,他还为我们传来一些男同学的情况,知道花喜露、杨伯甫住进病监,我们都十分不安;当门恩义和王盛伦两个男同学死去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则陷入久久不能解脱的悲痛中。监狱死人都从女监门口路过,送到西大门外埋掉。那些日子,干完活,我就站在铁窗前望着那个西大门,那里埋着两个死在日本法西斯手里的学生,他们都只有十几岁啊!我憋不住这满腔的仇与恨,真愿意

化成烈火喷出来,把这个吃人的世界烧得精光。日本鬼子不亡,天理难容。

在监狱里能看到书是最幸福的,能得到笔和纸也是难得的事。我和姜静芳都看过杨野偷着运进来的书。监房一夜不闭灯,夜半人酣睡时,我在被窝里偷看《丁玲短篇小说集》《蔡元培文集》,我在狱中的一本日记,也是在这个时分写出来的。只可惜,带出后它在1955年“反胡风”那场风暴中搜查我时失去了。我很佩服这些判了刑的“政治犯”,他们在敌人监狱这样严酷的环境里,敢于藏这些禁书;又利用当杂役之便,敢于把这些书传出去,这是冒极大危险的事。

冬去春来,进入1945年,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在狱中经历了一次美国B29对沈阳的轰炸。至今还记得那个情景:从铁窗向外望去,一架架飞机拖着长长的白色的尾巴,没有看见往下投炸弹,只听天崩地裂似的响声,把监狱的门窗震得一齐响;窗外漫天黑雾,还夹杂着一个一个小亮点。事后听看守说,兵工厂被炸,街上行人被炸断的胳膊、大腿都挂在电线杆上。犯人对时事是最敏感的,他们太高兴了,宁愿飞机把监狱炸飞,只盼日本鬼子快完蛋,这是犯人普遍的心理。随之监狱也紧张起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鬼子的情况不妙。在监狱里,第一个征候是,把女监一些已判决的犯人转移到瓦房店监狱;余下的女犯则从后面的小院搬到前院男监楼下,显然是为了集中管理,以防不测。第二个征候是,对犯人的监管严厉起来,尤其对我们几个“政治犯”,不允许再出去放风。大铁门一天三响,穿大皮靴带着枪的看守长、看守警等,动不动就进来巡视一番,女看守的眼睛也频繁地出现在监房的监视孔上,那目光严峻而鬼祟。这些情况不能不让我们有些恐惧。我们明白随着形势的紧张,“政治犯”随时都有被处置的危险。事实上也是可能的,事隔十几年后,沈阳公审日本战犯,据主审我们案件的前渊交代,当时奉天警务厅有过把这些人处决的打算,后来考虑形势的变化,未敢动手。事后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只是那时年少幼稚,不可能想的那么多。

在那接近胜利的几个月里,我们一阵喜来一阵惊,折磨得日夜不安。又过堂了,这是我来监狱后的第二次审讯,令人奇怪的是,这次审讯不是去伪高等检察厅,而是在监狱里。审讯没有新内容,只是又复讯一遍。是吉还是凶,我们几个人分析不出来,只有焦心地等了。事情的发展竟出乎我们的意料,等来了好消息,那是距日本投降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一个看守来通知:明天4个学生开放。这可能吗?可这是真实的。回到监房,跟难友话别,患难之情,依依不舍。又是收拾东西,又是说话,一夜几乎没有合眼,我们终于活着出去了,敌人到底没敢动手;但是当我想到有7个战友牺牲在日本法西斯酷刑下,后来又听到还有11个人包括两名国高学生仍然留在狱中判刑,我

的心又沉重起来……继续关押在狱中的，包括我敬爱的花喜露老师。

1944年4月28日夜里，花老师被捕的时候，已经在沈阳做了将近三年地下情报工作，并且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到一个月。但是，他的被捕，并不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而是在盖平县所从事的革命文艺活动。也就是敌人所说的“桃园工作”。他被捕时，女儿刚刚出生14天。敌人对他施以各种各样的酷刑，吊大杠、过电、压杠子……无所不用其极。他被折磨得一次次昏死过去，又一次次被淋醒。但是，他始终守口如瓶，没有泄漏一点秘密。1945年春，当他被从北陵留置场转到奉天第一监狱十一号牢房时，已受了7个月酷刑，全身浮肿，严重脱水，常常发高烧。但是，花老师的斗志越发高涨，在狱中写了很多诗。在一首《我是王》的诗中写道：

我是王，
把生命发出万道光，
毁掉这恶牢的万道墙，
跳到大路的当央，
要活，就要有主张，
死也死在主张上！

还有一首诗里写道：

暗室虽没有日光，
我胸怀十万个太阳。

花老师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在难友的搀扶下走出了奉天第一监狱。由于所受的残酷摧残，身上遍体鳞伤，在狱中得了严重结核性腹膜炎，身体虚弱到极点。1946年6月13日，年仅34岁的花老师，还没有能够看到他追求的光明世界，就似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陨落了。

捕后审讯

高玉元

被捕后审讯开始,首先拿出李昌毓的新诗逼供,并用重刑“压杠子”、“吊大褂”和用棍棒拷打。几经折磨,我脑袋肿了,腿出血了,几乎昏了过去。

经过 20 多天的刑讯逼供后,把我们 5 人由熊岳转押至盖县城内警察署留置场。在这里我才认识了二高学生臧永昌、于恩惠、周建涛、王德祥、王永泰,女高学生穆玉琪、侯庚芝、姜静芳、赵俊芬。这时方知道被捕的学生已有 20 多名。

后来又把我押解到县警务科留置场,见到了李昌毓,还认识了社会青年王锡成、张克恩、李季生及陈亢等人。在这里,从和这些人偷偷谈话中,我才第一次知道于家麟是地下国民党员,计划在社会上成立“青年自觉社”,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以宣传反满抗日思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锡成,他一面遭受酷刑审讯,一面还宣传革命思想。那年我才 17 岁,是被捕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格外关心我,教我什么是“小布尔乔亚”,不要悲观,要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等。他是我初步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老师。大约经过两个多月的审讯后,以“治安维持法违反”之罪名,把我们都押送至奉天第一监狱。我虽然还是个不大懂事的青年,也同样带上沉重的脚镣,成了一名“思想犯”。

日伪监狱中的苦难生活是可想而知的。每天只给两顿猪狗食都不如的限量饭,还要强迫我们饿着肚子参加缝袜子、拆布袋的定额劳动。由于遭受各种酷刑,有病又得不到及时治疗,加上长期监牢生活的折磨,有的同学牺牲在狱中,如年仅 18 岁的王盛伦和营口青年许庆春等。

日寇虽然能关押我们的肉体,但关不住我们的思想和精神。在我被关押的楼上三号监房里,共 20 多人,“政治犯”有李继武(沈阳,国民党员)、秦 XX(本溪教师)、我和汪士硕(盖平县青年)共 4 人。我们互相关照,并不感到孤单,而且能够暗地里搞些活动。如传说花喜露可能是共产党,同日本鬼子斗争很坚强,我们都很敬佩。我还偷偷地听李继武讲述五四运动的情况,学会小声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渔光曲》,我们每天早晨背诵孙中山的遗嘱。思想上更加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也就更加热爱祖国。1945 年,有时可以读到秘密带进去的报纸,了解了

日本战争连遭失败。又听到美机轰炸的消息，感到日寇统治的寿命不长了，我们都很高兴。互相鼓励着：“要好好保护自己，准备迎接新的斗争。”所以，我虽然患了满身的疥疮，还天天坚持锻炼身体。

“经济犯”救了我的命

关云车

在盖县对我们刑讯了半年多以后，就把我们押送到奉天第一监狱。住过第一监狱的人都知道西角门是鬼门关。病死的、打死的、被绞死的都从西角门拉出去，监狱里各种流行传染病不断，一旦谁得了传染病，不管死活，一律拖出西角门埋掉或烧掉。1945年3月，我被虱子传染患了“回归热”而发高烧、流鼻血，大家都为我瞒着、打掩护。一位姓郭的商人，因为买旧棉絮做家具垫子，被特务抓住，说他违犯了“经济统治法”，定为“经济犯”。他利用家属接见机会，让家属把阿斯匹林做在食物里冒着危险带进牢房，偷偷给我吃了，就是这种药才使我很快好起来，才避免被送去西角门活埋。

田贲的狱中斗争

铁汉

1944年5月，我被日寇逮捕，押进沈阳小南关第一监狱。这里每顿只给囚徒一个饭坨，就是又粗又红，夹杂着沙子、老鼠粪的高粱米饭团，能有二两来重。有时只给几粒咸盐或一小片咸菜，有时是浮着白菜叶的清汤。饥饿、疾病、毒打，折磨着每一位难友。不久，听说田贲也被捕押在这里。

在难友中间，流传着田贲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故事，传来传去，有的甚至带上了传奇色彩。

田贲在狱中受刑最多，灌凉水、吊大挂、压杠子，什么酷刑都受了，但从来不曾向敌人喊叫一声。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日本特务的酷刑拷打。特务们要他交代组织

和同党，他坚决不承认有同党。有一次，日本特务把洗净的苹果送到田贲面前：“花的，我送给你几个苹果，请用……”田贲怒目横眉，说：“这是我们的苹果，你是吃我们的，我不吃，我吃够了！”

伪满沈阳第一监狱的病监，虽说有一个医务所、一个日本大夫、两个曾当过医生的犯人做护士，不过是做样子看的。病监有轻病号和重病号，经常达到五六百人。有病的犯人照样吃“饭坨”。只是像我们这戴脚镣的重犯有一点方便，进病监时，把脚镣给摘去了。那时犯人明知进了病监也就离鬼门关不远，但总是抱一线希望能够活着出来。

我昏迷了好几天，有人喂我药，喂我水，我终于醒了过来。这时有一个人俯下身来问：“铁汉，你想吃点什么不？”

我起初一惊，仔细打量下这个面目浮肿、颜色惨白的中年人，不由得悲喜交加，满眼含泪，叫了一声：“花老师！”

他微笑着温和地握着我已经皮包骨的手：“一定要吃点东西，我们要活下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吗？”

我苦笑着点点头。从田贲身上我获取了奇异的力量。他给我指出方向，给了我斗争的勇气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帮助我从死神魔鬼那里挣扎着活下来。

这期间，他给我读他在狱中所写的二三十首诗篇，那都是他偷偷用铅笔头写在草纸上的。我为他在诗中表现出的惊人毅力和伟大气魄而深深感动。他在《我是王》中写道：

我是王，
端坐在恶魔的牢房，
饥寒毒打全都不关我痛痒，
你们卑鄙狠毒，
不用趾高气扬，
我知道，
这里就是我战斗的地方。
我是王，
把生命发出万道光，
毁掉这恶牢的万道墙，
跳到大路的当央，

要活，就要有主张，
死也死在主张上！

这是何等铿锵的声音啊！这是古往今来一切革命先驱的共同语言，这是为捍卫真理而斗争到底的号角。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句短诗《暗室》：

暗室虽没有日光，
我胸怀十万个太阳。

我没有读懂，问他也笑而不答。他在《谁也不知道》中写道：

我曾做些什么
谁也不知道
我还想做些什么
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我心里的快乐
谁也不知道我此时心里的快乐

光复自由之后，我才弄明白：田贲参加共产党，敌人始终不知道。田贲被捕后，坚持“到我为止”，不向敌人吐露半点组织机密，所以地下工作同志照样活动。这是他的胜利，所以心里快乐又是谁也不知道的。田贲的快乐表现了他高尚的情操和价值观。

在他写的 20 首旧体诗中，我印象较深的是：

夜半灯昏人独醒，
幽思忽得圣贤心。
槛窗争禁横流志，
独步人间有所亲。

我已病情好转，坐在墙角，激情洋溢，便和诗一首，送给他看：

九死一生喜逢君，
铁窗难锁壮士心。
高山流水今犹昔，
愿与我师有所亲。

田贲依然宽厚地微笑着，最后却摇了摇头。他思考了半天，才说：“你为什么把壮士心仅仅放到个人感情上去？仅仅放到你我之间上去？你亲我，我当然感激，可你是不是应当更亲那些大众呢？”

正在此时，突然被看守一声吆喝打断了：“你干什么？”

田贲机警地把他画的一幅山水画举起来：“随便画个画。”

看守咔嚓一声打开牢门，我吓得将草纸一口塞进嘴里，话也讲不出来。全仗田贲周旋，那看守一边申斥着“蹲监狱还他妈有心画画”，一边悻悻地滚了出去。从此，田贲终于答应，允许我称他为老师了。

楼下病监十一号牢房，我俩铺挨铺，头挨头，是我向花老师学习的课堂。

从1945年6月开始，日寇在前线节节败退。美军飞机已开始轰炸沈阳。8月8日苏联出兵东北喜讯传来，十一号所有犯人莫不高兴。田贲写诗一首，来表达这种心情：

消息飞来新鞞鼓，
夜中征舞且狂歌。
忽忘长囚身已病，
欲鞭弩马试横磨。

身残志不残的一个革命者，想象着不久可以跃马横鞭驰骋在祖国原野，这种崇高境界流露在字里行间。我欣赏着，被感染着，可是忽然品味到“长囚身已病”，不由得眼睛湿润了。我最清楚毒辣的日本特务把可敬可爱的花老师糟蹋到何等程度，他全身浮肿，肚中有水，腹膜炎，经常高烧……在这病监里，几乎天天都有因为浮肿而被抬送太平间的人。他是全凭一个革命者宽广胸怀与坚强意志战胜死亡威胁的。

伪满奉天高等法院经过反复审查，也查不到花老师半点从事地下活动的组织线索，只好根据盖县的文化活动宣判他15年徒刑。

在8月14日晚上，突然传来日伪要秘密处决全部政治犯的消息。于是，政治犯

们被迫采取了越狱的措施。我在激愤中，一气呵成一首《狱中之歌》，呼吁政治犯团结一致为破狱而战斗。我把这首诗念给难友听，大家个个摩拳擦掌，表示要一起往外冲。一个名叫欧君的抗联战士第一个表态：“我负责背老花……”另一个从山东根据地被抓来的民兵抢着喊：“俺背！俺比你体格好！”

半夜暴动了，仅仅一部分冲出去，我们住的监牢根本没人来给开门。可是，日本特务的部署被打乱了，一场大屠杀的阴谋也破了产。

狱中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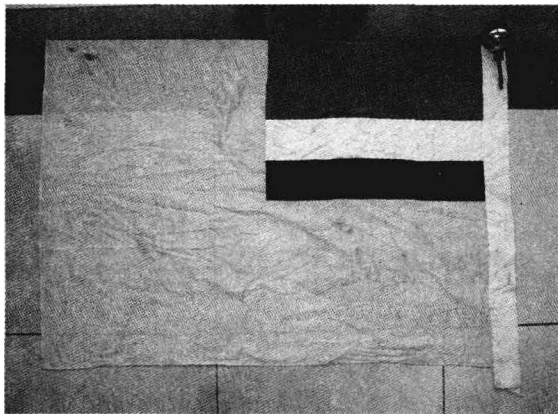
李吉恒

我在长春警察厅被日伪警察拘留时，曾遇到从沈阳押解到长春的三个盛京医大的学生，他们是齐海航、李玉田、陈明仁，曾在“北陵秘密室”和花老师拘留在一起，共同经历了非人的生活。在言谈中他们说：“你的老师真行，身上都打成紫茄子色了，还和敌人斗，并且还骂日本人。一次过堂，日本人耍花招，给他苹果吃，他痛斥日本特务说：‘这是我们的苹果，你是吃我们的，我不吃，我吃够了。’本来日本人采取饿犯人的政策，一般人抵抗不了，哪有不吃的。可花老师始终没吃，真有骨气呀！他在那里受刑是最重的，灌辣椒水，双手吊上去，底下用火烤，每次过完堂都是拖回监房的。尤其审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始终也没有承认。”

据说“秘密室”在北陵公园内一个小院里，修的是地下室，全是日本人看守，连做饭的女人都是日本人。那饭不仅有糠和虫子，而且不熟。监房里潮湿、闷热更不待言了。

1944年8月10日，我被从长春押解到盖县，当时我和鲁启智、冯策勋、王家贻、阎家珍5人，由于饥饿，连上火车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到盖县时，押在警务科留置场里的一些同学，正往奉天第一监狱送。我在盖县又被日本特务审讯4个多月，在12月29日，解送去奉天第一监狱。到那里的第二天就给钉上了脚镣子，然后分到二舍楼下五号监房。到里面一看，李昌毓也在那里，我真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在患难之中，但也得到一些安慰。头一天睡在“狱神”——就是便桶旁边。监号里有20多人，应该按顺序谁后进来谁挨便桶，由于李昌毓先到那里，他和另外两名“政治犯”崔蕴声、宋维新处得很好，经过他们的努力，过了一天我就挪到李昌毓旁边了。那时未判决的

犯人也不让闲着,每天都要缝袜子,完不成任务不行,我新进去不熟练,都是李昌毓帮我缝的。在这期间,我们4个政治犯紧紧团结在一起。他们三个按时参加总理纪念周,我也不了解,只是旁听。他们教我唱《义勇军进行曲》《七七抗日歌》。尤其是宋维新,他和花老师都在北陵秘密监狱待过,是在一个监室里,对花老师了解最深。他说:“《我是王》那首诗,花喜露写完就给我看了,我很受启发,感觉坚强有力。所以我给配了曲。”说完他就教我们唱,确实雄壮有力,越唱越有劲,越唱越精神振奋:“要活,就要有主张,死也死在主张上!”这句诗是多么有力
量!他在狱中鼓舞了多少革命志士视死如归啊!



伪满洲国国旗

于家麟在狱中

杨士绵

1944年5月19日,我和一批同学在盖县一高求学期间,被日伪特务逮捕。经过两个多月的毒打逼供,最后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于同年8月7日第一批被送往奉天第一监狱,关押在二舍(栋)。

我被关押在二舍上(楼)二号监房。那是个大监房,人多时关着20余人,少时也有十几人。

1945年春节前,我那个监房里来了个新“犯人”,我一看很熟悉,是于家麟。于家麟看到我,显得很高兴。他从前认识我,我向他借阅过书籍,请他帮助改稿等。这里的惯例是,新来的犯人紧靠茅桶住。几天以后,“炕头”了解到他是本案的“首犯”,又颇讲礼貌,让他的睡处离开茅桶,我们之间的位置靠近了。大约半个月后,我俩就紧挨着了,说话也方便了。于刚到监房时,头发、胡子都长得老长,显得瘦弱,但两只大眼睛却炯炯有神,思想情绪颇为乐观。他很关心本案被捕人员情况,不断问这问那。我

告诉他：听说特务们到他家去抓他，头两次都没抓到，可是把他家翻了个底朝天，不知搜去了什么东西。到了5月19日，日伪在全县有组织、有计划地大逮捕，我就是那天被抓的。我继续告诉他：那天没抓到他，却把他的妻子和一个吃奶的孩子、母亲和妹妹都抓去了，分别关押在盖县警察署拘留所一号、二号监房。抓去后当即对她们进行交替、连续逼供，让她们供出你逃到那里去了。每一个被逼供回来都是哭声、哎哟哎哟的疼痛难耐的叫声不止，几乎是连续了两天两夜。因为我关在四号监房，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于家麟听到这些后，一方面感到怒不可遏，另一方面感到“自己做的事连累了家人，当初，不躲逃就好了”。我又告诉于家麟说：在大逮捕后一周左右的一个晚上，看守在拘留所的走廊高声对我们叫骂：“你们这些兔崽子好好听着，你们的头子于家麟已被抓住了，装在麻袋里送奉天去了，到死你们也见不着他一面了！你们赶快交代自己的问题吧！”他听后轻蔑地嗤笑一声，没再说什么。

我又告诉于家麟，在大逮捕的那天，第一国高的有十几人，二高的4人，女高的4人，当日没抓到的，以后陆续都抓到了。还有不少社会上的和上大学的，包括一些亲属在内，估计可能超过百人。听看守们谈论：这些不要命的狗崽子们，盖县警察署、警务科和协和会三个拘留所都关不下他们，有些还得暂时关在熊岳城拘留所。老子听说抓这么多人，颇感惊讶，他说：“抓这么多人，我真没想到。将来光复了，盖平的父老乡亲们是不会饶恕那些特务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着瞧吧。”他还特别关心被抓后坐牢的小同学，他说：“他们不仅念不了书，而且还要坐牢狱。这是敌人害怕真理、垂死挣扎的表现。”对小同学，他主张：只要有获释的可能，放一个是一个，能全部获释更好。特别是知道王盛伦同学病死在狱中后，更是这么主张的。他说：“小日本统治虽然不会很长，但在这里坐牢是有生命危险的，像王盛伦那样死了，多么可惜，多么可惜啊！”

后来他还询问了被捕坐牢小同学的学习情况。我告诉他：“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同学和老师的心目中都有较高的威信。就是在被捕和坐牢后个个也都很坦荡、乐观。”并告诉他同案人各在哪个监房。

有时我问他被抓和审讯的情况，他说：特务把他从盖县送到奉天下火车后，用布把他的双眼蒙上，然后把他推上汽车，左转右转，走了一会儿说是到了，把他带进监房后，才给他解开蒙眼布。一个人住一个监房，周围是带电网的高墙，可能是警务厅拘留所，估计花喜露也关在那里，但是始终未见过面。对审讯情况，他说：压杠子、灌凉水、吊大挂、夹手指，都尝过了。并伸出两手让我看他那夹弯曲了的手指。

于家麟在狱中同我谈论较多的还有日寇投降出狱后的一些打算。我被捕的当天

下午,在拘留所内听同案的张克恩说,于家麟是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从此,我确知于家麟的政治身份。由此我开始懂得我们案件的性质和复杂性。但我同他谈论所有问题时,他从未谈及其政治身份,我也不便问他。

他同我谈论最多的有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惩办汉奸、特务的问题。他对汉奸、特务非常仇恨,特别是对那些对我们实施酷刑的人,更加愤怒。他说:“光复后的盖平是人民的天下,我们要严惩汉奸、特务,逮捕和治他们的罪,父老乡亲公认为罪大恶极的要治他死罪。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

二是举办文化设施。于最感兴趣的是开报馆出报纸。他说了许多具体想法,可惜我对此一窍不通,记不住具体说法了。但有一点记得颇牢,他说:“盖平地方小,人才少,要到营口去办,那里人才多,想法办成人们喜欢看的报纸。”他还说:“要在盖平继续开设书店,要比秋灯书店规模大,办成盖平最大、最有名望的书店。”他说他还要写诗歌、写小说,要出书。现在回忆他当年的言行,确想成为一位名诗人、名作家,对政治之道,则无多见。

三是关于被捕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出路问题。他说:“愿意上学的继续上学,不愿上学的和社会青年就帮助找工作。”我自感文化知识少,愿继续求学,最好能上大学。他甚表赞同,并说:“凡坐过监狱,又愿上学的,我们出证明,争取免费。”能公费上大学,是我当时的最高理想,如能实现,那是求之不得的了。

对我们这些“未决犯”,狱方不给任何书报看,偶尔从新进监房的狱友口中听到一些传闻,算是大消息了。为了振奋精神,增强信心,于家麟教我们唱《流亡三部曲》,后来得知它的确切名称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里是在唱啊,唱歌是狱方绝对不允许的。我们就小声哼哼,而且是在看守巡视的间隙小声哼哼。开始是我一个人,后来又有几个人跟着唱。

那时只要一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先是满腔积怨,无比悲愤,而后是精神振奋,怒火满腔。“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是的,我们黑土地的东北是如此富饶,可是这些不是我们的了,东北不是东北人的东北了,而成为日寇铁蹄奴役蹂躏下的东北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是的,那里有当牛做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同胞,那里有不知儿女今在何方的爹娘,儿女也不知爹娘是否还活着。“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流浪,而是拿起笔作刀枪,刺向鬼子的胸膛,如今我们被禁锢在牢房,还要奋起反抗。“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

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我们越唱，信念越坚定。日寇必败，伪满必亡，抗战必胜，人民欢庆，这样的日子不会很远。到那时，我们一定可以回到可爱的故乡！一定可以收回那无尽的宝藏！同父母一定能欢聚在一堂！

尽管那时称它为《流亡三部曲》，尽管那时于家麟教的和我们唱的词曲不一定准确，但它却是一篇反满抗日的檄文，我们每唱一遍，都加深一分对日伪统治的仇恨，增强一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力量，同时也增加了对于家麟的崇敬。

日伪监狱，是他们统治的典型缩影。对反满抗日的仁人志士来说，坐一次牢狱，更加增强了对日伪统治的仇恨。我们在那里，盼望着光复的一天早日到来。

右手拇指至今不能活动

门文东

一天夜里，日本审问官上田警佐和翻译金朝泰，又把我提出去审问，上田问：“你为什么要反对日中亲善，破坏大东亚共荣？你的良心大大地坏啦。”我说：“你们侵占我国的领土，杀害我们的同胞。凡是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要起来反抗你们的。”金朝泰是个朝鲜人，他的日本话、中国话说得都很流利，当他把这些话翻译给上田以后，上田气红了眼，回手操起一根木棒子，照着我的腰眼打过去，我扭身用带着手铐的双手一迎，木棒子正打在我手上，又撞到腰上，当时就把我打倒在地。几个打手又用绳子拴住我的两个大拇指，把我吊在房梁上，紧接着就用皮鞭、木棒轮番抽打。一边打一边问：“谁是你们的领导？你们还有哪些同伙？”我咬看牙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没有领导，同伙都叫你们抓来啦。我们反满抗日是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我没有钱就出人！”又是一阵毒打。等我被拖回牢房，全身已不能动弹了。过了好多日子，发现右手拇指怎么也不能动弹了。后来才明白：就是上田那一棒子把拇指关节打碎，从此造成右手拇指不能活动，影响写字和做细活。

女监

姜静芳

8月的一个深夜,我们这些爱国青年,被带上手铐,押上了北去的列车,投进了奉天第一监狱。

女监,位于监狱最后边一个狭长的院子里。我和侯赓芝、穆玉琪、赵俊芬被分散关押在各个监号里。监号里的“炕头”是个躁悍凶狠的杀人犯,号内犯人都得听她摆布。可她似乎也懂得点道理,并不欺侮我们。在她们眼里,我们学生是有血性的爱国青年,是反满抗日的政治犯。因此,对我们只有尊敬和爱戴,从不欺侮。不少看守、犯人都有中国心,同情我们,她们也是如此,都愿意帮助我们做些事情。有一天,两个来上玻璃的已决犯胡子头“老北风”“靠山红”悄悄地对我说:“你们学生反对日本鬼子,我们就是佩服,你们有什么事,我们愿意为你们传递消息。”判处8年劳役的南满医大学生杨维兴(杨野),经常利用给女监送活儿(棉衣锁扣眼、钉扣子)的机会,把一些进步书籍藏在棉衣捆里带给我们阅读,并不断偷偷告诉我们一些男监同学的情况。当听说花喜露、杨伯甫、门恩义等身染重病住进病监时,我们都很着急,希望他们早日康复;当我们听到门恩义同学病故的噩耗,都为失去一位坚强有为的战友而悲恸,更加痛恨日寇的残暴罪行。

一天,美国B29型飞机轰炸奉天,把日本人吓得惊慌失措,而我们就别提多么高兴了。宁愿牢狱炸飞,只盼日本鬼子早日完蛋。

1945年夏初,我和李昌毓、臧永昌等同学被提审。在法庭上,我们当着日伪特务的面,痛斥特务们给我们罗织的种种莫须有的所谓“罪行”,控诉了特务们野蛮的刑讯逼供的罪行,使日伪特务在法庭上显得非常惊慌、狼狈。

田贲狱中情景回放

王丹群

日本投降、东北光复，田贲出狱后我才知道，他被捕后关在北陵留置场特务秘密分室一间刚能转开身的暗室里。就在这间黑牢里他被关押历时7个月之久。每天晚7时开始审讯至次日早7时，从未间断。敌人为了得到党的地下组织和党员名单，对田贲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刑罚的名目繁多：吊大挂、过电、灌辣椒水、压杠子、皮鞭抽……敌人让田贲写出朋友的姓名，田贲就按百家姓写“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敌人说你怎么这么多朋友，田贲说：“全中国人都是我的朋友。”敌人问他的组织和领导人是谁，田贲说：“我没有组织，也没谁领导我。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每次审讯敌人都是一无所获，只有施以酷刑，有一次敌人用鞭子抽得他全身紫靛一般，看不见一块皮肤本色，敌人还狂叫“这就是艺术”。在7个月的审讯过程中，田贲昏死过11次，出狱后背上还有两块伤疤。

田贲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以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和不可摧毁的共产主义信仰，战胜了敌人的酷刑，实现了“到我为止”的誓言，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了地下党组织和他所认识的同志和朋友。正如他的狱中诗所写：

慷慨赴囚虏，
挺身担大刑。
愿将新血肉，
烈烈试贞情。

1945年春，田贲已从北陵留置场转到沈阳小南门里第一监狱，这时可以送东西了。田贲在狱中写了许多诗篇，有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谁也不知道》《暗室》，有浩气冲霄的《咏梅》《无题》和狱中歌《我是王》。这些诗是由一个叫“大程”的人从第一监狱秘密送给我的。他不告诉我真实姓名，他对我说你就叫我大程吧。田贲出狱后他也再没有出现。所以，我始终不知道他的姓名和身份。这些诗当时给我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离开田贲家之后

姜毅

1944年4月28日傍晚,我在找到入关的门路之后,兴高采烈地到花老师家里,想约他们一起投奔革命。想不到花老师被捕,王丹群因刚刚生完孩子被狱外监禁。王丹群见到我惊惶地告诉我有特务监视,叫我快走。

我匆匆离开他家,逃离东北。那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准备随时献身的年月。我们都准备用自己的血肉为后继者扫清一段前进的道路。虽然我们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但我们谁也没指望我们会活到那一天。我们意外地活过来了,但却牺牲了我们最亲密的战友和领路人。一想起花喜露同志,就使我联想到20世纪20年代党在草创时期,那些在荒芜的大地上撒播真理的火种直到自己为真理而献身的拓荒者们的形象,虽然他们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形象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

在过去的30多年中,我见过当年我们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中的同志已有十几个人。包括东北组织的负责人丁宜同志,他就是当时住在花喜露家对面屋那个在志城银行上班的姓张的人。当然,当时花喜露和王丹群不了解他的身份。当我向他提起花喜露同志时,他说:“咳!如果老花能活到现在,那该多好……”表示他对花喜露同志的称赞和对他牺牲过早的惋惜。花喜露同志被捕以后,按照秘密工作规则,所有他认识的人都须转移,可是,这并不是在混乱的上海租界,而是在日寇严密控制下的东北。改换名姓、住址、职业,谈何容易!几个领导同志分析了情况,他们坚信老花一定顶得住。因而,谁都没有转移。如果出了什么事,不仅会牵涉到整个东北的地下组织,而且还会牵涉两位中央派来指导工作的同志。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老花当时对我讲的秘密工作的信条。如果自己出了事,那就是“到我为止”。

1944年4月28日那天傍晚,我侥幸平安无事地离开了花老师的住所,流浪了近一个月,长途跋涉越过山海关,到了青岛,找到了我的弟弟宗璜(现名陶炎),很快我们就找到了关系,进入胶东抗日根据地。我们都各自战斗在不同的岗位上,走着复杂曲折的道路。在困难的时刻也未曾屈服于邪恶的势力也只能以此来告慰当年的同志了。我们都是为未来工作的,难得有时间去回忆往事,但是同花喜露同志相处的那

些日子，他那刻苦学习、追求真理的精神，坚定的革命意志，诚恳朴素的作风，始终是鼓舞我在困难中前进的动力。不仅是对于我，他的形象也在感染着我的孩子们，他们也都知道他们父亲当年的战友中有这样一位烈士，而我确实也幻想有一天会突然遇到一个叫花铁虹的青年，告诉她我和她父亲相处的那些日子。我觉得在品格和气质上没有能及得上花喜露同志的。

监狱经历

王锡成

从审讯到人狱，经过敌特的严刑摧残，有以下同人先后死去：王克范（笔名竹人，1985年被追认为烈士）、许默语（笔名噩疋、魔女）、许庆春（笔名雷力普）、门恩义（学生）、王盛伦（学生）、李勤甫（秋灯书店经理），还有一位名叫杨伯甫的，是为掩护我们的同人而被捕的，也被严刑毒打致死。

一进监狱即被带上脚镣，投入五六人一室的小监房，不准自由行动，每天得静坐，白天不准瞌睡，偶一违反，轻则被看守大骂，重则被用胶皮板子毒打。监房长不到四步，宽约两步，有时住七人，茅桶在墙角，非常臭。冬天地板上霜，睡在上边像冰床一样。每天两顿饭，早上稀粥，晚上粗粮饭团，均吃不饱。每个犯人都饿红了眼睛，我被押一年多，终年囚禁坐于监房，有时强迫在房中缝袜子和手套。

由于犯人吃不饱和终年囚禁，想吃点什么或向外通个信，就成了看守们大发其财的机会，受贿之风监狱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大都是两头压榨，中饱私囊。如看守将犯人偷着拿进狱中的衣物、钱财拿走，给买几张煎饼就可以了。有的家中托看守带来的东西，先留下十分之九以上，余者交犯人。

我住的监狱四舍，都是没判决的犯人，被看守毒打的事是终日充耳，惨叫声不断，使人不忍闻。我曾亲眼看到一个沈阳铁西区的工人，不知为何被捕判刑3年，执行中他逃走了，不过3天被追捕回来，脱光衣服于院中用胶皮板子将身上的皮揭下来，然后带上脚镣推到我住的房中。该工人已昏迷不醒，不到半夜就死了。我告知看守，他们不管，直到早晨才抬出去。另一个逃走被捕回的关在我们隔壁，7天没给饭吃，瘦得皮包骨，不知以后死活。总之，监狱黑暗无天，拿人比牲畜不如。

我同案的朋友就有王克范、许默语、徐庆春、王盛伦、门恩义5人，均因在刑讯中

被拷打摧残严重,监狱又不予以医治而折磨致死。其中王克范就死在我住的监房隔壁,死前周身浮肿,监狱不予治疗,还说“死了的好!”另有花喜露、李琴甫、杨伯甫3人,因刑讯和在狱中折磨成疾,出狱后即卧床不起,旋即死去。

当时的第一监狱押有五六千人。最多是所谓经济犯、盗窃犯、思想犯。此五六千人中,有1000多人是未判刑的,终日监禁,其余都在监狱中各工厂强迫劳动,如裁缝、铁工、木工、基建等。

由于敌伪将人不当人看,监狱中就无所谓人的生活条件。食物霉烂,居住污秽,体罚严重,医药无着。据被押较久的人说,每天都有十到几十人死亡,夏天都放臭了,用拉粪车拉到东郊,冬天垛成垛集中拉走。

监狱中设有绞刑楼,犯人把它叫小楼,在第一监狱西北角。被判死刑的过3个月或6个月后,就送到小楼被勒死。我于监一年中,记得有六七人先后被执行绞刑。

总之,那时的监狱就是地狱,监狱管理人员就是小鬼和阎王,他们什么时候叫你死,你是不会活的。据住久一点的“犯人”说,监狱看守和狱长,他们敲诈某人不得手,就可以找茬打你,直到打病送进病监,然后进一步逼迫就死掉了。

伪敌特把我们关押到1945年春,将一部分同人以“假释”的名义释放。除已死的7人之外留下要判刑的有11人:于家麟、门文东、张吉宽、花喜露、王锡成、张克恩、鲁启智、郁庆令、李昌毓、臧永昌、迟金镇。直到这年伪高等检察院提起公诉,经过伪法院审判之后,我才知道于家麟、门文东、张吉宽曾承认他们是国民党党员,而花喜露什么也没有承认。这从敌伪量刑也可看出,要判于家麟死刑、门文东无期、张吉宽20年,而花喜露和我是15年。

1945年8月15日中午,正是日伪高等法院要对我们宣判的时候。就在敌人的法庭上,听到了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祖国的大好河山,英雄的人民,在数不尽的革命先烈英勇顽强斗争下解放了!

审讯

赵俊芬

1944年春,日寇在社会上的大逮捕中发现了《辰星》《大地》,以反满抗日的罪名逮捕了所有撰稿的学生。20世纪50年代,在沈阳进行的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原

伪奉天省警务厅特务股长前渊供认罪行中的“桃园”事件，就是盖平的这一反满抗日事件。

在审讯中，敌人对被捕者用尽酷刑。有的同学被棍棒打得腿不能走、手臂不能动，瘫痪在刑场上；有的被压杆子、坐老虎凳，腿骨骨折、化脓溃烂；有的被灌凉水，造成腹膜炎，从肚脐里流出血水；有的受无数次电刑，十几次昏死过去。盖一高有两位同学，其中一位只有15岁，因酷刑惨死在狱中。当年我只有17岁，长得瘦小，被日本鬼子加部和伪警尉补赵景文两人把我两手反绑在背后，吊起来脚离开地，并用木棍狂打，不出几分钟，我就昏过去，苏醒后，两只手腕被绳子勒出深深的血道子，两臂完全失去了知觉。我被拖回警察署留置场牢房，连吃饭都不能动手了，全靠同监房的难友一口一口地喂，才活了下来。残酷的刑讯使我们对日本鬼子恨之人骨，愈加坚定了我们反满抗日的意志和决心。

经过半年的审讯，1944年8月的一天，我们这些学生被带上手铐，押上火车，转到伪奉天高等检察厅，投进沈阳小南门里伪奉天第一监狱。男同学都被带上沉重的脚镣，4名女同学分别关押在女监4个监房里，每天要给关东军缝军服上的扣子。早晚两顿饭，每顿吃的是2两重的掺和着糠皮的高粱米饭坨和腐霉了的胡萝卜块加豆腐渣做成的稀汤。去年，我参观沈阳九一八历史纪念馆，在展品中看到那阴森可怖的牢房，一件件沾满鲜血的刑具，看到那给犯人扣饭坨用的一个个模具，回想起那血腥风的狱中岁月，更加怀念同案中7位惨死在敌人酷刑下的同学、战友，心中涌起无限悲痛。

爸爸死后三个月我们才知道

王剑华

爸爸和已被捕的于家麟一起被作为重犯押到沈阳，和早已被捕的花喜露一起关押在北陵留置场特务秘密分室，在这里审讯将近半年。敌人对爸爸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毒打、压杠子、老虎凳、吊大挂、坐电椅、灌辣椒水等。爸爸一次又一次地昏死过去。在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下，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地和敌人斗争，历诉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血腥罪行。敌人得不到口供，只有对爸爸施加重刑。爸爸在审讯中受刑最重，在敌人的酷刑下于同年10月份壮烈牺牲。王丹群阿姨回忆

说：“我听说克范死得好惨哪，活活被敌人打死了。”那年他刚刚满 31 岁，就与世长辞了。

爸爸死后 3 个月，直到这一年的农历腊月，我们家才获悉爸爸早在 10 月份就已殉难于北陵留置场的噩耗。

遥吊杨伯甫

孙萌

在盖平县过堂时，我见过两次杨伯甫，有一次是同堂审问。毒打、吊大挂、压杠子，我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杨伯甫始终紧闭嘴唇，不说也不叫。据说，他一直受刑很重。对我的审讯中，从未有过是从他那里说出的什么情况和问题。现在想到这些，崇敬之余难免还有一种内疚和心酸。他毕竟是为掩护我们而牺牲的。

在监狱里，我再没有见到杨伯甫。从一个男杂役口中听说的，杨伯甫受刑过重，两腿溃烂被收进病监。我们这批人“假释”出狱之后，我和穆玉琪、姜静芳还有李季生，立即去看望杨伯甫。他已卧床不起，看上去十分痛苦。当时，我只想到他的腿可能保不住了，没想到他会死，更没想到我们这次看望竟是永诀。我是在盖平县家里听到他的死讯的，心里十分难过。他在活着的时候竟没有听到我说一句感谢他的话。当时，思绪万千，我拿笔写下一篇悼念他的小文和一首小诗，后来送给鲁琪主办的《文风》。粉碎“四人帮”之后，鲁琪来沈阳把这两篇小稿交给我，算是留下了一份纪念。这首题为《遥吊》的小诗写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阴沉之夜”：

为了正义
你迈进监牢
为了朋友
你失去了双脚
终于为了人类
你停止了青春的心跳

你没有眼泪

你没有叹息
因为你在真理的胸前
树起了胜利的旗帜
你有快活
你有欢笑
因为你在苦难的地上
栽下了健康的秧苗

你这生之完成者
我不愿向你作空洞的凭吊
我愿为你
血的功绩歌颂
你是黑夜中的一盏灯
是长夜里永不落的星

三、长夜过后盼天亮

伪法院审判结果

臧永昌

1944年8月7日,我和蒙难的朋友们、同学们被转解到伪奉天省高等检察厅、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带镣囚禁在伪奉天第一监狱。1945年5月4日,伪奉天省高等法院以“治安法违反”罪,对25人判处3年犹豫执行,放回家由当地警方监视。这25人是:“盖女高”的姜静芳、穆玉琪、侯赓芝、赵俊芬;“盖一高”的杨士绵、李吉恒、高玉元、赵廷奎、张文廷、洪声钜、关振国、张登玉、赵怀藩、李如东、赵宝丰、李连泰、赵俊久;“盖二高”的周建涛、王德祥、于恩惠;社会上的孔庆举、汪士硕、李季生、李明轩、阎家珍。8月9日,伪奉天省高等法院通知将于15日以“治安法违反”罪判决于家麟死刑,门文东无期徒刑,张继宽20年,花喜露、王夕澄、张克恩15年,郁庆令、鲁启智、迟金镇、李昌毓、臧永昌5年。8月15日,我们等待正式宣判,却等来日本战败投降,东北光复。8月19日,被判刑的11人出了监狱。

宣判

杨士绵

在热切的盼望中,我得到了被释放的消息。1945年5月3日晚饭后,帮助看守做事的一个已判决犯人,扒到我们二房铁栏杆窗前,把“炕头”和我招到跟前,笑嘻嘻地说:“明天,杨士绵开放。”我疑惑地问:“是真的?”他严肃地说:“这事还能开玩笑。”我急着又问还有谁,“你们学生都开放”。说完他又到他熟悉的监房报喜去了。不多会儿,看守前来正式通知:“明天杨士绵开放。”开始,我半信半疑,正式通知,我相信是真的了。狱友们听到后伸出大拇指向我表示祝贺。于家麟问我:“估计还有谁?”我告

诉他说：“我是四年级学生，是《大地》出刊的具体负责者，释放我，估计其他同学都能放。”于沉思了一会儿，找了一张小纸片，向“炕头”借来全监房唯一的一支铅笔头，随后写下了“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勿忘祖国，勿忘同志”四句话，写完后交给我，说：“这是出狱赠言。”并叫我把这四句话转告给其他开放学生。同时，他还让我有机会时到他家去一趟，告诉家人他在狱中的情况，请他们放心，等等。我表示一定办到。当晚，我兴奋得很，浮想联翩，幻想着出狱后还能复学，把我们被捕后的种种见闻讲给同学听。想来想去，整夜未能入睡。

5月4日早饭后，看守打开门锁，我走出监房，砸掉了脚镣。释放的人员到齐后，在看守人员的带领下，向奉天高等法院走去。到了高等法院的大门口，首先看到的是在盖县审讯我们的特务和年迈的父亲、各个学生的家长。随后进入审判庭的大厅。学生站在前面，各位家长站在学生后面，特务们各站在两侧。排好队后，坐在审判席中央的日本法官宣判：“为了纪念满洲皇帝第一次访问日本10周年胜利归来和《回銮训民诏书》颁布10周年，对你们这些人宽大处理，实行‘犹豫执刑’，释放回家。你们应当感谢大日本帝国和康德皇帝。”

宣判完毕，盖平县来的特务们又重申了释放后要一律在家服罪，一旦违反，全家治罪。并要求当晚住宿在事前统一租用的旅馆，翌日离开，不得违反。从宣布所谓释放的情况看，我当即觉得，这不过是把我们从小监狱安排到狱外服刑罢了。

离开法庭，我在父亲的带领下住进了旅馆。同学们互相见了面，如周围没人，就简单地几句话；如周围有人，只互相点头表示问好就离开了。我真想利用这个时机，把于家麟的十六字赠言转告给见面的同学，看到特务们窜来窜去，只好作罢。

5月5日清晨，我随父亲乘由奉天开往盖平的火车，当晚回到了痛别一年的家里，老母、哥、嫂和弟弟，全家人欢聚在一堂。有的乡邻来家看望，但多数人不敢前来。第二天，村长、屯长也来了。以后每隔几天，村长准来家一次，问这问那。开始，还以为是对我的关心，后来我发现，他可能是受特务机关指使，来监视我的，如不来，他无法向上交代。因此，我只好应酬了。由于受到直接和间接的监视，于家麟拜托到他家看望之事终未如愿。这样，出狱前于家麟说的两件事，都没办成。每每回忆起来，甚感遗憾。

“特赦”仪式

于恩惠

我们被捕后，日本特务就抓紧对我们进行审讯。审讯完全在夜间进行，由日本特务主审。在审讯过程中对我们施加了种种酷刑，诸如灌凉水、压大杠、把双臂反绑起来吊在房梁上用木棒狠命地打腿棒骨等。和我同住一个监房里的阎家珍，受了压大杠的酷刑，膝盖下前腿骨的皮全被压坏、化脓，致使下肢瘫痪好几个月不能行动。

1945年5月，时值伪满皇帝溥仪访日10周年，日本侵略者耍了一个花招，在5月4日这一天，把我们这些被捕的20多名学生，以“特赦”的方式释放了。于家麟、花喜露等11人没有被释放。“特赦”仪式是在奉天高等法院进行的。开“特赦”式这一天，盖县也去了一些日伪特务、警察，还有我们这些被释放人员的家长。在高等法院的院子里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后，我们就被日伪特务、警察带回盖平县。在盖平县警务科又给我们开了一个小会，对我们提出了一些管制的要求。就是说，我们名义上是被释放了，不蹲监狱了，但在行动上是不自由的。我们回到农村的家里参加了农业劳动。一直到这年秋天的“九·三”胜利，我才完全恢复了自由。

宣判

关云车

1945年5月初，《大地》案件第一次出庭受审。我记得出庭那天，我们被扣上像美国三K党那种黑尖帽子，只露两只眼睛，扣上手铐，从前到后穿上绳子，二十几人一路叮叮当地上了法庭。强加给我们“思想犯”的罪名，判处“犹豫判刑”。所谓“犹豫判刑”，就是暂不判刑。我们被捕的60多人中，11人留在狱中准备判刑，其余的均讨保回家，不许外出，监外管制，实际上是释而没放，随时都可再抓回监狱。我和洪声钜、高玉元等一些年龄较小的同学就是这样判处的。

我获释后受到双重管制

孙萌

当看守打开牢门，我走出监房的时候，我没有狂喜，只是又回头看了看那扇大铁门和铁门上那个大铁“疙瘩”。那里还有多少我们的同胞，不禁仍然感到一阵寒意。看守在后面催着快走，我加紧脚步跟上前面的人。我们来到高等检察厅的门口，盖平来的那帮特务已经等候在那里；我还看到站在后面的父亲，原来通知家长来接。在审判大厅里，学生站在前面，家长站在后面，警察特务站在两侧。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宣判：为纪念满洲国皇帝访日宣诏 10 周年，对你们这些学生宽大处理，判处“犹豫刑”释放回家。宣判完毕，盖平来的特务重申：释放后要在家服罪，不许随便外出，一旦违反全家治罪。什么叫犹豫刑？什么叫假释？我都不懂，但事实明摆着这哪里是释放？分明是把我们从有铁窗的小监狱又送到没有围墙的大监狱。

出狱的第二天，我随父亲登上回乡的火车。同车的除了一同释放的同学，还有监押我们的特务。坐在火车里，我怯生生地望着沉默不语的父亲。他的严肃和沉默使我不安。我从家逃亡，牵连贵为伪盖平商会会长的他也住了一个多月的监牢。这次见面他竟没说一句责备我的话，只是反复说：“我这次是来奉天办事，顺路接你的。”他是想说明他不是特意为我来的。

既然来接我，这已经足够了，我已经很感激他了。在我们一向冷漠的父女关系上能表现亲情的事，过去和现在恐怕只有这一桩吧！

我听着隆隆的车轮声，又陷于遐思中，我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也是这趟火车，把我送向地狱；今天又要把我载向何方？我非常清醒，我并没有获得自由，那是去向另一个监狱，社会的监狱，没有围墙的大监狱，就是在我身后不是还坐着鬼子和特务吗？有他们在，哪里会有自由？只有他们这些人都死光了，只有把旧世界彻底砸碎，这个世界才会有光明，人民才会有真正的自由。昨天，今天，明天，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今后我自己的处境，突然我想：到家母亲会说些什么呢？

黎明前的时分最黑暗，没有铁窗和围墙的牢狱更可怕。出狱后我又度过了一段短暂却是最焦心难耐的时日。

从奉天第一监狱回来，我受到了双重管制。我到家不到一个月，特务已经闯进来

五六次了。进来这瞅瞅那望望，问你做什么了，转一圈又出去。可以不打招呼推门而入，随便进出，这家也失去了安全。母亲对我入狱十分恼火，她认为我给她丢脸了，让她在家里家外都抬不起头来。她说：“哪有姑娘家蹲监狱，一名二声的，好说不好听。从这以后哪也别去在家给我学活计。”我能理解她的苦衷和用心，父亲本来对她就不好，我又给她添乱，深感内疚，只能无言以对。可是，我对她百般限制我的自由，把我软禁起来却十分反感。我怪母亲不知道她这样做是帮了谁的忙。气极了，我跟母亲说：“你真是一个好狱卒啊！”

既然释放就是无罪，还来个什么“三年犹豫刑”，什么“假释”？是什么意思？回来这一个月我明白了，就是要你在特务监管下过日子，有一双眼睛时刻盯着你，只准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给你留个尾巴，有这个尾巴你就跑不了，你就得乖乖地听他的。在这种情况下复学是无望了，和外面通信也是不可能的。盖平的朋友风吹云散，穆玉琪、姜静芳出狱后都到乡下去了；未入狱的朋友，只有张木兰仍然在上学，感谢她不避祸灾，常常在晚上跑来看我。木兰是我的书友，可称志同道合，我俩到一起又像过去那样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了。她是毕业班，学校“勤劳奉仕”剥云母片，这东西是制造飞机用的，让学生干这活，反映了当时的时局和战争情况，日本鬼子的日子不好过是显而易见的。我一边帮木兰剥云母，一边给她讲监狱里的事。我说：“在监狱里每天给衣服钉扣子，我就想起鲁迅翻译的那本日本小说《千人针》，那是写日本妇女反战的。她们一边给前线亲人缝‘千人针’（一种吉祥物），一边倾诉对战争的不满。今天剥云母片又使我想起那本书的情节。”木兰说：“不论在监狱里还是在外边，我们都没有自由，只能任人宰割。唯有一腔愤怒，却无法反抗。”说到这里，我们都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只是我们都感觉到了这种痛苦该有尽头了，心照不宣地都期待着那个变动的到来。漫漫长夜总要过去，黑暗过后就是黎明。这种预感对我们无疑是一种希望，有希望就有奔头，活着就有力量。

帮助我度过这寂寞的监外囚禁生活的最好伴侣，仍然是家里那些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的藏书。这时，我从外边借书的渠道已被切断，能看到的只有手里那些旧书了。我把警务科退回的那一大包书打开分类，找出了不少可以重读的书，令人惊喜不已的则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这本大书，竟也被退还了。我如获至宝，一边翻阅这本劫后珍品，一边在想：看来盖平的日本特务都是饭桶。思想倾向如此鲜明的书，竟被放过未做审案的线索，最后还视同一般书退给我，让我这个中学生耻笑了。

在敌人眼皮底下，我还能这样悠闲地看点书，过得也不算太寂寞，谁知这样的日

子也过不成，随着时局的变化，特务来的次数越来越多了。过去一个月来个五六次，这时几乎每天或隔个一两天就来一次。闯进来慌慌张张地各个屋都看一遍，也不说什么就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点书也是提心吊胆，随时都得防备特务的闯入。木兰也多日不来，我心不安。一天晚上她跑来告诉我：最近学校停课搞防空演习和救护训练，学校有两个已四旬的日本老师应征入伍了。另外剥云母的任务也加重了，每天都得干到很晚才能完成定量。这些信息都说明了战争形势的紧急，日本鬼子的情况不妙。

我虽囚居家中，也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变化的到来。居民的灯火管制很紧，保长通知每家每户的玻璃窗都要糊上纸条，电灯全罩上黑面红里的防空布罩。更反常的是，小县城的上空，几乎每天都有飞机飞过，还听人说，这些日子，火车站南来北往的火车运的都是日本大兵。“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些迹象都预示着一场大的变动，天就要亮了。我在心中窃喜：小日本是快要完蛋了，我盼着那天快点到来。

盼望的那一天终于来了，真的天亮了！日本侵略者终于被赶出了中国的领土。这本是日夜期待的意料中的事，可是事情来了又觉得那么突然、那么措手不及，不知该如何迎接这个胜利。也许是太高兴了，那些日子，人们只知奔走相告，把日本投降的消息快点传出去。那时没有收音机，也没有广播喇叭，日本鬼子投降了的声浪，却像旋风一样，刮过小城的大街小巷，人们乐得只知说一句话：“这回好了，可熬到头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竟记不起是谁第一个把这消息告诉了我。我和母亲闭门而居，生活有如止水，可是巨大的胜利把我家这口枯井也冲得起了波澜。至今我仍记着一个细节，那就是母亲那一辈子也没有晴过天、阴沉的脸，在听到鬼子投降了那一刻，绽开了笑容。母亲笑了，我也笑了。老一辈，少一辈，这14年，是一天天、一年年熬过来的，若是开控诉大会的话，我想就是嘴最笨的人，也能讲出一段血和泪的故事。中国人民胜利了，终于胜利了。这高兴，这胜利，只有在东北的父老兄弟心里明白它的分量，它的非同一般。

我自然更高兴，因为我解除了3年“犹豫刑”的枷锁，不再担心随时有被抓进去的可能。我自由了，但是仍然只能坐在家里等待，等什么我也说不清。这时外面完全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这段时间我只出去了一次，还险些出事。那是臧晶的弟弟来告诉我，沈阳狱中留下判刑的人这两天返回盖平。我征得母亲的同意就去火车站接他们。盖平城里距火车站是8里路，8月份正是高粱齐身的季节，两边大地里除了庄稼就是果树，一条柏油路少有行人。我急匆匆地往前走，忽然一个穿军衣的人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稍近时，我看清了这人原来是主审我们的特务股长前渊，他仍然是一身戎

装,腰挎一把军刀。我前后瞅瞅没有车辆,也无行人,不由得有些害怕。我低着头急走过去,他却放慢车速直瞅我。我走过去后,忽觉身后有声音,回头一看,原来他转回来了,骑车跟在我后边。就在这时,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过来了,这个日本特务也回头骑车走了。这次去火车站没有接回一个人,却遭一次险遇。事后想起不由得后怕,日本鬼子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后来听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县城里的日本鬼子还不肯放下武器,直到苏联红军进城,他们才真正缴械投降。

光复后在家闲居的这段日子,我仍然生活在母亲的严加管束中,没有她的允许,我不能迈出家门一步。面对封建礼教的桎梏,我又陷入新的苦闷之中。外边不通信也不通车,我该怎么办?我想起了花喜露说的话:“我们不仅要抗日赶走侵略者,还要革旧的‘吃人’的社会的命。”花老师对国共两党的看法也言犹在耳:“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是为解放劳苦大众的;国民党不积极抗日,贪污腐败。”想到这里,顿觉心里明亮起来,我要找共产党,我要走革命的路。这时我明白了我等待的是什么。就在这时,穆玉琪的朋友王暖从沈阳回来,带来花喜露要我们出去参加革命的口信。王暖这时已在沈阳参加了八路军,他是回来接我们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出去参军的。这焦躁的心如注雨露,我高兴得就差没蹦起来了。可是我却把这次机会失去了,这是因为母亲的粗暴干涉、大吵大闹,不仅弄得我走不了,也危及到穆玉琪等人的脱身。为了不影响朋友,我只能痛苦地同意暂留下来等待,只能等待。我必须走,我没有停止斗争,又经过两次逃跑,我终于逃出家门做了封建家庭的彻底叛逆者。1946年初,我来到安东,我踏上了真正解放的土地,到这时我才真正结束了我的“囚徒”生活。新的生活,灿烂的阳光,为人民服务的美好春天,似乎都在等着我;而令我更高兴的是,我看到了过去一起斗争、一起住监狱的同学和朋友——穆玉琪、王暖,还有臧晶和赵俊芬都在这里。我们又走到一起了,相会在鸭绿江边……

末日的宣判

门文东

1945年5月4日,伪奉天高等法院对“星火”同人中一部分人给予处理:杨士绵、高玉元、赵宝丰、姜静芳、穆玉琪等20多人被宣布“犹豫判决”,监外执行,放回原籍进行监管。而花喜露、于家麟等11位“星火”骨干被作为“要犯”仍被押在伪奉天第

一监狱。

8月9日，刚刚开过早饭，我们11位“星火”同人带着脚镣被提了出去，押送到伪奉天省高等法院进行“陈述”。所谓“陈述”，就是当面宣读每个人的“罪状”和应判的刑期，但不是正式宣判。当时伪法官高高地坐在宣判台上，对我们“陈述”完了，问：“罪状有没有出入，同不同意这样判决？”我们11个人谁也没吱一声。因为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陈述”时宣布，于家麟判死刑，门文东无期徒刑，张吉宽20年徒刑，花喜露、王锡成、张克恩15年徒刑，李昌毓、臧永昌、郁其文、鲁启智、迟金镇5年徒刑。

1945年8月15日早上，伪奉天第一监狱里的犯人刚刚开过早饭，看守警就打开牢房铁门叫喊：“于家麟出来！花喜露出来！门文东出来！……”我心里想：这是正式宣判了。总算熬出头了，每天可到院子里活动活动了。

我们先被带到监狱的候审室里，还是那个外号叫“豆鬼子”的伪警察厉声说：“今天叫你们到省高等法院出庭，一路上都要老老实实的，如果有人不老实，可别怪我们不客气！”然后又过来两个伪警察，用长麻绳一个接一个绑在每个人的右胳膊上，把我们11名“星火”同人绑成了一串，接着又在每个人的头上扣一个用黑布做的三角形的尖尖帽，帽沿直扣到鼻子底下，使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脚下的路。他们还给这种帽子起个名字叫“羞帽”。这样，我们被伪警察监押着，从监狱的黑大门里走出来，拖着沉重的脚镣，哗哗啦啦地顺着铁西南城墙根向北又向西走出了大西门，再向北走了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伪满奉天高等法院候审室等候出庭接受正式宣判。一进屋，就把“羞帽”摘下来，又解开绑在胳膊上的绳子。

突然不知是谁小声地说驼子恐怕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了。这句话虽然说得那么轻，却好像巨雷一样震动了大家的心，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眼光都集中到于家麟的身上。他被绑在最前头，也就是第一个进屋，当时正靠在最里边的墙角上。他那残疾的躯体这时显得更加矮小了，他8岁的时候从磨架上跌下来，摔坏了脊骨，形成了一个罗锅背，身高还只有1.5米左右，挺不直身躯。可他毫不在乎这残疾的躯体，向来没因为有个罗锅而感到难堪，在写文章时还特意用“驼子”作笔名。所以“星火”同人都叫他“驼子”。在他那残疾的躯体内包藏着果敢、倔强、不屈和幽默的性格。可是于家麟却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也能看到胜利的。”

我们一直在等着，眼看快晌午了，也没有宣判。我们当中，有人等得不耐烦了。大家越说声音越大，那个看守警有点着慌和发怒了，闯进屋来说：“别吵别吵，你们要找不自在吗？这不是在监狱里，这是法院，闹出事来，吃不了兜着走。”“法院又怎么样，不是要宣判吗？为什么还不开庭？”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外号叫“豆鬼子”的看守警,一改平常那种凶神恶煞的嘴脸,三步两步地走了进来,挂着似笑非笑的假脸儿讨好地说:“喂喂喂,你们盖平县这帮人拣着了,日本人投降了,不能判你们的罪了……”那个把门的看守警蒙了头,不知是怎么回事,直愣愣地看着“豆鬼子”,再也不咋呼了。我们一齐把目光集中到“豆鬼子”脸上,谁也没吱声,静静地审视着他,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他在搞什么鬼。那个“豆鬼子”有点手足无措了,又讨好地说:“真的,日本投降了,是真的,日本打输了,刚才广播了,日本天皇发布了无条件投降的诏书。”说完,他想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与其说是高兴,还不如说是哭丧。他又勉强地补充了一句:“我们都是中国人,我替你们高兴。”

这时,我们11位“星火”同人全明白了,日本帝国主义失败了,投降了。可是,这个消息确实有点太突然了。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失败,伪满洲国必然垮台,这在我们的心目中是确定不移的。今天的事实可以说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怎么也想不到这样凑巧,正在日本人要对我们进行宣判的时候,历史却宣判了日本侵略者末日的到来。我们一下子跳了起来,高声欢呼起来:“胜利了,我们胜利了!中国人民终于胜利啦!”我们互相握手、拥抱、祝贺、问候,眼中闪着泪花。大家又把于家麟围了起来:“哈哈,老驼,我们都以为你看不到胜利这一天的到来了,可你却看到了。老驼!”

整个候审室里响起了一片欢快的笑声。我们一面说笑着、欢呼着,一面旁若无人地往外走。“豆鬼子”和那个站在门口把门的看守警,看到这种情况有些发慌了。这时又跑来好几个伪看守警和日本人,堵在门外不知如何是好了。我们这种旁若无人的举动,把狗警察和日本人全惊呆了。又跑过来一个日本人,苦丧着脸说:“诸位,诸位,中国胜利了,你们是中国人在中国你们就不是罪人了,所以你们会得到自由的。不过,不过现在还不能出去,要等中国方面来接收,才能放你们回家,你们不要着急,一定会放你们的。”

外边的看守警和日本人都围上前来,站在门外,不敢不堵,又不敢强堵。还是那个日本官儿陪着客气说:“为了维护治安,你们还得回到监狱里住几天,还要办些手续才能放你们,请谅解,请谅解。”

我们互相看了看,意识到现在往外闯是不合时宜的,于是就同意地说:“好吧,我们回去,再回到监狱去,确实有些事情要办一办,不能这样白白地走了。”

我刚一进监狱的大门,就看到不少看守和日本人站在院子里,其中一人手里拿着名单,一个一个地从牢房里向外喊犯人,被喊出来的犯人都带着脚镣,集中在监狱

的院子当间儿。那个看守头子看见“星火”同人被押了回来，让我们也伙入院里站着的犯人中去。一个日本人站到高处，让大家站好队，对大家说：“为什么叫你们出来，我不讲有的人可能知道了，你们都是政治犯，在中国，你们就不是犯人啦，所以首先要把镣子给你们卸下来，等中国方面来接收，再放你们回家。”听到这里，整个监狱的院子像炸了锅似的，乱哄哄地议论起来。有互相祝贺的，还有些不了解实情的，就互相打听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有的人高喊起来：“还等什么？我们用不着谁来接收，现在就放我们。”“为什么不立刻就放，难道还想要什么阴谋不成？”院子里有些骚乱起来。这时监狱四周的岗楼上站满了伪警察，还架起了机关枪，大铁门死死地关着。犯人脚上的铁镣还没有摘下来，根本没有出去的可能。在郁其文的搀拥下，花喜露使出全身的力气说：“同志们，先不要乱，现在还不是用强的时候，看看敌人的动作以后再说。”他的话被一个人一个人地传过去，人们开始静下来。那个日本人冲着脖子向大家喊：“大家不要怀疑，我们接到上级的命令，先给你们卸下镣子，等中国方面来人，办完接收手续，就释放你们。不过，为了维护监狱内的安全，你们要听从指挥，有秩序地活动。以后你们在监舍里可以自由活动，每天可以分批地到院子里来晒晒太阳……”接着就分别给所有的政治犯卸下了脚镣，又把大伙送回了监号。

傍晚时分，暗暗地传递着一个惊人的消息：日本特务要秘密处决全部政治犯。一时间各牢房都骚动起来。天黑以后，各牢房间又秘密地传递着一个通知：“所有政治犯要采取统一行动，午夜越狱。”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冷静地作了分析：第一，如果日伪特务真的要全部杀害在押的政治犯，为什么白天把政治犯的脚镣全部卸掉呢？不卸掉脚镣不是更容易杀害吗？这是疑点之一。第二，奉天第一监狱地处大城市之中，四周都住有居民，这不同于设在偏远地区的秘密监狱，可以随便开枪杀人。若是这里全部杀害政治犯，绝对保守不了秘密。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宣布投降的情况下，估计日伪特务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第三，所有政治犯仍然和刑事犯混杂地关在各个牢房内，并没有集中在一起，不便于特务杀害。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不应该贸然地采取越狱行动，弄不好会带来极坏的后果。我们还发现：积极活动主张越狱的犯人中，大部分是刑事犯。这就不能不引起警惕了。很可能是那些刑事犯估计到日本投降后，中国当局接收监狱，也未必释放他们，所以想乘机越狱。如果这样盲目地干起来，会使监狱的形势复杂化，不便于中国当局来接收监狱。所以政治犯都主张不能盲目草率地组织越狱。在当前的非常时刻，既要防止日伪特务狗急跳墙，对政治犯下毒手，同时也要安定人心，不能盲从乱动。

就在8月15日的当晚，“星火”同人都在各自的牢房里联络好其他犯人，仔细地

观察监狱里看守、特务们的举动,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倒是不少看守放松了管理,甚至主动讨好政治犯。花喜露让郁其文设法通知各牢房的“星火”同人和其他政治犯,不要被敌人的假象所迷惑,敌人什么花招和卑鄙手段都能使出来的,千万不能放松警惕。这天夜里,“星火”同人没有一个人睡觉,都作好了战斗准备。约在午夜时分,从监狱的第五栋监舍里传出了呐喊声。一时间人声嘈杂,整个监狱全震动了。接着枪声大作。由于大多数监舍的铁锁没有打开,犯人无法冲出,所以只有第五栋监舍里的犯人冲了出去,越过北面的病监和女监,从后面的狱墙向外冲。由于最北面女监后边的墙比较矮,一下子冲出去不少犯人。看守警和日伪特务凶狠地开枪屠杀,当场就打死了好多人。没跳过狱墙和受伤的犯人最后全被抓了回去。接着各栋监舍的通道上都涌进了一些持枪拿刀的看守和日伪特务,疯狂地叫喊着:“各监号的犯人听着,谁也不准乱动,都趴在地上,谁要乱动就立即开枪。”接着每栋监舍的外边都架起了机关枪。“星火”同人就在自己的牢房内动员了所有的犯人,作好了准备。我们都躲在牢房铁门的两侧,一旦日伪特务把枪口伸进铁窗口,或者打开牢房的铁门,大家就一拥而上,夺枪和冲出牢房,绝不能束手待毙。等了很长时间,监狱里各个监舍再没发生任何动静,直到天亮。

第二天,整个监狱里空气非常紧张,各牢房都重新换上了大铁锁。大墙四周的岗楼上都增加了武装警察,架起了好多机关枪。既不准犯人到院里去放风晒太阳,也不准犯人出去倒茅桶。“星火”同人和其他政治犯一起坚决向日伪监狱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说:“日本已经投降,必须立即释放政治犯。这次暴狱应由日伪监狱当局负责,他们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必须抚恤死难的政治犯,惩办凶手。如果日伪当局胆敢迫害政治犯,必须严厉制裁肇事者。”并警告看守中的中国人:你们如不乘机立功赎罪,再替日本人效劳卖命,为虎作伥,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坚决斗争之下,监狱当局不得不答应让政治犯派出代表,和日伪监狱当局进行谈判,协商释放政治犯问题。直到8月19日下午3点钟左右,苏联红军接收了伪满奉天第一监狱,立刻把全部在押的反满抗日的政治犯营救出狱。花喜露同志由于伤病过重,已不能行走了,是郁其文等同志背着把他送到小东门外的家里。其他“星火”同人暂住在大南门里原东北边业银行的大楼里,那是临时招待所。8月29日,家住盖县的于家麟、门文东、王锡成、张克恩、张吉宽、郁其文、李昌毓、鲁启智、迟金镇等人乘火车返回家乡。臧永昌留住沈阳。

病中的田贲

王丹群

1945年8月8日，大程给我送来一张小纸条，田贲告诉我8月9日上午伪高等法院要对他宣判，要我到小西门外伪高等法院门外等候，可以看到他们。

8月9日那天，我抱着孩子一大早就去了，等到10点、12点不见到来，又等到下午2点还不见来，我就回去了，在我回来时，小东门外的电线杆上贴出了苏联出兵东北对日宣战的号外，我暗想有希望了。8月13日，日本侵略军一队队荷枪实弹的步兵、一辆辆载着武器的军车，从大东街过来，顺小东街往北走去，十分慌张紧迫，看样子是要迎战了。可是没过两天这些侵略者又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军车上的膏药旗换成了白旗。在15日正午，一声长笛响彻沈阳上空，“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今天祖国光复了！”人们奔走相告！

8月19日田贲出狱了。但由于敌人的酷刑和饥寒所折磨，当时面肿腹胀，已卧床不起。出狱后第三天，侯洛和贾玉冈同志前来看望，当即决定住小河沿施医院治疗，经确诊为结核性腹膜炎，从此我又开始了每天抱着孩子从小东门到小河沿徒步往返两次给田贲送饭的日子。当时形势混乱，社会动荡不安，暗杀、凶杀、抢劫等事时有发生。田贲担心我们母女的安全，经常嘱咐我，走路要走大路，大路人多安全些，要多长几只“眼睛”……他有时给我讲狱中的斗争，他说：“我很坦然，我没在敌人的酷刑下低头，严刑毁坏了我的身体，却更坚强了我的意志……我现在不能走，时局安定些，你设法去查查敌人的审讯记录，看看谁是英雄，谁是软货……”

1945年底，田贲病情在恶化，家中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已到了绝路，为了解决困难，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买了一台旧缝纫机。田贲说：“闻鸡起舞，就叫鸡鸣成衣局吧。”牌子挂出去了，名字也不小，实际就我一人。后来，在沈阳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朋友王秋萤可怜我们，让我去卖他编的《文化导报》。那时我每天要护理田贲的病，打针、吃药、买药，要抱着孩子上街卖《文化导报》，因为我没有棉鞋，孩子也只是单薄的衣服，等春暖时，我的十个脚趾甲全部脱落，女儿铁虹也留下了冻伤，她直到上大学时还没有好。白天也没有多少时间去做针线活。

我想到自己的坎坷途程，心情有些伤感，日记里笔调自然就低沉些。一天田贲看

完了我的日记,对我说:“不要把生活写得一把眼泪,生活就是斗争,革命道路是曲折的,没有笔直的坦途,艰难和困苦是强者的熔炉,不能被它吓倒,你还记得我从狱中寄给你的那首诗吗?”我说记得,并脱口背诵出来:

东方有顽铁,
投炉百锤炼。
霜刃一朝成,
凭君惊绝艳。

他说:“是啊,千锤百炼才能成钢,只有那些伪君子才经不起烈火的冶炼,最后成为渣滓而被扔掉。现在斗争还没结束,我们还要继续战斗……”他已病得天天高烧39℃以上,但是烧一退就握起战斗的笔,躺在病床上写出了《不,先不要放下武器》《人·盗匪·野兽》等诗篇,发表在《文化导报》上。

1946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撤离沈阳,侯洛和贾玉冈同志来辞行,要田贲继续隐蔽下来,给我的任务是护理田贲继续治疗。田贲知道后硬让我和他们一起走,我怎忍心离开垂危的田贲,我不走,他硬让我走。我争辩不过他,我哭了。田贲冷静一会儿说:“这是战场,哭有什么用!那你就和我一起继续向疾病和一切魔鬼战斗吧……”

侯洛和贾玉冈同志离开沈阳,对一刻也不能空闲的田贲来说,是多大的焦急,他多么想尽力地去工作,他的“隐忧”(自画像),既不是忧物也不是忧他自身,是忧他不



田贲出狱后病中画的梅花之一



田贲出狱后病中画的梅花之四

能工作。他说：“我又得像蛹一样假眠，为了隐蔽不暴露，就叫《蛹的情绪》吧……现在什么人都想表演，要注意扇子两面风表功的两面派……”表面做“蛹”，实际他的心是一团火，他非常焦急地对我说：“我还有好多工作应该做，我不能走。”“我对革命贡献的太少了，我不该走。”“唉，法西斯撕毁了我的肚呀，我们要懂点儿医就好了……”他起不来了，躺着写字、画梅花，直到病危还坚持读完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1946年6月13日9时田贲同志与世长辞了。但他的床头上仍放着没写完的《蛹的情绪》、没画完的梅花……

田贲出狱后

铁汉

田贲出狱后，不久就住进小河沿施医院。

1946年春，我去看望他。我告诉他，有个难友是商人，在狱中曾表示愿出钱办出版社，我提议先编些书出版吧。

田贲也很高兴。于是就商定了先出他的诗集《奴隶之歌》，再出小说集《幽静的山谷》；杂文集、散文集都未定名。他说他要写几个长篇，先写《狱中记》。后来他开了个目录给我，上面写着：长篇《血祭》《花与恋爱》《岁门》。可惜，他病情加重，不仅拟写的三个长篇仅有题目，就是《狱中记》也没来得及动手。

出版社没办成，田贲反倒卧床不起。

八路军（那时叫东北民主联军）撤出沈阳，国民党进城后，立刻出现白色恐怖，田贲的领导人都撤走了，医药两绝，特务包围，内战一触即发……这一切，增加了他生理上、心理上、肉体上、精神上许多的忧虑和病苦。这表现在从1946年初，他挥笔写下了至今仍然撼动人心的诗篇：《不，先不要放下武器》《人民是正直的》《你们的和我们的》《他们的钱是谁的》《我怎样在活着》《呼唤》等。

他的诗，来自人民，代表人民，为了人民。在《不，先不要放下武器》这首诗里，反映得非常强烈。

中共地下党以中苏友好协会名义办的《文化导报》，在1946年春节前创刊。一天，主编鲁企风（鲁果）在田贲家和我会了面。我答应鲁企风的要求，给他写稿。不久，田贲著名的诗《到前面去》即在《文化导报》上发表。

我先和驼子、舒啸、冯新生等人商量，自己编刊物，想继续走《星火》之路。因为早在伪满时期，我们盖县“星火”同人在花老师领导下，秘密油印过手抄的《星火》，以后又公开出过《星火》周刊。于是我到他家，请他主编。

卧床的田贲苦笑着说：“我不行了，主持不了，我看你就干吧。”

我不由得觉得田贲病已深重，仍然说：“那你也得当个顾问，多指点，多出主张，有些稿子给你看。”

“行吧。”田贲并未完全推辞，“铁汉，千万保持住《星火》的名誉，让这星星之火，将来能够燎原吧。”

田贲在《星火》杂志上发表了《我是王》等几首诗。我还要求他写《狱中记》在《星火》杂志上连载，他只苦笑着摇头，但又怕我失望，安慰我道：“我好起来，一定交卷。”

他忍受着巨大的病痛，从不呻吟一声。用一支粗粗的铅笔，写下了一条一条的随感，流露着他热爱人民的强烈的呼喊：

“为什么要不承认人民呢？为什么要不承认人民的政府呢？”

“如果再有斧头向我肆虐，我愿一掷这未割的头颅！”

“于垂危时安心，于新生时深思。”

但是，我敬爱的花老师，人民的歌手，革命的勇士，他的生命的火花竟突然熄灭了。他自己竟未能亲眼看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梦寐以求的解放了的社会，在风华正茂、大有作为的韶华岁月就走了。

田贲，一个才华卓越、知识渊博，被无数青年尊称为“花老师”的革命文学家，被那可诅咒的邪恶夺去了不平凡的生命。噩耗传来，当时在沈阳的新旧朋友莫不同声痛哭。花老师，你死得太早啊！你只不过刚刚活到34岁，本来以你政治上的成熟、文思上的深刻，会给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啊！

我们这些穷朋友，东拼西凑，总算把田贲遗体装殓到棺材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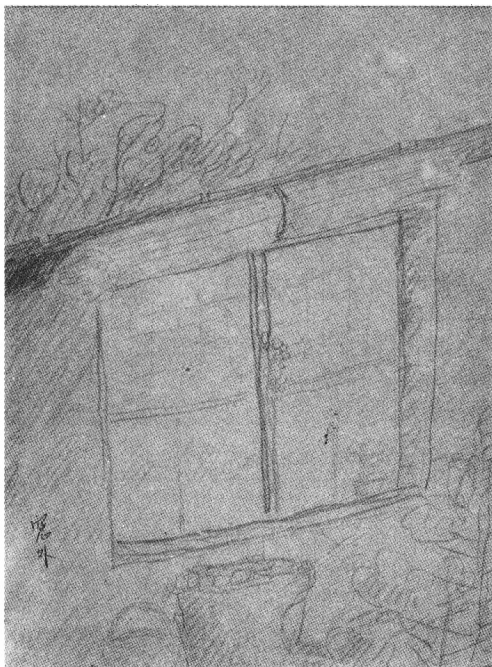
我不愿劝阻他的未亡人——田丹携带幼女铁虹在撕裂人心的呜咽中，默默地跟在后面把田贲送到大东关竹林寺去。我们没有采取火葬，我们在梦想一旦沈阳解放，将给他一个温暖而向阳的地方，让他的灵魂得到安慰。

为了悼念田贲，由我组稿在1946年的《新报》《前进报》《中苏日报》和《和平日报》上，连续出了四期《追悼田贲特刊》，选登了他的遗作，发表了一些追悼文章，并牵头发起为田贲遗属募捐。可是那时我在田贲生平中，只能介绍他是一位爱国作家，而不能写出他是个无产阶级志士，完整的历史，只能由今天来补写了。遗憾的是，查遍图书馆，没有完全找到追悼特刊。特别是连田贲的两篇遗作也丢失了。

还在田贲逝世前七八天,我去看他。他虽然骨瘦如柴,面色惨白,但他照样用亲切的目光、温和的微笑和我谈他的创作计划,也交给我两篇稿准备在《星火》上发表。我虽然预感到他会发生不幸,但我却一直坚信他能活下来,哪里想到竟成为永别。

我流着泪,把他的诗当做任务,当做老师给我的重托,决定付排。还没来得及发稿,认为《星火》杂志有“赤色嫌疑”的国民党特务,便四处打听主编兼社长的“喻一飞”(我办刊物登记用的假名)在什么地方。朋友们为我捏一把汗。我也只好于6月下旬匆匆逃出了沈阳城。

1947年春天,我在沈阳重新落户,以掩护职业从事地下学运一年后,田丹说她要辽南解放区去,为了防止失落,把田贲的全部遗作(指她保存的)交给了我。算来,这些宝贵的闪耀着金色光芒的诗文,在我手中整整保存了32年。这32年,我经历了数不清的险情、不幸和灾难,从蒋介石特务的搜查,到“四人帮”的迫害,梳过来又梳过去的运动,把我的作品早已洗劫一空,但是,田贲的作品,我和我的爱人没有让它损失一页!我们用自己的一切机智和毅力保存下来。这是田贲的遗墨,田贲的心血!我简直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了它的尊严与完整。如果说我能无愧于田贲的,这算是最大的一个安慰。



田贲病床上的画《窗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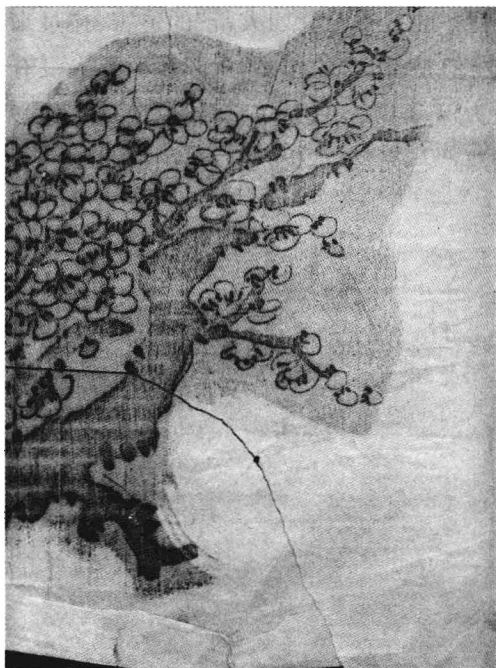


田贲病床上画给女儿的画《浇园》

我出狱后住在田贲家里

王锡成

1945年8月19日,政治犯全部出狱。田贲同志被摧残得已不能行走,只好坐三轮车回家去。在狱中一年我们没能见面。出狱后他卧病,我在他家住了两天后去旅店,以后又去看望了两次,就返回故乡。谁知那次分离,竟成永别!



田贲出狱后病中画的梅花之二



田贲出狱后病中画的梅花之三

看望田贲

秋莹

“八一五”光复后，我在沈阳中苏友好协会文化部工作，从田贲的学生口中，知道了他被捕后受酷刑的情况，我问明了住址，去看望他。他住在沈阳大东区小东门外顺城街路旁一个大杂院里，门前有一块不太显眼的“鸡鸣成衣铺”的小招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那是一个傍晚，室内显得幽暗阴森。他躺在炕上，呼吸有些费力，望着他那瘦骨嶙峋的身躯，我立即感到心脏收缩。屋里除了一台陈旧的缝纫机，家徒四壁，他爱人为人做衣裳是唯一的生活来源。他爱人抱着一个不大的小女孩，面有菜色。我坐在他身旁，谈起他那次失约，才知道正是在这天他被捕了。为了让他休息，我们并没有多谈。回家路上，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虽然活着出狱，只怕逃不出病魔。

当时的沈阳，一片混乱。我们的部队虽已源源不断地进城，但国民党势力仍然很强大。街上贴着红红绿绿的各种标语，有拥护共产党的，也有给蒋介石捧场的。经过14年的殖民统治，东北人民不大了解八路军，把蒋介石当做民族英雄，存在盲目正统观念，对我们的军政人员并没有好感，甚至蔑视。苏联红军中有的人纪律不好，干了些不利于中苏友好的勾当。国民党的特务组织“铁血锄奸团”活动猖狂，光天化日之下就敢于进行暗杀活动。我由于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当初的一些文友，把我看做危险分子，不敢接近。只有和田贲还有共同语言。因此常去他那里谈谈。我的烟瘾很重，谈得兴奋时更是接连不断。而他那时最怕烟呛，有一次他甚至毫不客气地让我把烟掐掉。即使如此，我的谈兴仍然不减。

还有一次，他要留我吃晚饭。我考虑到他的艰难处境，一再婉谢。他说，他家乡有人带来一点海产，名叫“虾爬子”，味特别鲜，并问我是否吃过。我说连名字都没听过。他更坚决挽留，让我尝鲜。他爱人做出汤来，我看到这个东西的长像，满身爬足，一副凶相，不敢品尝。他却吃得津津有味。在他的一再劝让下，我只喝了几口汤。这天，他精神较好，说到他在监狱里认识的一些地下国民党员经常到他家里来，告诫我今后来时，最好在晚上。

在我担任《文化导报》编辑期间，我曾想让他到报社工作，解决生活困难问题。看

到他瘦骨嶙峋卧在炕上的痛苦情形,没有说出口,只说他爱人可以代销《文化导报》。当时的办法,不用先交钱,卖不了还可以退回去。这样,成衣铺的主妇变成了街头卖报女。当时已是寒冬,她怀抱女儿,辗转在街头,我心里感到不安。问他对生活是否有小补,他说卖报所得还可以维持生活,使我心中稍安。

1946年初,我因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逃出沈阳。等我再回沈阳的时候,已是1949年,田贲已经离开人世了。可以说,他战斗于黑暗,写作于黑暗,也死于黑暗。

为花喜露买棺材

姜静芳

我和花喜露从未接触过,但我们都是慕名之交。老花是我小弟弟姜宗璐(姜涛)的小学老师,又是我二弟、三弟的好友和导师。我三个弟弟之所以很早走上革命道路,可以说是花喜露同志启蒙引导的结果。

“八一五”光复后,老花由于长期的狱中折磨已身染重病。在组织照顾下,住进小河沿施医院。我爱人李季生和我小弟宗璐经常去医院探望,给他送去毛主席著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朱德总司令著作《论解放区战场》以及茅盾名著《腐蚀》等。他们并约定在老花病愈后,一同参加《人民文学》《文学战线》《妇女公论》等刊物编辑工作。

1945年11月末,八路军撤出沈阳后,组织上已无法照顾,老花遂回到家中。老李又不时给予接济,设法弄药送去。可惜当时条件太差,无力回天。不幸,老花于1946年6月13日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含恨而去。噩耗传来,我们万分痛惜。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同志啊!老花一生清贫,毫无积蓄,为了帮助老花处理善后,我们拿出了4000元东北流通券,老李亲手给他选购了一口上等棺材,亲自把他送到大东关竹林寺寄存起来,余钱交给老花的遗孀王丹群,作为母女生活补贴。这也算是我们对老花的一片心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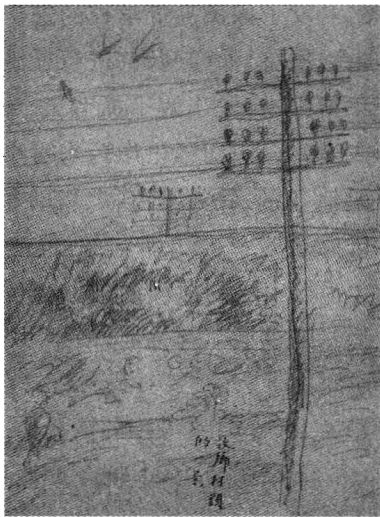
老花去世不久,组织上来人和我们接头,我们遂接受了党交给的地下工作任务,领导我们的是中共辽东分局社会部,对外称辽东军区联络处辽南分处,恰恰与老花是同一个系统。

为田贲料理后事

李昌钰

田贲在狱中被敌人残酷折磨和摧残，出狱后，虽经医治却未能好转。在他卧床期间，我曾和朋友去看过他几次。见他经济上十分困窘，便想办法从一个曾在一起住过监狱而当时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的人那里弄得几十元钱接济他。我那时已离开了国民党省党部，在一所大学补习班学习，没有收入，只好请这位朋友帮忙。他是我在监狱里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他也很了解田贲的为人，很愿慷慨解囊。这完全是出于我对田贲的敬重和爱护，希望他早日康复。田贲对此深感过意不去，而我却觉得这点绵薄之力，唯恐做得不够。

当他去世之后，在他身边除了他的爱妻王丹群，并无其他亲人。当时在沈阳的朋友和乡邻对他



田贲的画《故乡的村头》

去世深表悲痛和惋惜，并帮助料理了后事。之后，我又和铁汉、季生、吉恒等去存放他棺木的寺院看过。铁汉还为悼念他热心组织我们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以表达对他的悼念之情。我写的《悼念花老师》一文发表在《前进日报》上，同时发表悼念文章的还有铁汉、吉恒等人。在他去世没过几天，我便同杨士绵投奔晋察冀解放区去了。这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被国民党赶走的国民党

门文东

在日本人逮捕于家麟时，因为他逃了，日本鬼子就把他的母亲、二妈、妻子、姐

姐、妹妹，全家十几口人都抓起来了。很惨的！

《星火》在《营口新报》停刊后，公开发表作品没了阵地。于家麟不甘心，1941年春，他和王觉、李光海等到新京（长春），组建新时代出版社，出版了《朝鲜短篇小说选》《法国败了》，正准备出版《英国向何处去》，日伪特务进行了“一二·三〇”大逮捕，王觉、李季疯等人被捕，李光海逃入关内，他先去了重庆，后来又投奔延安，于家麟逃回盖平县。于家麟和王锡成、张克恩和我等又创办了“秋灯书店”，组织盖平第一、第二和女子国民高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以“秋灯书店”为据点的“读书会”并创办了《大地》《辰星》油印刊物，进行反满抗日活动。当时，我和于家麟还给国民党地下组织搜集情报，有关于盖平抓劳工、要国兵、交荷粮等，用毛笔给奉天施医院德医生（英国人）写信，中间缝里用药水写小字。于家麟有一段时间跟王觉到新京，我也这样写信跟他联系。后来知道，上边的领导人是张宝池。1944年在伪奉天第一监狱里有不少国民党员，如李光绅，当时也被判了死刑。

以上这些活动，我们被捕后，都被日伪特务审理得清清楚楚。1945年8月9日，于家麟被通知判死刑。1945年8月15日上午9点，敌人把于家麟等人押到日伪的奉天高等法院，要对我们正式宣判，一直等到10点也没有宣判，又押回到监狱。中午12点，传来日本完蛋的消息！

于家麟是1941年经王觉和李光海介绍加入地下国民党的。1945年8月19日于家麟出狱后，受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李光忱书记长委派，回盖平县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并任书记长。9月2日，在全县组织群众大会庆祝抗战胜利。我主持大会，于家麟讲话。9月5日，国民党长春某党部，又委派刘文斗为盖平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随之而来的还有张希鹏、赵洪发、林育明等人。他们说于家麟、门文东、王锡成、张克恩组成的党部是假的，把我们撵回家去了。后来又要与我们合作，我们谁也没干。当时，盖平有五股势力都争夺国民党县党部，都被刘文斗打下去了。1946年于家麟任盖县中学教员。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刘文斗被枪毙，张希鹏被判无期徒刑（1975年被特赦出监），于家麟先是被褫夺公民权，后因为被盖县中学师生揭发出说过“鲁迅比有的共产党员都先进”之类对共产党“不满”的言论，被判处15年徒刑。当时，街上画着许多漫画，小孩子都知道，于家麟是个大坏蛋。于家麟刑满后回盖县老家，1979年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有几位“星火”同人在营口市政协《文史资料》上发表回忆录，肯定于家麟是位爱国者，他没有反对过共产党。1954年，他还为审判日本战犯提供证词。1956年中国最高军事法庭在沈阳公开审判日本战犯，于家麟从监狱里出来走上法庭控诉日本战犯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的罪行。

铁汉要求证实他不是“副科长”

于声准

于声准 于家麟的二儿子，1941年生，农村木匠。

1945年8月19日，我父亲于家麟出狱之后，在盖平县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并任书记长，组织召开了全县群众大会，庆祝抗战胜利。没几天就被新来的一帮国民党撵回家去了。他当书记长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是十几天，半个月不到。

1980年3月，突然收到沈阳日报社铁汉给我父亲的一封信，说是辽宁省社科院要编田贲的集子，叫他回忆田贲的事。信的内容先是让我父亲回忆田贲、李季风的一些事。最后说他本人的历史问题早已有了结论。但是多年以来，就是因为“副科长问题”，屡次受审查。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事。他说他在日本投降之后投奔我父亲是有个人想法的，主要是想依靠我父亲搞一个出版社。他记得庆祝“九三”胜利那一天下午，门文东拿着一张纸，宣布他和孙萌等四五个人是干事，顺序排在王夕澄之后。从来没有听说过是什么“副科长”，希望我父亲给予证实，以便澄清他的历史问题。因为过去定“历史问题”，副科长就够级别了，干事不够级别。可是这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半年了。他在1979年9月20日去世之前，已经摘掉“历史反革命”帽子，享受公民权一年了。我年龄小，根本不知道铁汉是谁，问我母亲，她也想不起来。出于礼貌，我给铁汉叔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还抄录我悼念父亲的一首词。

诉衷情

一生奔波未曾休，
壮志付东流。
功罪谁人评说？
留与后人愁！

为正义，囚囹圄，
几春秋！

此生谁料，
心在天山，
身老沧州。

但是铁汉没有收到，邮局给我退回来了。因为这时铁汉也去世半年了。在那封信里，铁汉还说就在宣布他们几个人的职务的第二天，我父亲他们的这个国民党县党部，就被长春来的那一帮国民党赶到家里去了。他也就不辞而别，回了沈阳。

四、田贲的文学观

不朽的人生

王建中

王建中 1931年12月出生，原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任辽宁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辽宁省文学学会副理事长。主编《东北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东北革命作家田贲诗文纪念集》《时代女性论稿》《东北文学通览》《东北解放区文学史》。

田贲是位东北作家，也是一位革命烈士。今天的青年一代很少知道他的名字。不过，历史是无法割断的。生活在今天的青年人，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很难想象生活在日伪统治下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的人们是什么样子，更难于理解那时的革命者的困苦与艰辛，以及他们何以能够知难而进、视死如归。

田贲是作家的榜样、时代的楷模，他的文品与人品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革命业绩永远值得人们纪念。

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写诗著文，议论生与死这一人生大事。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一诗中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清照写下了“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绝句》。裴多菲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而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缅怀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写下了《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的诗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田贲与鲁迅，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生活的环境不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斗争的策略各异，但他们为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一致的。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田贲崇敬鲁迅，学习鲁迅，宣传鲁迅。他始终以鲁迅为榜样。1934年，他在盖平县熊岳三区立归州两级小学任教时，就曾开过鲁迅生平作品秘密会。1936年，他秘密成立了“L·S(鲁迅)文学研究社”。花友藩在回忆爸爸田贲的文章中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他对鲁迅的作品爱不释卷，只要听说谁有鲁迅的著作，他总是想法借来读。”“爸爸对鲁迅的著作最爱，鲁迅对他的影响也最深。他听到鲁迅逝世的消息后，曾经泥塑了鲁迅的头像，以表崇敬哀悼之情。正是鲁迅的革命精神熏陶了他、哺育了他，使他倾向于革命，跟着共产党走。他经常秘密借阅《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革命书籍，并加入党领导的组织‘留日东北青年救国会’，更自觉地投入反满抗日的斗争。”1941年冬，因开展情报工作的需要，地下党组织决定调他来沈阳，以奉天市大东区凌云街公所职员的身份，负责搜集满洲飞行株式会社(飞机制造工厂)、奉天造兵所(兵工厂)的情报。直到他于1944年4月28日夜被捕。正是在这一年的4月初，他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夙愿。在被关押期间，他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本色，面对敌人的凶残和酷刑坚贞不屈，没有泄露任何一点党的机密，实践了“到我为止”不牵连别人的诺言。这正是鲁迅革命硬骨头精神。他和鲁迅一样“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对伟大的“鲁迅精神”概括为如下三个特点：一是鲁迅的“政治的远见”。赞扬鲁迅“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二是鲁迅的“斗争精神”。赞扬鲁迅“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三是鲁迅的“牺牲精神”。赞扬鲁迅“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了坚决心。”田贲作为“鲁迅的忠实信徒”，他的一言一行确实体现了伟大的“鲁迅精神”。作为年仅二十几岁的青年，一位日伪统治下的小学教师，由于受中外(苏联)进步作家作品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指引，而增长了学识，提高了觉悟，认清了抗战胜利后中国要走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他在假期举办的读书会上，坚决反对那种要反满抗日救国就要跟国民党走的主张，坚持要跟共产党走，并身体力行，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学生和文学青年。这正表现了他的“政治的远见”，对问题的本质“看得远，看得真”。田贲所创办的秘密油印刊物《星火》，曾因结识《营口新报》副主编王觉而移至该报的文艺副刊公开面世，一年时间里出版20多期，作者

分布在营口、沈阳、盖县、复州、海城、本溪、双城乃至哈尔滨等地，多达30余人。然而，王觉却是个国民党员，要求《星火》与他们创办的副刊《辽河》合并。田贲严辞拒绝，《星火》被迫停刊。田贲在《星火》的终刊号上发表了杂文《舒愤懑》，对王觉的顽固不化，以权压人予以揭露和痛斥，表现出田贲的“斗争精神”和共产主义信念。“星火”同人由合到分、由团结到分裂，反映了这一批青年朋友的思想发展与变化。田贲那时已由一个爱国者提高到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了追求真理，反满抗日，田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直到献出他年轻宝贵的生命。

闪光的诗文

王建中

田贲是一位革命烈士，也是一位革命作家，他更多的岁月是以笔作刀枪从事战斗的，直到正式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党组织要求他少写作、少发表文章时，他也从未离开过写作，不能发表就在战友间朗诵，以诗文激励大家的斗志。在狱中更是写了大量诗歌，就是在出狱后的重病期间，他仍然奋笔写下几十篇诗稿，揭露国民党积极反共、坚持内战的反动本质，也表现出因重病在身难以投入新的斗争的痛苦心态。

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正因为田贲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所以，他写的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杂文、评论，都充满时代精神和战斗气息。即或是一首《校歌》或《朝会歌》的歌词，也充满爱国之情，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河，表达驱逐日寇的强烈心声。田贲是位文艺多面手，写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文艺评论，可惜由于历史久远，加之敌情复杂，有些手稿难以保留。就是发表过的作品也难以查找，像九篇小说、七篇散文、三篇杂文，以及像《孙二祖宗上西天》这样很有影响的长诗，如今只能知其目录而不见其本来面目。现有作品主要是几篇文艺评论和杂文，再就是诗歌，包括入狱前、入狱后、出狱后各个阶段作者所写的诗歌，还算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这里，首先评述他的几篇文艺评论和杂文。

田贲不仅有创作实践，而且有理论建树。他的评论文字虽然与创作相比显得薄弱，然而从仅存的几篇作品看，却鲜明地表现出他的人生的文艺观。《诗歌的发生》一

文正确地阐述了好的作品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真理。“在各机会上,人若具有要求诗歌的欲望时,这诗歌,我想就可以被产生了。”阐明诗歌必须有感而发。而这个“有感”又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他又强调:“但我以为诗歌如发生于劳动的要求,这样的诗歌,应是更雄浑有力的诗歌。”并举出作者亲身经历的抬铁轨的工人高喊劳动号子的实例,说明诗歌与劳动的关系。他以为,这“才是生命和诗和力的混合、交织、协调的大神域”,“是极度的诗、生命、创造、伟大。能享受如此的相视一笑的,是真幸福。能参与如此真实而有力的一‘吼’的,是大诗人”,“如何把诗歌产出在如此充实的人生中,如何把诗歌效力于如此集团的伟大的生活中,这是有关诗人的休(修)养问题。若不能把自己‘走进’伟大的实生活,而只飘飘地作一个旁观的行路人,那么诗歌一定要从另一阶级产生出的。那另一阶级产生出的诗歌,会呼出人类的黎明。”

这篇评论曾刊于1942年11月的《盛京时报》文学副刊上。显然,在日伪统治下,作者不可能更明朗地显露自己的观点,但从上述简略的引证中,也足以看出他的阶级观点。那就是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诗歌、不同的文学,而只有反映“充实的人生”、反映无产阶级(集团)的伟大的生活的诗歌,才能起到呼唤“人类的黎明”的巨大作用。田贲发表于1942年12月《盛京时报》上的《观剧书感》一文,以奉天的演剧团体与来自上海的影人剧团相对照,指出:“本年度曾观过几次满人的奉天演剧,给人的最大痛苦有二:一是把演剧当成了扯淡。二是把演剧当做诓骗手段。所以给观者的印象是可鄙与可笑。相反的是影人剧团,在某种程度上是给予了亲切的真挚与努力。”有褒有贬,态度鲜明。作者赞扬海派剧团“在诚挚地进行着艺术的工作”,辩证地分析了上演剧目:《殉情》肯定了“脚本的艺术上的机警、活泼、流动、机巧;无处不是的讽刺,狂飞乱舞的中伤。危机与匡复,使演技也跟着无限地活泼起来”,以及演出时“布景的简素”;与此同时也指出了“《殉情》中的斗争,是薄弱的、可怜的”。因为“《殉情》的时代已经过去,仿佛像一篇古旧的故事;虽然旧社会的残余,仍未必消尽,然而在1942年将尽的满洲,是并不十分需要它。然而,我们总算看了艺术上的本格活剧了。我们在期待意识上的本格的活剧的出现”。当然,作者所期望的“意识上的本格的活剧”,是具有更鲜明的革命倾向的话剧。不用说它诞生之艰难,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也难以上演。但这里却表现了作者的革命的文艺观。《期待于今年者》是发表于1943年1月《盛京时报》上一篇比较长的文艺评论,它对1942年的文坛现状,包括评论、小说、报告文学、剧本、诗歌、绘画(插图、漫画)作了全面评述。他认为,“只有真的走进实生活的英雄的人,才会更充实地举起光和献出力”。只有“更勇敢的青年之士”,才敢于涉身下层生活,写出暴露黑暗的作品,他期望出现“代万民发声”的“大勇的诗

家”,写出“可以和任何一民族国家映照的诗”,写出“内质(内容)更充实的作品”。主张作家应该“不麻木,不虚伪,不畏惧(麻木使你失感觉,虚伪使你失真,畏惧使你失力)”,“把今日的实生活真实地写下来”,“把本身的生活,写成今代的野史”,以便留给后代子孙,让他们“一详这身际的童话”。这些看法和主张,不仅符合普罗文学的理论观点,而且在当时也是很有见地的,显示出1943年的田贲马列主义思想的逐步成熟。

至于1943年和1946年作者先后发表的杂文《塔·城·一切建筑》和《人·盗匪·野兽》,其战斗锋芒也充满两文的字里行间。前者的中心思想是揭露黑暗,变革现实。作者认为,那穷困潦倒的人们都在混日子,“这地球已有些不像适于人类的家”。而这种“在相噬中的生存现状”,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他号召人们“要重新建设地球”,建设“适于大家居住”的“新的家”。他预言:逐渐觉醒了的人们“感觉自己的心疼痛的人类之子将聚起来,兴起伟大的人类的作业,计划的经营这宇宙”。即那些“打铁的,削木的,摊煎饼的”亿万劳动群众将成为历史的主人、世界的主人。而后者把日寇、国民党比作盗匪、野兽,他们妨碍人类的生存。但是,“依照人类历史来看,都在证明着人类在累累的击败野兽,更广大的发展人类的事业。我们应当相信,经过有史以来的战斗的考验的祖先交给我们的战斗的智慧和力量,有足以战胜野兽而推进人类社会的胜算”。当然,彼此间“须要互相告警,互相教育,互相学习”,才能使每个人“更精干”,成为从事战斗的“完璧之士”。

综观田贲的几篇评论文章,其革命性是鲜明的,阶级性是清晰的。但是也应该指出,有的文章也有拖沓、重复、绕圈子、使人含混不清之处,甚至运用曲笔,如《期待于今年者》一文就是如此。作者写道:“在报纸上也常见报告街村生活、工厂、矿山、交通、勤劳奉仕队、国境地带、移民团、搜货出荷等的文字,如那样可笑的浮浅的文字,应以何者为根底的文字来代替呢?”文章结尾处有一句“赞语”：“满洲是让文艺生长的原野。”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样可笑的浮浅的文字”原是长在“满洲是让文艺生长的原野”上的,是为了顺利地通过文字检查的障眼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见诸于报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带着枷锁的跳舞”。这是一种斗争策略,并不奇怪。

田贲的诗歌作品丰富多彩,有被作者称为“黑书”写于1933年至1943年他被捕前的新诗40首;有作者写于1944年被捕后至1945年出狱前的新诗10首、旧体诗20首;有被作者称为“奴隶之歌”写于1945年光复后至1946年逝世前的新诗、旧体诗、儿歌、格言体诗85首。这些诗歌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概括说来,突出地表现在如

下几个方面：

首先，田贲的诗歌有力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活动，号召人民起来予以积极的抗争。写于1940年的《我们是丰厚》，表现的是敌人的掠夺，人民的苦难，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打下的粮食，被敌人掠夺净尽。“我们耕种收获”却“永远饥寒交迫”、“这丰厚已为日皇所有”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若不杀尽这群豺狼谁能活得侥幸”，促使奴隶们通过斗争改变现实。“不道我们在来春要把大地划开/另播能掘翻土壤的新种/新苗要茁壮生长向上/去迎接直门高起来的太阳/我知春光再不会姗姗来迟/白雪底下早已埋藏微笑的新秧。”这诗句形象地表现了苦难农民的美好愿望。写于1941年秋的《新京》一诗是未完稿，仅存留四句：“在碧绿的高原上/是一个粗雕的小小的/罪恶从这里放光/照亮世纪的恶魔的心窗。”其深刻含意不言自明。《到前面去》是作者听说一位战友要到抗日最前线去之后有感而发。诗中号召“为生活流着奴隶的汗的人们”，“被鞭挞和杀戮的人们，到前面去”；号召“迎着暴风雨起来”的“全人类的觉醒者”到前面去，“到真实的人类之家去”，“到建设与自由的梦的乡土去”，“到呼吸活气的空旷自由的田野去”。日寇投降，国民党进驻。赶走了猛虎又来了恶狼，正是“打跑鬼子狗为王”，“黄狗变黑狗，给了饽饽，还咬手”（《儿歌》）。面对着这“恶势力的保持者，革命的摧残者，戴着民主的假面的专制暴君”，作者告诫人民“先不要放下武器”，要坚持斗争，“去求一次彻底的解放”（《不，先不要放下武器》）。告诫人民“不要被他们的枪炮吓倒”，“不能在奴才的屠刀下，再做一遍羔羊”（《他们的钱是谁的》）。

其次，田贲的诗歌表现出作者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并为之奋斗的坚强意志和钢铁决心。这部分诗篇主要写于作者入狱后和出狱后。《暗室》是他入狱后所写的第一首诗。“暗室虽没有日光/我胸怀十万个太阳”，言其暗室（指北陵看守所）挡不住革命者的凌云之志，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堪称上乘之作。写于北陵看守所的另一诗篇《我是王》，表现出革命者对敌人的藐视：“我是王/端坐在恶魔的监牢/饥寒毒打全都不关我痛痒/你们卑鄙狠毒/不用趾高气扬/我知道/这里，就是我战斗的地方。”他身陷囹圄，更感到生命之可贵，然而，在作者看来革命者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把仅有一次的生命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要活，就要有主张，死也死在主张上。”“纵使敲断脊梁”，“我们也要干它一场”，让“生命发出万道光，毁掉这恶牢的万道墙”。在狱中，他正是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和革命诗歌影响和激励囚徒们的战斗豪情，鼓舞奉天监狱里的“三千条饿鬼”，“呼啸着发一声霹雳，把铁打的牢门挣碎”，去迎接“发着温暖的光辉”的太阳，以显示他们“胜利的雄威”（《破狱之歌》）。

1944年到1945年田贲在狱中以及1945年出狱后，还写有40余首旧体五、七言诗。它易记、易传，短小精悍，其味无穷。如出狱前所写的第十二、第十六、第十九、第二十首，出狱后所写的第五、第十六首。与新诗一样，表现了他的理想与信念：

慷慨赴囚虏，
挺身担大刑。
愿将新血肉，
烈烈试贞情。

作花愿做老梅开，
化作人间一点埃。
我是神龙思破壁，
要从风雨上天来。

东方有顽铁，
投炉百锤炼。
霜刃一朝成，
凭君惊绝艳。

消息飞来新鼙鼓，
夜中征舞又狂歌。
忽忘长囚身已病，
欲鞭驽马试横磨。

愿将平生意，
都来付爱儿。
练成铁血魂，
努力杀强贼。

何时洗兵马，
共看好地球。

有饭大家吃，
有福大家求。

这里所引的第四首七言诗，作者曾附有小注：“1945.8.9夜作。中午得到消息，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因有此作。”其兴奋心情可想而知。诗人的坚强意志随处可见。为了追求“大光明”“大自由”，即或“一著失神机”被捕入狱，也要“昂昂作大囚”。

日本投降后，田贲于1945年8月19日出狱。他虽然重见天日，但由于在狱中备受酷刑已病入膏肓，加之国民党统治，医治不力，成天生活在病魔之中。即或如此，他还是“每日最少写小诗一句”，编成《病室小缀》。其中不乏理想与信念的闪光。如“在失败中我胜利，在必死处我复生”，“我们要牵手偕行，不要误踏荆棘，渡过河流。大伙要自为桥梁。前边的灯光近在摇晃，那是人类的鲜血涂染的红光。”

《蛹的情绪》也是作者在重病中所作。其中包括20首短诗。每首多者五句，少者仅一句。也是随想随写，却真实地表达了他临终前的内心情怀。从中可以看到他出狱后呼吸自由空气、眼望蓝天的喜悦：“自从窗玻璃上的冰花融掉/我看见一片蔚蓝天/现在又飞起一只纸鸢”；也可以体味到他把自身与民族、时代相连的幸福：“把民族的运命的丝来织我的茧/呆痴如一尊弥陀学生时代的禅。”即或重病缠身，不得不“悄悄地在危楼一角高卧”，也仍然用他的双耳在“倾听世界”，“听世纪的激响”。田贲之所以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因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党，相信群众。“晤昧闻圣音”，“不灭有神光”（《旧体诗20首》），这“圣音”“神光”，都是指马克思主义而言。“我们的信仰，是党义”，“我们的民众，有主张”（《你们的和我们的》）。他始终确信群众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群众是一注汹汹的山洪/把一百万个声音喊成一片火红/从沙皇的手里夺回我们的权统/齐来学做后代子孙新的祖宗。”他们将开辟新的天地，“种新田，播新的种/把新的砧座敲响/点火，有新的火种/从此要撞新传统的洪钟”（《大街》）。由于他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才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貌似强大的敌人面前看到美好的前程，面对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作出科学的预言：“你们的结果，是完蛋/我们的结果，是繁荣”（《你们的和我们的》）。

再次，田贲的诗歌赞颂了伟大的母爱、夫妻之爱、兄弟姊妹之爱乃至人类之爱，鲁迅先生有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答客诮》）真正的革命者，是感情最丰富的人，有所爱才能有所恨，对人民、对亲人爱之深才能对敌人、对违反人民利益者恨之切。《献给母灵》和《像赞》，就是作者

纪念母亲、歌颂母爱的作品。前者赞美母亲“一生斗争的辛苦”：

你知道的比别人更多，
你哭过故里的山河，
你放纵你的子女走上原野，
梦想过勇敢的掀天的夜火。

死前你犹念着田园的劳作，
指挥着子女此后的生活，
你把爱，遍赠邻人，
知你要用爱击碎狼子的野心。

特别称颂“你投给人间的是人类母亲的爱”，它温暖着人们的心田。“你将和太阳一样，日日东出。”后者更具体地称颂母亲的牺牲精神：

如果沙漠底下埋藏甘泉，
如果沙漠底下埋藏甘泉，
在日里夜里殷勤的开凿，
母亲担去的是第一次的重担。

如果黯夜过去就是明天，
如果黯夜过去就是明天，
世代催人继续的前行，
母亲第一个走进黑暗。

作者以简洁的笔墨，塑造了世代所有母亲的形象。作者在盛京施医院治病期间所写的《病室小缀》中的51首小诗，全部是赠给爱妻“楠”(田丹)的，其中有与妻子中秋赏月的回忆，有对爱妻携女往返送饭的追念，更有对妻子衣食无着的慨叹：“富有天下而贫无立锥。你今晚又该吃谁家的米呀！”“等‘骗’来的钱(按：指战友的无偿周济)花光时，楠呀，还有谁可‘骗’呀？”《蛹的情绪》中的第22首短诗，表达的是对“初恋的姑娘”的挚爱之情，而第23首短诗引起作者感泣的则是两性之爱、同志之爱、祖

国之爱、人类之爱。诗人高唱：“到人类的大自由的前面去，到闪动着光的爱的前面去。”诗人也正是为争得民主、自由而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田贲的诗歌是在革命生涯中有感而发，多是应急之作，无暇仔细推敲，也为了更好地在群众中流传，发挥其匕首、投枪的作用，所以，有些诗是通俗的、直白的，但有些诗却也表现了它鲜明的艺术特色，特别是如下几方面，很值得称道。

一是高度凝练。诗的语言需要凝练，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感情。《暗室》一诗仅有两句：“暗室虽没有日光/我胸怀十万个太阳”，却给人以回味无穷之感，可谓高度凝练。几十首旧体诗，也大都具有这一特点。二是强烈对比。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你们的和我们的》全诗都是“你们的”与“我们的”对比，如“你们的肚里，有鬼胎/我们的肚里，包容四海”，“你们的军队，是凶兽的牙爪/我们的军队，是和平的保障”，是非分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是充满激情。诗常常揭示人的心灵世界，更需要的是以情感人。《献给母亲》《像赞》等诗篇就是以情感人的上乘之作。此外像“那儿看还不是这一个么？中秋月呀！”“楠让我自己看月，此时她也自己看着月吧！可是月好像并不管这些闲事呢！”“花如果也有坠地的悲哀，人的悲哀该更重十分。”（《病室小缀》）“告诉楠说，我们的恋爱是一长篇的运命的战斗的诗，在时代的洪炉中冶炼，十五年！十五年哟！”（《蛹的情绪》）这朴实无华的诗句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四是富于哲理。如“真理与虚妄的距离能有几许？”“在正确指导之前摇头时，那只显示卑稚而已。”“于垂危时安心，于新生时深思。”“人在心情伟大时，才见光明。”这些都给人以哲理思考。这些诗句的产生，自然与作者的马列主义水平密切相关。当然，田贲诗歌的艺术特色并不止于这些，此处所述只是随时想到的几点而已。

五、田贲、驼子诗歌赏析

田贲的诗

石岱宗

田贲的作品产生的时间是伪满初期 1932 年至沈阳解放前的 1946 年。

他的散文，大部分刊载于 1937 年至 1939 年间秘密出版的《行行》上。小说《幽静的山谷》和杂文等则刊载于 1940 年公开出版的《营口新报》的《星火》副刊上。非常可惜，刊登上述作品的刊物，竟然一篇也找不到了。现在，我还记得《幽静的山谷》的开头：“夏天，山谷中的石竹花，凄惨而哀艳的开着”，“山头的云影，压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他以这样凄迷的笔调，来展示殖民地下黑暗的东北农村。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头而已，其余的绝大部分，只好留待将来，或者有人通过某种机缘，有所发现了。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他在《营口新报》上发表的《星火》“发刊前言”以及《星火》被迫停刊的前两期发表的《吃气息》和最后的一期上发表的《舒愤懑》两篇杂文，到如今，也只留下题目，我们找不到文字了。但他在“发刊前言”中曾写道：“星火是为人们开花的，不是为人们插花的”，“期待于它的读者，不止于知识层，且应有农夫、樵子、老妇和壮汉”这些仍然留在我们的心中。这在当时来说，该是多么不简单的呼唤啊！

田贲后期绝大部分诗稿，都被保存了下来。包括作者在伪满初期的一小部分取名为《黑书》的作品。

《黑书》是 1938 年“L·S(鲁迅)文学研究社”(对外称“灵莎文学研究社”——灵莎是田贲的字)的同人，准备油印他的杂文时，给自己的作品所起的名字。后因油印刊物难于避免日寇的检查，不利于传递遂即停印。1940 年左右，仍有个别同人和学生，要求用自己的笔和纸，抄写他的一些作品。当时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抄写是可以的，但我写的作品，除了少数绕了几个圈子写成，勉强可以在刊物上发表之外，很少能够公开出版的。你们一定要抄写，也可以，我给它起个名字，不妨就叫‘黑书’吧。”因为这些东西，在伪满，不能公开在外边读，对于日本人及其走狗必须随时加以回避。现在，仍可用《黑书》来作田贲诗集的名字——包括他在 1944 年至 1945 年 8 月 18 日

在伪满监狱中秘密写作的诗在内。

田贲出狱之后,直到逝世为止,虽然不到10个月,而且始终在病魔残酷的折磨之下,他却完成诗歌85首之多,真可谓多产作家了。这一时期的作品,他自己起名叫做《奴隶之歌》。

《黑书》和《奴隶之歌》中的一些作品的写作经过是:

《冬的尾巴还在颤抖》是田贲在1933年作为教学补充教材的一篇习作。《我们是丰厚》是1940年的作品。当时,他已经把自己的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供发表的——例如在《星火》《明明》上发表的。一类是只供鲁迅文学研究社内部人员传看的。《新京》《有赠》《日子》和《咱是一块铁》诸篇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类作品根本就不曾准备公开出版,也真的未曾公开出版。但,它是准备在群众当中流传的。它不仅写了伪满农民们忍着饥饿来打下粮食还要交“出荷”的实质,更主要的是它号召人们:“起来!”“动手!”这些作品在伪满刊物上是绝难发表的。

《新京》写于1941年8月,是针对伪满洲国的。它说:“那是一个粗雕的心脏”,指当时长春作为“国都”而言。可惜,作者没有写完。《有赠》是赠送给驼子的。驼子原属于《行行》同人(《行行》是鲁迅文学研究社的同人刊物,共油印两期)写了《砂风曲》等爱国主义诗篇,田园风味极浓,是反满抗日的作品。但是,田贲写作此诗时,由于对现实的分析与认识不同,加以驼子此时已正式加入地下的国民党,田贲已与驼子分道扬镳,所以,诗中说“连一页信笺也不屑寄”是有理由的。

《献给母灵》《像赞》是当时已经见诸报端的作品。刊于1942年12月16日奉天《盛京时报》文学版。像是田贲纪念自己母亲的作品。

需要着重提出的是1942年12月31日午后4时20分写毕的《到前面去》。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我听说可以从东北奔赴抗日的前线——延安,遂即来沈阳征求田贲的意见,当时田贲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考虑之后,他表示可以,于是在我走后立即完成这首诗。他首先喊出:

困苦中的人们到前面去,
贫穷的没饭吃的人们到前面去,
为生活流着奴隶的汗的人们到前面去,
受着叱骂在被欺侮中生活的人们到前面去,
被掠夺的被压轧的人们到前面去……

但是，我正式听田贲朗诵诗歌的时间是 1943 年 5 月 28 日午后，即我逃出沈阳的前两日。他有选择地读了诗的后一部分：

迎着暴风雨起来
全人类的觉醒者起来
到前面去
到人类的前面去
到我们的前面去
到斗争和生存的我们的前面去
抹掉眼泪，到前面去
抚着创痛，到前面去
到有生命的活泼的前面去
踏过灭亡，到前面去
到人类的大自由的前面去
到闪动着光的爱的前面去
呼唤着，到前面去
牵扶着，到前面去
引导着，到前面去
拥挤着，到前面去
高喊着，到前面去
怒骂着，到前面去
沉默着，衔着憎恨地到前面去
歌唱着，到前面去
战斗着，到前面去
友爱地拥抱着心地到前面去
抛弃一切地到前面去
到真实的人类之家去
到建设与自由的梦的乡土去
到世界的人们能够握手
兄弟姊妹般的握手的前面去
到呼吸活气的空旷自由的田野去

到种植的乐园去
到开花结果,结果开花的无穷的发展去
到美丽的虹的乡国去
我们,世纪的朋友
一起来到前面去
无须思索踌躇地起来
在正义之前没有愧赧
到前面去
世纪的前行,谁能阻拦
把自己先属于自己的朋友
属于群众
到前面去
冲着暴风雨
到前面去
迎着夜光
到前面去

由于害怕窗外有谁路过时听到,他是尽量压低嗓音来读的,但那声音对于我,却是一曲高亢的进军号角。随即他又研究了我逃离沦陷区抵达最后一站时方可使用的通讯密码,以及到达解放区后,最好能亲自回来,如果实在回不来的话,也应请组织上派人来与他亲自联系。5月30日,田丹(当时,他们尚未结婚)按照田贲的指示到沈阳车站为我送行。此诗于1946年春季,在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文化导报》上正式发表。虽然我已中原解放区,但由于国民党包围,当时是没有读到的。

《日子》和《咱是一块铁》则是1943年间的作品。《咱是一块铁》是自述。《日子》确实如田贲所写“手脚都忘记闲适的风味”,但一种“生活设计(社会主义的中国)早被弄得清楚啦”——虽然当时还是一种清清楚楚的“泛想”。

然而,自此之后,田贲的呼喊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竟戛然而止了。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所参加的秘密组织——东北青年救亡会曾要求他不写,或尽量少写,要写得更加精练一些,而且还得发挥一点作用。二是他所直接领导的爱国青年,有的人已经开始进关,我是1943年5月,季冬(笔名胡沙)大约是7月末,邓周立也是8月进关。田贲之所以不再发表作品是可以理解的。当然,田贲的秘密写作是不曾停止

的。例如《挣扎》《凌云街的惊异》都是写美军轰炸沈阳的小说，1944年初的作品。不过只供内部观看，不予发表罢了。可惜，两篇作品都在他被日寇逮捕前，自己烧毁，再也找不到了。

1944年4月初，经组织上重重考查，田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28日夜，田贲遭到日寇逮捕。《暗室》是作者被关在奉天北陵留置场内的第一首诗。全诗只有两句：“暗室虽没有日光”（黑暗哟！），但，“我胸怀十万个太阳！”（马克思主义思想啊！）《梦》和《蔷薇》是入狱初期的感想。《我是王》是与敌人（日本人）进行思想斗争最为激烈的表白，可惜已查不清此日寇的姓氏名字了。只记得日寇特务法官，姓矢野，非常凶狠。但田贲由于最讲策略——他始终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所以他对自己的友人说：“要活，就要有主张，死也死在主张上！”借以团结群众，共同对敌。

《祝》是悄悄地预送一名同监囚徒赴日本人的刑室。他虽然不知此人的姓名，对此人具有热情慰问的心情，则是流露笔端的。《夏》《生物以下的世代》《禁锢》是酷刑已经过去，作者也许在等待着判刑的日子所写的吧。但《生物以下的世代》所写的却正是很好的记录，那个时代的犯人，所能吃的、喝的是什么呀，“然而都隐忍了，自己拔掉一根毛发，使皮肤流血，这时候才知道笼子里的蝥螋为什么要自残骨肉”。他要求“给我们清风吹吹久窒的身体，给我们太阳——好像他早把我们遗忘”。此诗的写作时间是1944年6月。《拔草的人》是一首非常朴素的诗：“他（日本帝国主义者），持枪逼着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不是“满洲国人”）蒙着眼睛赤着上身，去拔掉留置场的，迎着日光的——蒿草哩！”《谁也不知道》是作者非常喜欢的一首诗。他把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瞒过了敌人，怎不令人喜欢不尽呢？

田贲在狱中写了20首旧体诗。本来他是不主张发表旧体诗词的。词，他也写，但数量很少。但是，他有兴趣（他的古文学底子是很深的），爱写，这也是原因之一。其次，监狱生活也促使他写起旧诗来。例如他托“大程”向外边带的诗中，第十二、第十九两首是旧诗。因为它短小、精悍、易背又易写（写字之写）。

慷慨赴囚虏，
挺身担大刑。
愿将新血肉，
烈烈试贞情。

此诗是1944年6月1日在北陵留置场的作品。

作花愿做老梅开，
降作人间一点埃。
我是神龙思破壁，
要从风雨上天来。

这是1944年于留置场遭受最酷烈的刑法之后写的诗。当日大雨，作者姓“花”，对于梅花有特殊的喜爱。在狱中，出狱后在病床上，他都经常画梅、写梅，以梅自诩。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之中，各种酷刑之下，摧残衰败了，只不过是一点点尘埃而已。不！我是神龙。思想起来将要破壁而起啊，要服从风雨上天来吆！

东方有顽铁，
投炉百锤炼。
霜刃一朝成，
凭君惊绝艳。

这是在奉天(沈阳)第一监狱中写给爱妻田丹的作品。

20首狱中诗作，是经他人抄写，排列的次序已不准确。从“赌命争长恋，冰霜逼落花”到“槛窗争禁横流志，独步人间有所亲”，应属于1944年，在北陵监狱(留置场)中所写的作品。其中所谓“圣音”“神光”“独步人间有所亲”显然是指马克思、恩格斯而言。他在留置场之中，思索自己的归宿，是“血刃定尔我”的。但是自己仍须“槛楼一翘首，浩唱不须愁”。虽然置身在日本的“留置场”，已是“生死小参差”了。但是，田贲在留置场，是当做“怒舌舐越胆，此裂断私公”来对待的。

在奉天第一监狱中，最后一首诗是1945年8月夜所作，因为中午已得到消息说8月8日苏联政府业已对日宣战了。

消息飞来新鞞鼓，
夜中狂舞又狂歌。
忽忘长囚身已病，
欲鞭弩马试横磨。

他已忘记“长囚身已病”了，只等待横鞭立马一试“十万口大剑”了。“横磨”，剑也。《辞典》谓：“晋有大剑十万口”等待一试呢！

邓周立曾在沈阳最初一度解放时的一个刊物上搜集到田贲的一首诗给我看，应当也是狱中的作品：

事破无言就索绳，
铁窗锁我自从容。
愿将东北男儿血，
洒作白山顶上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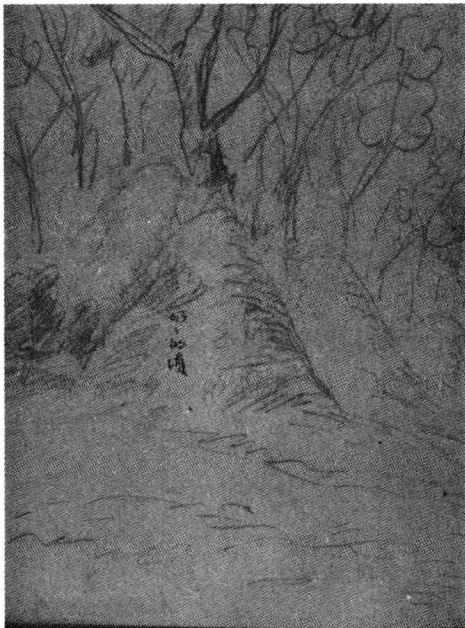
沈阳光复以后，田贲写了《狱外记》。由于疾病在身，加上国共两党真刀真枪地干，时局在急剧变化，故此未能完成。所留存的只是一首长诗的序诗。《大街》是苏联红军在沈阳时期的作品，“点火，有新的火种，从此要撞新的洪钟”，指苏联有集体农庄。《病房小缀》，是赠与田丹的，由于闹病，每天通常仅写一句。但是10月8日则写了14句。可见多写少写是由病况来决定的。不过，田贲是坚强的，也是有韧性的。例如，在10月2日，他说：“在正确领导之前摇头时，那只显示卑稚而已。”在10月7日，他说：“和死作斗争，我曾是骄傲的胜利者。”可见，死对他已不算什么了，“呼吸一断就死了，多么简单的事，还有什么‘神秘’的？”

《我的歌》是1945年秋季完成的，可与1943年《咱是一块铁》两者对照来看。1946年3月他又重抄，寄给什么杂志就知道了。这距他告别人世，只有一个来月。《两世代》是田贲的一页总结。《不，先不要放下武器》是读报以后的诗篇，以及《人民是正直的》《他们的钱是谁的》《你们的和我们的》共4篇，都是1946年的作品，也是作者自己编辑的《奴隶之歌》的最后4篇。

我走在人民的面前，
看人民的脸色，赭红的脸刻满皱纹，
皱纹上又泛满微笑的波浪，
是勤劳诚朴的笑的波浪……
我坐在人民的身边，
听人民的声音，简洁而刚劲，
愤怒加强了音韵……

不再做官僚、封建主、资本家的仆从。
迫害教导着他们，
要有这聪明；
生活教导着他们，
要有这行动……
因为我知道，
在历史的前方，
只有人民是正直的。

还有《你们的和我们的》，“你们的前途是牛角尖，我们的前途是无限；你们的结果是完蛋，我们的结果是繁荣！”这是1946年3月的呼声啊，今天读起来仍然铮铮有力，爱憎分明，声若洪钟。



田贲病床上画给女儿的画《奶妈的坟》



田贲病中的自画像《隐忧》

伪满新生派诗人评田贲与驼子

崔束

崔束 本名高柏苍,笔名崔束、影子、白常、崔伯常、余有余等。1916年出生,辽宁海城人。伪满吉林师道大学学生、锦州国高教员,流亡关内,入“战干团”和三台东北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辽西文艺》编辑部负责人、《辽宁文艺》副主编、辽宁省图书馆副研究员。



高柏苍在伪满国立师道大学时(1941年)

我出生于1916年8月,和田贲、驼子是同时代人。我是辽宁省海城人,与他们是近邻。1930年考入海城中学初中,那时田贲在海城上师范。我们彼此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和生活背景。我爱好文学,爱写诗,也受过日本人的毒打。近些天,我读了田贲、驼子的诗文之后,明确感觉到:我的诗文和他们的不一样,或许可以给现在的人认识伪满洲国的文学、理解田贲他们的诗有一些参照的作用。我认为,我与田贲、驼子他们的诗,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是战士,我是搞纯文学;他们的诗是武器,我的诗就是诗;他们直抒胸臆,我却讲究含蓄、讲究美。当然,我不是说他们的诗不美,但那是另一种美,更不是说他们的诗不追求意境。田贲的诗有一种霸气、英雄气概和牺牲的精神。我的诗里没有这些东西,是小资的气味和情感。

1936年,我考入奉天省立奉天师范学校。这一年,我诗兴大发,成天写诗,一天写几首。看下雨:“下雨了,冒泡了,王八戴草帽了!”有诗;看孩子们和泥团窝窝,往下摔扣,口中念念有词:“东北风,西北风,一摔摔个大窟窿!”窝窝的底部薄,摔扣下去鼓破砰然有声,也成诗。我也从不推敲润色。写成一本几十首,邮寄给《抚顺新报》,给我每天一首连载,寄赠一份报。人家诗都是通栏发表,我的“落叶集”不通栏,看来并没有得到编辑的重视。

那时沈阳叫奉天,还有城墙。城墙根叫“顺城街”。顺城街泥泞不堪,有旧书摊。奉天省立奉天师范在同泽中学旧址,现在小河沿动物园旁边。进城,得经过顺城街。我

在旧书摊上买到过王一叶先生的诗集《锦瑟集》、张露薇的《昭陵红叶》，还买到过臧克家先生的诗集《罪恶的黑手》和鲁迅的《南腔北调集》，这两本书的版权页上都贴有“大连青年书店”的标签。这时，我懂得诗需要推敲了，开始用影子笔名给《新青年》投稿，受到编辑重视。有时候放在诗栏的头条。

我当时不懂得阶级论，只是怀有一种强烈的家乡的眷恋情，我用笔名影子撰作的诗几乎都可以涵盖到这个圈内。如1936年发表在伪满杂志《新青年》上的《一束草》：

一束草

(署名：影子)

抓一束青青草，
当这蜂飞花烂天气。
不叹息，说春要阑归。
怪恋人的，是
这野草的生鲜味。

妈妈盼儿归，
儿不能归。
听不见妈妈烟袋
扣打烟灰。
白头发多，
黑头发少，
爸爸见老。

维时金音在《民报》上办诗刊《冷雾》；老萧在《民报》上办文学副刊《平凡》。老萧是兵工厂的工人，星期天经常和四五个同他办刊的工人朋友来学校找我，到学校南边的瓜地请我吃香瓜。其中，有一位在《平凡》上发表小说的陈重，他说：“我什么都干过，还做过货郎，摇拨浪鼓卖针头线脑。”我给《平凡》都写过什么？现在是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了。肯定是写过什么的，不然，他们怎么会来学校找我呢？

一个星期天，说是在铁路上工作的一位中年人来找我，自我介绍叫王尚志。王尚志我并不认识。他递给我一卷原稿，说，他是孟素。一提是孟素，我就知道了，那是经

常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文艺评论家呀。我非常尊敬地行礼、握手，他给我看的原稿题目是《介绍一位文坛新人》，副标题是“评影子诗作”。后来在伪满《新青年》上分上、下两部两期连载。记得最后要我避免程式化，不要每首诗最后一行都是某某啊。

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日本《改造》杂志1936年12月号有《鲁迅哀悼特辑》。日本杂志从不脱期，且提前一个月出版。鲁迅先生10月份逝世，《改造》的11月号已经出版了，所以只能在12月号出《鲁迅哀悼特辑》。《特辑》发表三篇文章：一是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的《心的历史》；一是内山完造的《鲁迅先生追忆》；一是鹿地亘翻译的鲁迅先生的《记在深夜里》。我去日本站大阪屋书店购得《改造》12月号，翻译了山本实彦和内山完造的文章，发表在1937年的《新青年》上，标点还是用的日本的“、”和“。”。

1937年，我为了晚上在青年会补习数学，准备考大学，不在学校住宿，住在包伙食的旅店。记得是一个星期天，在大南门里，遇见了袁犀，给他看我的诗。袁犀说：“你把东北农村写得过美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统治下的农村能够这样美吗？”我唯唯。我并未全面了解农村。我家是富裕的，我是根据我的家写的。

1938年，我考上吉林师道高等学校（后改为国立师道大学）。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戴四角帽子，帽徽和钮扣上印制“高师”字样，制服和外套是黑色的。与日本的大学生是相同的。第一年尚无军训，教学管理制度尚有日本内地大学遗风，比较宽松。课程分量小。我几乎是疯狂般地读购岩波文库、新潮文库和改造文库。外国小说、日本小说，几乎都是通过文库本读的。文库本便宜，又便于携带。

学校里有个同窗会，同窗会有个文艺部负责校刊《乌拉》的征稿编辑工作，我上一年级时，是高明阁、罗明哲同学管事，宫琦负责。我在校刊上发表了几首诗，翻译了日本短歌。第二年由杨国杰和我管事，另外有王家仁和郑毓钧，还有一个日本学生管日文稿件。姚志学是三班学史地专业的，也写一首诗，王家仁的一首长诗作封面并刻了一幅木刻。我写了一篇小说《灰死记》，用笔名耿叔永，还有同班同学李志信写的小说《大坟圈》。稿子编辑齐了交给负责的日本老师阿部襄，然后在当时的新京（长春）铅印，一年一本，称“大乌拉”；我和杨国杰还另外搞了一本不定期油印的“小乌拉”，每次刻印六七张蜡纸都很吃劲儿，印的份数不多，只在宿舍的阅报室里放几份给同学们看。主要都是文艺作品，阿部襄老师不看原稿，只印出后给他一本。办得很吃劲儿，办了四五期就停了。《古殿堂》就是发表在1940年8月油印本《乌拉》上的一首怀旧情绪的诗。

当迈进这古殿堂，
小沙弥敲打一声钟。
灰土焦炼铁香鼎，
都花斑锈了。

后生子，他燃高三炷香，
愧对宗族英雄像。
说，早先年的黄金偈子，
都消磨尽了。
掌和掌，
眼泪一对双。

这个时期我写的诗，后来我在辽宁省图书馆工作时在伪满刊物上找到的有好几首：

车

(署名：白常)
一小伙，
破旧衣裤，
崭新自行车。
看前把闪光亮，
押铃铛儿哇哇响。
他一会儿试手闸，
他一会儿试脚闸，
一会儿他使劲使劲蹬，
嘴笑呵呵儿的，
脸美滋滋儿的。

我于是赶上前，施礼问道：
“问这位大哥，

大哥你花多少钱，
买得这辆车？”

他下车答我：
让老弟你说，
架是西洋架，
把是风把，
老头牌里外带，
喷，实不瞒老弟。
都花二百多。
他说到此处，
再盯问我，
巴地一拍牛皮座，
说：这车登登的。

我仍有问：
“还借问大哥，
大哥你为甚，
要买这样车？”

他不高兴了，
他小声说：
是他东家车，
东家叫学车，
他骑东家车，
他学车。

小北风儿吹清雪，
微点头，他悠儿地上车，
后轮赶前轮，
一条线上滑走，

我听不见铃铛响了。

(1939年7月,原载伪满《大同报》)

这首诗写一个打工的穷青年,用东家的自行车学骑车,以及他对洋车的喜爱。表现了他的虚荣心和价值追求。《希望的象征》是晚霞即景,现在读起来我自己仍然觉得很美。你如果把它与田贲他们的战斗口号式的诗来比较,如果在那上纲上线的年代,说我美化伪满洲国,我也无话可说。可是,我只是写景,只是喜欢美,说我唯美主义我也承认。

我用崔伯常笔名写诗,诗写得少了;用崔束笔名写小说,小说写得多了。发表在《文选》第1辑(1939年12月出版)上的《日子》,署名就是崔束。《文选》是由陈因、王秋萤于1939年12月在沈阳创办,是300页以上的大型文学刊物。《文选》针对“躺在玫瑰花坛上唱着催眠软歌”的闲情逸致文学和“狂放的恣睢者”的“艺文志”同人,提出反对“为文艺而文艺”与“把文艺作为个人牢骚泄愤工具”,主张文艺应是“认识现实的工具”“教养群众的利器”。可以说是当时东北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文学杂志,曾经设立过民间文学奖——“文选赏”,和当时的伪满洲国“民生部文艺大臣赏”及“盛京文学赏”相抗衡。但是只出刊2辑,1940年8月就终刊了。在第2辑里,我以崔伯常的笔名发表了《希望的象征》。

希望的象征

(署名:崔伯常)

天无风,
晚霞儿映脸红,
铁背弓:
拉得绷紧了。

要箭头儿朝天么?
像燕尾,
像贼星,
流一条光与影。

箭头儿朝地了,
箭头儿射进地了,

羽毛翎，
草青青。

(1940年2月，原载伪满《文选》第2辑)

这时，我读过岩波文库本欧·亨利(美国)的《短篇小说集》，爱得不忍释手。受欧·亨利的影 响，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爱》，写好后给同班的李承烈学兄看，他批评我写的《爱》污辱女性。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批评是深刻的、正确的。但当时我并未接受，还是寄给王秋萤先生了。不知道王秋萤先生从哪点上相中了，在《文选》上发表了，而《文选》中只有我这个唯一的短篇小说。我被选为校刊《乌拉》的编委，以“耿叔永”的笔名，撰写了中篇小说《灰死记》，内容是写一个先抽大烟后扎吗啡，终于披着麻袋片冻死于沟壑的人的妻子对丈夫的关怀和无奈。我还写了一个中篇小说《高六子》，发表在《斯民》画报上，内容写高六子14岁被家长强迫结婚，要拜天地了，新姑爷不见了，找啊找啊，在后园子的柴禾垛里揪出来了的故事。我写过一首长诗《离家》，发表在《明明》月刊上。那时候能在《明明》上发表是很“光荣”的。1944年冬天我到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中文系念书时，在壁报上发现有人把我的《离家》几乎是一字不错地抄上了。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陈芜。陈芜，本名郑毓钧。他是第一班学“国民道德”的，宿舍在我的隔壁。我编校刊《乌拉》时约他写诗，他写了一首《宝匣》，署名“邓东遮”。宝匣里有一支宝剑，寒光闪闪，是要飞出去斩掉敌人的首级的。他平常几乎是一句话都不说，常戴口罩，说是身体不好，害怕感冒。有人说，他家里有钱，他把地卖了，和新京(长春)的朋友合资开了个出版社。他说要编印《诗丛》，我曾把已经发表的诗编成一个集子(题名《死》)交给他。他计划要出一本日文的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传》，几个人分工翻译，我翻译了好几章呢。后来出版社被查封，诗集和传记都付诸东流了。

伪满只有14年。谈伪满文学大概只涉及活动在社会上的所谓作家。这些作家都是已有的，不是新生代。新生代还是学生代，像陈芜和我。陈芜，在寒假时我曾见过他不穿师大校服而穿皮领子呢子大衣。第二年改成国立师道大学了，有了预科，有了军训，有了推煤渣的劳作课，日本学生(日系)吃大米饭，中国学生(满系)吃高粱米饭了。一天夜里，宿舍的入门处(玄关)出现大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一大早就都收拾掉了，我没有见到。于是全校学生在礼堂前边集合，气氛恐怖。礼堂的门只开一条缝，学生被一个一个叫上来，通过只开一条缝的礼堂门，两个把门的日本人教官虎视眈眈，察颜观色，要发现张贴反满抗日标语者。结果不了了之，没有发现可疑者。谁也不会想到身体病弱、少言寡语的陈芜(郑毓钧)是伪师大国民党地下工作的领袖。

陈芜(郑毓钧)后来在北京因肺病逝世。我在西安时曾见到他亲笔写的自传,题作《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我认识他的笔迹,确是他所作。他不吸收我,但他并不回避我。有一次,他说带我去见一个人,走进一座白楼,门开处,出来和我握手的竟是早已去大后方的于庆波。

1941年4月,又一个日本国内樱花开放的季节,伪满高等学校照例要去日本修业参观旅行。我是应届毕业生的班长,同班同学张孝谦、李承烈、李志信、之朴、马传鹏、夏樾等都去了,我更不能例外。回校后照例向在校师生汇报旅行观感。我着重从文化方面讲,讲的题目是《从日本和尚看报谈到汉字拉丁化》。内容大意是:日本到处皆神社,无地不鸟居。^①日本和尚也不少。但日本和尚与我们这边的和尚大不相同。咱们这边的和尚要修道成佛,要出世,看破红尘。日本和尚却带手表、读新闻,关心国内外大事,要入世。去广岛文理科大学参观,看见一个外国学校研究汉文的,竟藏有那么多汉文古书;研究屈原的专有一个屈原研究室,这些都使我大为惊讶。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与我们一起开座谈会,一个日本学生说是研究《易经》的阴阳二气的,得不出结论,要我们把问题带回去,以后加强联系。而我们根本未学过《易经》,不知道阴阳二气是怎么回事。看人家那个学生泰然自若,侃侃而谈,就自愧无知。我说:一进文理科大学,就明显感觉到阳光耀眼,春色明媚,树底下有穿着宽袍大袖和服的学生看书,与我们的大学十分不一样。我说到在火车、轮船上遇到从日本往满洲来的、从满洲往日本去的日本人,张口闭口东京,张口闭口内地,他们是日本人,也是满洲国人。可我们呢?也是满洲国人,“复合民族”成员,就不敢提北京,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不敢说有祖国。我说到去日本小学参观,看见日本小学生刚会日文字母就会写汉字“雞”,日文“鸡”字念ニハトリ,四个字母就行,我们小学生学会写个“雞”字该有多难啊!汉字是得拉丁化!我说着说着感情冲动,觉得用日语讲挺别扭费劲,听的人也吃力,何必呢?就不假思索地用汉语讲下去,引来同学们的热烈鼓掌,也使在场的日本师生和朝鲜学生惊诧。虽说讲稿是用日文写的,事先经过检查,没有反满抗日的词句,但是这种鲜明的事实对比、强烈的民族意识、澎湃的爱国热情已经激起了同学们的共鸣,他们用热烈的掌声呼应我。

由于自己的冒失,引起学校的风波。后来,人们把这件事叫做“高柏苍事件”。我遭到日本舍监的毒打,被逐回家。

回家之初有一段时间,我在房后待着,干活或看书,不出大门。我爸爸给耿庄子

① “鸟居”是日本神社前入口处的大门(阍)。

警察署署长送了一对鲜鲤鱼，以后只来查过一次户口，没有再来。时间一长，好像忘了，松了，我可以自由活动了。我不仅给新京（长春）《大同报》副刊投稿，而且每天骑车往返海城县里帮助社长刘田星编《农业进步》（实为文艺刊物），也无人过问。直至该杂志社迁往沈阳，刘田星搬走。这期间我写的短诗《窄门》、短篇小说《尸走》，主要排遣自己无聊的生活，表达自己无聊的心情。我能够在当时报刊上找到的有：

灯笼

（署名：崔伯常）

正月十五雪打灯，
那雪花儿点点轻静。
你看大门关处：
有两个温红，
在窗上弄影。

别提叫嚣的大都吧，
当细雨斜梳胡同，
当黄昏溜进小城，
你看家家澡堂子旗杆顶
那一盏青春的灯呵！

我酷爱灯笼。
更恋想王侯家门口大纱灯，
不是想退居古昔。
每见大灯笼，就觉得这是，
英雄富阔矜持标记，
是温饱和太平的象征，
而忆及南征北战先祖，
不禁肃然起敬，
愤然有志了。

（1942年11月21日，原载伪满《新满洲》杂志四卷十一期）

这也是写民俗、写传统的诗。说老实话，我现在读起来，仍然感觉很美。从灯笼就

联想到祖先。流露或者表现怀旧情绪的,我现在找到的还有其他几首。这种情绪,在我的诗里持续了很长时间,也许与我从家乡、传说、师长、书本等渠道上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学熏陶分不开。齐红深先生说,这其实是中华文化对伪满殖民文化的一种固执的抵触和反抗,我内心感到安慰。我没有像“星火”同人那样,与日本殖民文化有意识地进行正面的冲突,所以我不是英雄,但在骨子里,中华文化对殖民文化的抵制同样会在我身上表现出来。当然,这是不经意的。我在师道大学讲演被打、从东北逃亡,都是中华文化的血脉在起作用。

回忆历史的,还有一首题为《稗史》的诗,写的是关于清朝“压倒三江”的关东才子王尔烈的民间传说。那时民间的说法,人死了之后,要过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到阴间变成鬼。可是,王尔烈有灵气呀,潇洒呀,没过三七就游走江湖了:

《稗史》

(署名:崔伯常)

南边雨呀北边风,

有灵气呀出关东。

你记得压倒三江王尔烈吧?

王尔烈某夜独行,

有人蹒跚来,

手提小灯。

于是王尔烈趋步上前,

说:“借光大哥,小弟对个火!”

只见那人打开灯:

王尔烈烟袋伸近烛火。

烛火直舔烟锅,

烟袋锅不着火。

那人可就笑了,说:

“老弟靡过七七吧?

不然哪能不着火?”

你看压倒三江王尔烈:

“可不是，大哥，
小弟还靡过三七呢！”

(1942年3月，原载伪满《新满洲》杂志四卷二期满洲诗作介绍栏)

采访整理伪满洲国口述历史的齐红深先生很欣赏我的诗，说写景的有诗情画意，叙事的通俗幽默，透着睿智和隽永。我想大概就是就这些小诗而说的。齐红深先生说我在解放后写着玩的那些诗同样有着这样的因子，是一脉相承的，甚至看不出多少时代的烙印。他还举出1957年的《家行路》和2003年的《右眼歌》来和我伪满时期的诗作比较。

如果说我的诗作与当时的社会完全不贴边，那也不是。例如：

父像记

(署名：崔来)

你儿子想给你照相
尔来小三年了！
今年夏天你病了，
你在病里想你儿子，
想叫你儿子把你领进洋医院，
于是，你给你儿子打去电报了。

你儿子请晚了一天假，
病，使你等不了他。
你和你亲家，你和你大女婿，
你和你二女婿，你和你大侄子，
你雇一辆双马车，
你自个儿上洋医院去治病了。

等你儿子赶回来，
你业已看完病。你躺着问你儿子：
“来呵，你上爹这边来。”你说：
“还是人家洋医院”，你说：
“咱们哪知道人家不兴往地下吐痰。”你说：

“你两个姐夫通通不行，
一见洋人玩不转转呵！（你笑了）！
这要是你去，和洋人一翻译，
吐口痰那算什么？不让吐咱不吐。
他们不行呢，都不会话，
把人家地板都给弄脏啦！
人家往外赶咱们，都要不给治了。”
你儿子在你那眼睛里
幻化成救星，幻化成希望了。

你的病在洋医院治好了！
你打城里回到了自个的家。
你对你儿子说：“哪也不如自个的家呀！”
于是你儿子想起借来的像匣子：
“爹，我给你照相呵？”
你笑了，
你老闺女给你换件蓝绸袄
你站在阳光里微笑，看你儿子
摆弄那黑色的小箱，你那
微笑里，跃动着多少高兴的波纹哪！
你儿子带着在家照的像
离开了家。到城里洗出来了！
是下屋仓子。
怕你疑心到别的上头去
像洗出来，就留在你儿子手了。

你儿子求他的一个友人——
一个努力的，天才的
往外画个性和青春的年轻友人
给你画像了，去掉身后的仓子。
画成了！装在镜框里。

你儿子捧回自个的卧室，
戳在画架上了。
第二天早上挂墙上了，
第二天午间挪到窗户边的墙上去了，
第二天夜里挪到他的寝台头直上了，
你儿子这回安心了！
他抬头便能看见你。
每夜，你儿子做完一天的工作，
横身子在自个的寝台，
他就看见你了。
他就想起你了！他知道你爱他，
他更在心的紧底下爱你：
爱你尽筋的手，
爱你七十六岁齐全的牙，
爱你拿靡差别的心眼，
平均地爱你整个的家。

凝视着你鬓发银白，
你儿子从妖怪的黄金匱，
联想到无边无沿的悲哀，
要更一层地和你亲近了。

这首诗是写家、写父亲、写父子、写亲情、写温馨。我没有想过别的。但是，齐红深先生给我指出，这首诗与以前的诗相比，明显有变化了：日本话夹杂进去了，“通通不行”是日本语法，“寝台”是日本词汇；新的事物，医院呀、照相呀也写进去了；学会日本话吃得开，中国农民不讲卫生，信任洋医院等观念也流露出来了。虽然我是为写诗的，不像田贲是为生活的，但多多少少也折射出当时的一些社会情景、价值观念、文化变化，这说明奴化教育在我身上也起作用了。细一想，他分析得不能说没有道理。

我从自身的创作经历出发，来欣赏田贲和驼子的诗，再联系到伪满洲国与我类似的新生派诗人，对诗的认识有一些升华。我感到诗有多种品格，多种用途。能写出什么诗，要看作者的底蕴，和他所处的境况。

当诗用作闺中的插花,会追求含蓄和雅致;当诗用作休闲的茶点,会希望它的滋味和余韵;当诗用作田园的炊烟,会适宜闲适与恬淡;当诗用于宣传和思想的发动,自然会追求直率和鼓舞的力量。

田贲的《到前面去》,是口号,是鼓点。同时,它的节奏美和重复手法的运用所制造的鼓动的力量,真诚而热烈,催人奋进。驼子的诗,会比田贲在狱中和病床上写的诗更着力于创设意境与语言的修饰。他们二人,都具有较好的中国古典诗词的基础,却更致力于向苏联、欧美诗人学习。他们不是为了写诗才写诗,也不是为了美才写诗。诗,文学,艺术,不是一个人的情调和素养,更不是一种消遣,而是他们思想的外衣和言语行为的表征,是战斗的武器,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我认为诗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人们对诗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反对把诗一律政治化。田贲、驼子是革命诗人,但都有歌唱大自然的诗。田贲作于1933年的《冬天的尾巴还在颤抖》、驼子的《小山》等,都写于日本占领下东北最黑暗、日本镇压东北人民最残酷的时期,同时也是他俩燃烧爱国激情的时期,能因此就说他俩为伪满洲国粉饰太平吗?

驼子与田贲诗歌之我见

门熙鼎

驼子写了很多激情涌动的反满抗日诗文,发表在他们自己创办的油印刊物《行行》《星火》上和当时营口、大连、奉天、哈尔滨的日伪公开出版的报纸刊物,如《营口新报》《泰东日报》《大同报》《新满洲》《大北新闻》。他还随时随地地鼓动和辅导其他“星火”同人,写诗撰文抨击日伪的罪行和鼓舞人们的斗志。这些诗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多是含蓄隐讳的,以避免日本特务和汉奸文人的书报检查,更多地运用了托物言志、借景抒怀的手法。然而,“诗言志,歌咏言”,不管他们的诗文怎样含蓄、怎样隐讳,还是掩盖不了其思想的真谛。我的父亲门文东,不仅是驼子的同志和战友,也是他诗文的忠实读者。那时,他剪贴了一大本子“星火”同人的作品,其中田贲和驼子的最多。在大逮捕前,和其他材料及有关人的照片都一起烧掉了。所以,尽管驼子在日伪时期写了很多诗文,可我们手里保存下来的却寥寥无几。由于驼子的出身和解放后的经历所致,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没人去提及驼子的诗文。直到粉碎“四人

帮”、改革开放以后，1990年《营口文史资料》第七辑才登载“星火”同人门文东、铁汉的回忆文章，一些知情者开始回忆“星火”同人在田贲、驼子领导下，拿起笔作刀枪，进行反满抗日斗争的那段历史。田贲的诗文，由于铁汉的精心保管，大多得以面世，而驼子的诗文，搜集起来相当困难，仅凭一些同志的记忆和查阅伪满报刊找到一小部分。

1990年我参加了盖县县政府主持邀请居住在东北的“星火”同人座谈会，他们无不称赞驼子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是才华横溢的诗人，是在日伪反动派酷刑折磨和死刑威胁面前不屈不挠的斗士。李昌毓（现名李实）说：“驼子是一位平易近人、非常热情的作家，当我一接触他，他就像一块磁铁一般吸引着我，在我们之间很快建立起密切的友谊，他指导我写作，引导我以文艺为武器进行反满抗日斗争，他是我非常崇敬的导师。他在反满抗日斗争中，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最可贵的民族气节。他能诗善文，作品极富联想和寓意，极少雕琢和标语口号之弊，想象丰富，含而不露，思想性寓于艺术性之中，很有艺术魅力。他把诗文视为革命的号角、反抗的战鼓。他的诗意境深远、感情充沛、构思奇妙、战斗性强、具有生气和魄力，感染了当时很多青年。”下面我们援引几首不同年份的驼子的诗，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驼子的思想和他的艺术风格。

耐寒曲

荒原如睡，
霜雪满地，
半山的枯林，
一天的阴霾。

冰天雪地里，
何处尚有耐寒的东西？
只有这断崖上的孤松，
只有这孤松在断崖矗立。

暴风摇不掉他的高歌，
严寒啮不尽他的绿意，
四季变换不了他坚强的节气。

便是那无限的凌辱啊，
也毁不灭他的生机！

荒原如睡，
霜雪满地，
半山的枯林，
一天的阴霾。

冰天雪地里，
何处尚有耐寒的东西？
只有这断崖上的我们，
只有我们在断崖上巍立。

我们每人都要学那一棵青松，
我们要变成一片松林，覆遍了野地。
让高歌变成更响的涛声，
让绿意变成电火，
烧碎那冷漠的铁狱！
四季移动不了我们坚强的雄心，
便是那无限的凌辱啊，
也毁不尽我们的生机！

(1939年1月)

这首诗用象征手法，歌颂“断崖上的孤松”。在“荒原如睡，霜雪满地”的严冬，只见“半山的枯林，一天的阴霾”，“冰天雪地里”，再无“耐寒的东西”，“只有这孤松在断崖巍立”。这是一个突兀高大的形象，是一个英勇不屈的强者。“暴风摇不掉他的高歌，严寒晒不尽他的绿意，四季变换不了他坚强的节气。便是那无限的凌辱啊，也毁不灭他的生机！”诗人不仅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他，进而发出铿锵有力的誓言和号召：“我们每人都要学那一棵青松，我们要变成一片松林，覆遍了野地。让高歌变成更响的涛声，让绿意变成电火，烧碎那冷漠的铁狱！”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誓词，也是他行动的真实写照。他以一个残疾弱小之躯，投身于反满抗日斗争，用自己的诗文，发出阵阵高歌，不断卷起“更响的涛声”，唤醒青年学生，投入到斗争的战场；他在敌人黑暗

的监牢里，坚贞不屈，顽强乐观，把“绿意变成电火，烧碎那冷漠的铁狱”！他真正做到了“四季移动不了我们坚强的雄心”，做到了“那无限的凌辱啊，也毁不尽我们的生机！”这首诗的感染力强，不仅因为它形象鲜明、热情奔放，还由于运用的拟人、象征、反复等艺术手法。

驼子是一个强者，一个巨人。对生活、对人民、对祖国的强烈的爱，对敌人、对黑暗、对恶势力满腔的恨和蔑视，使他弱小身躯里发出的热情之火焰熊熊燃烧，具有磅礴的力量和无可阻挡的气势。作为“星火”同人斗争高潮的《我的歌》，更具有代表性。

我的歌

我的歌，
 犹如疯狂匠人手里的赤铁，
 经过千百次锤炼，
 雄宏的声音也不会消灭！
 宛如云空暴发的雷鸣，
 荒原的焚火，
 永恒地奔放，叫嚣着，
 虽然人间睡去，
 山海也有千百年的沉寞。
 似大海卷起飞嘶的涛声，
 去淹没鲸鳄的血口，
 去淘汰天宇的阴晦。
 又如大野的风声啊，
 吹醒了林木，叫醒了宿草，
 复生在美丽的春天。
 虽然我的歌唱在冬天，
 我的歌经千万次锤炼，
 也消灭不了他自由的钢韵，
 如雷火之奔腾，
 永远在天地间轰鸣！

(1943年)

这首诗较之于前一首，形象更丰富，比喻更多彩，语言更华美。诗人把“我的歌”，

比作“疯狂匠人手里的赤铁，经过千百次锤炼，雄宏的声音也不会消灭”；比作“云空暴发的雷鸣，荒原的焚火，永恒地奔放着，叫嚣着”；又比作“大海卷起飞嘶的涛声，去淹没鲸鳄的血口，去淘汰天宇的阴晦”，还比作“大野的风声”，“吹醒了林木，叫醒了宿草，复生在美丽的春天”。他的诗，总是昂扬着斗争的精神，短短的篇什，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场面。赤铁，经受锤炼。纵然千百次的打击，也不会消灭它那“雄宏的声音”；雷鸣，即使“人间睡去”，“山海沉寞”，它也要“似大海卷起飞嘶的涛声”。因为它深知自己的使命，是“去淹没鲸鳄的血口，去淘汰天宇的阴晦”，去“吹醒林木，叫醒宿草”，使它们“复生在美丽的春天”。诗人的热情丝毫没有麻痹他理智的清醒，他知道自己的歌唱在冬天。但他决不屈服，决不软弱，绝不松懈，绝不气馁，要——“如雷火之奔腾，永远在天地间轰鸣！”

当时的伪满洲国诗坛文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和压榨下，缄口消声者有之，歌功献媚者有之，骚风弄影者有之，为艺术而艺术者有之，使用两面手法麻痹敌人者亦有之。而田贲、驼子之群，生于草野之间，起于青萍之末，以发表于地下油印刊物和在群众中传播为主的诗人、作家，顽强而固执地保持着诗人的高尚和纯真率直。如果说在发动、团结、鼓舞青年学生觉醒的过程中，发出这样响亮、热烈、豪迈的歌声，尚不多困难和考验的话，真正在严寒袭来，在黑暗的牢狱中，在残酷的刑罚下，在生死的紧急关头，诗人的生命之火还会不会燃烧、能不能跳跃？又是在怎样地燃烧和怎样地跳跃？驼子于1944年5月上旬在盖县被捕，作为重犯立刻押送奉天“北陵留置场”秘密分室，严刑审讯8个多月，最后被判处死刑。请看他1945年写于狱中的作品：

斗争之火

生命是一把熊熊的烈火，
它燃烧，它跳跃，跳跃啊，跳跃。

……

枷锁和牢狱，对于它只如同，
倒在头上的烈性的油，暴躁的酒，
遇上那油和酒，碰上那酒和油，

……

生命便愈加燃烧得坚决，
便愈加燃烧得透彻！
这生命之火哟，

这斗争之火哟，
 越是撩逗，越是挑拨，
 便愈加燃烧得坚决，
 便愈加燃烧得透彻！

……

(1945年写于狱中)

他把“枷锁和牢狱”视作“倒在头上的烈性的油，暴躁的酒”。这生命之火，一“遇上那油和酒，碰上那酒和油”，“越是撩逗，越是挑拨”，“便愈加燃烧得坚决，便愈加燃烧得透彻！”我们读着这样的诗句，真是振奋，真是酣畅！从这些诗句里我们可以看出驼子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和斗争精神，看到他的爱国精神。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战斗的诗是不朽的。中华民族是不甘屈辱的，为民族的高歌，会“永远在天地间轰鸣”！

驼子的诗与田贲的诗，是时代同一队伍的歌，因而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由于他们都是优秀的歌者，因而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总的来说，田贲更直白，更质朴；驼子却在保持思想内容斗争性的同时，较多一些修饰和色彩。《我是王》《怀揣十万个太阳》是需要直截了当地奋力一吼的，《耐寒曲》《我的歌》也是需要绚丽的。可谓异曲却有同工之妙。

田贲没有雅致也没有条件风花雪月低吟浅唱。他在生活贫困和地下秘密工作双重恶劣环境下，“日子过的像电火烧烤，手脚都忘记闲适的风味，一饮一食的事都让你永夜不眠，搜捕的惊惧跟随着是永脱不开的鬼影”。自然，他“没有时间去玩赏艺术的长篇精品”，“对风月遐想够当真望尘莫及”。(以上引文见田贲《日子》，1943年作)所以，从他口中喷出的只能是血与火。如《咱是一块铁》：

咱是一块铁
 不知怎走出
 到这斗争
 血
 火的世界

看满脸红光
 那铁匠

是咱爸爸
那只黑锤
是咱妈

咱便是他手里那块顽固
顽固得
喷吐火花

由于他是“坚固的铁一样的儿郎”，所以，“我要跳上一乘铁的骏马，把新的呼唤高高唱响，去迎接火色的幸福美丽的晨光”。（以上引文见《咱是一块铁》，1943年作）显然，这对于他，是适宜的。如果搔风弄月，便是故作风雅，适得其反。

田贲诗集中有一首诗题名《有赠》，写于1942年春，是给昔日好友于家麟的，但却没有寄给他。原文如下：

让田园风味麻痹着你吧
我连一页信签也不屑剪寄

生活紧紧地抓住我
再没有工夫去梦想夜莺和白云

梦里都是惊恐
淫雨把白昼拉成白色的布片

走一段秘密的路的心
惊喜像抓一个雷

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颓弱的人群啊
惊心的是这过多的牺牲者

等闲者的幸福是有限的
苍天都不言语

有人分析说,由于田贲 1941 年到奉天参加反满抗日地下工作,之后,于家麟加入国民党,田贲跟他分道扬镳,划清界限,所以才没有寄给他。诗中“我连一页信签也不屑剪寄”就是有力的凭证。也有人有不同看法,说:诚然,田贲直言不讳地批评于家麟被“田园风味麻痹”,并讽刺说“等闲者的幸福是无限的”。但他的批评是诚恳和推心置腹的,田贲述说自己“走一段秘密的路的心”,“梦里都是惊恐”,“生活紧紧地抓住我,再没有工夫去梦想夜莺和白云”。显然,他连保密的纪律都不顾忌,善意地劝说开导于家麟不要再做“等闲者”,而要投入更大更艰苦的斗争中。这是田贲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他之所以没有寄给于家麟,不应当如站在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的那样,是与于家麟保持距离,而是这首诗过于真挚,以至于忽视了地下工作的纪律。而党组织在他做地下工作时曾提出要求与盖平断绝来往。正因为田贲意识到了这一点,才没有寄出。没有寄出是他纪律性强的表现,而诗本身是他与驼子友情的流露。

于家麟确曾写过一些田园风味较浓的诗。批评严重一点说是被“田园风味麻痹”也无妨。如:

小山

(署名:迢迢)

小山上也有野火吗?
 石竹花延烧了一面山坡。
 野石竹也过于红了,
 红,深红,更深红,
 更深红是炽着底火焰哪!
 闲步人悠然地踏过,
 小心灼了游履呢。
 静静里,山灵的梦太隐沉,
 山风哑然笑了,
 小虫也沉入了思索。
 小山的日子更长了,
 日光老恋着山顶的油绿,
 牧子招一招手,
 羊群流下山腰。

牧子的鞭再响一声，
鞭梢抽落了夕阳呢。

这是一首田园牧歌，原载大连《泰东日报》1937年8月22日，正是他们成立“鲁迅文学研究社”之初。这一时期，驼子写了许多这样的短诗，刊于《泰东日报》等报刊。有时候一期就有好几首，如同年8月9日的《泰东日报》，署名为“迢迢”的诗歌有《盛夏的小草》《旧扇》《家》《秋》等，诗风与《小山》类似。《小山》是他早期作品之一，小诗轻松恬淡而又明快亮丽。以疑问句开头，在叙事诗中很少见。“小山上也有野火吗？”始于作者的第一感觉，诗篇起得突兀，然后娓娓道来，把野石竹的“红”写得淋漓尽致，风采照人。如果说，把红的野花比作“炽着底火焰”算不得天才，但小心这火焰“灼了游履”的通感夸张却绝对会让人惊奇！对那山风、小虫、日光、绿的观察细致入微，对那牧童、鞭子、羊群、夕阳的描写流淌着静谧和韵律。我们不仅惊叹诗人对美的欣赏力，也佩服他雕词炼字的功力。“日光老恋着山顶的油绿”中的“恋”不仅写出了白日渐长、阳光明媚，并赋予日光以生命、以意志，已经着实值得我们品评赞叹，但接着读，很快就淹没到更美更大胆奇特的想象里了。你看，“羊群流下山腰”“鞭梢抽落了夕阳”这两幅画面，因为巧用了“流”和“抽落”而动感十足，活灵活现。诗人对生活、对大自然、对美景的发现和描摹能力之强，足见他的功力之深。而我们却认为是野石竹的火焰般的红，映照出诗人胸膛里那颗年轻火热的心，才是这首看似不经意的小诗充满意蕴的力的源泉。

后来，于家麟是否仍沉湎于“田园风味”，我们未能搜集到更多于家麟的作品，无法得出结论。不过，有三方面的事实是确实的：一是田贲去奉天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之后，于家麟等人加入国民党并为国民党提供情报；二是利用文艺的武器发动组织青年学生出版《辰星》《大地》秘密刊物，创办“秋灯书店”，组织“青年自觉社”；三是写了许多如上面引用和分析过的号召力、战斗性很强的诗歌和作品。这就不应当因为他们后来在政治观点和立场上的不同，而对他们在东北沦陷时期所从事的进步文学活动做出厚此薄彼的评价，甚或夸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如果这样，就无法解释他们在组织青年读书活动特别是掩护李季风等方面的默契合作，更无法解释他们在敌人狱中的配合斗争。

驼子的爱国思想和文学才华，是受家庭、社会文化潮流影响的，是他刻苦学习吸纳先进思想和前人的艺术营养而取得的。驼子的父亲是奉系军阀张作霖麾下的一个中层军官，当然是不断地参与当时国内的军阀混战，为张作霖争权夺地；在此同时，

他们也深深感到自身背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伸过来的魔爪的威胁，特别是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特务炸死以后，在驼子的家乡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日情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盖平县很快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殖民地，当时正在盖平中学读书的驼子，深恶痛绝日本侵略者对殖民地学生的奴化教育，愤然退学，在家自学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这期间驼子从奉天、新京的书店里购买了大量的进步书刊，他不仅如饥似渴地阅读，还推荐给住在同街（就是当时叫盖平县天台街）的朋友门文东、王锡成、张克恩和在盖平中学读书的同学们读，宣传进步思想。我父亲门文东回忆他在1934年前后从驼子那里借到的书籍有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灭亡》、高尔基的《母亲》等。当时我还有点不相信，以为是父亲把后来看过的这些书，误记成年轻时读过的了。因为这些书，我是在50年代读大学时才阅读过的，他怎么能在20世纪30年代就阅读了呢？当时父亲是身处东北沦陷区的一个边远的小县——盖平县啊！后来我听“星火”同人王锡成、铁汉、李昌毓等人都这么说，才确信我父亲的回忆没有错。这说明了驼子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熏陶和哺育的。

另外，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驼子和他的朋友们最爱唱歌，一个人在家里也唱，几个人聚会也唱，我父亲还从我外祖父家拿来留声机划着唱片学着唱，我们这些孩子也都能哼上几句，就是哼不完整。时隔60多年，还记得一些词句，其中有：《开路先锋》歌词是“轰！轰！轰！哈哈哈哈哈，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哪怕高山千万重……”；《筑路歌》歌词是“嗨哟嗨哟嗨哟嗨哟，大家一起流血汗，哎嗨哟，哪怕铁碓重如山……哪怕日晒筋骨酸”；《花木兰》电影插曲歌词是“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乡，照进我的窗，照在我的床”；《渔光曲》歌词是“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滩迎面吹过来大海风，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世间穷，爷爷留下的破渔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夜半歌声》歌词是“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走着狸牲，在这漫漫的黑夜里，谁同我等待着天明”；《莲花落》歌词是“我们都是没有饭吃的穷朋友，穷朋友。采枝花儿开，一个一枝莲花，饥饿道上一块走，一块走……马路上太阳人人有，大家有……”等。这也可以成为驼子他们受到“五四”新文化熏陶的佐证。

附录

1.“星火”同人、读书会成员与“桃园工作”案件关系人简介

花喜露 满族，满姓伊拉里·华色，笔名田贲、灵莎、L·S、哭夜郎、田芜、米凯、铁讷、黑田贲夫、青山草草、山川草草、念奴金、东门焕、公孙燕、提耳、洪芦、曾鲁、王瞻、弱士等。1912年生，1934年奉天省立第三师范（校址在海城）毕业后回原籍盖平县，历任归州两级小学校、团瓢分校、正黄旗康宁堡国民优级学校、熊岳第二优级学校教员。从1936年起和于家麟、李光海、王克范等，在盖平县组织“鲁迅文学研究社”，创办《行行》《星火》等刊物，宣传反满抗日思想，进行反满抗日活动。1941年到奉天以大东区凌云街公所职员身份为掩护，进行情报工作。1944年4月初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4月28日被捕，被日伪判刑15年。1945年8月19日，日本投降后出狱。因在狱中受酷刑致重病，于1946年6月13日去世。“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成叛徒，其子花友藩受迫害。1985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主要作品有：小说《幽静的山谷》《凌云街的惊异》《荒城故事》《挣扎》，诗集《黑书》《奴隶之歌》，杂文《塔·城·一切建筑》《观剧书感》等。

于家麟 笔名驼子、条条、灵昭、迢、迢迢、马它、贺草、马曳重、穆阿鹿等。1913年生，在盖平中学读书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不久，盖平县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不能忍受日伪的奴化教育，愤而退学，在家自学和从事文学活动，与花喜露等成立“鲁迅文学研究社”，创办《行行》《星火》刊物，还经常在《诗季》《明明》《泰东日报》《大阪每日》等日伪报刊上发表诗文。1941年经王觉（营口地区地下国民党组织负责人）、李光海介绍，加入了地下国民党。并和王觉、李光海等到新京（长春），组建新时代出版社，出版了《朝鲜短篇小说选》《法国败了》，正准备出版《英国向何处去》，日伪进行“一二·三〇”大逮捕，逃回盖平县，1942年至1943年，与门文东、王锡成、张克恩等创办了“秋灯书店”，组织盖平第一、第二和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学生开展“读书会”活动，并创办了《大地》《辰星》油印刊物，进行反满抗日活动。1944年5月初，被日伪特务逮捕，1945年8月9日被通知判死刑，8月15日伪奉天高等法院对他宣

判时日本投降,8月19日出狱,受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委派回盖平县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并任书记长。9月份国民党长春某党部,又委派刘文斗为盖平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随之而来的还有张希鹏、赵洪发、林育明等。先说于家麟的党部是假的,将其撵回家,后又要求与之合作,遭于家麟等人拒绝。1946年任盖县中学(今盖州熊岳高中)教员,1951年镇反时,被判15年徒刑,1954年沈阳审判时作为证人揭露日本战犯对“星火”同人的镇压罪行,刑满后回盖平县原籍,1979年去世。作品有《砂风曲》等。

王克范 笔名矜人、竹人,1913年生。1934年从奉天省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历任盖平县蚂蚱庙小学、尚和寨国民优级学校、永安屯国民优级学校教员。1936年成为“星火四友”之一。1944年5月初被捕,1944年10月在日伪特务酷刑折磨下,死于“奉天北陵留置场”。1985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光海 笔名铁励,1913年生,1934年从奉天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后任伪满复州湾盐务分局局长,加入国民党地下组织。1936年同花喜露、于家麟、王克范等一起组织“鲁迅文学研究社”,创办《行行》《星火》刊物,1941年春同王觉、于家麟等到新京(长春)创办新时代出版社,同年“一二·三〇”事件后逃往关内,流亡到重庆,后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卫生部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北大荒劳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

郭世魁 笔名光慈,1914年生,花喜露在盖平中学(初中)、奉天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和在归州两级小学教书时的同事。离休前系盖平县盖州高中教师。

门文东 笔名铁键,1915年生,伪满时盖平县馥馨香铺会计,地下国民党员,因积极参与“星火”同人反满抗日活动,在1944年5月初被日伪特务逮捕,判无期徒刑。1945年8月19日出狱回盖平县,在于家麟组织的盖平县国民党县党部任总务科长,被长春派来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文斗撵出后,去沈阳经商,退休前系沈阳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干部,1999年去世。

王锡成 笔名夕澄,1915年生。伪满营口义和利药店学徒、忠信昌药店店员,《营口新报》《星火》副刊汇稿人,积极参与“星火”同人反满抗日活动,1944年5月被捕,被判处15年徒刑,1945年8月19日出狱回盖平县,在于家麟组织的国民党县党部任宣传科长,被长春派来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文斗等撵出后,参加八路军,离休前系辽宁省新华书店副经理。1954年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时,出庭控诉日本战犯罪行。

方庆文 原名葛成武,笔名葛雷,1918年生,伪满海城师范学校毕业后任盖平归州小学、熊岳康宁堡小学教员,因送《星火》刊物被日伪逮捕拷打,后被扔进大石桥日本宪兵队的狼狗圈被咬死。

张克恩 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毕业后,任盖平县兴农合作社仓库保管员。因仓库失窃遭日伪逮捕,不久释放;因积极参与“星火”同人反满抗日活动,1944年5月被日伪特务逮捕,判刑15年,1945年8月19日回盖平县家乡务农。去世较早。

张吉宽 笔名殷拳,1922年生,伪满盖平归州小学、盖平一高、吉林师道大学学生。系国民党地下党员。因参加“星火”同人反满抗日活动,1944年被捕,被判刑20年。1945年8月19日出狱后未回盖平,不久去世。

郁其文 原名郁庆令,笔名铁汉、苏生、芷莎郎,1923年生,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参加“星火”同人反满抗日活动;毕业后去新京任《新潮》编辑,1944年4月被捕,被判10年徒刑。1945年8月19日出狱后,曾到盖平县于家麟的国民党县党部任宣传科干事,后任中共沈阳城工部学联秘书、《沈阳日报》编辑,1957年被错划“右派分子”,在遭受迫害下乡劳动改造的恶劣条件下保存花喜露手稿,改正后任《沈阳日报》主任编辑、辽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一个军官与两个隐身女》《神秘的红叶》等长篇小说。1997年去世。

鲁启智 笔名鲁琪、华春,1924年生,伪满盖平第一国高、新京(长春)王道书院学生。因从长春为秋灯书店捎书,帮助“星火”同人办事,1944年被捕,判处5年徒刑,1945年8月19日出狱后,参加革命,离休前系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北大荒的故事》《小兰的故事》《女人》《车站·秋雨·他和她》《春耕的时候》等。

李昌毓 现名李实,笔名舒啸、狂奔,1924年生,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参与“星火”活动,领导一高进步学生参加秋灯书店读书会,主编《大地》油印刊物。1944年5月被捕,判刑5年,1945年8月19日出狱后参加革命,离休前系山西省农牧厅机关党委副书记,2002年去世。

臧永昌 笔名臧晶、臧青镜,1927年生,伪满盖平县第二国高学生,领导二高进步学生积极参加“星火”同人组织的读书会,主编《辰星》油印刊物,1944年5月被捕,被判5年徒刑,1945年8月19日出狱,参加革命。离休前系辽宁省成人教育研究所《职工教育》编辑部编审。

迟金镇 笔名赵更,伪满盖平县第二国高学生,因积极参与读书会反满抗日活动,1944年被捕,1945年8月9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5年徒刑,1945年8月19日出狱。

杨士锦 笔名杨波,1925年生,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参与油印刊物《大地》的出版、投稿和读书会活动。1944年5月被捕,在盖平县警察署和奉天第一监狱受刑,1945年5月4日,在伪奉天省高等法院被宣布“犹豫执刑”狱外监督。退休前系鞍山市自来水管道的工程公司干部。

李吉恒 笔名毅夫,1923年生,李季生的弟弟。花喜露在归州小学任教时的学生,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新京记者养成所学员、长春某报社编辑。在长春被捕后于1944年8月10日与鲁启智、冯策勋、王家貽、阎家珍一起押解到盖平县。退休前系鞍山市自来水管道的工程公司干部。

高玉元 笔名兰丁,1928年生,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为《大地》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退休前系辽宁省盖平县第一工业局副局长。

鲁启仁 鲁启智的弟弟。伪满凤城国高毕业生。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刘永良 笔名刘英、赤婴,1922年生。伪满盖平归州小学、盖平第一国高的学生。积极向《大地》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洪声钜 1921年生,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参与《大地》出版和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行”放回家监督,日本投降后参加革命,离休前系国家标准局设备监督局副局长。

关云车 原名关振国,1922年生,伪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参与《大地》的出版和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日本投降后参加革命,离休前系吉林省体育学院教授。

张文庭 1928年生,伪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参与《大地》出版和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宣布“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日本投降后在沈阳从事建筑工作。

赵庭奎 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向《大地》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于恩惠 笔名洁心,1925年出生,伪满盖平县第二国高学生,参与油印刊物《辰星》的出版、写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离休前系盖县盖州高中副校长。

孙世藩 笔名舒展,伪满盖平第一国高学生,因参与向油印刊物《大地》《辰星》

投稿和读书会,于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赵俊九 伪满盖平第一国高学生,因参与向油印刊物《大地》《辰星》投稿和读书会,于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赵怀藩 伪满盖平第一国高学生,因参与向油印刊物《大地》《辰星》投稿和读书会,于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刘兆祺 1923年生。伪满盖平第一国高的学生,因参与向油印刊物《大地》《辰星》投稿和读书会,于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吴鸿显 笔名吴山。伪满盖平第一国高的学生,因参与向油印刊物《大地》《辰星》投稿和读书会,于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赵宝峰 伪满盖平第一国高学生,因参与向油印刊物《大地》《辰星》投稿和读书会,于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李如东 伪满盖平第一国高学生,因参与向油印刊物《大地》《辰星》投稿和读书会,于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张登玉 伪满盖平第一国高学生,因参与向油印刊物《大地》《辰星》投稿和读书会,于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李连泰 伪满盖平第一国高学生,因参与向油印刊物《大地》《辰星》投稿和读书会,于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陈玉立 伪满盖平第一国高学生,因参与向油印刊物《大地》《辰星》投稿和读书会,于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王祖烈 伪满盖平第一国高学生,因参与向油印刊物《大地》《辰星》投稿和读书会,于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

回家监督。

潘作佩 伪满盖平第一国高学生,因参与向油印刊物《大地》《辰星》投稿和读书会,于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秦玉筠 伪满盖平第一国高学生,因参与向油印刊物《大地》《辰星》投稿和读书会,于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孔庆举 笔名羽羊,1923年生,伪满营口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学生,因是花喜露归州小学时的学生,和盖平县“星火”同人有联系,被日伪特务逮捕,于1945年5月4日,被“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后参加革命,离休前系辽宁省出版局局长。

汪士硕 1924年生,营口第一国高学生,是王克范在蚂蚱庙小学教书时的学生,与“星火”同人有联系,1944年被捕,1945年5月4日被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退休前系营口鲅鱼圈渔场主管会计。

王盛伦 1928年生,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参与出版油印刊物《大地》并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日伪逮捕,在伪奉天第一监狱受酷刑致死。

门恩义 笔名辰藩,1926年生。伪满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积极参与出版油印刊物《大地》并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在伪奉天第一监狱受酷刑致死。

周建涛 伪满盖平县第二国高学生,因参与地下油印刊物《辰星》的出版并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王德祥 伪满盖平县第二国高学生,因参与地下油印刊物《辰星》的出版并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王永泰 伪满盖平县第二国高学生,因参与地下油印刊物《辰星》的出版并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王丹群 原名王凤云,曾用名田丹,女,1922年生。伪满吉林省九台县城关女子小学、盖平县归州村两级小学、盖平县立女子中学、奉天省立第三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学生,盖平县归州国民优级学校教员。1943年到奉天装作家庭妇女掩护花喜露做地下情报工作,与其结婚。女儿铁虹出生14天时花喜露被捕,受狱外监视。离休前系辽宁中医学院人事处副处级干部。

孙萌 原名侯庚芝,笔名潜萌、施弟,女,1927年生。伪满盖平县女子国高学生,因参加《辰星》出版并投稿,参加读书会,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1946年参加革命,先后在《安东日报》《辽东日报》《东北日报》《辽宁日报》做编辑工作,1954年被错定为“胡风分子”受迫害,“文革”中到岫岩插队,粉碎“四人帮”后回辽宁日报社工作,离休前系《辽宁日报》责任编辑。

姜静芳 笔名银燕,女,1928年生,伪满盖平县女子国高学生,积极参与《辰星》的出版并投稿,参加读书会,曾在伪满著名刊物《麒麟》上发表诗作。1944年5月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离休前系沈阳市公安局干部。

穆玉琪 简称琪,笔名雅枫、枫君,现名穆子枫,女,1926年生,伪满盖平县归州小学、盖平女子国高学生。1944年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后参加解放军,离休前系大连市物价局局长。

赵俊芬 女,1927年生,伪满盖平县女子国高学生,参加读书会和为《辰星》投稿等反满抗日活动,1944年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离休前系辽宁省总工会干部,是臧永昌的妻子。

张慕兰 女,伪满盖平县女子国高学生。参加读书会和为《辰星》投稿等反满抗日活动,1944年被捕,1945年5月4日被伪奉天省高等法院判处“犹豫执刑”放回家监督。

陈抗 1920年生,伪满建国大学学生,因《辰星》刊登其诗歌于1944年被日伪逮捕。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市教育局局长、国家外交部日本科科长等职。

李季生 1922年生,姜静芳的丈夫、李吉恒的哥哥。伪满洲国通信社“满文”部校对员、编辑。做地下工作,被日伪逮捕,后释放。离休前系沈阳市公安局处长。

许庆春 笔名雷力普,伪满营口义和利汉药店学徒,王锡成的同事,和“星火”同人有联系。1944年被捕,受酷刑致死在狱中。

许默语 笔名噩疋、魔女,与许庆春为叔侄,曾在伪满《诗季》发表诗作《春》等,1944年被捕,受酷刑致死。

李勤圃(李勤甫、李琴朴) 1893年生。商人,伪满盖平县“秋灯书店”经理。1944年5月被捕,因受酷刑出狱后不久死去。

马灿洲 王锡成在营口义和利汉药店的师弟。1944年5月受牵连被捕。

石攻 伪满瓦房店国高学生。1944年5月受牵连被捕。

冯连韬 于家麟的表弟,因于家麟躲在他家,受牵连被捕。1954年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时作证并出庭控诉。

陈子荣 馥馨香铺二掌柜,因于家麟是香铺财东、门文东是香铺会计,1944年受牵连被捕。刑讯致疾出狱不久死去。

郝慧 营口市立同德国民优级小学教师,以成立诗社为掩护,进行抗日活动,被日伪特务机关逮捕。

杨伯甫 1925年生,伪满奉天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学生,姜宗璜的同学,花喜露影响下的读书会成员,因掩护孙萌被日伪逮捕,受酷刑致疾,出狱后不久死去。

孙世箴 1925年出生,伪满奉天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学生,杨伯甫的同学,花喜露影响下的读书会成员,因掩护孙萌日伪逮捕时逃跑后参加革命,妻子被打流产致疾。

姜毅 原名姜宗琰,1916年生,姜静芳的哥哥。伪满后期在花喜露领导下,以在伪满奉天飞机制造厂当工人为掩护做地下工作。1944年4月底田贲被捕后入关,进入胶东根据地。离休前系中共中央调查部局长。

陶焰 原名姜宗璜,又名陶炎,1924年生,姜静芳的三弟。伪满奉天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读书会成员,1943年入关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前系中国科学院沈阳林土(应用生态)研究所所长。

姜涛 原名姜宗璐,1928年生,姜静芳的小弟弟。伪满盖平县正黄旗村康宁堡小学、清原县国民高等学校学生。1947年入关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前系鞍山市政府秘书长。

齐雨藻 1927年生,伪满盖平县国高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暨南大学水产研究所所长。

王孝先 1927年生,伪满盖平县国高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辽宁省粮食学校主任。

臧光华 1922年生,伪满盖平归州小学、奉天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读书会成员。退休前系北京第三人民医院医生。

石岱宗 后名卞和之,笔名力飞,1923年生。花喜露在盖平县归州国民优级学校时的学生,在本溪国民高等学校读书时组织读书会。1943年入山海关参加革命。离休前系沈阳戏剧学校办公室副主任。

孙启民 原名马熙文,1923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河南省洛阳工学院副院长。

李素勤 又名李泽芝,女,1924年生,伪满本溪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河南省洛阳铜加工厂中央实验室主任。

李季冬 笔名胡沙、李桦。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1943年7月入山海关参加革命。

李太岩 笔名风荫,后名李侃。1922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北京中华书局总编辑。

孟方平 笔名广远,1920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1944年先于花喜露被捕。退休前系沈阳市于洪区北陵乡水稻技术员。

邓周立 原名邓崇仁,1924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召集人,1943年8月入山海关参加革命。离休前系武汉市中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肖明伟 又名肖工,1924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2672工厂厂长。

刘金黎 原名刘震一,1924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本溪市人大常委会干部。

肖彦 原名肖承善,1924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沈阳铁路局机械学校工会主席。

施承芬 女,1925年生。伪满本溪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2672工厂总经济师。

燕西仲 女,1925年生。伪满本溪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沈阳市化工原料公司支部书记。

张村夫 原名张万昌,1925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吉林市政府副秘书长。

程维国 1925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湖北省长江航运科学研究所所长。

崔凤钧 1926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本溪市体委副主任。

刘竹欣 原名刘桂珍,女,1927年生。伪满本溪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协作办公室处长。

霍松军 又名霍秀兰,女,伪满本溪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

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河北地质学院副教授。

刘威一 1927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本溪市公安局交通大队队长。

刘晰戎 原名刘喜荣,1927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中国煤矿科学院太原分院副院长。

马魁明 1929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本溪市检察院检察长。

朴莘 原名朴明霞,女,1927年生,伪满本溪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湖北医学院基础系党总支部书记。

王觅 原名王淑贤,女,1927年生,伪满本溪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江西省科技情报所所长。

李激东 原名李桦,1927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北京市总工会文工团团长。

王哲 原名王景成,1925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中国有色金属协会副会长。

李宝鼎 1927年生,伪满本溪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干部。

王勇 女,1927年生,伪满本溪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花喜露影响下的本溪读书会成员。离休前系黑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

王觉 1917年生,1930年在营口商科高级中学毕业后,在营口从事反满抗日活动。曾任《营口新报》文艺副刊编辑,帮助“星火”同人将进步文章发表在《营口新报》文艺副刊上,自己也在报纸上刊载过多篇作品。地下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干。1942年1月13日,在长春被日伪警特逮捕,5月13日死于重刑之下。

田琛 原名王耀纪(季),盖平县归州镇人。李季生的姨父。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日本留学生救国会成员,介绍花喜露参加抗日救国会。回国后以伪满国务院官需局属官为掩护,担任中共地下党新京(长春)负责人。

贾玉冈 又名贾毅,花喜露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时的上级领导。离休前系中共中央调查部干部。

侯洛 花喜露的同乡和盖县西关中学、奉天第一中学时同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留学日本,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日本留学生救国会成员。花喜露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时的上级领导。离休前系中共天津市委调查局局长。

三宅秀也 日本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伪满洲国简任一等警正,1944年7月由伪满治安部警务司警务科长转任伪奉天省警务厅长兼地方保安局长。1944年5月在全东北对地下国民党进行大逮捕之际,对伪奉天省警察官下达“桃园工作”命令,于1945年6月对逮捕审讯“桃园工作”警察颁发奖状、奖金。1956年沈阳审判的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监狱,后释放回国。

前渊秀宪 日本人,伪满洲国警佐,1944年7月1日由奉天省警务厅特务股长调到盖平县警务科任特务科长。负责“桃园工作”案件侦破、逮捕、审讯。1954年沈阳审判时曾提供笔录和检举书。在对被告三宅秀也作证时称: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对“桃园工作”中逮捕的于家麟、李勤甫、门文东等约300余名中国爱国者进行监禁拷问。其中,奉天市约30名,本溪市约100名,营口市约100名,盖平县约60名,海城县约10名。

根川尤夫 日本人,伪满奉天市警察厅铁西警察署特务主任、警佐。1954年沈阳审判时,揭发“桃园工作”事件:1. 1942年5月,在海城县发现青年反满抗日组织,根据海城地方保安局理事官(特务科长兼任)中村宣也命令特务股长井上嘉男逮捕5人;2. 根据伪满地方保安局长森田贞男的命令,1944年3月至6月,在奉天(沈阳)、本溪、营口、海城、盖平共逮捕以国民党东北党部负责人罗庆春、张宝慈为中心的中国青年反满抗日组织318人;3. 1944年9月,根据伪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等在奉天市兴亚墅召开省特务科(股)长会议布置,审讯后送检察厅人数:奉天25名,海城3名,盖平32名,营口、本溪等地40多人。

下川岩 日本人,1943年5月至1945年8月15日,任伪满奉天省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指导和直接审理“桃园工作”案件。1956年沈阳审判时供认:盖平县逮捕50人,送检察厅审理30人;本溪逮捕15人,送检察厅审理10人;辽阳逮捕15人,未送检察厅审理。

矢野 日本人,审判田贵等人的伪满洲国奉天高等法院法官。

2. 主要参考文献与伪满洲国文学研究成果

姚远:《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东北文学》1946年新年号。

林里:《东北散文十四年收获》,《东北文学》1946年新年号。

李文湘:《过去十四年诗坛》,《东北文学》1946年新年号。

林里:《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东北文学》1946年新年号。

孟语:《沦陷期的东北戏剧》,《东北文学》1946年新年号。

[日]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の研究》,日本劲草书店,1971年。

吕元明:《论伪满的文化》,《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

姜椿芳:《金剑啸与哈尔滨革命文艺活动》,《辽宁社会科学研究所》内部交流,1980年。

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

李平、铁汉:《作家李季风越狱牺牲纪略》,《东北文学研究资料》第3辑,1981年。

山田敬一、吕元明:《十五年战争与文学》,[日]东方书店,1981年。

吕钦文:《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学术研究丛刊》1982年第3期。

王秋萤:《东北沦陷期文学概况》,《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3年。

张毓茂:《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以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期。

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1—11辑,1980—1989年。

哈尔滨业余学院(陈隄编):《东北文学研究丛刊》,《东北现代文学研究史料》第1—7辑,1984—1988年。

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地下文学》,台湾正中书局,1985年。

王秋萤:《东北日伪统治时期文艺社团的发展》,《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4期。

王建中等编:《东北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

冯为群、李春燕:《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内部交流,1987年。

李春燕:《关于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研究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

期。

李瑞腾:《抗战文学概说》,台湾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年。

营口市人民政协:《营口文史资料》第3辑、第7辑。

吕钦文:《东北沦陷时期的乡土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

东北现代文学史编写组:《东北现代文学史》,沈阳出版社,1989年。

张毓茂:《东北新文学论丛》,沈阳出版社,1989年。

沙金成:《东北新文学初探》,重庆出版社,1989年。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

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辽宁教育史志资料》(4辑6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内部交流,1990年。

[日]川村湊:《异乡の昭和文学——“满洲”与近代日本》,[日]岩波书店,1990年。

营口市人民政协:《辰州星火》,《营口文史资料》第9辑,1991年。

冯为群、李春燕:《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

申殿和、黄万华:《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

冯为群、王建中、李春燕、李树权:《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出版社,1992年。

山田敬三、吕元明主编:《中日战争与文学——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孟庆枢:《日本近代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

邢富君:《从荒原走向世界》,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2年。

孙邦主编:《伪满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

王建中、卞和之主编:《东北革命作家田贲诗文纪念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

齐红深:《满族的教育文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

逢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

卢鸿德、齐红深、陈丕中:《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

[日]山本有造:《满洲国文艺之诸相——从大连到新京》,绿阴书房,1995年。

郑新衡:《一二·三〇事件始末》,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

张毓茂:《东北现代文学史》,沈阳出版社,1996年。

吉林省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 39·文化艺术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

齐红深:《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

长春市政协:《回忆伪满建国大学》,长春文史资料第49辑,1997年。

封世辉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关沫南:《春花秋月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

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孙中田、逢增玉、黄万华:《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

齐红深、渡部宗助:《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研究》,内部交流,1999年。

刘丹华:《星火三部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高翔、薛勤、刘瑞弘:《迂曲中的求索——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学论争及社团形态比较》,《求是学刊》2000年第3期。

钱理群:《“言”与“不言”之间》,《新华文摘》2000年第4期。

高翔、薛勤、刘瑞弘:《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研究50年寻踪》,《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张泉:《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文艺报》2000年3月28日。

陈辽:《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艺报》2000年第111期。

张泉:《二论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前提》,《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张泉:《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日]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学》,靳丛林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

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伪满洲国史料》,全国图书馆文献复制中心,2002年。

齐红深:《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张泉:《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谈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史实准确与政治正确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陈辽:《也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历史的原则”——与张泉先生商榷》,《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唐世贵:《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

张连俊:《东北三省革命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黄万华:《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及其研究》,《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孙萌口述、齐红深整理：《我经历的伪满江南文学与读书活动》，《九一八研究》第5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齐红深主编：《“满洲”オーラルヒストリ——“奴隶化教育”に抗して》，竹中宪一译，日本皓星社，2004年。

齐红深主编：《抹煞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齐红深主编：《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辽海出版社，2005年。

齐红深主编：《日本对华教育侵略》，昆仑出版社，2005年。

刘晓丽：《发现的“满洲”——对1932—1945年中国满洲地区文学的一种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刘晓丽：《被遮蔽的文学图景——对1932—1945年东北地区作家群落的一种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刘晓丽：《从〈麒麟〉杂志看东北沦陷时期的通俗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

刘晓丽：《伪满洲国时期文学杂志新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刘晓丽：《从〈艺文志〉杂志看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求是学刊》2005年第6期。

刘晓丽：《幽暗时空中文学的一角——关于〈新满洲〉杂志》，《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刘晓丽：《“实话·秘话·谜话”的传播——以伪满洲国时期的〈麒麟〉杂志为中心》，《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刘晓丽：《伪满洲国的“实话·秘话·谜话”——以〈麒麟〉杂志为例》，《博览群书》2005年第9期。

上官纁：《东北沦陷区文学史话》，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2005年。

刘晓丽：《家园沦陷，文学何为——日本侵略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地方经验之一种：伪满洲时期的通俗文学》，《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1期。

刘晓丽：《伪满洲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观照》，东方学术文库第九卷《中国的前沿：文化复兴与秩序重构》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2006年度）青年文集，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刘晓丽：《伪满洲国时期附逆作品的表里——以“献纳诗”和“时局小说”为中

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4期。

刘晓丽：《系列采访“寻访东北三四十年代作家”》，《社会科学报》2006年6月29日。

刘晓丽：《伪满洲国时期〈青年文化〉杂志考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刘晓丽：《伪满洲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补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刘晓丽：《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以伪满洲国文学何以进入文学史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4期。

刘晓丽：《文学无意构建“新满洲”——〈新满洲〉杂志考述》，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第12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

刘晓丽：《文学无意构建“新满洲”——〈新满洲〉杂志研究》，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2006年第12期。

李春燕：《东北沦陷时期的爱国抗日文学》，《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史料与研究》第1辑，2006年。

张泉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史料与研究》第1辑，2006年。

[美]耿德华著、张泉译：《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新星出版社，2006年。

刘爱华：《孤独的舞蹈——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年。

吴晓明：《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在当前的突破》，《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刘晓丽：《伪满洲国文学研究》，《中文自学指导》2007年第2期。

高柏苍：《高柏苍文集》，辽新内资[2007]第32号。

孙萌口述、齐红深整理、平井润一译：《抗日少女が体验した奉天监狱の生活》，[日]《季刊中国》2008年夏季号。

齐红深：《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大象出版社，2008年7月。

刘晓丽：《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华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SS号= 1 2 8 9 0 6 0 9